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国际秩序与大国关系

- 3 冯绍雷 / 美国对俄罗斯问题的决策争议
和认知差异
- 32 A·克里科维奇, Y·韦伯 / 美国行为的
根源——以美国对俄政策为例
- 47 R·萨科瓦 / 世界秩序: 俄罗斯的视角
- 62 波波·罗 / 两种世界观与世界失序的回
归——新霍布斯式想象与俄罗斯外
交的功能性失调
- 100 初智勇 / 意识形态对俄罗斯国家对外目
标的影响
- 134 林精华 / 人文学术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张
力——冷战时代英美斯拉夫学界对
苏联的文学把握

乌克兰研究

- 179 杨友孙 / 乌克兰地方自治: 问题、改革
与前景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冯绍雷

副 主 编: 陈大维 (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 杨 成

本期编务: 阎德学

封面设计: 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 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 年 4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6年第2期(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Фэн Шаолэй

Споры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и когнитив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в политике СШ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3)

А.Крикович, Ю.Вебер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 на пример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СШ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32)

Р. Саква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оссии..... (47)

Бобо Ло

Два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и возврат мирового беспорядка–Нео-гоббсовское воображение и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62)

Чу Чжунюан

Влияние идеологии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России... (100)

Линь Цзинхуа

Напряжение между гуманитарными наукам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ой
—Изуч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и британскими славистами во времена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34)

Ян Юсунь

Местно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 в Украине: проблемы, рефор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179)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6 年第 2 期 (双月刊)

Contents

Feng Shaolei

Decision Disputes and Perceptual Differences of U.S. Policy towards Russia (3)

Andrej Krickovic, Yuval Weber

Sources of American Conduct (Towards Russia)..... (32)

Richard Sakwa

World Order: The Russian View (47)

Bobo Lo

Two Worlds and the Return of World Disorder: Neo-Hobbesian Vision and Dysfunction of Russian Diplomacy(62)

Chu Zhiyong

Ideological Influences on Russian National Foreign Goals (100)

Lin Jinghua

Tension between Humanistic Scholarship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glo-American Slavic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n Soviet Literature during the Cold War.....(134)

Yang Yousun

Local Autonomy in Ukraine: Problems, Reform and Prospects..... (179)

国际秩序与大国关系

美国对俄罗斯问题的决策争议和认知差异*

冯绍雷**

【内容提要】 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争后，美国的决策界对于俄罗斯问题出现了不少争议。鉴于美国国内政治主张的多样性，以及决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我们通过四个方面来观察美国对俄认知的起落变化与发展趋势：第一，美国核心决策层对当前俄罗斯问题的基本看法；第二，美国研究界包括各智库对俄罗斯战略的不同立场；第三，美国具有广泛影响的前政要的观点；第四，美国选战热潮中的各位总统候选人以及大众媒体对俄罗斯问题的态度。可以看出，在意识形态主导美国对俄关系的状况下，美俄关系难以短时期内实质改善，而双方共识匮乏造成的误解，难以避免未来冲突的延续。因此，中国在美俄之间的理性定位，对于自身乃至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的健康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 美国对俄罗斯 决策争议 认知差异 意识形态化

【中图分类号】 D87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6)02-0003(29)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冷战后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思想谱系”（项目批准号：11JJJDJW003）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国通史（六卷本）”（项目批准号：11&ZD13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节本收录于杨成绪大使主编的《美国与战后世界秩序——新时期美国何去何从？》一书，即将出版。经征杨大使的同意，发表于此。

** 冯绍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一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争后，美国的决策界对于俄罗斯问题出现了不少争议。其中不少乃是近二十五年来一直在讨论的话题，不过因危机情势而更显突出；而有些则是冷战时期延续下来的传统议题。在国际局势迅速变动、包括美俄两国国内政治生态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背景之下，上述争论经久不息，时而有被激化的趋势。鉴于美国国内政治主张的多样性，以及决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本文通过着重阐述下述四方面问题，来观察美国对俄认知的起落变化与发展趋势：第一，美国核心决策层对当前俄罗斯问题的基本看法；第二，美国研究界、包括各智库对俄罗斯战略的不同立场；第三，美国具有广泛影响的前政要的观点；第四，美国选战热潮中各位总统候选人以及大众媒体对俄罗斯问题的态度。

一、美国对俄认知状况的一些基本背景

首先，总体上来说，美国对俄罗斯战略决策的形成和执行过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当中，有体现为美国战略意志和决策的一些共同理念和国家利益背景的驱动，但经常也会出现非常矛盾的状况，反映出美国国内五花八门的利益集团背景的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复杂局面。

一般而言，这里既有国家的对外决策部门、议会与党派集团、军工集团、安全部门、学界智库等各个方面的相互制肘，也有金融和财政系统、公司、地方机构以及大量非政府组织等各种参与者之间的复杂博弈。大致说来，2003-2004年以后，美国各界对俄认知逐渐呈现负面状态，至乌克兰危机、特别是克里米亚事件发生而达到顶峰。为什么美国对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内外政策表现出总体的不信任？在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 Lukin）看来，其基本原因在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左右着美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此同时，也受到华尔街和美国银行体系本身利益的深刻影响。^①笔者认为，如果说，卢金教授所言仍是美国对俄认知的一般状况的话，那么，当下美国对俄认知则具有从冷战时期美国和西方学界的“苏联学”，到上世纪80-90年

^① “US unwilling, unable to comprehend situation in Ukraine, Russia – expert”, 16 July 2014, http://sputniknews.com/voiceofrussia/2014_07_16/US-unwilling-unable-comprehend-situation-in-Ukraine-Russia-expert-9972/

代的“转型学”，一直到新世纪以来的“威权学”这样一个学理变化的深层次背景。换言之，美国对俄认知得到了学术过程的支持^①

的确，美国对俄战略形成和运作过程，包含了各种不同立场的理论和思想趋向：第一，权力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叙事相互交织，强调美国强权的至高无上作用。奥巴马所言称的，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②大体是这样一个背景的集中体现。第二，美国战略决策形成过程包含有全球主义与孤立主义相互交织的深刻背景，这种全球主义既来自多元自由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更具有扩张进取精神的若干思想派别的影响，而美国孤立主义也始终没有放弃对于对外战略或多或少的影响力。第三，美国传统的务实主义，特别是以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这一派别，强调国际政治角逐中的不同力量之间的均衡，而非崇尚一味的抗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派力量尽管在中国和俄罗斯研究领域有着比较大的影响，但在 21 世纪以来的美国，这一种声音并不总是影响决策、特别是影响对俄罗斯或对中国决策的决定性因素，甚至经常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除此之外，美国对俄战略还表现出更容易受到国际环境变迁的趋势以及具体情境的影响。比如，美国的全球地位和能力、全球化的实际进程，究竟是有所推进，还是出现倒退？这里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当前趋势，比如，在多大程度上，美国的同盟关系已经被伙伴关系网络所取代？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民众的外交功能，实际上已经比政府的官方外交来得更为重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更多地运用制裁和经济手段来平衡潜在的对手？作为全球头号大国的美国在运筹对俄外交的时候，比较多地受到这些现实因素的影响。^③

① David Art, “What Do We Know About Authoritarianism After Ten Years?”, *Comparative Politics*, April 2012.

② “Obama’s west point speech”, *New York Times*, May 30,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5/30/opinion/obamas-west-point-speech.html>

③ 2016 年 2 月初，笔者在华盛顿参加乔治敦大学安吉拉·斯坦特（Angela Stein）教授主持的有关欧亚问题、以及中俄关系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上，俄罗斯留美学者维塔利·库兹列夫（Vitaly Kozyrev）的一篇文章，题为“US approaches to Russia”的第一部分“General Overview”中做出了相关的描述。

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争以来，随着美俄之间的角逐激化，美国的对俄认知在总体上趋于恶化，几乎处于一个不可逆的态势。许多相当敌视俄罗斯的观点纷至沓来，强调把俄罗斯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和美国权威的新的、上升中的威胁。这种观点主要来自传统的现实主义立场，同时也来自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后者更加强调，如果俄罗斯在事关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方面、或者在事关治理效应的体制方面，取得对美国的优势，那将成为对美国的重大威胁。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争之后，连奥巴马总统也公开把俄罗斯与“伊斯兰国”、“埃博拉病毒”并称为“三害”之一^①，这是美俄关系迅速滑坡的一个关键性标志。

二、美国核心决策层对于当前俄罗斯问题的基本看法

2011年后叙利亚陷入动乱，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一连串重大国际事件标志着奥巴马的中东政策和“重启”对俄关系的战略设计陷入困境。2015年9月底，普京决定以空中打击方式干预叙利亚事件，使得美国总统行政决策系统进一步出现了不同的立场。

其一，奥巴马的举棋不定使得核心决策团队处于对俄被动状态

用迈克尔·克罗利（Michael Crowley）的话来说，普京在叙利亚实行空中打击“这一招使得奥巴马决策系统为了弥补内部裂痕而显得筋疲力尽，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使得奥巴马国家安全决策团队的士气大为低落。在一些主张采取更大胆行动的官员看来，奥巴马似乎表现出在总统任期最后一年时间里，执意不愿意采取任何新的冒险行动。奥巴马团队的现任和前任官员表示，奥巴马本人不愿意对普京采取断然行动这一事实，昭示着美国的软弱和无所

^①“Full text of President Obama’s 2014 addres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4,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full-text-of-president-obamas-2014-address-to-the-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2014/09/24/88889e46-43f4-11e4-b437-1a7368204804_story.html

作为。一位总统办公厅的资深官员认为，‘我们几乎是被动应对，只是等待着趋势变换，以及观察其他行为者所采取的步骤。’”^①

其二，美国在叙利亚战局中行动缓慢与俄的进取态度形成反差

克罗利指出：“在近几年来不直接支持阿萨德政权之后，普京转为直接军事干预叙利亚，这几乎瓦解了奥巴马在取得伊朗核协议进展之后所有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努力。”^②

其三，白宫团队对俄决策的立场分歧

熟悉白宫事务人士表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珊·赖斯和白宫办公厅主任丹尼斯·麦克唐纳在反对不同意见，影响着奥巴马的立场，他们不愿意与叙利亚和俄罗斯事务有关的行动导致美俄冲突升级。“在高层会议上，一些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表示要对普京在叙利亚秀肌肉作出强硬反应，这里也包括克里本人，他主张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而奥巴马的选择事实上面临两难……冷战时期的核威慑专家、国防部长阿什·卡特认为：面对普京的‘挑战’，美国并没有站稳立场。中央情报局主任约翰·布瑞南抱怨：普京轰炸叙利亚反对派的举动没有受到足够的惩罚。一位奥巴马前高官认为：事态表明我们在退让，我们无法对普京施加任何压力。”^③迈克尔·克罗利认为，“奥巴马拒绝采取坚决行动反对莫斯科，这也导致了奥巴马身边几位主张强硬路线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越来越受到孤立。这里说的是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iuland）、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欧亚部高级主任塞雷斯特·瓦伦达（Celeste Wallander）、国防部负责俄罗斯、乌克兰、欧亚事务的部长助理艾福林·法卡斯（Evelyn Farkas）等人，他们的主张没有被采纳，从而使得奥巴马决策系统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没有对其采取强硬武力行动。”^④

① Michael Crowley, “Rift in Obama administration over Putin”, *Politico*, October 13, 2015,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5/10/syria-obama-putin-russia-discord-214677#ixzz3ofZOB yjr>

② Ibid.

③ Ibid.

④ Ibid.

其四，超越党派的对俄政策分歧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中打击行动开始后，民主党内部对奥巴马的批评压力在增加，特别是希拉里·克林顿主张在叙利亚设置禁飞区，克里也主张在叙利亚北部与土耳其接壤地区建立禁飞区。其实，早在2012年，希拉里·克林顿就会合了当时的中情局局长帕特利乌斯（David Petraeus）、防长帕内塔（Leon Panetta），一起提出武装训练温和反对派的建议。奥巴马否决了这一主张。2015年较早时候又重新出现了动议。在奥巴马高级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中，包括克里和当时的防长哈格尔（Chuck Hagel），主张美国应该向乌克兰输送杀伤性武器，包括提供反坦克导弹。奥巴马又一次否决了向乌克兰提供重武器，认为普京会作出很大反响，以作为回报。

对于奥巴马行政当局对俄政策的评价，自然也是大相径庭的。比如，民主党元老布热津斯基曾经公开批评奥巴马完全缺乏对俄罗斯的总体战略，但是，俄罗斯著名评论家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则公开撰文提出：“不能再指望有比奥巴马对俄罗斯更好的（美国）总统了”。^①

卢基扬诺夫的评论看来是有道理的，因为，不仅在两党之间，而且民主党内也在对俄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甚至于在一个决策人物身上，也可以看到既有强硬、又有妥协的两面立场。像克里这样的国务卿，几年来一直主张设立禁飞区，但是，他又反对鹰派所坚持的孤立普京的主张。这一派主张，要一直坚持到普京相信对话能够给他带来好处。又比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反俄坚决，主张运送重武器到乌克兰，但是，他又反对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

三、美对俄政策与认知变化的一个重要背景 ——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合流

从美国对俄政策和认知迅速转向对俄强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侧重于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派别和强调以实力抗衡的保守主义派别这两

^① Fyodor Lukyanov: “Part of the sanctions can fall off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6”, 10.01.2016, <http://southfront.org/fyodor-lukyanov-part-of-the-sanctions-can-fall-off-in-the-second-half-of-2016/>

大阵营的立场出现了大幅度的接近。^①一般而言，前者较多指民主党，而后者较多指共和党，而两党的立场在趋近。通常认为，美国的保守派比较倾向于对俄强硬，而民主党则对俄相对温和。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民主党人，特别是被认为有可能成为 2016 年总统人选的希拉里·克林顿本人的对俄立场趋于强硬，与不少共和党中的强硬派立场相吻合。

叙利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共和党头面人物（如麦凯恩）的很多言行表明了这一点。他们主要强调俄罗斯具有攻击性的过分行爲，指责普京的扩张主义和帝国抱负，强调俄罗斯传统主义和倾向于使用武力，强调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消极作用。认为，由于俄罗斯使用军事手段的潜在结果，势必会对美国产生压力，破坏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努力。他们主张对俄罗斯采取进攻性行动，包括进行制裁、对俄罗斯显示武力，使得俄罗斯在面对西方具有优势的强权发生冲突时不得不实行退却。

在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老资格的外交家、美国最重要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主席、也是一位资深的俄罗斯问题专家特罗布·塔尔博特 (Strobe Talbott)。不少人认为，如果 2016 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塔尔博特非常可能成为希拉里·克林顿未来对俄政策的主要顾问。^②

塔尔博特曾经专门著文表达对普京上台之初就“看透”普京的威廉·法赛的器重。2000 年 1 月稍晚的时候，威廉·赛法就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题为“普京主义已然来临”，指出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新领袖将会是“个人崇拜”、“压制真理”、“俄罗斯大国复苏”这些现象的延续和发展。在以后九年左右的时间里，赛法不止一次地指责普京压制反对者，镇压媒体，流放和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引诱中国充当美国的反对者，尽其一切所能把“近邻国家”纳入俄罗斯势力范围，将俄罗斯文明的母亲——乌克兰充当俄罗斯的粮仓和制造中心，对任何西方进入这一地区的举动耿耿于怀。

在塔尔博特看来，普京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支持暴乱者，只不过是上述逻辑的自然延伸。普京通过军事手段和单边决定吞并克里

① 于滨教授 2014 年秋天在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所作的讲演中，曾经明确指过出这一点。

② Strobe Talbott, “The Making of Vladimir Putin”, August 19, 2014,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4/08/putin-the-backstory-110151>

米亚，并且宣布有权保卫生活在从波罗的海到中亚地区的、作为少数语言族群的俄罗斯同胞和公民。

塔尔博特断言，普京主义不仅违反了国际法，放弃了俄罗斯过去对于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不顾扩大冲突所带来的危险，并刻意营造使另一个主要大国也奉行普京学说的先例（他指出这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正在同越南和菲律宾，以及日本发生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

塔尔博特还认为，普京实现了多年来俄罗斯人无法实现的恢复前苏联体制的愿望，煽动起对布什时期和奥巴马时期美国一系列决策的愤懑情绪，这里包括：2002年美国单边退出反导条约；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间一段，西方支持在两个后苏联国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2004-2009年北约的第二和第三波扩张，把前苏联境内6个国家拉入北约。

塔尔博特提出，普京关于俄罗斯安全的观念，也很像从斯大林直到契尔年科等所有苏联领导人的想法。他认为：事实上，只有俄罗斯的所有邻国都感到绝对安全了，否则俄罗斯自己就不会感到绝对安全。在他看来，在普京时代，俄罗斯成了一个具有妄想症的国家，到处制造敌人。在这样零和博弈的背景下，俄罗斯不可能成为一个值得信赖和建设性的主要大国。

至于如何应对普京，塔尔博特主张双管齐下，即一方面对其进行遏制，用塔的话来说，即使当下不同于冷战，但还是有些近似的；另一方面，鉴于俄罗斯社会还是有相当部分的势力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因此，西方还是需要与其保持接触。美国需要尽其所能保持接触，不要把他们看成第五纵队。在塔尔博特看来，俄罗斯目前的经济状况说明，对普京政策失败的认识正在提升。

如果说，特罗布·塔尔博特是民主党相当权威的俄国问题专家，那么，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则是新世纪以来新保守主义阵营扛大旗的人物。这两位有着丰富的在外交部门工作的经验、但又是来自不同阵营的资深人士，现在面对叙利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的新形势，在如何决策俄罗斯问题上，几乎已经站到了同一条战壕里。比如，罗伯特·卡根认为，大国间竞争的现实影响将取决于美国对此作出何种反应。美国需要强调自己在维持现行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进程中的核心作用，还必须运用自己令人生畏的实力与影响，力挺这一秩序以应对必不可免的挑战。

卡根还提出，俄罗斯和中国都不能再提出“势力范围的要求”。他强调，历史地看，大国之间的战争往往发生在对缓冲地区的争夺之中，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俄国与奥匈帝国之间对于巴尔干地区的竞争。今天的国际环境已经非常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在冷战终结以后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当然，美国并不只是一个地区的强国，它是在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各个地区都存在着的强国，在欧洲、亚洲、中东等地维持着平衡。与过去不同，这样做的结果，是各个大国不再面临对它们自身安全的重大威胁。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几乎同时发生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五日战争”，卡根对此曾明确提出，这是威权政治下的市场制度对自由民主的市场制度的一次“联手挑战”。目前，卡根则着眼于刻画俄罗斯对西方的“离心离德”。俄罗斯可以不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领域与西方竞争，而主要诉诸于军事力量，但他强调，普京攻击的正是作为自由世界秩序基础的安全与稳定。^①

上述塔尔博特和卡根两位资深人物的对俄立场，比较明确地表明：新保守主义的立场没有改变，而自由派民主党人的观点则大大激进化了。这两派的共同立场不但是基于意识形态，而且也鲜明地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影响目前、乃至今后一个阶段美国对俄政策的最具影响力的立场和意见。

四、美国智库多样化的对俄认知与政策立场

美国智库是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智库立场则各不相同。大体而言，既有传统基金会等一类对俄持较为保守立场的智库，也有如卡耐基基金会属下各类研究机构这样比较温和立场的智库。而美国传统基金会欧亚项目负责人詹姆斯·卡拉法纳(James Carafano)所主持的两份最新研

^① Robert Kagan, “The United States must resist a return to spheres of interes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February 19, 2015,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order-from-chaos/posts/2015/02/19-united-states-must-resist-return-to-spheres-of-interest-international-system-kagan>

究报告《美国需要能使俄罗斯力量边缘化的外交政策》^①和《美国对俄罗斯战略》^②，是前一种立场的体现。

其一，美国如何看待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合作

卡拉法纳提出，普京显示实力以支持叙利亚强人阿萨德，这一变化发生在美国国会已经不再能够阻挡伊朗核协议得到通过的那一时刻。这两件事情是否互相关联呢？未必。但他认为，俄罗斯和伊朗在中东地区志趣相投，他们共同的目标是避免德黑兰遭受国际制裁的威胁。伊朗核协议的签订有助于德黑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经济合作。接着，俄罗斯和伊朗就决定走向第二个目标：支持大马士革，开通伊朗空中走廊。俄罗斯对叙利亚的“人道援助”接踵而至，有坦克、军队、战斗机以及各种支持设备，为阿萨德军队输血打气。在白宫眼里，这是重拳一击。

卡氏认为，有人主张，现在是开始跟俄罗斯人讨价还价的时候了。因为难民成潮，欧洲不稳定，伊斯兰国日益猖獗……所以，美国及其盟国可以让普京来帮助灭火。克里姆林宫当然愿意这样做，这是因为，这样可以分散人们对于莫斯科干预格鲁吉亚、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中欧其他地方的注意力。

其二，美国如何应对

卡拉法纳提出，相反，美国应该开始着手对俄罗斯和伊朗施加压力，惩罚阿萨德。紧接着，美国应该和欧洲人一起，就难民问题达成一致。难民问题极其重要。美国应该领导中东地区解决难民问题。最后，美国需要采取切实的军事战略粉碎伊斯兰国对于伊拉克北部领土的控制。这是现在很多问题的源头。对于阿萨德，卡拉法纳主张，美国从来都不同意他可以继续留下。

③

① James Carafano, “US Needs a Foreign Policy That Marginalizes Russia’s Ability to Mess With Us”, *The Daily Signal*, October 2, 2015 <http://dailysignal.com/2015/10/02/two-important-truths-about-the-crisis-in-syria/>

② “U.S.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ward Russia”, Edited by James Jay Carafano,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5/12/us-comprehensive-strategy-toward-russia>

③ James Carafano, “US Needs a Foreign Policy That Marginalizes Russia’s Ability to Mess With Us”.

其三，美国需要全面完整的对俄战略

卡拉法纳提出，美国应该有全面完整的对俄战略，这应该是更为总体的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战略目标——现在，已不再是冷战时候的局面了——即使俄罗斯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对手和美国角力，但它依然不是美国的首要对抗者。

卡拉法纳指出，需要从头来梳理美国对俄战略。他认为，正是因为对俄罗斯的认知偏差，导致长期以来奉行“接触”政策，以为只要通过“接触”，就能够使俄“改邪归正”。因此，俄罗斯被邀请参加 WTO，2008 年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这些变化，也被当作是俄罗斯民主的“重大进步”，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作者尖锐地批评道：“接触”政策的问题实质在于，俄罗斯似乎只是美国人想象中的、而非现实生活中的俄罗斯。

其四，美俄关系的恶化：谁之罪？

卡拉法纳提出，俄罗斯的辩护者们认为，美国需要对俄美关系的恶化负责。他们经常引用的是 1999 年科索沃危机、美国反导系统在中东欧的部署以及北约在一系列前苏联国家的扩张。卡拉法纳认为：这样的主张实际上承认作为新帝国的俄罗斯有权监控其邻居。

在卡拉法纳看来，今日俄罗斯，已非前苏联。无论在意识形态、经济、还是实力规模等方面都是如此。俄罗斯已经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但并非因此俄罗斯就不值得重视。所以，需要搞清楚普京的战略。

卡拉法纳断言：美俄之间的直接冲突会非常有限，但会是非常现实的冲突。美国可以合理地应对长期的博弈，“遏制”政策并不是有效的办法。从长时段的抗争而言，俄罗斯远远不是美国的对手，因此，应避免在短时间冲突中过多地纠缠，而侧重于让俄罗斯在长时段付出代价。

就短时段而言，应侧重于使用不是“遏制”、而是“限制”的政策：限于保护盟友及其利益，对俄罗斯的破坏性行为做出反应，迫使其付出代价，令其改弦更张。这一政策的关键在于预见性，要区分出美国需要保护和做出反应的关键领域、对象和手段，以及俄罗斯的合理关切。这需要稳健、坚定、

避免逃避，让俄罗斯预先明白需要付出的代价。美国对俄政策需要依靠联盟。对此，可以先易后难。^①

如果说，卡拉法纳的研究报告体现的是当代美国传统智库对俄政策强硬立场的鲜明特色，特别是在形成美国对付俄罗斯的使其“长期付出代价”的战略中发挥了作用，那么，以下来自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前俄罗斯与欧亚项目主任安德鲁·库钦斯(Andrew Kuchins)的立场，则与之形成了一定的反差。

安德鲁·库钦斯早先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主任，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库钦斯被长期派驻俄罗斯，他所进行的观察和研究，使其成为美国俄罗斯研究领域的一位重要专家。回到美国后，库钦斯转到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担任俄罗斯与欧亚项目的负责人，去年又调至乔治敦大学，担任欧亚问题的教职。从他最近撰写的《乌克兰危机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影响》一文^②可以发现，这位资深智库专家与前述传统基金会的同行，在观点上存在着有趣的差异。

其一，俄罗斯是一个首要对手

与卡拉法纳的评价相比，库钦斯认为，俄罗斯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他看来，乌克兰危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大范围地触及到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利益。除了对于美俄双边关系的影响，这场危机广泛地触动了欧洲的安全——从北约未来的选择到欧盟的核心地位和军控事务。

库钦斯断言，美国旨在全力终结、至少是希望加以遏制的叙利亚冲突以及作为其后果的所谓“伊斯兰国”影响扩展的过程中，俄罗斯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而在伊朗核不扩散问题、联盟军队撤出之后的阿富汗和中亚稳定问题上，俄罗斯更是发挥着关键作用。当美国非常不愿意看到俄罗斯成为亚太地

① “U.S.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ward Russia”, Edited by James Jay Carafano,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5/12/us-comprehensive-strategy-toward-russia>

② Andrew C. Kuchins. Russia, Ukraine, and U.S. Policy Options. A Briefing Memo, JAN 29, 2015,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50129_Mankoff_RussiaUkraineUSOptions_Web.pdf

区一个重要角色的时候，西方制裁使得俄大大深化了与中国的接触，并给了俄罗斯转向亚太的新动力。

其二，美国力量的式微

与传统派对美俄力量对比的自信相比，库钦斯显得较为谨慎。他说，对美国的挑战在于，正当需要与俄罗斯合作解决大量优先次序交叉的问题时，美国对此的影响能力被大大缩小了。

库钦斯认为，首先是欧洲安全问题，这是美国利益最基本的方面，如今受到了乌克兰危机的影响。对乌克兰的干预，是冷战终结后俄罗斯第一次大规模地跨越国界在欧洲使用武力，也是第一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后在欧洲凭借武力占领一国领土。库钦斯提出，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干预，以及普京称俄罗斯有权保卫俄罗斯族人、俄语居民和“国外同胞”的立场之时，正值美国准备减少在欧洲安全事务的卷入、而转向亚太地区之际，俄罗斯的修正主义迫使美国重新聚焦欧洲，包括美国和北约在地处前沿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增加部署兵力，也包括北约在2014年威尔斯峰会上重新确认把确保盟国安全作为其核心竞争力。最关键的挑战在于，与西欧国家既和俄罗斯有着较强劲的经济合作关系，又没有面临俄直接威胁的情况相比，俄罗斯修正主义对东欧国家，具有更多直接的威胁。

其三，鉴于中俄合作的趋势，美国要重整旗鼓

库钦斯认为，当乌克兰既不是北约成员，也不是美国盟友的时候，在1994年的布达佩斯协议中，美国与英国和俄罗斯一起，确认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以换取基辅同意让渡它的核武器。因此，尽管乌克兰还远不是北约盟国，但美国对于危机的反应，也包含上述它曾做过的这项确认。库指出，华盛顿的亚太盟友，特别是日本，看到乌克兰的危机正在逼近，担心俄罗斯的举动会引发中国在亚太地区采取同样的行动。他认为，俄罗斯已经多次提出和中国组成轴心，以抵抗美国影响的扩大。中俄关系可以对美国造成困难，特别是鉴于俄罗斯正在帮助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由于越来越盛行的缺乏互信和竞争抱负，对盟国而言，减缓向这一前景的滑行乃是共同任务。

库钦斯提出，美国希望确保自己在全球各个安全领域的优先地位，乃是美国不得不卷入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原因。

其四，俄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库钦斯认为，乌克兰危机以后，俄美关系跌落到了冷战结束以后从未出现过的局面，而且几乎是年复一年，每况愈下。随后，奥巴马和大部分西方政治领袖抵制出席 2014 年索契奥运会的开幕式。库钦斯分析道，与此同时，“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又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引起紧张。华盛顿首先把局势的波动看作是中东走向民主化的积极趋向，而俄罗斯则担忧这些变化正在引起混乱，以及造成军事穆斯林主义的扩张。俄罗斯谴责美国为推动政权更替到处采取毫无区别的政策，就像 1990 年在南斯拉夫和 2003 年在伊拉克，以及在后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一样。

库钦斯指出，俄美关系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相信，推动在俄罗斯的政权改变，乃是美国的一个没有公开宣布的目标。俄方官员，包括外长拉夫罗夫公开指出，他们认为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政府的制裁就是旨在煽动不满情绪，最终导致普京政权被罢免。

在库钦斯看来，对于华盛顿习惯于使用军事干预和政权改变的方法而产生的不满，随着以北约为核心的欧洲安全体制永久化的推进而加深了。俄罗斯精英由来已久的对美国的仇恨，远远不限于对个别事件的看法，它正在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立场。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干预，实际上是关于俄罗斯不愿意接受西方指令的一个明确标志，特别是对于邻近国家，俄罗斯把自己看作是西方之外的、作为欧亚文明和地缘政治集团的一部分。当俄罗斯把自己定义为西方的对立面，把与西方的关系视为对抗性关系之时，要想比有限合作获得更多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

库钦斯总结道，从中短期前景来看，美俄关系的前景是模糊而不甚乐观的。不光是奥巴马政府已经对普京和俄罗斯不抱希望，而且，俄罗斯自身今天也越来越不想与美国进行合作。但是一旦危机过去，双方还是会有兴趣去构建一种模式，让俄罗斯去解决它的问题，让美国能够取得俄方对于其在中东和亚太安全目标的支持。无论如何，俄美关系新模式看来会与过去二十多年占主导地位的方式很不相同。

其五，美国应有的政策反响

库钦斯认为，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挑战，那就是如何在以下的这两个方面保持同步和平衡：一方面，与俄罗斯以更新的方式进行接触，促使其打开大门，继续合作；另一方面，要摧毁俄罗斯修正主义的抱负。美国并不想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开战。2014年9月，在欧亚组织支持下达成的、并由俄罗斯、乌克兰、分离主义者、以及欧安组织共同签署的明斯克协议，乃是目前最好的协商解决框架，其中包含着逐步解除制裁的可能性。

最后，库钦斯提出了一个具体建议：即使需要继续施压把乌克兰冲突引向终结，也必须同时与莫斯科保持沟通。这既是为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外交努力，也是为着将来的继续接触。库钦斯指出，一个非常有害的观点是，将现有双边总统委员会层面的沟通加以空置，然后，转入经常性的军事对军事的接触。鉴于双方都需要紧密的交往，去发掘解决冲突的方法，因此，建立与克里姆林宫高层的交往管道，将是当前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为了结束当下危机，包括第二管道在内的非正式接触，需要扩展讨论的领域，以激活美俄之间的交流。

与传统基金会卡拉法纳的观点相比较，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库钦斯更主张重视俄罗斯这个“首要对手”，而不是忽视它。库钦斯不太同意只是运用单一的制裁手段，而是提出，必须在保持压力的同时，发掘更多管道加强沟通。^①

五、美国前政要的忠告和建言

曾经身居高位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是美国国际政治决策界和学术界相当重要的标志性人物。经常听到美国同行这样议论：最近几十年来几代外交官和决策专家中，很少再有像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权威人物。特别是在对俄决策和认知问题上，这两位前辈的巨大影响力无可比拟。然而，人们也发现，叙利亚战争和乌克兰危机以来的美国决策过程中，很少看到基辛

^① Andrew C. Kuchins, “Russia, Ukraine, and U.S. Policy Options. A Briefing Memo”, JAN 29, 2015,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50129_Mankoff_RussiaUkraineUSOptions_Web.pdf

格和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得到采纳和贯彻，只是经常在危急关头，搬出两位老人来做做工作。

2016年2月4日基辛格在莫斯科戈尔恰科夫基金会发表的一篇重要演说中，有这样一些要点：

其一，呼吁美国与俄罗斯政治决策者超越导致冲突的歧见和误解，共同应对两国最近几年来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基辛格认为，我们今天的相互关系比十年前要差得多。实际上，这可能是冷战终结以来最差的一段时期，双方相互之间的信任被挥霍殆尽，冲突代替了合作。那时双方许多人都非常理解，俄罗斯和美国的命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维持战略稳定和避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同时，也致力于建立欧亚地区的安全体系，特别是由于俄罗斯有着那么长的周边地区。当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出现了新的远景，合作开发能源产地的项目也位列榜首。不幸的是，全球化的巨大冲击揭示出了政治家的才能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其二，基辛格呼吁美俄两家要找到在叙利亚冲突中的共同基础，以及降低乌克兰危机的紧张度。

基辛格指出，现在每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叙事方式是责备对方，或者是把对方——如果不是整个国家的话——至少是把领导人妖魔化。美俄在巴尔干问题、前苏联领土、中东问题、北约扩大问题、导弹系统问题以及军售问题上的政策分歧，正在走向不能再回到合作的局面。

其三，基辛格批评道：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很多评论家，都拒绝在新国际秩序条件下美国与俄罗斯合作工作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美国和俄罗斯进入了“新冷战”状态。对美俄两国来说，今天的危险在于，虽较少回到军事抗争，但却更多走向自我预言的固化。两个国家的长远利益要求的是这样一个世界：把当代的动荡和变化，纳入到一个既是多极化，又是全球化的均衡状态。

基辛格深刻地指出，动乱的特性往往是前所未有的。迄今为止，什么是全球化的国际威胁，往往是由一个主导性的国家，根据其力量积累的状态来界定的。其实，今天的威胁更多地是来自国家权力的瓦解，来自于未被管理

的领土数量大大增加。这样一个扩展中的权力真空，并不是任何国家都能够对付得了的，不管基于排他性的民族基础背景下这个国家多么强大。事态要求的是，美国、俄罗斯和其他主要国家之间开展可持续的合作。竞争性因素必须受到限制，且处于可控状态，而避免冲突再现的竞争还是会留存。

其四，基辛格的一个关键观念是：中、美、俄必须在一起工作。他说，在我们面前有着乌克兰、叙利亚这一类非常紧迫的冲突现象。过去几年中，很多国家有那么多的讨论，但是鲜有进步。这并不奇怪，因为讨论是发生在一个被认可的战略框架之外的。每一种专门事件就是一个大战略的表达。事实上，乌克兰问题需要放于欧洲和国际的安全构架下来加以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克兰与其成为任何一方的一個前哨或边塞，不如被看成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对叙利亚而言，任何仅限于当地的、或者地区的团体，都不可能找到自身问题的解决办法。处于竞争状态的美国与俄罗斯可以努力和其他大国一起来创造一个在中东，甚至其他任何地方的和平解决办法。必须牢记：“俄罗斯、中国和美国需要在 2016 年一起工作。”

其五，基辛格强调通过对话来构建秩序。他说，任何改进关系的努力必须包含一种有关形成中的世界秩序的对话。怎样的趋势在消解旧秩序，同时还在营建新秩序？怎样的挑战在改变着俄罗斯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状态？怎样的规则在发挥作用形塑着世界秩序？怎样的一种立场合乎逻辑地、并且自动地有望在新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如何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使得非常不同的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可以被融合到一起？这个世界秩序当然必须包括美国与俄罗斯，还包括其他大国。目标必须是发展出一种有关美俄关系的战略概念，在这一概念框架内，争论是可以被管理的。

其六，基辛格重申，俄罗斯不是美国的威胁。他说，上世纪 60-70 年代，国际关系基本上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一种竞争关系。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两个国家可以履行一种战略稳定的概念，纵然他们之间的竞争在其他领域继续存在。从那以后，世界戏剧性地改变了。尤其是出现了一个形成中的多极世界，俄罗斯应被看作是哪一种新的全球均衡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而基本上不应该被看作是美国的威胁。

基辛格反复指出，我在这里论证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对话寻找把我们将来融合起来的方法，而不是去催生我们之间的冲突。这要求双方都尊重对方的重要价值和利益。这样的目标不可能在目前政府行政框架中被完成。但是，也不应该因为美国国内政治而被耽搁。只有当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有意愿之时，才能超越愤懑、牺牲感，一起来应对我们两个国家共同面临的更大挑战。^①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发现，基辛格关于处理美俄关系的观点，与所谓的两党共识以及奥巴马行政当局的立场都大相径庭。

第一，基辛格不同意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关于俄罗斯问题的主流叙事，即把普京视为一切地缘政治博弈争斗的罪恶元凶，断定普京准备恢复前苏联。在基辛格看来：“当普京花 600 亿美元把索契这个夏天的度假胜地变成冬季奥林匹克运动村，并且在冬奥会闭幕式上把俄罗斯描绘成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然后在此一个星期之后，说普京以此为开端，发起了一场军事危机，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基辛格认为：“在俄罗斯人看来，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始终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从来也不是局限于两个传统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光在俄罗斯人看来是如此，而且乌克兰人也是在这样看问题。”^②

第二，在乌克兰危机突然爆发以后，基辛格认为：“美国对此的反应并不及格”。他认为，美国设定了一个并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即“打垮俄罗斯”。当强行要求俄罗斯忠于美国所阐述的、由美国评判的国际行为标准时，“美国是设定了一个强人所难的概念，除非有一天俄罗斯突然有一个要求改宗换祖的自发行动，宣布加入世界共同体。”

第三，基辛格认为，军事不结盟、战略上的缓冲地带，应该是基辅未来政权形式的内涵，从而让俄罗斯的关切得到舒缓，同时，也确保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因此，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东部地区撤出军队，由乌克兰政府控制俄乌边界。

^① “Henry Kissinger: Russia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 threat to the US”, Feb 5, 2016, <http://www.russia-direct.org/opinion/henry-kissinger-russia-should-not-be-considered-threat-us>

^② Ibid.

卡特时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也是一位非常老资格的苏联和俄罗斯问题专家。他在谈论俄罗斯问题时，与基辛格有很多相类似的观点。有所区别的是，布热津斯基的立场更为明确，观点更为犀利。

布热津斯基在 2015 年 11 月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事发之后，接受了一次专门的采访。^①在他看来，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状态非常严重，但并非致命。如果方法对头，还是有着把坏事变成好事的机会。不仅要处理好地区冲突，而且要防止由（中、美、俄）三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可能出现的破坏性结果。

布热津斯基认为，首先，西方的反应还是相当克制，同时对于真正的威胁并不让步。而俄罗斯意识到，在自己相当孤立的情况下，冲突的后果严重。事实上，我们可能处于大国间关系即将突破的悬崖边上。因此，他提议立即通过维也纳会议等形式，与俄罗斯接触。他竭力主张核超级大国之间首先要展开磋商。

关于叙利亚现政权的前途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如果阿萨德继续留任，对俄罗斯并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而同样对美国来说，强行迫使阿萨德离开，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这里依然有着共同利益，要避免美俄之间的冲撞。他说：“可能是我幼稚，但是我总归认为，当前形势之下，各方需要冒的风险并不是那么可怕。最近几周以来，叙利亚的反对派似乎越来越像乌克兰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竭力主张俄罗斯与美国之间要坐下来谈，取法乌克兰问题的‘芬兰化解决立场’（意指乌克兰保持独立的立场，不加入北约，但可以和欧盟发生紧密的经济关系）。现在看来形势正在朝这一方向发展。”

当记者追问布热津斯基，认为他在 2015 年 11 月下旬的立场较之 10 月份要乐观得多，因为当时布热津斯基直言批评俄罗斯空中打击远不是针对“伊斯兰国”，而恰恰是针对反对派，并旨在帮助阿萨德政权。对此，布热津斯基答道：“因为当时的原始报告披露俄罗斯直接打击的是美国支持的地方武装力量。我们必须提出警告，我想，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在我看来，我

① Michael Hirsh, “Once a Hawk, Brzezinski Sees Hope for U.S.-Russia Relations. A Cold War hardliner explains why this time is very different”, November 27, 2015,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11/brzezinski-sees-hope-for-us-russia-relations-interview-hirsh-213400#ixzz4107kpFwB>

们的反应是适度的。普京在熄灭了情绪的波动之后，已经实质性地开始和我们一起着手解决问题。土耳其人的立场既有弹性，但也不事声张地表现出强硬……实际上，各方面对未来变局都表现出了更多的理性。在此时刻，我想，非常幸运的是，在土耳其击落俄战机的不是我们美国。”^①

布热津斯基特别强调，普京有把握这一事态的非常卓越的能力。“同时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这一类突发事件并不是发生在波罗的海国家，在那里，俄罗斯作出强硬反应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波罗的海国家应对的能力太弱，必须要美国出手的话，那必定是一个自找麻烦的结局。”

当记者问到是否担心俄罗斯与中国联手一起反对美国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干脆地回答：不会。他认为：“短时期来看，中国地缘战略利益的重点是在稳定，而不是在冲突。稳定，才使中国能够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增长其影响力。这一项目包含有中国进入印度洋和中国通过铁路进入中亚这两个方面，然后再通过这些国家进入西方。在中亚，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逐步发生非常谨慎的改变，这一改变有利于中国。俄罗斯对此无能为力。而除了吉尔吉斯斯坦以外的有关国家则欢迎这一变化。中亚国家明白，如果他们成为莫斯科首倡的欧亚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他们将会丧失独立地位……”^②

记者进一步问：“您在冷战时期被认为是著名的鹰派，您现在来看，俄罗斯与美国的利益能否联手？”布热津斯基答道：“如果中东局势完全失控，首先，与伊朗之间所达成的长期协议将会遇到极大麻烦，如果那样的话，以色列马上会出现严重问题。在以色列，至少有一些领导人是非常倾向于采取军事选择的。那样，就会出现爆炸性的地区形势，也会从外部激起强烈反响。俄罗斯与西方在稳定当地形势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至少，阿萨德政府的转型正在被考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认为，并非各方的所有问题都取决于阿萨德。”关于普京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可能，普京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未必理智。首先，他在媒体面前一定会感到很愤怒。

① Michael Hirsh, “Once a Hawk, Brzezinski Sees Hope for U.S.-Russia Relations. A Cold War hardliner explains why this time is very different”.

② Ibid.

但我认为，他会很快意识到，除非他非常渴望战争；乱象升级，对于普京是没有什么好的回报的。”

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两位老人，目前在美国既具有很高的声望、但又很难对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关键影响这一事实，表明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要使其对俄外交理性化，依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问题。

六、2016 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对俄罗斯的态度

根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 2015 年 1 月 12 日报道，华盛顿政治学中心“欧亚中心”副主任厄尔·拉斯穆森称，一些美国总统候选人已经志在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另外一些则是揣着“寻衅滋事”的态度。他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谈道：“2016 年 11 月的选举结果可能会对俄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以一些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发表的声明为基础，可以作出结论，即他们中的一些人承认有双边合作的必要性，以面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①据拉斯穆森介绍，这首先就涉及到民主党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和共和党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兰德·保罗和特德·克鲁兹。他认为，特朗普和保罗比其他人都更着眼于合作。此外，拉斯穆森还说道，另一些候选人的心态则是极其寻衅好战的，他们是希拉里·克林顿、杰布·布什、卡莉·菲奥莉娜和克里斯·克里斯蒂，这些人关于俄罗斯和建立国际安全与稳定体系的发言令人警惕。以下分别述之。

其一，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希拉里对俄罗斯态度一直以强硬著称，包括其任国务卿期间曾多次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策。在乌克兰问题上，她曾将普京与希特勒相提并论，但事后，希拉里曾对此公开加以纠正。对此，普京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说：“最好不要与女人争论。如果有人越界太远，这往往并不是因为其强大，而是因为其软弱。”^②2016 年 2 月 5 日，希拉里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电视

^① “一些美国总统候选人志在与俄罗斯发展合作”，环球网，2016 年 1 月 12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1/8361480.html>

^② “普京回应希拉里将其比作希特勒：凸显其软弱”，中国网，2014 年 6 月 5 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6-05/6245221.shtml>

辩论中，对美国防长阿什顿·卡特关于俄罗斯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的声明作出了评论。她说：“我认为，卡特提请注意的是俄罗斯正在向我们的欧洲盟国不断施压，是俄罗斯试图改变欧洲边界时所采取的手段，必须让北约重新担负起共同防御工作”。她还指出：“俄罗斯非常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想在那里拥有自己的地盘、自己的海军和空军基地”。^①希拉里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意图表示关切。

其二，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主张美国“发起政治革命”，反对权贵对于美国民主的破坏。在国际政策方面，他也与希拉里·克林顿拉开距离。他的基本立场是，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2月5日的民主党初选辩论中，桑德斯明确提出要和俄罗斯一起工作。

其三，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据俄罗斯媒体2015年11月4日报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相信，如果他2016年获选美国总统，美国和俄罗斯将有“非常好的关系”。特朗普在他的新书《跛脚的美国：如何让美国再度伟大》发布会上回答会场中提出的问题时说：“我们将会和俄罗斯有非常好的关系，并且我相信，我将与普京有非常好的关系。”^②接着，在12月17日美国俄亥俄州的竞选集会上，特朗普把普京称为“备受尊敬的全球领导者”。当天，特朗普对支持者表示：“当这样一位在国内外如此受尊重的人称赞你时，这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是莫大的荣幸。他（普京）至少像个领导人的样子，治理他的国家，不像我们国家的那位。”^③此外，特朗普还呼吁，美国不应阻止俄罗斯或伊朗在中东的反恐行动，因为俄伊两国在中东打击恐怖主义对美国十分有利。

① “希拉里：俄罗斯试图改变欧洲边界 北约需共同防御”，环球网，2016年2月5日，<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6-02/8514445.html>

② “特朗普：若能当选美总统 美俄关系将‘非常好’”，环球网，2015年11月4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11/7906575.html>

③ “杰布·布什叫嚣：美应通过武力在全世界范围与俄对抗”，环球网，2015年11月21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12/8222291.html>

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他最近有关外交政策的正式讲话中有关俄罗斯问题的立场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俄罗斯和中国以非常快的速度来拓展军事能力”，而美国的“核武器——我们的终极武器——已经慢慢地萎缩，急需进行现代化和更新。”

“现役军队已经从 1991 年的 200 万缩减至如今的 130 万。海军从那时的 500 艘军舰缩减至现在的 272 艘。空军也比 1991 年缩减了近三分之一。”“那政府做了些什么呢？奥巴马总统提交了 2017 年的国防预算，比 2011 年的国防支出削减了约 25%。军事已经奄奄一息，我们却还在要求将领和军事领导人去担心全球变暖问题。”

第二，“我们渴望和平地生活，并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友谊。我们与这两个国家有严重分歧，所以必须擦亮眼睛对待他们。但我们并不一定非要成为对手。我们应该基于共同利益，求同存异。像俄罗斯就已经看到了伊斯兰恐怖主义令人恐惧之处。”

第三，“我相信缓和与俄罗斯的紧张局势，并改善关系是可能的。常识告诉我们必须结束这种敌意的循环。有人说俄罗斯人不讲理。我会试着看看。如果我们不能为美国谈成一笔好生意，我们会立刻撤出谈判席。

最后，“我将和盟友一起合作，重振西方价值观和制度。但我不会试图去传播‘普世价值’，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种价值观，我们应该清楚：加强和促进西方文明及成就，要比军事干预更能在世界上促发改革。”^①

其四，共和党候选人杰布·布什（Jeb Bush）

据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PressTV）2015 年 12 月 20 日报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杰布·布什当月 20 日在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民”（Face the Nation）节目中表示，由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存在，美国正在丧失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同时，他还指责特朗普盛赞普京是“伟大领导人”的行为。杰布·布什说：“普京正在挑战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他将把我们推开视作其成功。我们正在失去影响力，而普京却坐享其成。”这位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扬言：“他（普京）不是我们的盟

^① “特朗普演讲：中国尊重强国，我们已失去尊重”，2016 年 5 月 1 日，搜狐网，<http://mt.sohu.com/20160501/n447208772.shtml>

友，他是个‘独裁者’，是‘恶棍’。”布什补充道，俄罗斯崇尚武力，美国也应该通过使用武力在全世界范围内与其对抗。布什表示：“我们需要一位总统，无论在欧洲还是中东事务上都要站在美国的立场之上，这才是与普京建立‘更好’关系的方式。”^①

这位最终退出竞选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杰布·布什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为阻止莫斯科介入叙利亚冲突，美国应该向俄罗斯及总统普京“秀秀肌肉”。他认为，奥巴马政府对普京表现软弱。如果现在不做点什么阻止普京，那么不仅在叙利亚，甚至在世界其他地区都会引发许多问题；因为俄罗斯在协同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军打击“伊斯兰国”的同时，或许准备在世界其他地区扩大军事影响力。^②

其五，共和党候选人卡莉·菲奥莉娜 (Carly S. Fiorina)

据俄新社 2016 年 1 月 4 日报道，原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卡莉·菲奥莉娜称，伊朗和俄罗斯并非美国的盟友，美国不应把在中东的影响力拱手让给俄罗斯和伊朗。菲奥莉娜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电视直播中说道：“美国应该明确地告诉自己的盟友们，伊朗和俄罗斯并非美国的盟友。当俄罗斯和伊朗结盟时，美国不应该像唐纳德·特朗普建议的那样，把在中东的领导权让给俄罗斯和伊朗。俄罗斯和伊朗不是美国的盟友，而是敌人。”^③杰布·布什、菲奥莉娜等人已于 2 月 10 日正式宣布退出美国总统选举。

虽然，大选的政治鼓动并不等于日后真正的政治运作，但是，从美国大选进程中诸多候选人的不同立场，可以一窥美国对俄政治立场的谱段变化。

① “杰布·布什：美应通过武力在全世界范围与俄对抗”，环球网，2015 年 11 月 21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12/8222291.html>

② “布什斥奥巴马软弱 其呼吁奥巴马要对普京的行为进行阻止”，环球网，2015 年 10 月 4 日，<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10/7690776.html>

③ “美总统候选人：伊朗和俄罗斯不是美国的盟友”，新华网，2016 年 1 月 4 号，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1/04/c_128593528.htm

七、美国民调中的对俄认知^①

对近三年俄美关系的变化，美国社会舆论是如何看待的？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对近 25 年美国民众对俄罗斯态度变化的跟踪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俄罗斯态度的变化在这期间总共经历了约 7 个不同阶段的变化。最新阶段的变化始于 2013 年，它也是美俄关系开始恶化的起点，到 2015 年则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数据显示，2015 年有多达 70% 的美国民众对俄罗斯持负面看法，仅 24% 的民众对俄罗斯持积极看法，这一数据刷新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的历史纪录。（参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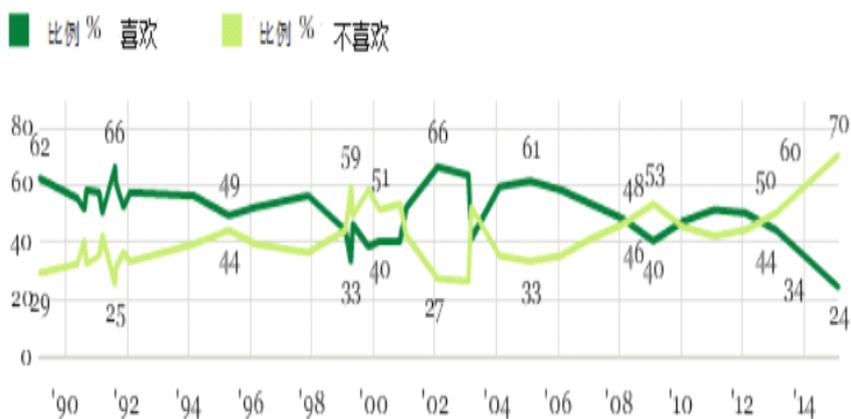


图 1 美国社会舆论对俄罗斯态度的变化

数据来源：Gallup.Russia | Trend:Americans' Opinions of Russia. www.gallup.com/poll/1642/russia.aspx

另据 2014 年盖洛普咨询公司的调查数据，在问及美国与俄罗斯关系是否重回冷战状态时，有 50% 的美国民众持肯定看法，有 43% 的民众持否定看

^① 标题六和标题七中的材料，为博士后万青松先生所提供，特表谢意。

法，另外 7%的民众表示难以回答这个问题。^①而在 2015 年 2 月的一项调查中，当被问及是否同意美国应该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用于对抗乌克兰东部武装力量时，有 54%的美国民众持反对看法，有 40%的民众持赞成看法，余下的 6%的民众不持任何看法。^②在乌克兰危机以及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仅有 5%的美国民众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盟友，这与 9·11 事件以及 2013 年“化武换和平”倡议提出之后形成鲜明对比，这两个节点相应地有多达 23%、13%的美国民众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与此相对应的，则是 2013 年以后有 24%的美国民众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敌人”，与 2006 年 9%的比例相比，显然大幅度上升，并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另外还有多达 44%的美国民众认为俄罗斯是不友好的国家。^③

上述民意变化的原因很可能是，自 2013 年以来，亦即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始料未及的美国“棱镜门”事件的爆料者斯诺登逃往莫斯科寻求避难。俄罗斯最终顶住美国要求引渡的巨大压力，拒绝交出斯诺登，奥巴马因此取消了原定 9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双边总统会晤。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坚决反对以武力方式推翻巴沙尔政权，在奥巴马政府以叙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叫嚣动武之际，俄主动抛出“化武换和平”倡议，暂时化解了叙利亚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但美俄围绕叙利亚的博弈仍然持续至今。接踵而来的乌克兰危机以及因俄“兼并”克里米亚而导致美国 and 盟友对其实行严厉经济制裁，更是使得本来就已脆弱的俄美关系更加陷入冷战以来的最低谷。甚至连梅德韦杰夫都提到，“新冷战”似乎已接近爆发的临界点。

① Gallup. Russia | Gallup Historical Trends. Trend: Americans' Opinions of Russia. Do you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are heading back toward a Cold War, or not? – www.gallup.com/poll/1642/russia.aspx

② Gallup. Russia | Gallup Historical Trends. Trend: Next, I'd like your overall opinion of some foreign countries. What is your overall opinion of Russia? Is it very favorable, mostly favorable, mostly unfavorable, or very unfavorable? – www.gallup.com/poll/1642/russia.aspx.

③ Gallup. Russia | Gallup Historical Trends. Trend: Please say whether you consider Russia an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iendly, but not an ally, unfriendly, or an enemy of the United States. – www.gallup.com/poll/1642/russia.aspx

结 语

第一，纵观美国对俄决策的争议内容和认知状况可以发现，强调意识形态的倾向，不光依然是美国外交的护身符，而且成了评判别国的重要武器。在可见时段的国际环境竞争加剧和国内政治博弈激化的过程中，包括在一个具有庞大能量的学术加工系统的催生之下，很难设想，美国出现对外关系领域会出现非意识形态化的状况。有鉴于此，美俄关系的改善很可能难以在短时期内实现。

第二，美国对俄战略中的激进民主党人士和新保守主义派别的实际联手，正在成为现实。而以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稳健力量更多时间是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步。这样一种以前少见的政治生态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俄决策。

第三，美俄关系二十多年来的演进过程中，双方认知差异巨大。不光是传统意识形态影响沉渣泛起，而且现代化进程国家构建中所处的不同时段，所面临的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美俄两家所思所想，经常是南辕北辙。有人说，美俄间的对话大体上是两个不同类型国家的对话，甚至是两种世界之间的交往，各说各的，各自成理。这样一种共识匮乏的局面，远非短时间内可以改变。而误解的最大危险，乃在于有可能带来冲突的升级。

第五，美俄之间在叙利亚问题上或在乌克兰问题上，双方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近来的磋商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取得根本性改善的机会有限。有可能会在这一问题上长期拖延胶着。

第六，除了上述美俄之间在相互认知过程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差异、战略利益分歧等之外，值得关注的还有进行大国多边互动的沟通能力、对于对手的认知水平以及对合理决策的执行能力等方面。美俄两大国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相当程度上还在于一代或几代人的知识准备、理解能力和交往水平，尚没有做好真正迎接新时期双边关系复杂挑战的充分准备。

最后，中国在美俄两家之间的理性定位，不光对于自身，而且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国际关系的健康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理有节地处理好与美俄两家的关系，是今后长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项考验。

【 Abstract 】 Since the Ukraine crisis and the Syrian war, there emerge heated discussion within the U.S. decision-makers regarding Russian issues. Given the diversity of U.S. domestic politics, as well as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tself,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observe changes and trends of the U.S. perceptions of Russia from four aspects. First, the U.S. core decision-makers' basic views on current Russian issues; second, different stances of the U.S. academic community including think tanks regarding the U.S. Russian strategies; third, views of the U.S. former influential politicians; fourth, attitudes of the U.S.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and the mass media towards Russian issues. As can be seen, when dominated by ideology, it is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 U.S.-Russian relationship in the short term. Furthermore, it will be quite difficult to avoid an escalation of the conflict in the future because of misunderstanding, caused by lack of consensu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for China to have a rational positioning between the U.S. and Russia for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the good of regional and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Key Words 】 U.S. and Russia, Decision Disputes, Perceptual Difference, Ideologicaliz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кризиса в Украине и войны в Сирии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кругах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олитики США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России возникло много споров. Учитывая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а также сложность сам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мы анализируем когнитив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и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политик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четырех аспектов: во-первых, позиции ключевого слоя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по вопросам акту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Ш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во-вторых, различных позиций науч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СШ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мозговых центров,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тратег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в-третьих,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в США широког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влиянии бывших политиков; в-четвертых, позиции кандидатов в

президенты США и всех СМИ в вопросах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России в пик выборной кампании. Как видно, в условиях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господства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ША с Россией в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трудно добиться качественных улучшений американ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збежать в будущем эскалации конфликта будет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ложно из-за недопонимания, вызванного отсутствием консенсус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р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зиция Китая меж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Россией играет ключевую роль в китайск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а также в сохранении здор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атмосферы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и глобальном уровнях.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ША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России, споры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когнитив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идеологизация

(责任编辑 阎德学)

美国行为的根源——以美国对俄政策为例*

A·克里科维奇, Y·韦伯**

【内容提要】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凯南报告的影响。当今,影响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因素主要是:国际权力结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些因素决定了美国对俄政策的两个基本方面:遏制但不直接打击。美俄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无论是近期还是长期,双方都难于达成突破性的和解协议。从策略性的角度看,美国今天的对俄政策体现为,不与俄罗斯直接对抗,但让俄罗斯深度卷入危机地区(乌克兰、叙利亚),从而加速俄罗斯的衰弱。

【关键词】美俄关系 美国国内政治 美国对俄政策 乌克兰危机 叙利亚危机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2-0032-(15)

近七十年前,乔治·凯南发出了那封著名的长篇电报。后来,这篇名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发表在《外交杂志》上^①。凯南的文章将物质、意识形态与历史的因素融入进来,发展出一种研究苏联外交政策的综合的、整体的方法。受该文的启发,本文简要勾勒当代美国对俄政策的根源,其中

* 本文的缩略版本曾发表于《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Russia in Global Affairs*)杂志2016年第2期。作者增补、丰富内容后的新版本,专供本刊发表。

** A·克里科维奇(Andrej Krikovic),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Y·韦伯(Yuval Weber),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① X. (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1947, Vol.25, No. 4, pp.566-582.

包括国际权力结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这些因素，一方面进一步固化了在美国决策者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即把美国视为现状保卫者，制约俄罗斯对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所发起的修正主义挑战；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不仅事先决定了美国对其想象中的挑战的回应，也令美国无法寻求与俄罗斯的和解。当然，美国方面并不鼓励立即对“俄罗斯威胁”采取军事对抗——即使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国内游说集团在为此而奔走。^①

伊肯伯里^②的关注点，是战后的安排（这些安排明确了国际秩序的制度）。沿袭他的方法，我们认为美国与俄罗斯的对乌克兰政策，反映出的正是国际秩序的真正起源。简而言之，当代世界开始于1989年还是1991年？谁是维持现状国家，谁是修正主义国家？我们如何走到今天的地步？

俄罗斯认为，当代国际秩序应该始于1989年，这一年，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戈氏希望通过大幅削减国防开支、改变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以及融入世界经济等途径，来复兴苏联经济，拯救苏联体制。他从东德撤回五十万苏军，并用辛纳屈主义成功替代了勃列日涅夫主义。辛纳屈主义指的是苏联对东欧缓冲区的政策，即从原来威胁干预那些偏离苏联领导和正统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转变为默许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之路^③。当时的期盼是，通过国内的重建振兴苏联体制，以及继续依靠苏联军队保家卫国。当然，结果并非如此，苏联于1991年底终结。

① Yuval Weber, “Why the U.S. Does Nothing in Ukraine”, *Washington Post*, 2015, Monkey Cage. 18 March.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monkey-cage/wp/2015/03/18/why-the-u-s-does-nothing-in-ukraine/> A·韦伯认为俄美冲突的危险程度降低，是因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并非如一些观察家认为的那样投入和热情。韦伯的一个推断是，奥巴马政府认为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结构挑战程度在降低。

②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James Taranto, “Leonid Brezhnev Lives”, *Wall Street Journal*, 30 March 2012. 作者引用了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11月13日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讲话。这是在布拉格事件发生后不久召开的一次大会。勃列日涅夫说：“当敌视社会主义的力量想改变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想将其引向资本主义的时候，这就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了，这是关涉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另参见 Reuters, “‘Sinatra Doctrine’ at Work in Warsaw Pact, Soviet Says”, 25 October 1989. 苏联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格拉西莫夫（Gennadi I. Gerasimov）说：“我们现在有辛纳屈主义。辛纳屈有一首歌，叫《我走我自己的路》。每个国家有权决定走自己的路。”当被问及莫斯科能否接受苏联集团国家内否定共产党领导时，他回答说：“那是当然……政治结构必须由当地人民自己来决定。”

但从美国的角度看，当代国际秩序是从 1991 年苏联解体的那一刻开始的。二战后的安排导致了两极国际格局，以及冷战和竞争。美国认为，在 1991 年以后，这些都被一个新的战后安排所取代了，各国可以自由地选择其希望归属的安全组织。这意味着，原先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可以自由地加入北约，以此来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的报复。此外，北约扩大也是美国对欧洲事务不会放手的一个重要信号。^①当时没有正式的协议禁止北约扩大，而且北约也不被认为有多大前途，就这样，北约接纳了许多前社会主义甚至是前苏联国家。^②

美俄之间基本的分歧点已经非常清晰：当代世界秩序是在 1989 年形成的（如是，美国就是修正主义国家），还是在 1991 年的形成（那么，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国家）？这一根本分歧，时至今日，还影响着美俄两国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不同政策选择。

依照俄罗斯的解释，其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行动，仅仅是针对威胁到自身安全与国家利益的严峻挑战所采取的防御性应对。而这些严峻的挑战，是由美国那些目光短浅且不稳定的外交政策所引起的。具体而言，在乌克兰，俄罗斯认为其所采取的行动，是为了保护自身重要的势力范围免受西方的侵占^③；在叙利亚，莫斯科相信自己是在防止“政权更迭”可能带来的更深层的混乱，并且通过保护叙利亚合法政府以对付 ISIS 的恐怖主义威胁。^④然而，华盛顿不这么解读莫斯科的行为。华盛顿认为，是俄罗斯的政策导致了不稳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尤其是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并入版图，被美国视为对国际秩序，特别是对国际秩序中最宝贵、最不容侵犯规则的挑战：不可

① Philip Levitz, Grigore Pop-Eleches, “Why no backsliding? The European Union’s impact on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before and after access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9, Vol.43, No.4, pp.457-485.

② Mary Elise Sarotte, “Perpetuating U.S. Preeminence: the 1990 deals to ‘Bribe the Soviets out’ and move NATO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0, Vol.35, No.1, pp.110-137. See also, Mary Elise Sarotte, “Not One Inch Eastward? Bush, Baker, Kohl, Genscher, Gorbachev, and the Origin of Russian Resentment toward NATO Enlargement in February 1990”, *Diplomatic History*, 2010, Vol.34, No.1, pp.119-140.

③ Dmitry Suslov, “For a Good Long While”,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4, December 18.

④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Мир находится в предво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The New Times. 16 февраля 2016 года, <http://www.newtimes.ru/articles/detail/107733/>

单方面改变边界。^①同样，俄罗斯在叙利亚支持阿萨德的政策，被美国认为有碍于打击 ISIS, 延长了叙利亚内战，并间接导致了难民危机。^②

因此，许多美国精英认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是一个决心推翻现存秩序、挑战美国全球领导的修正主义国家。但是在华盛顿仍然有一些声音，呼吁同俄罗斯进行更广泛的谈判，以免陷入新冷战（双方目前似乎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然而，正如我们下文要展开分析的，国际权力结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几个因素，使美国无法与俄罗斯达成任何突破性的协议。相反，现在美国政策圈子里的讨论，关注的是如何更有效地限制俄罗斯的进一步行动，纠正俄罗斯的行为；如果做不到这些，就想办法孤立俄罗斯，遏制其非民主的政权。

国际权力结构

结构因素指的是国家间权力和能力的对比，以及未来国力的发展趋势（是崛起还是衰落），这些都深刻影响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冷战后，美国观察家认为俄罗斯是一个衰落的国家，正在逐步失去其在全球甚至是地区层面的显要地位。这是因为，俄罗斯不能适应一个新的全球化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经济和技术的优势比军事和大国政治更重要^③。

美俄两国之间的力量差距悬殊，以至于俄罗斯很难被（美国）当作是国际秩序的真正挑战者，俄罗斯的地位被看作是在江河日下。奥巴马总统曾不屑一顾地称俄罗斯为“地区大国”，质疑俄在国际上施加影响的能力；美国参议员麦卡恩则称俄罗斯为“披着国家外衣的加油站”。^④

在美俄关系中，核心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是，“1989 世界秩序”和“1991

① Evelyn Farkas, “Putin is Testing our Resolve”, *Politico Magazine*, November 24, 2015,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11/isil-syria-putin-nato-airspace-213393>

② Jeffrey Stacey, “Russia’s Pyrrhic Victory in Syria”, *Foreign Affairs*, 20 March 201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syria/2016-03-20/russia-s-pyrrhic-victory-syria>

③ Joseph Nye, “The Challenge of Russia’s Decline”, *Project Syndicate*, 14 April 2015.

④ Scott Wilson, “Obama dismisses Russia as ‘regional power’ acting out of weakness”, *Washington Post*, 25 March 2014; David Sherfinski, “McCain: ‘Russia is a gas station masquerading as a country’”, *Washington Times*, 16 March 2014.

世界秩序”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俄罗斯来说，1991年确立的单极国际格局，以及俄罗斯国力的相对衰落，令西方忽视俄罗斯的吁求。莫斯科认为，西方的一些政策，如在中欧部署导弹和北约东扩，威胁着俄罗斯的关键利益。俄罗斯所面对的这些针对自身的结构性现实（也是大多数国家所面对的）意味着，如果俄罗斯想得到他人的认真对待，以及恢复在1989年谈判桌上所取得的地位，俄罗斯就必须展示出：任何损坏其国家利益和特权的行为，都要付出代价。因此，俄罗斯被迫使危机升级，并采取边缘政策，就是要证明，如果在世界安全与秩序的诸多问题上忽略俄罗斯，美国及其盟友就将受损，就如在乌克兰的情况一样。

俄罗斯的此种战略，令其容易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但这未必有助于俄罗斯最终目标的实现——被西方认可为一个可以谈判的伙伴。升级在乌克兰、叙利亚以及其他地区的动荡局势，也许会使人重视俄罗斯的意见，使俄罗斯在某些特定问题中变得更为重要，但这也令俄罗斯将来不太可能在重大的谈判中被当作一个可信赖的谈判伙伴。不仅是奥巴马总统，其他美国领导人也都不能认同和赞许这些被华盛顿视作“恶行”的行为，因为这将鼓励俄罗斯进一步的行动，其他国家也可能会试探美国的决心，那么美国将面对无穷无尽的挑战。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美俄两国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美国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俄罗斯想要颠覆这一现状。乌克兰的政治经济走向对于俄罗斯非常重要，但是对美国重要性不大。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美国站在乌克兰一边，限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也试图令俄罗斯无暇顾及及其他国际问题。罗伯特·吉尔平很久以前就曾谈到，威信和地位（不是许多新现实主义学者所说的“实力”）是国际关系中真正的通货。^①如果一个国家的地位和威信被其他国家所承认，则可以不必动用物质力量而达成目标。汉斯·摩根索也早就指出，“当一个国家不再追求通过使用武力获得声望之时，其威信就达到了巅峰。”^②美国不愿意公开讨论国际秩序等问题，因为担心这

①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②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4, p.15.

会给俄罗斯带来高于其实力的地位和威信。同样，美国也不愿意公开讨论那些被视为早在苏联解体时就已经解决了的有关秩序的问题。美国视俄罗斯为衰落中的大国，所以它更愿意将一切对抗都推迟到有朝一日俄罗斯更衰弱的时候再进行。美俄之间在实力上相差悬殊，令美国有理由把俄罗斯及其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视为次等威胁。

国内政治

如果说结构性的因素令美国不考虑俄罗斯的诉求，也无法与俄罗斯达成妥协以避免冲突，那么，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使两党的代表均对俄罗斯采取鹰派立场，只是在具体的事件上，两党的强硬程度不同而已。总统选战，也是两党候选人表达他们在安全问题上“强硬态度”的舞台。共和党人利用俄罗斯及其侵犯性的行动，来抨击奥巴马的对俄政策。他们认定，从一开始奥巴马对俄就太过软弱，特别是对待普京。他们批评奥巴马政府在 2008 年格鲁吉亚战争之后和莫斯科重修旧好的企图，认为这等同于绥靖，他们认为这鼓励了普京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政策。^①

虽然共和党领跑者唐纳德·特朗普已经表明，他会寻求一种安抚普京和俄罗斯的政策，这是他减少美国在海外的责任这一大策略的一部分，但其观点和共和党内的主流观点相左，遭到了党内中坚分子的猛烈批评^②。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采取更强硬的鹰派政策，来挫败俄罗斯的“挑衅”，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部署导弹拦截装置和雷达，以及在叙利亚设置禁飞区以阻挡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空中打击。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在他退出竞选之前，被许多专家认为是共和党内更受欢迎的候选人）评论说，普京总统一贯善于“抓住其西方谈判对手的弱点”。他承诺要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政策，来反击俄罗斯的“挑

① Charles Krauthammer, “Obama’s serial appeasement has backfired”, *Chicago Tribune*, 7 January. 2016, <http://www.chicagotribune.com/news/opinion/commentary/ct-iran-missile-krauthammer-putin-obama-perspec-0108-jm-20160107-story.html>

② Robert Zubrin, “Trump: The Kremlin’s Candidate”, *The National Review*, 4 April 2016,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433613/trump-kremlins-candidate>

衅”。他不顾美俄战机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强烈支持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鲁比奥指出，“这是说给普京听的。要让他明白，入侵邻国、支持像阿萨德那样的独裁者、侵犯他国的领空、以及威胁他国，将付出巨大代价。”^①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这位特朗普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一——指出，“我们本应该勇敢地对抗俄罗斯……当普京入侵乌克兰之时，我曾要求奥巴马总统做两件事。第一，立即发动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这些系统按计划早在 2009 年就该部署，但是奥巴马想要安抚普京，从而取消了这个行动，但并没有任何效果。第二，我们应该出口天然气帮助人们免受俄罗斯的勒索，直击普京痛处——他的钱包。”^②

民主党候选人也尽力疏远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尽管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功，比如结束对古巴的禁运、伊朗核问题的成功谈判，以及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不过，奥巴马曾经承诺要解决中东的难题，但现在这个地区麻烦不断，这令大部分美国选民不满。俄罗斯国内的威权主义，为民主党候选人关于自由主义的呼吁提供了口实，如，呼吁民主化，争取同性恋者的权利等。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一样，民主党的代表在对俄问题上也纷纷表明鹰派立场。就连鸽派人物——佛蒙特州州长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支持“对抗普京”的政策，还主张在政治与经济上孤立俄罗斯。桑德斯与美国大多外交政策决策者一样，把欧洲不断升级的紧张态势直接归咎于俄罗斯；他坚定支持奥巴马政府关于加强北约在东欧国家军事部署的政策。桑德斯说，我们必须告诉普京，“他不能随意侵犯，也无法全身而退。”^③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国务卿，也是民主党竞选领跑者的希拉里·克林顿，曾是美俄关系“重启”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俄罗斯问题，让她饱受来自两党政治对手的批评，他们认为她面对俄罗斯表现软弱。因此，在竞选过程

① “Ted Cruz: Chaos in Syria and Iraq is a Consequence of Obama’s Foreign Policy”, *Ted Cruz for President 2016*, <https://www.tedcruz.org/news/cruz-chaos-in-syria-and-iraq-is-direct-consequence-of-administrations-failed-foreign-policy/>

② “Ted Cruz: Chaos in Syria and Iraq is a Consequence of Obama’s Foreign Policy”.

③ “Transcript of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Debate in Milwaukee”, *New York Times*, 11 February 2016, http://www.nytimes.com/2016/02/12/us/politics/transcript-of-the-democratic-presidential-debate-in-milwaukee.html?_r=0

中，她对俄罗斯立场强硬，同时把“重启”政策解释为“精彩的一笔”，达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如制裁伊朗、在阿富汗合作，就削减新战略武器达成协议等）。而这些，是在由于格鲁吉亚问题、在中欧部署导弹计划等造成美俄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①希拉里说，两国关系的恶化并非是由政策本身所导致的，而是普京重新掌权之后威权主义在俄国滋长的后果。普京需要通过诉诸民族主义，采取了一个更具进攻性的、反美的外交政策，来转移俄国民众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前驻俄大使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重启”政策的另一关键策划者——也说了类似的话为该政策辩护^②。在竞选过程中，希拉里愈发强烈地批评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称需要对俄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其理由是，莫斯科的目标是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去抑制、对抗和削弱美国的权力。”^③

因此，在本轮总统竞选结束、下一届政府入主白宫之前，美国国内的政治舆论不会支持两国恢复友好关系，甚至使紧张的关系稍微降温都不太可能。然而，即便从长期来看，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也会继续阻碍与俄罗斯发展深入的合作关系。主要的问题是，莫斯科在华盛顿朋友少而敌人多。莫斯科在美国首都没有培育出像以色列、日本，以及波兰所拥有的那种游说力量，结果是，在华盛顿没有人把俄罗斯的诉求和看法，传达给美国领导人和华盛顿的各种机构。更严重的是，俄罗斯在2015年初还断绝了与俄美间一家主要的公关公司——凯旋公关（Ketchum）的关系，连象征性地影响精英言论

① 2014年6月，希拉里被问及，她是否为曾经的“重启”而感到尴尬，因为之后出现了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发生了战争。希拉里对此的回答是：“不，我认为重启是精彩的一笔。现在回想起来，更觉得是如此。只要看看在此政策下取得的成就，就一目了然。2008年的俄格战争，恶化了俄美关系。我们在这个时候进入白宫，当时是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普京做总理。我们当时需要的是：联合俄罗斯对伊朗实施强硬制裁，签署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限制核武器，还需要以俄罗斯作为进入阿富汗的物资通道。我们得到了所有这一切。”参见“Hillary: Russian Reset ‘A Brilliant Stroke’”, *The Weekly Standard*, June 13, 2014, http://www.weeklystandard.com/blogs/hillary-russian-reset-brilliant-stroke_794974.html

② Stoner Kathryn, Michael McFaul, “Who Lost Russia (This Time)? Vladimir Put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5, Vol.38, No.2, pp.167-187.

③ “Clinton Calls For Tougher Response To Russia On Ukraine, Syria”,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September 9, 2015, “<http://www.rferl.org/content/russia-us-clinton-calls-for-tougher-response-on-ukraine-syria/27235800.html>

的努力都放弃了。^①

而在过去几十年里，华盛顿却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反俄游说团体。^②这个游说团体由多方组成，其中包括传统上与俄罗斯敌对的族裔群体，他们曾遭受过苏联和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侵害（波兰人、巴尔干人和乌克兰人）；也有一些前苏联国家的利益团体，他们希望疏远莫斯科并进一步融入西方阵营，比如格鲁吉亚人；还有包括像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这些将普京视为威胁美国霸权的新保守主义的智囊机构；以及“自由鹰派人士”（liberal hawks）和反对俄罗斯威权主义的民主人士。根据齐甘科夫（Tsygankov）的说法，游说团体宣传一种扭曲的、反对俄罗斯及其政治制度的观点，认为这些在根本上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原则和价值相矛盾。他们将俄国所有的外交行动，都说成是出于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动机。^③

这些游说集团并不能单方面控制美国的对俄外交政策，但是，有些时候，他们的影响很关键。特别是，当美国的对俄政策不够强硬时，如奥巴马试图再次“重启”美俄关系，他曾几次通过行动想让俄罗斯对美国的意图感到放心，如取消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等。^④但是，游说集团一直在影响着整个政治讨论，并将其导向某种共识：即，与俄罗斯妥协，或者对俄罗斯的动机与利益持客观的、理解的态度，都是没有建设性意义的。一方面，莫斯科在美国的首都没有如以色列、日本甚至是波兰那样的游说团体；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形象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雇佣与俄联系紧密的游说人士或采取最有效的公关策略得到修复。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问题在于，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缺少吸引力和软实力，无法克服和溶解冷战期间早已形成的偏见：俄罗斯政治威权，社会落后。这些偏见由于俄罗斯最近在民主和人权方面的倒退，又被加强了。

① Frank Washkuch, Nichols Laura, “Ketchum calls it quits on Russia work”, *PR Week*, 15 March 2015, <http://www.prweek.com/article/1337821/ketchum-calls-quits-russia-work>

② Andrei Tsygankov, *Russophobia: The Anti-Russian Lobb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09.

③ Ibid. pp.14-15.

④ Douglas J. Feith, Cropsey Seth, “How the Russian ‘Reset’ Explains Obama’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16 October 2012.

在美国国内，广泛认为俄罗斯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并在如何回应俄罗斯威胁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更大的共识。两党的鹰派人物都主张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予以强力回应。奥巴马总统采取的是更为谨慎的做法，并拒绝进一步卷入乌克兰和叙利亚。但在奥巴马政府内部，对这一政策存在分歧。法卡斯（Evelyn Farkas），一名负责俄罗斯和乌克兰事务的国防部高官，为抗议奥巴马总统不愿更直接地对抗俄罗斯而宣布辞职。随后她在《政客》（Politico）杂志上评论说：“俄罗斯对国际体系、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挑战是根本性的，因此我们不能让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在叙利亚或其他任何地方得逞。”^①因此，美国未来任何一届政府，都会迫于来自两党、组织完善的利益集团、以及政治游说集团的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而对莫斯科采取强硬路线。

对于世界看法的分歧

世界观方面的重要分歧，也阻碍着达成更大的和解。对于俄罗斯的诉求，美国原本应该予以承认，即俄罗斯把后苏联空间当成自己的利益范围是合理的。但对于美国大多数的当权者而言，任何有关“势力范围”的言论，都是对他国权利（如推行独立外交和选择结盟等）的侵犯。^②他们认为，这类思维反映的是过时的 19 世纪对于国际关系的现实政治考量，不符合现代的、全球化的、互相依赖和开放的世界现实。若承认俄罗斯或者中国各自所要求的“势力范围”，则是向错误方向走了一步，这意味着回到过去几百年中的那种大国冲突与战争。^③著名的美国现实主义学者亨利·基辛格和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美俄关系恶化，美国负有相当多的责任。他们劝说美国应承认

① Evelyn Farkas, “Putin is Testing Our Resolve”, Website of Politico, November 24, 2015,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11/isil-syria-putin-nato-airspace-213393>

② Steve Pifer, “Avoiding a new Cold War. Really?”, *Brookings: Order from Chaos*, 13 October 2015,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order-from-chaos/posts/2015/10/13-avoiding-a-new-cold-war-pifer>

③ 这些说法背后所隐含的意味是，美国保持长久的霸权，是对世界光明与自由的保障，参见 Robert Kagan, “The United States must resist a return to spheres of interes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rookings: Order from Chaos* 19 February 2015,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order-from-chaos/posts/2015/02/19-united-states-must-resist-return-to-spheres-of-interest-international-system-kagan>

俄罗斯在自己后院的影响范围。^①但他们只是少数，而且他们的观点要么遭到猛烈的批评，要么无人回应。^②

美国的精英和公众一向不喜欢国际关系中的现实政治和实力均衡。自美国立国之初，许多“国父”就深深地怀疑欧洲的均势政治，认为这从根本上来说，是无原则、不道德和非民主的。^③美国独特的发展历程，使得对于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世界观可以不受现实政治考虑的约束而自由发展。与欧洲频仍的冲突不同，美国在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没有遭受外国侵略、军事占领和战争的破坏。由于一直以来没有实践现实政治的必要，因而一个比较理想化的外交政策的研究方法就出现了。按照米尔斯海默的说法，“美国之所以不喜欢现实主义，是因为现实主义与美国基本价值观相冲突。现实主义与美国人对于自身以及更广阔世界的认知相冲突，尤其是同美国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以及盛行于美国社会的道德感相矛盾。”^④

可以肯定的是，自由理想主义仅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分支，其他的分支还有：孤立主义和帝国主义（如，天定命运论），还有在特定时期内崭露头角的现实主义（主要是尼克松-基辛格外交政策）^⑤。但是，自由理想主义在二战结束之后就一直主导性的力量。此外，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以及随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成为历史上空前的领导国，这些似乎证明理想主

① John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4; Spiegel Der, “Interview with Henry Kissinger: Do We Achieve World Order Through Chaos or Insight?”, 13 November 2014.

② 近来，关于能否把奥巴马视为现实主义者，有很多争论。说他是现实主义者的理由有：他不愿让美国更多地介入到叙利亚和乌克兰；对 ISIS 的反应平稳，说威胁不到美国的生存；他自己也偶尔自称为外交政策方面的现实主义者。参见 Jeffre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The Atlantic*, April 2016,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虽说如此，大多数主流的现实主义者不认同以上的评价。他们认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更多地在延续自由国际主义和美国例外主义的外交政策，并且认为，这些促使他的行动违背现实主义的原则，造成严重的外交失败。参见 Steven Walt, “Obama Was Not a Realist President”, *Foreign Policy*, 5 April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04/07/obama-was-not-a-realist-president-jeffrey-goldberg-atlantic-obama-doctrine/>

③ John Bew, *Realpolitik: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07-122.

④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23.

⑤ Henry R. Nau, *America at Home Abroad: Identity and Powe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义的方法是有效的，也让美国例外论的自以为是（self-righteous）更加膨胀，以至于对美国自身那些不择手段的现实政治行为视而不见^①。美国精英们相信他们是在领导着一种独特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建立在全人类所认同的、因而也符合全人类最大利益的普遍自由主义的原则之上。接受俄罗斯对于“势力范围”的要求，不仅将损害美国的霸权，也将损害这个正义和公平秩序的未来。^②

对自由的国际主义的信仰，与对自由民主是最有效、最公正的政府形式的信念，总是携手共进的。民主规则不仅是民主国家人民的最佳利益所在，也是为了国际和平与稳定，因为民主国家喜欢同他国保持和平关系，而威权国家则有进攻性倾向和好战的举动。^③华盛顿的许多人认为，与莫斯科和解是枉然的举动，也是绥靖的做法，只会鼓励俄罗斯威权主义政权的侵略性，因为他们需要一种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来弥补其在国内部合法性的不足和外交政策的失败。^④

结 论

凯南通过对影响“苏联行为”的诸多因素的深入分析，得出了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理解。苏联经济上的薄弱、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其根源是在历史上屡次受到外来侵略）、执政党出自于曾被取缔的地下团体、以及弥赛亚式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特点，使得凯南得出结论：苏联有好斗的意图，这构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前所未有的威胁。虽然如此，凯南也认为，苏联相信共产主义最终会对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因此他们不会采取过于冒险的、妨害此目标的行为。因此，他总结道，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可以被遏制，但却没必要对其进行直接的打击。

① Michael Lind, *The American Way of Strategy: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John Ikenberry, “The Illusion of Geopolitics: The Enduring Power of the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4.

③ Bruce Russett, John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④ Stoner Kathryn, Michael McFaul, “Who Lost Russia (This Time)? Vladimir Putin”.

我们采用了类似的分析方法，即，考察影响美国对俄罗斯政策的国际权力结构、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因素，以及美国当权者如何看待俄罗斯对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的挑战。

从结构的角度看，美国既不愿意与被自己视为衰落的大国（俄罗斯）谈判，也不愿意与之直接冲突，而是想在以后俄罗斯更加衰弱的时候再采取这两种办法。在具体政策方面，这意味着无视俄罗斯对于建立欧洲安全新秩序的要求，同时扩大和加强北约在巴尔干地区、波兰和东欧等地的防御承诺，以阻止莫斯科采取鲁莽的行动，并藉此类行动迫使美国走向谈判桌。这还意味着，美国也不愿意做出可能引起俄罗斯直接对抗的行动（比如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等）。美国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些危机，让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越陷越深，从而加速俄罗斯的衰落。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近期发表了一篇关于奥巴马外交政策的文章，其中提到，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奥巴马的战略已被形容为汤姆·索亚 (Tom Sawyer) 式的方法^①：如果俄罗斯想耗费资源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粉饰篱笆”，那么美国应该由着他们这样做。这篇文章引用奥巴马的说法：“他们（指俄罗斯）扩张过度。他们正在流血。他们的经济已经连续三年剧烈地萎缩”^②。鉴于美俄之间的力量平衡关系（美国占绝对优势），美国应该静候时机，任凭俄罗斯过度扩张，卷入乌克兰、叙利亚或者其他地方的冲突之中。

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令美国很难与俄罗斯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至少在目前的莫斯科政权当政的时候不行。鉴于当前的政治气候，哪怕暗示性地接受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行动的合理性，都会被许多人谴责为绥靖。甚至当前奥巴马政府所采用的“静候时机，让俄罗斯自我消耗”——这

① 汤姆·索亚是作家马克·吐温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汤姆·索亚的本领是善于忽悠当地的小孩子相信他的想法，并为他干活。其中一段有名的故事，是当汤姆·索亚的姑妈让他去涂刷房屋周围的篱笆时，他让其他小朋友相信他在做的工作是多么的愉快，以至于那些小孩子甚至要贿赂他，请求他把这个机会留给他们。参见 Mark Twain,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Rpt, *The Unabridged Mark Twain* 1, 1876, pp.436-585.

② Jeffre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The Atlantic*, April 2016,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

一从上文分析的国际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讲最有道理的策略，也遭到了共和党反对派和自由主义鹰派的激烈批评。他们要求奥巴马直接对抗普京。虽然奥巴马守住了他的立场，同样，在竞选中的堂皇言论消退之后，未来的总统也将秉持同样的谨慎策略，因为他们必须去面对决策中的现实情况，然而，组织良好的“反俄”团体将继续游说未来的总统，要求对“俄罗斯威胁”做出回应。此外，相当大部分的美国精英认为，只有在俄罗斯发生制度更迭、转变为民主制度之后，俄罗斯才不会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才能融入西方领导的自由世界秩序之中。美国精英将继续对政府施压，批评俄罗斯侵犯民主和人权；任何与莫斯科之间的合作和建设性的接触政策，如果会起到加强莫斯科现政权合法性的效果，他们都将反对。

由于俄罗斯这个大国的挑战，美国介入乌克兰和叙利亚的代价和风险大大提高。俄罗斯现政府在有关威信和地位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让步的意思，而总统普京很可能到2024年之前都掌舵克里姆林宫（也可能更长久）。因此，美俄关系的命运，将受制于两国围绕未来国际秩序的斗争。当前的局势容易让人想到冷战：美国开始实行遏制政策，准备长期对抗。^①在这种情况下，今后的局面将是：看谁能撑得更久，谁更能展示出使另一方后退的决心。如果真是如此，历史可能会重演，最深受其害的将是乌克兰和叙利亚的民众。

（郇洁译 肖辉忠校）

【 Abstract 】 During the Cold War,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George Kennan’s seminal article. Contemporary U.S. policy towards Russia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ree factor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power structu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deology. All these three factors have decided two basic aspects of American conduct towards Russia, namely, contain but without direct confrontation. There exist bas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S. and Russia. Either in a short term or on the long run, it is difficult for both to reach any ground-breaking agreement. Strategically speaking,

^① Robert Legvold, “Managing the New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2014, Vol.93, No.4; Dmitry Trenin, “Welcome to Cold War II”, *Foreign Policy*, March 4, 2014,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4/03/04/welcome_to_cold_war_ii

contemporary U.S. policy towards Russia is getting Russia highly-involved in crises (Syria and Ukraine) in order to accelerate its decline instead of direct confrontation with Russia.

【 Key words 】 U.S.-Russia Relationship, U.S. Domestic Politics, U.S. Conduct towards Russia, the Ukraine Crisis, the Syrian Crisis

【 Аннотация 】 Во врем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держи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находилась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доклада Кеннана. Сегодня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находится в основном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следующих фактор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власти, внутрен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идеология. Данные факторы определяют два основных аспекта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ка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без прямого нападения. Меж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Россией существуют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будь то в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й или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обеим сторонам трудно достичь прорыва в соглашении по мирному улаживанию отношений. С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сегодня отражается в избегании прямой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с Россией, однако позволения России углублять участие в кризисных регионах (Украина, Сирия) с целью ускорения солабления Росс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Амери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кризис в Украине, кризис в Сир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世界秩序：俄罗斯的视角

R·萨科瓦*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在西方价值观的主导下，大西洋共同体通过北约和欧盟东扩至俄罗斯边境，俄罗斯被边缘化。俄罗斯自身面临的这一战略困境，塑造了它的新修正主义世界秩序观，即，挑战大西洋权力体系的实际操作而非内在原则，促进西方接受一个多极、多元的世界秩序。迄今为止，虽然新修正主义日益抬头，但俄罗斯还是一个保守的、维持现状的国家。俄罗斯目前把自己定义为“非西方成员”，但如果能够克服冷和平时期的战略限制，俄罗斯还是有可能重归“西方”。

【关键词】 俄罗斯的世界秩序观 大国关系 修正主义国家

【中图分类号】 D85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6)

02-0047(15)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国际秩序的活力在于合法性与权力的动态平衡。但是，“当平衡被打破，限制消失，国际社会出现了代价高昂的声索和难以和解的竞争对手时，混乱就会随之而来，直至一个新的秩序建立起来为止”。^①他指出，凡尔赛体系过于看重合法性层面，更倾向于诉诸共享原则，而忽略了权力因素，所以使得德国修正主义铤而走险。^②正

* R·萨科瓦（Richard Sakwa），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俄罗斯与欧亚项目研究员。

① 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London: Allen Lane, 2014, p.66.

② Kissinger, *World Order*, p.83.

如很多俄罗斯评论家所言，这也正好描述了当前欧洲和全球的失序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度面临新一轮冲突的威胁，而这一轮冲突的根源，在于冷战后没有能建立起一种正义、公平、平等的和平。从1989年到2014年，这四分之一世纪的“冷和平”，无疑是被浪费的25年。因为在这25年间，事关欧洲安全和全球秩序的根本性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2014年的乌克兰问题，是危机的征兆，而非原因。欧洲和世界进入了一些人所说的“新冷战”之中，部分原因是，在“冷和平”年间，由于制度和思维惯性，未能建立起一个新的结构，也未能提出新的思想。在实践层面，这并不是是一场新冷战，因为造成当前俄罗斯和大西洋共同体之间冲突的逻辑与冷战不同。^①

1989-2014：冷和平

俄罗斯的叙事（narrative）认为，在冷战结束后，自己的国家再次被冷酷地遗弃。事实一次又一次证明，俄罗斯难以被征服，但如今，俄罗斯还难以被消化和融合。到了2014年，已经很明了，尽管做出了艰难的努力，俄罗斯仍然无法融入现有的欧洲—大西洋安全结构体系之中。在结构层面上，俄罗斯过于庞大和独立，过于骄傲与强大，难以成为“大西方”（an expanded ‘West’）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考量和大国心态，意味着在身份认同上，俄罗斯无法被归入到西方之列。同时俄罗斯内部的政治和民族—区域建构，也加剧了外部的脆弱性。俄罗斯联邦与13个陆上邻国接壤，出海口很少，再加上150个土生土长的民族，作为这样一个政治实体，俄罗斯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异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

从18世纪沙皇俄国，到1917-1991年间的苏联，乃至到后苏联时代，在俄罗斯统治精英中，保持着一种独特的文化连续性。这三种政治制度，彼此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共同之处是，都将俄罗斯视为一个大国，认为俄罗斯是管理欧洲和全球事务的一个关键成分。苏联和后苏联时代精英的高

^① Andrew Monaghan, “A ‘New Cold War’? Abusing History, Misunderstanding Russia”, *Chatham House Research Paper*, May 2015.

度连续性，令这种看法越发固化。甚至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俄罗斯被视为嵌入欧洲—大西洋体系最深的时候，叶利钦（Boris Yeltsin）领导的这个独立的国家，所寻求的依旧是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普京总统上台初期，曾致力于找到一条既融入西方、又保持独立的道路。但是由于 2003 年西方入侵伊拉克等一系列因素，到 2005 年左右，普京的这一努力破产了。自那以后，普京的政策就被认为是不稳定且主观至上的，但实际上，普京的政策根植于两点：对国际地位的追求和对国内秩序的关照。

当前俄罗斯对于国际秩序的看法，受一个问题的影响：冷战结束了，但没有被超越，很多纠结还在。爱德华·卡尔（E. H. Carr）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20 年是“危机的 20 年”，这 20 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加上凡尔赛和约中的惩罚条款，激起了修正主义德国的报复。^①今天的俄罗斯不是另一个魏玛德国，更不是纳粹德国。但当前的欧洲格局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20 年有高度的相似性。最重要的是，上一次冲突的结束，决定了下一次冲突的形成。俄罗斯评论家认为，拿破仑战争以后，法国在维也纳会议中被其他国家礼貌对待，并被接纳入国际社会之中，从而才能建立起一个长达 100 年的和平秩序。而德国，在一次大战后，被羞辱、孤立，因此仅仅 20 年，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合法性和权力的平衡就此被打破。

1991 年以后，西方没有给俄罗斯施加惩罚性和平，相反，也有过真正的努力让俄罗斯进入自由民主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大西洋安全体系。但问题在于，是何种一体化模式。叶利钦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有不同的侧重，但共同之处是，在任何共同体中，都一贯坚持俄罗斯的平等主权。这意味着，俄罗斯一旦加入任何一个共同体，该共同体需要给予俄罗斯的不仅是成员国的身份象征，而且是平等的身份地位。实际情况是，俄罗斯曾被邀请加入到一个现有的共同体中，但是要求俄罗斯改变自己，使其接受在一个陌生的权力体系内扮演一个次要角色。在西方坚持大西洋权力体系的延续性，与俄罗斯要求该权力体系的根本变革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紧张关系。在这种紧张

^① E.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issu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additional material by Michael Cox, London: Palgrave, 2001 [1939].

关系中，维持了 25 年的冷和平。但 2014 年爆发了冲突，开始了新一轮的角力。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很大程度上受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①思想的启发，采取了大规模的改革方案。^②改革逐步变得激进，在 1989 年取消了共产主义制度。^③戈尔巴乔夫不仅尝试过克服大西洋共同体和苏联之间的冲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试图超越大国冲突的逻辑，目的是使冷战以各方共同胜利的方式终结；不仅是大国，还有身陷其中的所有国家。戈尔巴乔夫在 1988 年 7 月 6 日在欧洲议会（Council of Europe, CoE）的演讲中，提出建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共同欧洲家园（Common European Home），这一泛欧洲共同体的抱负以“泛欧洲”（Greater Europe）^④的形式延续至今。戈尔巴乔夫在 1988 年 12 月 7 日在联合国的演讲中公开声称，冷战结束了。1989 年的骚乱事件是这一根本性政策转变的结果。东欧共产主义政权接二连三地崩溃，11 月 9 日柏林墙倒塌。两德的命运，是 1989 年 12 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H. W. Bush）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海域会晤的主题。随之而来的争议是，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是部分还是完全加入北大西洋条约组织。

改革的思想前提是，如果能克服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安全冲突，那么自 1917 年开始的共产党政权引起的国内政治斗争，也能被克服。冷战的终结伴随着共产主义政权的瓦解，这不仅发生在苏联集团国家，也发生在苏联本身。两个进程同步进行：共产党政权的倒台与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是前者的掘墓人，但他尽其所能防止后者的发生。这两件事有内在联系，但并不等同。从时间上看，苏联正式解体是在 1991 年 12 月 25 日，此时冷战结束

①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历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院士，前苏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译者注

② M.S. Gorbachev,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London: Collins, 1987.

③ 有关戈尔巴乔夫思想演变的综述可参见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④ 关于泛欧洲的译法，是相对于大欧洲（the wider Europe）而言，指把欧洲大陆每个角落联合起来，构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共同欧洲家园”。可参见作者发表在《俄罗斯研究》2015 年第 1 期的文章“乌克兰的未来”——译者注

已经两年。苏联的解体肯定与共产主义政权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消亡有关。但苏联解体是一系列因素，特别是苏联国内问题导致的。尽管有俄罗斯学者提出，苏联解体背后有阴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人暗箭所伤的模式很类似，但苏共政权消亡和苏联国家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因素导致的，这毋庸置疑。

苏联的解体似乎仅仅证实了西方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冷战，因此西方可以随意把世界秩序按照自己的模式重新加以构建。苏联的消亡、俄罗斯的脆弱，使得构建一个真正超越胜败的政治平台大受影响，却为那些“冷战延续者”们（指热衷于延续冷战，最终目的在于扩大大西洋共同体的人）提供了足够的操作空间。换句话说，这种意图与戈尔巴乔夫尝试建立共同超越冷战的努力背道而驰，是一方宣称胜利、而另一方无论如何都被定为失败者（即便是没有被击败）的非对称结构。目前，俄罗斯对于世界秩序的看法，与其对冷战终结方式的不满有关，即只有一方可以宣称“胜利”，并将“失败”的帽子扣在另一方身上。冷战的非对称性终结，随之而来的是冷和平。

冷战结束初期，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持中间立场的承诺，即欧洲政治与安全架构接纳俄罗斯，俄罗斯也承诺愿意被纳入。在此基础上，才有了1990年11月21日的《新欧洲巴黎宪章》（the Charter of Paris for a New Europe）。在包括所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框架下，通过了该宪章。这部宪章强调“一个民主、和平、团结的新时代”的到来，宣称“欧洲不再受过往的羁绊”。^①冷和平是这种“超越、适应、延续”复杂过程的产物。就俄罗斯而言，这是一种非对称性的和平框架，俄罗斯为摆脱冷战所做的努力，没有在制度安排上得到认可。众多的理念，如建立欧洲安全议会等新机构，在平等的基础上管控潜在冲突等，都未能落实；相反，西方机构不断扩大，占领空间。

这个阶段的很多妄想和错误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一个政治上的妄想是，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在此语境下的妄想是真诚的，然而却是一

^① *Charter of Paris for a New Europe* (Paris, CSCE, 1990). Available at <https://www.oscepa.org/documents/all-documents/documents-1/historical-documents-1/673-1990-charter-of-paris-for-a-new-europe/file>

种虚构的叙述。毕竟，共产主义制度的终结，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苏联的解体，这些都是事实。西方自认在冷战中获胜的心态由此而生。这种胜利者心态，对于与俄罗斯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带来长期的有害影响。在俄罗斯方面，马耳他会议是为了超越冷战的逻辑，不去标记权力转移等问题。对西方来说，马耳他会议和冷战的结束，承担着终结雅尔塔以来的大国权力政治的诉求；对俄罗斯而言，马耳他会议的基础是承认雅尔塔体系的成果，最重要的是承认苏联的大国地位和联合国创始国的身份，特别是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在与苏联的斗争中，西方的思想和机制确实胜利了，但是在俄罗斯看来，这是共同的胜利，是共同反对腐朽的共产主义制度的胜利。因此对俄罗斯而言，马耳他会议是对于雅尔塔的超越，而非否定。俄罗斯人认为，西方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共产主义体系的自我瓦解，来毁灭苏联。

实际上，美国领导人曾尽一切努力来避免苏联的解体（除了波罗的海国家），其最大的担心是大量核武器的命运。^①俄罗斯积怨已久，但这些怨恨都起源于西方自认为“胜过”苏联这个根本问题。西方认为，这种胜利具有普遍意义，而且不能被与苏联继任者俄罗斯联邦之间的和解所稀释。同样，俄罗斯人的自信也根深蒂固：认为俄罗斯本质上是一个大国，这个国家不仅应当受到尊重，在管理欧洲和全球事务上受到平等对待，而且还应当享有作为欧亚大陆上最强大国家的特权。这些难以相融的“迷思”（myth），给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后果。简言之，双方的分歧可以归纳为：西方认为自己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在很多方面是得胜的；而俄罗斯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益主张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

战略僵局

俄罗斯对冷战后世界格局的看法是，它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战略僵局。显然，西方理念和制度的胜利，即便是在欧洲大陆上也非历史的终结，但在某

^① 有关一手材料参见 Jack F. Matlock, *Autopsy on an Empire: The American Ambassador's Account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and idem, *Reagan and Gorbachev: How the Cold War End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4.

种程度上却被认为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俄罗斯的唯一选项似乎就是要去适应这些理念和制度，否则就会被孤立和驱逐。在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主流的战略选择是适应自由民主理念和制度，但并非没有异议，特别是来自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Evgeny Primakov，1996 年 1 月到 1998 年 9 月任俄外交部长，1998 年 9 月到 1999 年 5 月任俄政府总理）的异议。俄罗斯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退却，放弃了其数个世纪以来所坚持的大国地位。任何对权利的诉求，更不要说后来被称为“特权”利益区，都会被邻国谴责为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复苏。普京的上台终结了“退却”政策，尽管在他任内的最初几年，也曾尝试着协商一些新的条款来维持这种适应性战略。但对普京而言，俄罗斯可以作为“普遍胜利”的一部分，然而必须是这个扩大的共同体中平等的主权国家。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不是外部世界能随意赋予或取消的，而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和命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大西洋共同体也曾想将俄罗斯纳入其中，将俄罗斯拒之门外并不是既定战略。问题是结构性的——双方对于后冷战时期世界秩序的认知，以及俄罗斯在其中地位的理解，不能兼容。

这种对立的根源在于对冷战终结方式的看法不同。尽管戈尔巴乔夫打破了冷战的格局，但他还致力于把苏联建设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他而言，超越冷战并不意味着苏联将自动地复制西方的政治体制。^①相反，在他和他的继任者看来，在国际事务中，俄罗斯应该拥有合作的精神，但同时更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直至今日，这种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多元主义还在塑造着俄罗斯的外交。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普里马科夫就已经呼吁多极化，主张不能无条件地去适应西方的制度。最终，俄罗斯是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国家，但显然希望以自由民主的形象进入国际社会。俄罗斯曾把民主当作理想来拥抱，并认为这是俄罗斯自身的民主，而非舶来品。然而，俄罗斯接受了很多民主支援。但很快，在俄罗斯，民主冲动和大国雄心之间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并逐渐成为普京政权的主要特征。

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不能是一个大国和民主国家，然而这需要国际环境的转变。戴高乐治下的法国虽然是大西洋共同体的创建者之一，在失去帝国

^① John Gooding, “Gorbachev and Democracy”, *Soviet Studies*, 1990, Vol.42, No.2, pp. 195-231; Neil Robinson, *Ideolog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ystem: 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Soviet Ideological Discourse*,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995.

地位之后，也遇到过适应性问题。对俄罗斯而言，这种挑战更加巨大，因为在俄罗斯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还包含着对俄罗斯的欧洲身份认同的质疑。另一方面，大西洋共同体由于受到冷战胜利的鼓舞，在面对新的恐怖主义和全球暴乱的挑战时，自身并不想做出任何根本性的改变，更不用说自我解散了。俄罗斯对世界秩序的批评，被西方指责为是典型的苏联式的在大西洋两岸之间插楔子。中东欧国家视大西洋共同体为安全和发展屏障而加入其中，加剧了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和俄罗斯呼吁的战略多元主义不同，大西洋一元主义声势日上。在今天的欧洲，欧盟是主导性的政治机制，北约是首要的安全机构，大西洋共同体的价值观是主流的意识形态。

还不清楚俄罗斯将以何种方式适应这种一元体系。由于未能找到一种包容性的适应模式，双方陷入了战略僵局。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副所长维克多·克列姆纽克（Viktor Kremenyuk）认为，这段时期的一个根本性错误在于：未能把马耳他会谈的内容以和平条约的形式来加以定型。^①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此前已经协商好的关于北约扩大的问题，由于没能将这些协商的内容形成正式的文件，才有了此后无休止的争论。克列姆纽克指出，只要有大国存在，就会有对势力范围的竞争。但后冷战时期，在美俄之间未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平衡。^②在实践中，冷战时期形成的西方机制与理念，直到现在还被西方认为拥有独有的优势。冷战的非对称性终结，使西方的机制和理念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把俄罗斯及其对新世界秩序的诉求放在一边。这些诉求，戈尔巴乔夫曾清晰地呼吁过，但最终由于俄罗斯急于想加入西方社会而失去了。换句话说，也就是俄罗斯的民主化革命，遮盖了苏联后期呼吁的在新基础上重建世界秩序的诉求。经历了90年代“转型”之痛的俄罗斯，到普京时期又重提当初戈尔巴乔夫的诉求，但此时的俄罗斯与欧洲，都已今非昔比了。

① Viktor Kremenyuk, *Lessons of the Cold War*, Moscow: Aspekt Press, 2015.

② Tamara Zamyatina, “Russia, US should seek balance of rivalry and cooperation to avoid new cold war”, TASS, 19 October 2015, <http://tass.ru/en/opinions/830039>, accessed 2 November 2015.

俄罗斯的世界秩序观

冷战后俄罗斯自身的战略困境塑造了它的世界秩序观。大西洋共同体通过北约和欧盟纷纷东扩至俄罗斯边境，伴随其中的还有其价值观。大西洋价值观自认为具有普遍性，因此作为反对力量的俄罗斯，客观上会被边缘化。当然双方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这一矛盾，如北约—俄罗斯理事会（NATO-Russia Council）的建立就是其中一例。“新大西洋主义”理念（new Atlanticism）的兴起，反映了后冷战时期被更加深化的一元主义价值观。^①安全一体化、日益紧密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以及对于某种“文明”标准的认同，削弱了欧洲政治的多元主义。

相反，俄罗斯追求的是拿破仑战争后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如2015年第12届瓦尔代俱乐部（Valdai Club）的一份专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维也纳会议持续数月……在于寻求促进欧洲大陆发展的新秩序。各国元首和外交官寻求建立一个能够管控大国冲突、避免正面碰撞并将破坏控制到最小的国际关系体系”。^②其目的在于，在体系内通过建立一套冲突解决机制来保护国家主权，抵抗外来侵略。相反的情况是，部分国家的利益被忽略，国际关系进入“霍布斯时刻”（Hobbesian moment）：即，“国际关系基于意识形态，而非现实考量，结果是走上暴力不断升级的僵局。外交政策不再奏效，战争如期而至”。^③这是一份比较能反映俄罗斯对当代世界秩序看法的文件。

俄罗斯还面临来自美国的反对。美国一方面是1989年“全球化”胜利之后自由贸易秩序和自由国际主义机制基石的奠基者，另一方面，它又是前

① Richard Sakwa, “The New Atlanticism”, *Valdai Paper*, No.17, Valdai Club, May 2015; <http://www.scribd.com/doc/266515275/The-New-Atlanticism>. The Russian version is “Novyi Atlantizm”; <http://www.scribd.com/doc/266515505/Новый-Атлантизм>. Reprinted as “The New Atlanticism”,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special issue, July-September 2015, pp.99-109,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The-New-Atlanticism-17695>

② *War and Peace in the 21st Century: A New International Balance as the Guarantee of Stability*, Materials for Discussion at the 12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Valdai Discussion Club, Sochi, 19-22 October 2015, p. 1. 最终版本的报告为 *War and Peace in the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and Balance of the New Type*, Valdai Discussion Club Report, January 2016, available at <http://valdaiclub.com/publications/reports/international-stability-and-balance-of-the-new-type/>, accessed 26 January 2016

③ *War and Peace in the 21st Century*, p. 2.

所未有的、地缘政治权力体系和军工复合体的中心。两者之间的紧张态势逐步升级，在俄罗斯看来，是由于无休止的“双重标准”，是美国自己破坏了自由制度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俄罗斯方面认为，无情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破坏了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的普遍价值观。在合法性与权力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孤立俄罗斯、迫使俄罗斯永久处于次要地位的象征性人物。对于乌克兰，布热津斯基主张采用冷酷的现实主义和地缘政治的策略，让乌克兰成为东欧的桥头堡，服务于欧洲大西洋主义者的战略利益。^①

俄罗斯的战略家们，如谢尔盖·格拉济耶夫（Sergei Glazyev）^②等人认为，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实现以下的目标：（1）完成2004年橙色政府的“未竟事业”。（2）使日益紧张的欧洲人团结到美国霸权之下（“领导力”）。（3）报复、惩罚俄罗斯。在2013年年中的叙利亚化武危机中，俄罗斯让美国相形见绌；在同年发生的斯诺登事件中，俄罗斯为其提供庇护；还有，总体上，俄罗斯拒绝在美国面前俯首称臣。当格拉济耶夫宣称“美国通过引发国际冲突来捍卫其地缘政治、金融和经济权力”，并建议成立以俄罗斯为首的“全球反战联盟”的时候，他的观点反映了莫斯科的信条。^③确实，在俄罗斯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认为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是在挑战俄罗斯。俄罗斯加入到了关于美国兴衰的诸多讨论之中，对此问题有不同观点，核心是如何看待美国所宣称的世界领导者地位。如今的新兴国家，正在动摇着美国的地位。^④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p. 39, 84-5 and 121-2.

② 谢尔盖·格拉济耶夫（Sergei Glazyev），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议员，著名左派经济学家。——译者注

③ Sergei Glazyev, 'The Threat of War and the Russian Response', www.globalaffairs.ru, 25 September 2014.

④ 一项新近发表的精致分析参见 Bruce Jones, *Still Ours to Lead: America, Rising Powers,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Rivalry and Restrain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4).

这一批判性立场，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俄罗斯挑战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①，但声称只是反对霸权，而不否认自由主义原则。相反，俄罗斯是“新修正主义”（neo-revisionist）国家。俄罗斯并不挑战国际法和国际治理体系，它也从中获益良多，但俄罗斯反对“霸权”国家在现实操作中滥用这些规则。在俄罗斯看来，真正的修正主义者是西方，而非俄罗斯。同样，俄罗斯批评的也不是国际法和国际治理的原则，而是这些原则的实际操作。比如在其与欧盟的关系中，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立场认为，俄罗斯不能仅仅是欧盟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成为欧洲命运的共同缔造者。^②这种斗争不仅是在规则层面，也是在竞争谁能使自己的理念变成欧洲的普遍价值。^③

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试图限制道德普遍主义（moral universalism）的应用，认为这往往是专断和具有惩罚性的。俄罗斯新修正主义主张，全球治理的工具，能真正反映全球的关切。在欧洲的碰撞，仅仅是多元主义在全球层面所遇到的挑战的一部分。西方的制裁加快了俄罗斯削弱美元、另辟蹊径的步伐，例如，用黄金而非美元来定价石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要从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脱离出来。中国的帮助缓解了俄罗斯的压力，金砖国家开始建立区别于西方主导的替代性国际机制。替代性机制的出现，不是另一个一元主义。正如瓦尔代报告指出的那样，“大西洋共同体是因统一的价值观而联合在一起。非西方国家则因强调多元的重要性而走到了一起，并坚持认为没有必要、

① 自由国际主义是一种外交政策学说，宣称自由国家为了保障自由的目标，可以干涉其他主权国家；方式包括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译者注

② Hiski Haukkala, “A Norm-Maker or a Norm-Taker? The Changing Normative Parameters of Russia’s Place in Europe”, in Ted Hopf (ed.), *Russia’s European Choic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35-56; idem,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Regional Normative Hegemon: The Case of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Vol.60, No.9, pp.1601-1622; idem, “Lost in Translation? Why the EU has Failed to Influence Russia’s Development”, *Europe-Asia Studies*, 2009, Vol.61, No.10, pp.1757-1775; idem, *The EU-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Limits of Post-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③ Hiski Haukkala, “From Cooperative to Contested Europe?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as a Culmination of a Long-Term Crisis in EU-Russia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Published online 3 February 2015.

也不可能为‘现代国家和社会’贴上统一的标签；这是与多极世界的现实状况更为契合的理念。”^①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美国大部分的政策设计，是通过保持高水平的驻军以及北约东扩，来“保持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权力平衡”。但这个理论同时也认为，“美国注定会为了维持单极世界，来阻碍历史的发展”。^②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数量已经从2000年的100万人大幅下降，因为这些力量被部署去参加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奥巴马总统竞选成功后，美国在欧洲军力的减少还因为，其认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因此进行了战略转移。西方大国在冷战后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度量和智慧，相反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傲慢与偏见使其固执于对新国际秩序的一元主义解说。俄罗斯面临着接受还是反抗这种一元主义的抉择。最后，天平倾向了“反抗”。但是这一选择在俄罗斯看来，并非最理想的，因为“接受西方的某些原则”得到的回报更加实惠。这就是俄罗斯新修正主义的基础——挑战大西洋权力体系的实际操作，而非内在原则，促使西方接受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多极与多元的世界秩序。

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并没有挑战自由国际主义的根基，但是它对外交平等和自尊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令其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秩序相冲撞。美国的二元论(dualism, 非黑即白)，使其既追求大国的地缘政治目标最大化(19世纪的模式)，同时又声称要服务于公平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即所谓的21世纪的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③对俄罗斯来说，这是双重标准、假冒和伪善。因此俄罗斯受到批评时，就会反驳说，“看看你自己”(你算什么)。但是这没有切中要害，因为霸权国家在诉诸它们的全球目标时，通常会穿上文明的外衣，并且有选择地使用国际法向对手施压。^④与此同时，俄罗斯呼吁一个更加多元的国际秩序，但在其国内却是一元主义的天下，这二者之间张力也很明显。

① *War and Peace in the 21st Century*, p.5.

②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00, Vol. 25, No.1, pp.5-41, at p.36.

③ 有关美国外交的精彩分析参见 Perry Anderson, “Imperium”, pp.5-111, and “Consilium”, pp.113-167, *New Left Review*, No.83, Sept-Oct 2013.

④ 对此论点的经典表述参见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开始适应和利用它所批评的这个体系的特征，特别表现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的介入似乎放弃了它一直拥护的那些原则，特别是联合国规定的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迄今为止，虽然新修正主义因素日益抬头，但俄罗斯还是一个保守的、维持现状的国家。2008年的俄格战争残酷地反映出，根植于欧洲国际事务中的，不是经典的大国政治协调，而是冷战的零和逻辑。普京执政之初，强调优先发展经济，外交政策应当服务于国内现代化的目标。然而目前俄罗斯的行为，似乎回到了地缘政治决定国家政策的道路。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如果我们假设俄罗斯对乌克兰危机的介入，是因为它试图要突破战略僵局（俄罗斯自感深陷其中），如果这种解释站得住脚的话，那么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动作仅仅是修正主义的行动，而非修正主义的战略。它的目的是冲破困顿，而非改变后冷战秩序的根基。但是，要想克服战略孤立，唯一方法是挑战这个体系。因此，俄罗斯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包含了修正主义的因素，但俄罗斯仍是一个有着长期保守传统和谨慎外交政策的国家。但（美国）对战略独立性（strategic independence）的追求，也有可能使俄罗斯从一个相对而言是防御性、保守型的新修正主义国家，变成真正的修正主义国家。

结 语

四分之一世纪后，在2014年，冷和平的僵局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新冷战”，而是一个新的阶段，在长久的冷和平僵局中，俄罗斯在此时开始寻求战略突破。在俄罗斯看来，这个过程中自己有很多志同道合者。自苏联解体后，“新世界秩序”理念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以西方为中心的、旧式的全球化模式正在褪色，一系列新的地区集团开始为创建更加多元的世界体系发挥影响力。俄罗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事实：在新时期制裁与反制裁将成为常态。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和新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都不可能发生，因为诸多的行为体在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影响力。

新的体系将会是一个“竞争与相互依存的综合体”。^①传统的“大西方”（broader West）（美国及其盟友），将会被由俄罗斯和中国领导的“泛欧亚”（greater Eurasia）来平衡，其他国家可以有选择地加入一方或是双方都加入。其中任何一方都不会有太过深入的一体化，而是每一方主要成员在大方向上保持一致，同时又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及经济潜力，来吸引其他成员，但不会达成集团内部的排他性规定。尽管俄罗斯目前把自己列为“非西方”的行列，但是如果能够克服冷和平时期的战略限制，也不排除俄罗斯会成为“西方”的一个部分这个选项。结构现实主义可以影响偏好，但不能决定选择。

（刘畅译 肖辉忠校）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dominated by western values, Russia has been marginalized by the Atlantic community through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the NATO and the EU to the Russian border. The strategic dilemma facing Russia has shaped its neo-revisionist view on the world order, i.e., challenging practical operations of the Atlantic power system instead of its inherent principles and driving the West to accept a multipolar and pluralistic world order. So far, although the new revisionism is increasingly rising, yet Russia is still a conservative, status-quo country. At present, Russia defines itself as a “non-Western member”. Nevertheless, if Russia overcomes strategic limitations of the cold peace,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return to “the West”.

【Key Words】 Russian View on the World Order, Great Power Relations, Revisionist Country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преследуя западные ценности, 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путём экспансии НАТО и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 восток приблизилось к российской границе,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маргинал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Столкнувшись с собственно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дилеммой, Россия

^① Fyodor Lukyanov, “The Goal is to Streamline Chaos and Rationalize Diversity”, Valdai Discussion Club, 20 January 2016, <http://valdaiclub.com/news/the-goal-is-to-streamline-chaos-and-rationalize-diversity/>.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 концепцию нео-ревизионистского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то есть, бросила вызов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 действиям 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а не его внутренними принципам, заставляя Запад принять многополярный и плюр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До сих пор, хотя нео-ревизионизм и набирает силу, однако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является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м, поддерживающим статус-к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Россия определяет себя как «незападного члена», но есл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периода холодного мира будут преодолены,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может вернуться в «Запад».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онятие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ревизионис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责任编辑 常喆)

两种世界观与世界失序的回归 ——新霍布斯式想象与俄罗斯外交的功能性失调*

波波·罗**

【内容提要】莫斯科的世界观，首先体现在，它认为这个世界是互不相容且常常充满敌意的，在这里，强者更强而落后就要挨打。其次，是对于硬实力的永恒信念。第三，国际体系由主要大国主宰。俄罗斯所期待的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俄罗斯在其中作为一个权力中心。俄罗斯认为多极世界很有前景，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的衰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兴起。但现实世界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挑战，与俄罗斯想象的世界并不一致。当下的国际环境充满了混乱，是一个失序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较之于美国和欧洲大国，俄罗斯更加脆弱。但俄罗斯仍然在想象中的多极（多中心）世界格局中，勾画其当代政治的图景。

【关键词】莫斯科的世界观 多极世界 地缘政治 大国协调

【中图分类号】D8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 (2016) 02-0062-(38)

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没有法律就无所谓公正或不公正。暴力与欺诈是战争中的两个主要美德。

托马斯·霍布斯，1651^①

* 本文译自波波·罗教授专著 *Russia and the New World Disorder*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5)中的第二章(“Two World”)。感谢波波·罗教授供稿给本刊发表其文章译文。副标题为编者所加。

** 波波·罗，独立评论人，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非驻所研究员。

①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1651], p.188.

很少有国家像俄罗斯这样更需要有效地融入国际社会。俄罗斯的邻国为数众多，其中包括中国——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力量。俄罗斯是全球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主要供应国，这（一身份）对俄罗斯的繁荣稳定仍至关重要。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自我认定，也基于其影响他国和外部环境的能力。与此同时，很少有国家像俄罗斯这样兼具反省自我与怀疑“他者”的传统。列宁曾形容俄国十月革命是一个“被包围的城堡”，这个词汇实际上也反映了俄国自我封闭的本性。当彼得大帝推开俄罗斯“通向西方世界之窗”的时候，他做的正是废除俄国数世纪的孤立与蒙蔽。^①

现实需要与传统本能之间的张力，到了 21 世纪仍在影响着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需要适应一个转型中的世界，一个日益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②然而，在面对后现代的挑战时，俄罗斯本能的反应，是退回到对内采取保守的政治与社会价值观，对外奉行传统的大国外交。

对于莫斯科而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对外交往，而是该如何进行对外交往。政治文化、利益和环境等各种因素，使得俄罗斯更容易形成一种防御性的心态。但普京的选择远超出了合理的范围。这是基于他自己对当前国际政治的认知，以及对俄罗斯作为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大国身份的评估。在俄罗斯，国内的背景、长期的结构性影响，与不确定的外部事件和“战略冲击”（strategic shocks），同时并存。

在过去十年里，普京试图将俄罗斯传统的世界观与基于利益的对外关系路径加以整合。为此，他秉持由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提出的“全球多极秩序”的观点。这是俄罗斯期待的世界。它有许多未知和风险，但也有战略机遇。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俄罗斯能繁荣发展——当然，前提是，如果俄罗斯能够重现其在历史上的成功时期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手腕。对于普京团队的精英而言，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俄政权更有理由巩固国内的权力和权威。因此，俄罗斯内外政策的选择，不是“适应或停滞”，而是“维持与巩固”。

① Robert Massie, *Peter the Great: His Life and Worl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0, pp. 242-243

② 2013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oncept.

然而，克里姆林宫想要按其所愿塑造世界是一回事，有效应对每天事与愿违、针锋相对的现实则是另一回事。真实的世界不稳定、充满了变数，且难以预料，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更遑论“秩序”。现实世界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挑战，与俄罗斯当权者想象的世界并不一致。要义在于，只有那些勇于适应变化的国家，才会繁荣发展。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意味着要抛弃“理所应得”的历史观，并根据实际的成就，来对自身的国际地位加以再确定。

一、莫斯科眼中的世界

需要说明的是，并没有一个“单一的俄罗斯世界观”。在一个多元、受教育水平高且允许辩论的社会，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世界观，正如对于“国家利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一样。考虑到本研究的客体是普京外交政策，这里说的俄罗斯世界观，指的是俄罗斯统治精英的假设、观点和抱负等。虽然如前所述，精英们也并非铁板一块，但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共性和延续性，它们一起构成了一种可识别的世界观。下文分三个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关注战略文化。多年以前，国际关系理论家杰克·施耐德（Jack Snyder）将战略文化定义为，“这是态度和信念的集合体，它引导和约束着对战略问题的思考，影响着战略议题的形成，设定着讨论战略问题的词汇和概念参数。”^①本文所说的战略文化，是指克里姆林宫对于所谓“世界的运行方式”的看法——世界的本质、惯性及国际行为的框架。这里强调的并非是正式规定，而是那些不成文但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世界；硬实力的至关重要；大国的中心地位；地缘政治的恒久重要。

第二部分更直接地侧重于俄罗斯精英对于国际体系的理解，即，主张一个后西方的多极秩序或多中心体系。莫斯科的这种世界观，在某种程度上是老一辈列宁主义者问题的重新包装，“谁将战胜谁？”或者用今天的话语说，“谁会兴盛，谁会衰落”。莫斯科精英的感受和认识是：西方在衰落，世界其他地区在崛起，以及国际权力向东方转移。如果说战略文化塑造了俄罗斯

^① 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Nuclear Options*, Santa Monica: RAND, 1977, p.9.

对外政策的哲学基础，那么对国际体系的认识和解读，则影响着具体的行动和政策回应。

最后，任何有关“莫斯科眼中的世界”的讨论，最终都会归结为俄罗斯当前和未来几十年内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克里姆林宫仍然将俄罗斯视作世界强国和地区霸主。俄罗斯在何种程度上能将这种自我定位与“正常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目标整合起来？普京和俄罗斯其他高层精英，对于俄罗斯能真正成为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赢家之一，乐观程度如何？亦或他们外在的自信，是在掩饰日益增长的不安，尤其是面对中国的崛起？他们对于俄罗斯的机遇与局限有哪些预测和判断？

二、新霍布斯式的想象

一位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的世界观，却真正摸着了大多数普京外交政策的精髓，这确实是一个讽刺。托马斯·霍布斯对于国际政治的极端现实主义的诠释，反映的是他所处时代的动荡不安。他先后经历了英国内战和查尔斯一世国王被推翻，并远观三十年战争将欧洲大陆彻底摧毁。他所谓的“自然状态”或曰无政府世界，似乎与二十一世纪初高度全球化和制度化的国际环境完全不同。^①

然而，即便如今的全球化背景与十七世纪的欧洲在本质上天差地别，俄罗斯的决策者仍然立足于霍布斯的思考所基于的一些假设。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认为这个世界是互不相容且常常充满敌意的。在这里，强者更强而落后就要挨打。有关相互依赖和“双赢”方案的所有讨论，都被分为胜者和输家两大阵营。与此观点一致，俄罗斯人几乎不相信美国和中国可以同时在新的国际体系中繁荣发展。

更近些，莫斯科在2008年8月打败格鲁吉亚后士气高昂，不仅是因为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的气焰被打了下去，更是因为俄罗斯享

^① Hobbes, *Leviathan*, pp. 186-190. See also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3d ed.,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1977], pp.44-46.

受到对于美国极为罕见的巨大胜利，轮到美国尝尝被当众羞辱的滋味了。^①俄罗斯甚至在面对双输结局时，依然采用这种“零和”思维。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刻，俄罗斯对于美国经济遇到的困难仍然幸灾乐祸，即便危机已经蔓延到了自身。^②

莫斯科思考中第二个明显的霍布斯式准则，是对于硬实力的永恒信念。虽然在核时代发动大规模战争愈发不可思议，但军事力量仍然是俄罗斯评判大国（державность）时的重中之重^③。面对人口持续缩减的状况却依然热衷于保持大规模常备军；保有大规模核武器兵工厂并强调“战略平等”；传统武器和核武器的军费大幅度增长——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种被权力的古典式理解影响颇深的安全文化。在普京和许多其他政治精英的眼中，军事力量是受到世界关注和尊重的根本保证。^④

相反，克里姆林宫对于软实力的使用更像是“软胁迫”^⑤。这体现在与邻国关系中对其弱点（如腐败）的利用；体现在对精英内部商业关系网络的培育；^⑥也体现在对莫斯科持友好态度政党的资助；还体现在通过大众媒体进行宣传。这些手段更接近前苏联时期所采取的“积极行动”（актив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⑦，而非西方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通过范例来影响”

① Dmitri Trenin, *Post-Imperium: A Eurasian Story*,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217-218.

② 普京曾说过，“我相信，对于美国作为自由世界和自由经济领导者的信任，以及对于华尔街作为世界中心的信任，已经破损了。” “Putin: US Image Damaged Forever over Economy Woes”, *USA Today*, October 9, 2008, http://usatoday30.usatoday.com/news/world/2008-10-09-1149101095_x.htm

③ Sergei Karaganov, “Security Strategy: Why Arm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October 26, 2012.

④ 2013年俄罗斯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为4.2%，远超过中国的比重（2.1%），也超过美国的水平（3.8%）World Bank, “Military Expenditure (% of GDP)”,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ms.mil.xpnd.gd.zs>

⑤ James Sherr, *Hard Diplomacy and Soft Coercion: Russia's Influence Abroad*, (London: Chatham House, 2013).

⑥ 沃兰德将此形容为“跨帝国主义”，参见 Celeste Wallander, “Russian Transimperi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7, Vol.30, No.2.

⑦ “Russian Influence Abroad: Non-State Actors and Propaganda,” summary report of a Chatham House meeting on October 24, 2014.

(influence through example)^①。他们从现实主义信条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是，真正的权力来自于对政治、经济和战略资产的冷酷使用（ruthless deployment）。普京对于乌克兰冲突的处理证明了这一思路。

莫斯科世界观的第三个特征是，国际体系由主要大国主宰。虽然相比于十七世纪的欧洲，如今的多边机制发挥了大得多的作用（多边机制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几乎尚未出现），莫斯科仍用主权国家的视角来看待当今国际政治，即，国际政治主要由主权国家间的关系来定义——有时是合作的，但常常是竞争的。在克里姆林宫语境下的“主权（国家）”，是指那些真正能够独立自主进行选择的少数国家——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加上在特定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其他国家，比如主要的欧洲国家（德国和法国）、印度和巴西。^②

小国和多边组织被俄罗斯视为大国外交的客体或工具，而并非是能提出合理议程（proper agendas）的重要行为者（serious actors）。当莫斯科说“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候，他们是从非常狭义的角度来理解的——即权力由前霸主美国向一组世界强国转移，或者是俄罗斯位列其中的“大国协调”。虽然小国有时也会参与国际决策，但这被视为偶然和非自然的。这种精英主义的态度，也是普京及其前任叶利钦永远不明白欧盟制度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主要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何莫斯科不相信 2008 年萨卡什维利进攻南奥塞梯，并没有美国事先的首肯。小国出于自主意愿进行如此疯狂冒险的观点，仍是不可思议的。^③

俄罗斯秉持的世界观是，这个世界是由大国主导的，并且是无情的；这与西方自由主义者宣称的地缘政治是不合时宜的主张^④，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对莫斯科而言，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的行为已经表明了旧式的军力投射（部

① As articulated by 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② 特列宁指出，俄罗斯统治精英所理解的“完全主权”，指的是对外关系中的“战略独立”，以及“在内部事务上的独立”。Dmitri Trenin, “Of Power and Greatness,” in Piotr Dutkiewicz and Dmitri Trenin (eds), *Russia: The Challenges of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411-414.

③ Trenin, *Post-Imperium*, p.29.

④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现实主义已经不再现实了”，并将其贬低为“适宜用于悲观世纪的国际政治”。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p.252.

署)仍然被频繁使用,即便它披上规范(normative)的外衣。俄罗斯的决策者一贯指责华盛顿利用“促进稳定”^①、民主和人权等口号,来掩饰另有图谋的地缘政治和商业目的。理由是,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利用俄罗斯的弱势,通过北约东扩来主导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空间。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又在俄罗斯邻国和中东资助了诸多草根运动。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相信,美国——无论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执政——仍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扩张其影响力。^②

上述观点都不意味着俄罗斯无法与其他国家合作。他们可以合作、必须合作,也的确在合作。但这种互动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国家的强弱。强国可以增进并捍卫自己的利益;弱国则不能。历代领导人——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再到普京——的结论是,为了繁荣俄罗斯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利益和能力,而不能将希望寄托于他国的善意、虚弱的国际机制,或是共同准则和共同价值观这些模糊的概念。

三、多极秩序

在克里姆林宫的眼中,国际体系是多极的。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一个容易被扭曲的概念,对于“多极”有着多种不同的解读。有趣的是,第一个公开使用这个概念的俄罗斯人,是叶利钦时代的自由派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他常被嘲笑为西方代理人。^③科济列夫是从合作的角度来看待多极化的世界的——不同国家团结合作来管理后冷战秩序。然而,如今主流的俄罗斯诠释,是由继科济列夫之后担任外长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提出的。他的观点与前者相似,都认为世界由不同极之间的互动来主导。但就精神内核而言,二者相距甚远。正如普里马科夫自己观察到的,一个多极化世界秩序背后的逻辑,是去“平衡”唯一的超级大国美

① 199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为北约东扩寻找的理由,就是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

② 参见Putin,“Russia and the Changing World,”*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February 27, 2012; also Nikolai Patrushev,“Ukraine Crisis--The View from Russia,”*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October 24,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oct/24/sp-ukraine-russia-cold-war>

③ Козырев А. Россия и США: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не преждевременно, а запаздывает// *Известия*. 11 марта 1994. С.3.

国过于自负的影响力。这是一个由地缘政治驱动的概念，而权力均衡是中心原则。虽然它并不排除与美国进行合作，但其主线是，通过“其他国家的共识”（consensus of the rest）——即国际体系中的其他“极”——来实现一种软遏制。^①

此外，还有其他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对于莫斯科而言，多极化与其说是要建立一个新秩序，不如说是希望复兴旧的秩序。俄罗斯语境下的多极世界，是类似于 1815 年维也纳会议中形成的欧洲协调。时过境迁，但背后的原则是相同的，即，由大国来决定国际政治的安排和规则，同时，至关重要是，大国也要加以遵守。不允许任何一个大国威胁现状或是打破均势，拥有不成比例的实力——比如 19 世纪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今天的美国以及未来的中国。小国明白他们的位置，尊重大国的利益，并据此来设计其国家政策。大国间不彼此干涉内政。而安全——至少是大国的安全——是集体的（collective）和不能分割的（indivisible）。

多极世界也是规范的世界。在普京看来，多极化的文明理念，与西方的道德普世主义不同。俄罗斯认同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②它表明存在着不同文明的“极点”，正如世界权力也有多个中心。在面对西方自由价值观施加的压力时，俄罗斯往往会特别强调文化和道德的相对主义与多样性，以及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由此，在 2013 年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中，将“文明层面的……全球竞争”与“日益强调文明身份认同”^③并置。在推动“文明间对话”的过程中，莫斯科明确地向西方表示，“我们的价值观和你们的一样好”——的确不同，但绝不次于你们。

问题在于，俄罗斯精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其关于多极化的豪言壮语？或者，这些话不过是掩饰而已？答案是，俄罗斯的确赞同多极秩序的原则，也认为具有可行性，并利用高言大志来加速多极化格局的出现。俄罗斯的盘算是，如果有足够多的大国宣称世界是多极的，那么这个多极格局就会

① Россия ищет новое место в мире// Известия. 6 марта 1996. С.3.

② Sergei Lavrov, “Russia in the 21st Century World of Power”,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December 27, 2012.

③ “Concep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pproved by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V. Putin on 12 February 2013, http://archive.mid.ru/brp_4.nsf/0/76389fec168189ed44257b2e0039b16d.

更快到来——这是俄罗斯通过影响认知，进而造成既定事实的一个典型例子。金砖国家进程的发展在此扮演了关键角色。尽管金砖组织成员国各不相同，但这个组织就是莫斯科想要的“多极世界秩序”的具体体现。

判断俄罗斯对于多极化的承诺是否认真，也取决于如何定义“多极化”。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天真地将“多极化”等同于“均等化”(equipolar)，它仍然承认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莫斯科对于多极化的理解非常微妙。他们承认存在着多个权力中心，这些权力中心并不平等但各自独立，并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或者用一个稍微含蓄一点的说法——利益范围)内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当美国继续领导西方世界时，中国正在崛起为亚太地区强国(并将最终会成为世界强国)，南美洲由巴西主导，南亚是印度的天下。而俄罗斯，由于其在欧亚地区持久的影响力，也证明了它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世界权力的中心之一。

多极化这个术语，近来逐步有了“多中心”(polycentrism)的意味。2013年的外交政策构想提及，由于“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层次变迁”，引起了“国际关系朝多中心体系发展”。尚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影响了表达上的调整，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多极秩序”是一个已经多少有些陈腐的提法了(早在1997年就被提出)，而且从那时起这个说法就常常与残酷的战略竞争相联系。“多中心主义”听起来更新潮，而且更容易涵盖上文提到的文明维度。^①但是，名称变化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正如中国原有的“和平崛起”的概念，与后来提出的“和平发展”并无实质不同，^②俄罗斯提出的多极化和多中心主义间的区别，也仅仅是名称上的。而且，普京仍然在讲多极世界，将其视为目标，也认为是现实。^③

① 在提及俄罗斯是新多中心世界中的一个中心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出，俄罗斯拥有这种地位，是因为“俄罗斯拥有的军事、地理和经济实力，及其文化和人力资源”，Lavrov, “Russia in the 21st Century World of Power”.

② 中国学者郑必坚提出了“和平崛起”这个词汇，但是被认为具有某种威胁性，此后更多地使用比较中性的表达：“和平发展”，参见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08-109.

③ 普京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指出，“当今世界是多极的、复杂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单极世界的国际关系、所有的决定由一个国家做出，这是无效的、行不通的，也是终将失败的。” Putin interview with ITAR-TASS, July 15, 2014, <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22667>

世界权力向东方转移。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克里姆林宫对于新的多极化秩序的前景更加自信。它指出了两个紧密相关的现象：西方的衰落和非西方的崛起。这二者一起被认定为世界权力正在转向东方的标志。在2013年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中，这种观点被总结为：“西方主导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能力正在衰减，全球权力和发展潜能，如今更为分散，并且正在转向东方，主要是亚太区域。”^①权力转移是多维度的，包含政治、经济、军事和规范影响。

西方的衰落。在谈及西方衰落时，俄罗斯政治精英主要指的是美国全球领导力在下降。虽然从二战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后，欧洲的衰落更加剧烈，但美国的宿命才是俄罗斯决策者最关心的。虽然在文化上和经济上莫斯科常常向欧洲看齐，但俄罗斯的战略和安全聚焦点——与新霍布斯式的国际体系观一致——则长期放在世界头号超级大国身上。

俄罗斯人眼中的美国是一个犹斗的困兽：外部挑战增多，内部政治体制失灵，经济高负债等。俄罗斯人相信美国正在失去领导的能力和意愿，由其主导的西方联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也日益脆弱。俄罗斯人还觉察到，美国在面对中国崛起时正在丧失自信并处于前所未有的焦虑之中。^②

同时，美国也不甘示弱。华盛顿通过“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抵消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并强化与日本、韩国和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同盟关系；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关系等。莫斯科预计，由于美国竭力维持其世界领袖地位，中美对抗会日趋紧张。但是，很少有俄罗斯人认为美国会在这场较量中彻底失败；俄罗斯人认为，即便美国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也仍将是一个超级大国。^③

俄罗斯对于欧洲的态度更为轻蔑。全球的经济低迷、特别是欧元区危机，印证了其看法：即，作为一个政治力量整体的欧盟已经筋疲力尽，过度的自

① 2013 Concep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② Igor Zevelev, “A New Re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December 27, 2012.

③ 2013年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指出，“新的全球经济与政治体在崛起，同时，西方国家竭力保持其传统的地位，这加剧了全球的竞争，表现为国际关系的日益不稳定。” 2013 Concep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由主义令其举步维艰，无法有效地回应国际环境的挑战。^①更具体地说，俄罗斯有这样一种感觉，即欧盟的欧洲计划陷入了深层次危机——弥漫在许多欧洲国家的反布鲁塞尔情绪的高涨也印证了这个观点。^②对于欧洲的未来，莫斯科相信，这个欧洲会越来越被德国、法国之类的主要国家所主导，内部充满着不断加宽的分裂：在东、西欧之间，在运行良好的“北部”（德国与北欧国家）与失灵的“南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欧洲之间，以及在大国和小国之间。^③

在俄罗斯看来，欧洲的失败削弱了“西方”这一概念。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伤害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融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和民主资本主义，而且还动摇了西方道德权威的根基。自二战以来，西方价值与普世价值当道的情形已经难以为继。主权制度和世界政治中的再国家化（renationalization）重新出现。^④由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生发出的超国家概念，诸如“保护的责任”（R2P）和人权的普世性，其合法性和可行性都大打折扣。

非西方的崛起。正如西方的衰落主要被理解为美国的衰落，俄罗斯对于东方崛起的概念也主要聚焦于中国。对于莫斯科而言，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如中国这样如此清晰地展示了国际体系的变革。这不仅预示着全球领导力量的更替（这仍需数十年的时间），更意味着一种非常不同的看待世界和管理世界的方式，这个世界是基于多个权力中心的。^⑤

克里姆林宫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助于使全球权力重心，从欧洲—大西洋

① “Putin’s remarks to the Valdai Club”, September 19, 2013, <http://eng.kremlin.ru/news/6007>; see also Nikolai Spasskiy, “The Decline of Europe and Russia’s Future”,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June 23, 2012,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The-Divide-of-Europe-and-Russias-Future-15572>

② 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极右翼政党的得势，如英国独立党、法国的国民阵线。

③ 参见 Timofei Bordachev, “Political Tsunami Hits Hard---the European Union and Functional Disintegrati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June 30, 2013,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Political-Tsunami-Hits-Hard-16054>

④ Sergei Karaganov, “The Map of the World: Geopolitics Stages a Comeback”,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May 19, 2013, <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The-Map-of-the-World-Geo-politics-Stages-a-Comeback-15974>

⑤ Lavrov, “Russia in the 21st Century World of Power.”

转移到亚太。在构建一个更为均等化的国际机制（非西方国家在其中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过程中，北京的角色至关重要。^①中国的崛起也导致了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和艰巨。这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及其他国家对此的战略回应有关。最后，随着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观逐渐受到其他发展模式的挑战，中国还是全球规范变革的先锋，^②

对莫斯科而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还不仅仅是简单的国际关系中的客观趋势。其背后的实质是，主权国家理念与西方政治、经济和规范霸权之间的较量。非西方大国非常希望联合起来制定国际体系的规则——尤其是在美国 and 欧洲无力将其全球治理理念强加于其他国家的时候。

在普京的新霍布斯式愿景中，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与西方的衰落是相互影响的。令人惊讶的是，前苏联领导人惯用的零和思维，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全球化后，依然没有减弱。只不过是当日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分野，如今变成了克里姆林宫眼中的威权主义传统与民主自由主义之间的竞争。俄罗斯与西方在政治上的交往、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以及人员往来，都比冷战时期频繁得难以统计，但是竞争性的基因还是一如既往地强大。的确，在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和难以预料”的大背景下^③，全球化有着多重效果。如今，竞争牵涉众多的行为体，在众多的领域内以多样的形式展开。

四、有机遇的世界

在过去二十年里，在西方和俄罗斯有很多关于俄罗斯从超级大国和帝国蜕变为“正常”（normal）民族国家的讨论。然而，困难在于如何界定“正常”。在欧洲，“正常”意味着政治上的多元主义、运转良好的国家机构、强有力的法治、平衡的经济、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以及自由的媒体。但俄罗斯对“正常”的理解则有所不同。俄罗斯所言的“正常”有些类似西方语境下

① 2013 Foreign Policy Concept.

② Pavel Salin, “Russia and Asia, or Russia within Asia?”,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September 24, 2011,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Russia-and-Asia-or-Russiawithin-Asia-15330>

③ 2013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oncept.

的“常态”，如较高的生活水准。俄罗斯对“正常”的如此定义，是基于一种基本假设：即，俄罗斯的自然条件令其注定是一个大国；并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俄罗斯是一个大国），俄罗斯（及其人民）才能繁荣发展。^①这种态度并不奇怪。回顾俄罗斯的历史，自彼得大帝以来，只有在很少的时段内，俄罗斯不是一个大国；在 20 世纪，这种情况只出现在 1917 年十月革命至 1930 年代斯大林大规模工业化之间。即便是在艰难的 1990 年代，俄罗斯仍然视自己为大国。

（一）全球行为体和地区领导者

在这种观念下，克里姆林宫很难想象用世界主要大国之外的任何词汇来形容俄罗斯。当然他们也同意，今天大国的含义在许多重要方面已经不同于过去，俄罗斯也不是要成为苏联式的大国。在普京总统任期伊始，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现代强国”。在后冷战世界中，仅有广阔的领土、数以千计的核武器或是超大规模的常备军，仍然是不够的，虽然这些因素仍然很关键。一个现代强国也需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科技进步。^②现代强国还需要能灵活地施展不同形式的影响。

在这方面，普京并不觉得显示俄罗斯作为地缘政治大国的形象，与根据国际体系的新要求、重新打造俄罗斯影响力之间，有任何矛盾——在这个国际体系中，经济和其他非军事影响力形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莫斯科经常鼓吹一些常用的王牌，比如领土规模、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地位（P5 membership）以及能够在任何自认为需要的地方动用武力。俄罗斯同时还突出自己作为能源和其他战略资源主要供应国的重要地位，及其仍相当庞大的

① 卢基扬诺夫指出，无论是叶利钦、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治下的克里姆林宫，都始终致力于恢复俄罗斯作为国际关系的领导国之一的地位。这是不变的。改变的是只是领导人所面临的环境和使用的手段。Fyodor Lukyanov, “Vigor, Toughness and Tolerance”,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March 27, 2011,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Vigor-Toughness-and-Tolerance-15152>

② Bobo Lo, *Vladimir Putin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Oxford: Chatham House and Blackwell, 2003; Vyacheslav Nikonov, “The Putin Strateg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February 8, 2005,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n_4415

智力资本。^①

克里姆林宫思考中另一个不变的想法，是坚持俄罗斯应该被视为一个永远的强国。这种想法几乎毫不顾及其国内和国际家当究竟有多少。在过去的300年里，俄罗斯的战略文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理所应当感。这种态度在俄罗斯政治谱系中一直在延伸。正是自由主义的科济列夫宣称，“俄罗斯注定是一个强国”^②。这种使命感表现为，需要他人的“尊重”，即作为世界精英之一的国家所应该得到的尊重。在制度层面上，这种认知反映在俄罗斯在各种排他性“俱乐部”中的会员资格——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金砖国家、中东四方（美国、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朝核六方会谈，以及之前的八国集团。但尊重往往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可以量化的事物。它可用西方对于俄罗斯在前苏联空间“特殊”利益的接受度、俄罗斯在国际决策中的特权地位，以及俄罗斯不受外部“干涉”地处理国内事务的权利等指标来衡量。

一个国家是不是全球行为体，首先要看该国能否主导其邻国，即列昂·阿伦所说的，是不是“区域超级大国”^③。乌克兰危机显示，俄罗斯作为地区超级大国的这种感觉依然强烈——考虑到在不到二十五年前俄罗斯的邻国们或直接或间接没有要求“例外”干预的特权，但它依然将自己视为西起乌克兰、东至中亚国家这一区域的领导者。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区域领导地位对于俄罗斯作为全球大国之一的地位而言，至关重要。正如美国带领西方、中国在亚洲“领头”，俄罗斯的信誉则取决于在它的那部分区域里拥有主导权。

（二）独立而又独特的俄罗斯

对普京而言，俄罗斯作为强国的地位是基于“独立自主”之上的。这个

① “智慧国家”的概念，包含了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运用。参见Igor Ivanov, “What Diplomacy Does Russia Need in the 21st Century?”,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December 29, 2011,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What-Diplomacy-Does-Russia-Need-in-the-21st-Century-15420>

② Andrei Kozyrev, “The Lagging Partnership”, *Foreign Affairs*, 1994, Vol.73, No.3.

③ Leon Aron, “The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of Postcommunist Russia and Its Domestic Context”, in Michael Mandelbaum (ed.), *The New Russi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8, p.33.

说法有许多内涵。它可以表示依靠自己，减少对西方政府和组织的依赖，从而使他们难以对莫斯科施加重要影响力。它也可以表示不结盟以及对集团政治的拒斥。它已经与“全方位”（multi-vectored）的外交政策紧密相连了，寻求基于“地理平衡”的对外关系，不偏东也不偏西。

虽然从根本上讲，独立的含义是维护国家主权，并反对那些试图否定或限制国家主权的权力。但“独立”这个目标，已经变成普京政权持续地追求国内与国际合法性的同义词。类似于普京代表了国家，因此政权利益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之间变得难以辨别。根据这个逻辑，外部对于普京政策的批评，特别是对诸如法治、民主化、人权等国内事务的批评，就被视为对于俄罗斯主权的侵犯。^①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俄罗斯作为世界权力中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心的身份，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它可以服务于防卫性的目的——在国内限制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并在叙利亚等国际冲突中抵抗西方的干预。俄罗斯方面还宣扬自身作为独立自主的国际行为体的“独特”作用。后苏联的俄罗斯没有进入欧洲、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也没有参与到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根本不想被一体化，而更倾向于合作和联合。因为真正的一体化包含对独立的限制、对主权让渡的要求，也会消融国家的“特殊性”（специфика）。这对于小国和弱国还说得通，但对于有着强国传统的俄罗斯来说，则极难接受。^②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态度是，如果俄罗斯无法领导（或共同领导），那么它绝不会服从领导。^③

① 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在2014年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上指出，“任何对普京的攻击，都是对俄罗斯的攻击”，参见“‘No Putin, No Russia,’ Says Kremlin Deputy Chief of Staff”, *Moscow Times*, October 23, 2014,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no-putin-no-russia-says-kremlin-deputy-chief-of-staff/509981.html>

② Trenin, “Of Power and Greatness”, p.407.

③ 2000年，普京问时任北约秘书长乔治·罗伯逊，为什么俄罗斯不被邀请加入北约。罗伯逊的回答是，需要申请并满足标准。于是普京说，“我不是随便和一些无关紧要的国家站队的。”“Robertson’s remarks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 February 25, 2009, <http://www.cfr.org/nato/remarks-former-nato-secretary-general-lord-robertson/p18661>

（三）不可或缺的国家

从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的统治开始，俄罗斯的领导者们就一直强调俄罗斯在欧洲以及世界事务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18世纪中叶，俄罗斯介入了七年战争，以支持奥地利对抗普鲁士的扩张。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胜利，扭转了历史进程并拯救欧洲免受独裁专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对于打败希特勒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性的主线，也延伸到俄罗斯作为文明屏障和物理屏障，保护欧洲免受东方野蛮的游牧部落入侵的神秘主义见解中。

这幅图景几乎完整地延续着。今天，在克里姆林宫眼中，一个复苏的俄罗斯，凭借其规模、历史和潜力，都是世界事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这种自信表现为多种形式。首先，它体现在这样一种信念中，即没有俄罗斯就无真正的安全可言。这不仅适用于邻国，更是普遍适用的。2013年9月，在俄罗斯成功介入叙利亚化武危机之后，普京宣称，纵观历史，俄罗斯的参与总是对维护持久和平至关重要——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如此，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亦如此。相反，俄罗斯的缺席是1919年凡尔赛和会失败，以及后来导致二战爆发的主要原因。^①最近，普京表示，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排斥俄罗斯参与的企图，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乌克兰的不稳定。^②

不可或缺性的假设，加深了莫斯科对于战略核均势等概念的强烈迷恋。战略核均势的首要考虑——即被摧毁的恐惧——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出于保持其对国际秩序影响力的考虑。俄罗斯的核力量是其与美国相当（且优于中国）的一个领域，对许多人而言，这仍是俄罗斯持续保持全球大国地位的最有力保障。

在这里，区分一下被承认的需要和承担具体责任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克里姆林宫非常清楚地知道，俄罗斯并不是与美国（或苏联）同等级别的全球大国，也清楚卷入与俄罗斯利益无关的纷争，对自身而言很难有什么好处。俄罗斯寻求的是，在任何自己选择的议题中，其他方面承认俄罗斯的“利益

① “Putin’s remarks to the Valdai Club”, September 19, 2013, <http://eng.kremlin.ru/news/6007>

② “Putin’s remarks to the Valdai Club”, October 24, 2014, <http://eng.kremlin.ru/news/23137>

权”及不可或缺性。因此，对于俄罗斯而言，成为“中东四方”一员本身，要比它试图影响和平进程更为重要。朝核六方会谈、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其他论坛，都是如此。最终，“不可或缺性”的价值，并非来自于期待达成的结果——事实上，这是一份重担——而是来自于其他国家都接受俄罗斯是重要的、而且是伟大的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四）地缘政治的平衡者和文明之间的桥梁

普京的精英，把俄罗斯视为国际秩序中关键的地缘政治均衡力量，认为俄罗斯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天然平衡者，更具体地说，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平衡者。这个自命的角色，来自于俄罗斯处于欧亚心脏地带的位置，来自于莫斯科、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战略大三角的历史。^①虽然类似的平衡随着冷战的终结而变得过时，但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关系的恶化，使俄罗斯重新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全球平衡者。^②叶利钦向中国领导人频献殷勤，并呼吁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新的多极格局”，以反对美国的“单极”^③。

虽然中俄关系的发展有很多内在因素，但地缘政治平衡始终是普京外交政策思考的核心。俄罗斯地缘政治平衡思想，已经从抽象的哲学层面，进展到了更为具体的实务层面。“世界权力转向东方”就是一个推动力。举例来说，这就反映在俄国和中国协调一致，反对推翻阿萨德。^④这种平衡，既针对那些被认为有损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具体行动，就广泛的意义而言，更是意在通过反抗美国权力来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这基于一种零和思维的假设，即，对于华盛顿不利的事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利于莫斯科。

①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Touchstone, 1994, pp.703-732; Bobo Lo, “Russ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from Strategic Triangularism to the Post-Modern Triangle”, *Proliferation Papers* 32, Winter 2010/*Russie.NEI Visions* 47, February 2010, <http://www.ifri.org/?page=contribution-detail&id=5860>; 波波·罗教授此文的中译本参见“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1期——编者注

② Россия ищет новое место в мире.

③ “Yeltsin---Jiang Zemin joint declaration ‘On a Multipolar World an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April 23, 1997, <http://www.fas.org/news/russia/1997/a52-153en.htm>

④ Peter Ferdinand, “The Positions of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 the Light of Recent Crises”, *European Parliament Briefing Paper*, March 2013, p.6.

俄罗斯对于平衡者身份的自我认知，并不仅限于宏大的思考，而是具体体现在各个地理层面。在东亚，俄罗斯明显地想把自己作为平衡美国的力量，^①也时不时地作为北京和东京之间的平衡者。在整个亚洲层面，这清晰地体现在莫斯科—北京—新德里的三边框架中。在全球层面，体现为金砖国家。

在一个竞争性不那么强的方向上，俄罗斯作为连接欧亚桥梁的古老思想，在中国倡导的“新丝绸之路”^②的大背景下复苏。这是一种软平衡，重点在于，俄罗斯在此的主要动力并非是遏制他国，而是凭借其地理位置、历史遗产及其与欧洲、中亚和中国的紧密联系，试图在推动“文明间对话”的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③。这似乎是一种地缘政治平衡，但俄罗斯实际上是藉此把自身定位于“不可或缺的大国”的地位。

（五）“孤独的大国”

拥有多重认同有着明显的优势：独立自主的强烈感受，在许多地区性和全球性事务中的合法利益，以及自由的行动。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俄罗斯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自我认同，这意味着它很难安心地融入欧洲或亚洲。在俄罗斯，中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维克多·拉林曾经提到一种“东—西困境”：在这种情境下，虽然有着需要融入亚洲的意识，但往往受到亲欧情绪的制约。^④其他观察者也提出，俄罗斯内部在认同问题上，存在着“相互冲突”，认为俄罗斯是一个“被撕裂的”国家。^⑤

俄罗斯在内部认同上存在的问题，使得这个国家一直希望被他者所接受。普京长期将俄罗斯形容为欧洲文明，但很多欧洲人却将俄罗斯视为局外

① Pavel Salin, “Russia’s Three Roads to Asia”,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December 27, 2012,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Russias-Three-Roads-to-Asia-15818>

② 即“一带一路”倡议。

③ “文明对话”的主题由来已久。2003年以来，俄铁总裁、普京的侧近人士之一弗拉基米尔·亚库宁，就此题目在希腊的罗德岛举行了一系列的研讨会。

④ Victor Larin, “Russia’s Eastern Border: Last Outpost of Europe or Base for Asian Experiment?”, *Russian Expert Review*, 2006, Vol.18, No.4.

⑤ Ronald Suny, “Provisional Stabilities: the Politics of Identities in post-Soviet Eur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9/2000, Vol.24, No.3;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Touchstone, 1998, p.138.

人，最多只是欧洲大陆的一个边缘存在。在地理上，俄罗斯属于亚洲的一部分，但亚洲人不认为俄罗斯具有亚洲性，无论是在文化上、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意义上。^①而俄罗斯致力于成为亚欧桥梁的雄心壮志，也很少被人认真对待。

“部分属于”与“部分外在”现象的内在紧张，仍然影响着俄罗斯的自我认知和对外交往。有时候，俄罗斯的举动像一个“孤独的大国”^②——一方面，充满了例外主义和正义所带来的力量感；另一方面，又十分焦虑他人不会给予俄罗斯应得的尊重。这在整个后冷战时代始终是俄国与西方关系的主调。虽然2012年的APEC峰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但这恰恰反映了俄罗斯对于自己在亚太地区前景所感到的不安。^③虽然俄罗斯精英拒绝接受任何表明俄罗斯被孤立的建议，但仍然心照不宣地意识到，俄罗斯必须比绝大多数国家更加努力来维持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在这一方面，俄罗斯与另一个备受瞩目的“外人”——土耳其，有相似之处：土耳其在欧洲和中东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但很难得到任何一方的完全接受。

（六）崛起的俄罗斯

通常认为，比起自己想要什么，莫斯科更清楚自己不要什么。^④莫斯科反对被霸权国家主导的单极世界；不喜欢西方主导的道德干涉主义；对美欧对后苏联空间的侵蚀充满敌意。事实上，这些目标都表明，克里姆林宫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它致力于营造一个支持普京体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的外部环境；^⑤它努力保障国际社会对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中利益的

① Salin, “Russia’s Three Roads to Asia.”

② Lilia Shevtsova, *Lonely Power: Why Russia Has Failed to Become the West and the West Is Weary of Russia*,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0.

③ Alexei Fenenko, “APEC Remains an American Project”, Valdai Club website, September 13, 2012, <http://valdaiclub.com/asia/48800.html>

④ Roderic Lyne, “My Neighbor’s Cow: Russia in Post-Cold War Europe”, lecture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entre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June 3, 2011; see also Julian Lindley-French, “What Does Russia Want?”,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June 22, 2011,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What-Does-Russia-Want-15238>

⑤ 这与中国的“和谐世界”的概念很类似，中国领导人希望借助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实现国内的政治与经济目标。

“尊重”——如果不是支持，也至少是默许；它致力于推动俄罗斯成为世界领导大国之一，并同时保持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战略上的灵活性。

在莫斯科看来，当前的国际趋势增加了它实现上述目标的可能性。俄罗斯有一个信念，即，俄罗斯会与中国、印度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一道，在西方衰落后留下的真空地带中有所获益。长远看来，俄罗斯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使其能重新商谈与美欧交往的规则。这当然存在着风险。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会成为潜在的新霸主。鉴于东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的脆弱性，这日益令人担忧。另一种危险，是中美统治世界秩序的出现，这会将俄罗斯降低为二等国家。习近平对美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一旦实现，将大大加强这种恐惧。^①

但克里姆林宫眼下似乎想暂时打消这些不愉快的思考。虽然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俄罗斯方面处于劣势，但是这些顾虑被以下因素所抵消：美国对中国崛起所流露出明显的尴尬，中俄合作的现状令人满意，以及相信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需要俄罗斯——作为重要自然资源的供应国和友善邻国^②。的确，中俄对于草根民主、美国“单边主义”，以及西方规范影响的共同反对立场，使得两国有望保持长期的战略友好，甚至会向更高水平的合作发展。至于中美共治，这是多余的担心。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和中国注定会走向日益竞争的道路，这恰好增加了俄罗斯发挥地缘政治平衡者作用的机会。^③

持续发酵的乌克兰危机，似乎正在挑战这种乐观主义。这场危机不仅令普京政权与西方渐行渐远，更使得俄罗斯史无前例地依靠北京。然而，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克里姆林宫的信心有所降低。相反，他们相信危机再次印证了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些判断有：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虚弱、欧洲的衰落、

① 2012年2月15日，习近平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建立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https://www.ncusr.org/content/video-vice-president-xi-jinping-policy-address>。新型大国关系以四个原则为基础：（1）加强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2）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主要关切；（3）深化互利合作；（4）加强国际合作。在2013年6月加利福尼亚安娜伯格庄园习-奥会上，正式被确定为“新型大国关系”。

② “Putin’s remarks to the Valdai Club”, October 25, 2012, <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4564>

③ Zevelev, “A New Re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非西方世界崛起、以及俄罗斯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等等。^①虽然俄罗斯要维持其作为世界领导国家的地位，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这被视为既是可行的又是必需的。此外，成功取决于持之以恒——不能因为畏惧西方或是受西方诱惑而改变自己，而必须要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传统和力量。

五、世界失序（Return of the New World Disorder）

普京的外交行为，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都遇到了日益增加的压力。由几个大国主导的新的多极化秩序（多中心体系）还远未成型，当下的国际环境则充满了混乱——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失序（disorder）的世界。这种紊乱的主要特征是权力内涵的变化，国际政治领导权的更替，大国联手安排国际事务能力的降低，国际政治中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碎片化。当前的世界充满了变动，这需要政策决策者们具有非常不同的思路——不能一味地固守和遏制，而要有创造性和适应能力。

（一）解析世界失序

二十多年前，美国的政治学家肯·乔维特（Ken Jowitt）写道，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世界进入了一个不可预期的时代，这将是“一个再次失序的世界”。乔维特反驳了弗朗西斯·福山以胜利者姿态所作出的宣称：随着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历史正“走向终结”。^②相反，乔维特认为，世界从具有相当确定性和清晰边界的“约书亚时代”（Joshua period）^③，走向一种“创世纪环境”（Genesis environment）^④——“日益陌生、复杂且危险：在这种状态中，现有的边界会遭到破坏和改变”。^⑤

①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Мир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менее прозападны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4 апреля 2014, <http://www.rg.ru/2014/04/23/karaganov-site.html>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pp.3-18.

③ 根据《圣经》约书亚记，约书亚完成了以色列边境划定的使命；此后，以色列人从游牧民族成为有四面国界的定居民族。——编者注

④ 《圣经》创世记第1章第2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编者注

⑤ Ken Jowitt, *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264.

今天，虽然全球形势在很多方面都与乔维特形容的那个世界有所差异，但他的一些见解仍然切中时弊。在政治上，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混乱，而非更加有序；传统安全威胁让位于无数新的挑战；权威更难树立；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参与者正在成倍地增加，他们带着各自的特殊利益——偶尔相同，但大多数不同；约束国际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也在相对化。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也是一个越来越分裂的世界。

需要提醒的是，“失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概念^①。这个用语，不同于被过度使用的一些词汇，诸如“秩序”和“国际社会”等。^②我们说失序，并不是鼓吹世界将回到原初状态的混乱，或是大规模的冲突。事实上，虽然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但当前的阶段，仍是现代历史上（1500年以来）最为和平的时期之一。^③

乔维特也通过一些略有创意的夸张修辞，来论证其“创世纪”的类比——后共产主义世界并非全是“空虚和混沌”的。^④同样，当代的国际社会也并非完全没有规章可寻，仍然存在着规则、结构和进步。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都依据规范良好运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确定的有关航行自由的众多规则，就是一个例子。国家行为体的流氓行为比较罕见，甚至大多数非国家行为体也遵守“文明的”行为。（恐怖组织和网络犯罪是例外，他们只占全部的非国家行为体中很小的比例。）莫斯科合并克里米亚（annexation）令西方国家如此震惊和惊慌，主要原因在于，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背离。

然而，虽然大型战争相对减少，但世界却变得更加混乱和棘手，国际关系行为也日益富有挑战性。与过去更加静态的体系相比——十七、十八世纪

① 克拉斯特夫与列昂纳德使用了“和平失序”的说法，参见Ivan Krastev, Mark Leonard, *The Spectre of a Multipolar Europ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ctober 2010, http://ecfr.3cdn.net/d294639d029f24c751_ilm6y7pbb.pdf

② 伦敦经济学院的巴里·布赞教授在与作者的对话中，特别批评对“国际社会”一词的滥用。

③ 参见Steven Pinker, “Violence Vanquished”,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4, 2011,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3111904106704576583203589408180>. 这篇文章是其著作的一个摘要，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New York: Viking, 2011. 另可参见*Human Security Report 2013*, Vancouver: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2013.

④ Jowitt, *New World Disorder*, p.264.

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十九世纪的欧洲协调，二十世纪的冷战两极格局，以及冷战后西方主导的秩序——当下，似乎少有共识。现存的秩序和“正确标准”正在瓦解。新的世界失序就其本质而言，是持续变动且抗拒协同的。其主旋律就是矛盾——或者说是多重矛盾：重新伸张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概念，对抗着全球治理的超国家理念；主要大国的相对衰落，伴随着多边机制的日渐式微；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但也迎来了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自我意识的复苏。

（二）俄罗斯与世界失序

莫斯科的主流叙事——也存在于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①——认为，当今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将随着国际秩序的转型而衰落和受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美国和欧洲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在面对世界失序的负面影响时，俄罗斯更加脆弱。在考察新的世界失序的几个维度及其对俄罗斯的影响之前，需要先回答为何俄罗斯更加脆弱的问题。

首先，当今的国际环境向莫斯科的决策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挑战。自彼得大帝（1682—1725）将俄罗斯带入欧洲以来的三个多世纪，俄国的决策者们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可预测的框架中行事。从18世纪到一战爆发，沙皇俄国是欧洲大国体系中不可分割的成员。在冷战期间，苏联在两极世界中代表了一半的国家。在后冷战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依托于一套现成的参照系，美国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今天，国际体系的形势从未如此不明朗，决策也前所未有的更加复杂。

其次，俄罗斯政权对内、对外施加影响的资源与能力很有限：高度依赖能源和大宗商品的出口，这令其在面对较大的冲击时更为脆弱，比如美国的（如今是全球的）页岩气革命以及能源价格的大幅度波动等。2014年末卢布的大幅度贬值、创纪录规模的资金外逃以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直接后果。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全球石油价格的下跌，以及西方严格限制对于俄罗斯企业的信用贷款。

^① 可参见 Kishore Mahbubani,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8.

第三，普京对国内国际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回应，不是直面大规模现代化的需要，而是选择了回归传统。在国内事务中，这意味着采取沙皇尼古拉一世停滞时期的保守主义。^①在国际事务中，则强调复兴旧式的大国外交（大国协调）、地缘政治均势以及势力范围。克里姆林宫不想调整自身以适应外部环境，相反，认为他国负有适应俄罗斯的义务。

第四，在制度与政治层面上，俄罗斯要比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更为脆弱。虽然俄罗斯民众有过忍受苦难的历史，然而，近年来他们的期望（以及不耐烦）在大幅度提升——对于这一点，俄罗斯当局再清楚不过。普京对 2011—2012 年反抗的严肃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此问题的焦虑。这引发了一个问题：俄罗斯的精英和民众，对于国际体系变迁造成的重大影响，适应的程度如何？这些影响即便不是在今天发生，那么在更长的一个时段里，是一定会出现的。

第五，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更为孤立。也许它比大多数国家都更加“独立”，但它几乎没有任何区域性或是国际性的制度支持。即便在欧亚联盟这个最为乐观的案例中，俄罗斯也不能指望在遇到麻烦时得到前苏联共和国的大力支持。虽然俄罗斯与中国有着越来越多的合作，但是基于具体利益而非共识。而利益是易变的。

上述几点并不意味着俄罗斯马上就要崩溃或是注定会衰落。重点在于表明，俄罗斯犯错——或是不走运——的余地，比大多数国家要小。为了繁荣发展，俄罗斯需要尽可能走正确的道路且几乎不能犯错。正如评论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在 2011 年所写的：“希望在全社会和统治阶层醒悟并开始采取明智的政策以复兴民族和国家之前，好运气会保佑这个国家……但我们俄罗斯人清楚地知道，我们不会永远走运的。”^②

（三）权力内涵的变化

在后现代世界的权力中，有多个向度：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技术进步、

^① Robert Service, “Putin’s Czarist Folly”, *New York Times*, April 6,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4/07/opinion/putins-czarist-folly.html?_r=0

^② Sergei Karaganov, “Lucky Russia,”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March 29, 2011 (<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Lucky-Russia-15154>).

文化影响力和规范权力（normative power）。^①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差别，也众所周知——前者通过胁迫和压力取得影响力，后者通过说服和吸引带来影响力——虽然二者之间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②权力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时势造就的暂时产物。像俄罗斯这样通过能源和资源出口获得影响力的国家，其影响力会随着全球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变化。在主动进取型大国和预防保守型大国之间，差别很大。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力争主动积极地设置议程。但大多数国家也有一定的能力，阻挠其他国家的目标。俄罗斯是这方面的绝佳例证。俄罗斯无法像过去那样主导后苏联空间，但仍有相当大的能力，使相关国家动荡，也能令其他的外部参与者感到头痛。

在权力的不同维度中，可以识别出一些参数权重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军事力量**的价值正在减少。鉴于乌克兰事件的发展，这样的论断似乎难以置信。但俄罗斯的“成功”，恰恰暴露了使用武力或硬实力的缺陷。2014年2月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是一次绝妙的行动，实现了所有的短期目标。然而，克里姆林宫行动的战略后果，对俄毫无益处。基辅政权至少在未来数年会为俄罗斯充满敌意，而乌克兰国内的亲欧洲（和亲欧盟）派系民众对其的支持也会大大加强。^③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会更加注意保护其国家主权，进而将阻碍普京的欧亚联盟计划。美国人和欧洲人会更密切地关注乌克兰事件。北约也重新发现了其存在的目的，并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等前线成员国中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Strateg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 24.

② Perhaps the clearest definition of soft power today is offered by James Sherr: “the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 preferences and behaviour of others through affinity or attraction” (*Hard Diplomacy and Soft Coercion*, p. 15).

③ 根据乌克兰民主倡议基金会2014年10月在基辅的民调，54%的乌克兰人支持加入欧盟，22%的乌克兰人支持加入到莫斯科的关税同盟，与此前的调查数据大致相同。这次民意调查还发现，44%的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22%的人支持不结盟，15%的人支持与俄罗斯建立军事联盟（2012年3月，相应的比例分别为：13%、42%和26%）。参见Chris Dunnett, “Ukrainians’ Public Opinions: Pro-Europe, Skeptical of Moscow”, Ukraine Crisis media center, October 21, 2014, <http://uacrisis.org/ukrainians-public-opinions-pro-europe-skepticalmoscow/>

加强军事存在。^①而俄罗斯对于中国的战略依赖也达到空前的高度。俄罗斯的行动还加剧了其国内宏观经济的恶化，导致资本外逃骤增，阻碍了国内外的投资，并严重限制了俄罗斯主要企业获得信用贷款。普京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在为了胜利下了如此大的赌注之后，接下来，他要么被迫做出让步，要么继续升级与西方的正面冲突。无论哪种状态，后果都远比他预计的更为危险和不可控。

普京似乎默认了部分事实，特别是，单靠军事力量所获甚微。因此在乌克兰东南部，使用代理人、拉拢亲俄分子，并坚决否认参与其中——这就是俄罗斯采取的“混合战”（hybrid warfare）——其实是表明了，俄罗斯对于在这个地区部署本国武装力量很犹豫。普京知道武力干预的代价将十分巨大，会在俄罗斯经济萧条时期耗费大量资源，而且对于实现他的“俄罗斯人一乌克兰人的世界”（Russian-Ukrainian world）构想也会适得其反。^②然而，困难在于，他如何使自己在不丢颜面的情况下从中脱身。

在冷战期间，军事力量时常有效（虽然不总是如此），因为军力是权力的主要形式，并且也普遍被公认是如此。然而在当今世界，武力手段在施加长期影响方面徒劳无益甚至适得其反。即便在双方力量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强势的一方在将看似势不可挡的力量转化为希望的结果时，也会面临巨大困难。还会出现许多计划外的结果。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显示了使用武力会导致严重的自损效果。正如美国的国际地位在2000年后一落千丈，俄罗斯在乌克兰（和欧洲）的影响力也降到了二十多年来的最低点。

相反，**经济实力**则变得极其重要。没有经济实力，一个国家无法保持长期的影响力，并会使其在国内动荡和外部压力面前十分脆弱。这是俄罗斯在

① 波兰决定发展空军和导弹防御能力，参见Lukasz Kulesa, “Poland an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the Limits of Atlanticism”, *Proliferations* 14, 2014, 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http://www.ifri.org/en/publications/enotes/proliferation-papers/poland-and-ballistic-missile-defense-limits-atlanticism>. 2013年11月，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举行北约7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参见Matt Millham, “NATO Wraps up Major Exercise in Poland, Baltics”, *Stars and Stripes*, November 12, 2013, <http://www.stripes.com/news/nato-wraps-up-major-exercise-in-poland-baltics-1.252512>

② “Putin’s remarks to the Valdai Club”, September 19, 2013, <http://eng.kremlin.ru/news/6007>

后冷战时代所经历的一个重大教训。然而经济力量也是有漏洞且脆弱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明证。美国仍是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但发现把自己都典当给了中国，也存在着过度消费的问题。^①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 GDP 一直保持在 9% 的年均增长率，经济发展仍然处于中等水平——大多数行业技术落后，环境污染严重，2.5 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 2 美元。^②俄罗斯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却已经成为国际上的反面教材——一个非现代化（甚至去现代化）的、缺乏竞争力的和长期腐败的例子。

在投射影响方面，经济手段要比军事力量有效得多。但经济力量也有局限。美国拥有巨大的金融实力，但也无法阻止自身在世界许多地方影响力的下降。中国是一个经济巨人，但也明白金钱不能买到一切。似乎所有国家都希望加强与北京的经济往来，但大多都谨慎避免与中国交往过密——避免对其的依赖。对于俄罗斯而言，其在后苏联的欧亚区域中所具有的压倒性经济优势，也绝不是上天的赐福。这令其邻国在保持与莫斯科紧密关系的同时，选择对外交往的多元化。

我们生活在技术革命不断进展并日益加速的时代，那些生活在过去的成就与荣耀里的国家，将注定落后。技术革命不仅是获得需要的技术来发展相关产业，或者是把最好、最聪明的人送进豪华的商学院。它关系到全社会态度的转变。最关键的不是国家的现有水平——无论它是不是一个大国、发达经济体或是发展中国家——而在于不断提升自我的渴望和能力。这是美国在 20 世纪初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基础，也是中国今天成功的基石。美国和欧洲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无法适应变化的环境和要求。对于俄罗斯，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经济实力和科技能力是**软实力优势**的支撑。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国，就是那些拥有软实力的国家。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因为它拥有最大的经济体量、最先进的科技、最有说服力的文化和规范性影响力。

① 截止 2014 年 6 月，中国持有 1.8 万亿美元美国证券，其中的 1.26 万亿是美国国债。“Preliminary Report on Portfolio Holdings of U.S. Securities at End-June 2014”，<http://www.treasury.gov/ticdata/Publish/shlprelim.html>

② World Bank, “Poverty Head Count Ratio at \$2 a Day (PPP), (% of Population)”,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2DAY>

美国的军事实力直接取决于其经济和科技优势，但军事行动在某些方面也影响着经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过度扩张加大了美国的经济困难，造成了庞大的公共债务。^①同样，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几乎全部是经济改革的结果，而非因其军事力量。^②

对于美国长期衰落的预测需要格外谨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巨大的财富、较高的生活标准，以及相当大的政治和社会自由。这些仍然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有吸引力。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也许早已“生锈”，但其他国家想要赶超美国的软实力，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便中国按 GDP 总量在未来几年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其人均 GDP 仍是美国的五分之一，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质量也逊于美国。

与此同时，软实力的影响也变得更加不确定——或许是对其局限性的认识更清楚了。正如乔舒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所指出的，你可以穿着美国品牌的衣服（中国制造的！），看着好莱坞大片，将你的孩子送入美国和欧洲大学，但仍然致力于损害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③中国的实例已经证明，拥抱西方的消费主义，并不意味着接受自由民主价值观；有时，效果正好是相反。在一个失序的世界里，对于诱人的花言巧语，大多数国家更为谨慎和抵制。不是没人对他们进行劝说，而是他们难以被说服。

俄罗斯的软实力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俄罗斯的流行文化——电影、电视剧、音乐——对于前苏联国家仍有巨大吸引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的人民想要加入俄罗斯联邦，或是像克里姆林宫希望的那样，成为“俄罗斯世界”的附属国。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这里的人讲俄语、被俄罗斯同化的程度高——但仍然在追求着自身的独立与自由，甚至愿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④

① 截止 2015 年 3 月，美国的公共债务为 18.2 万亿美元。

②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自 1979 年以来，中国没有与其他国家发生过战争。

③ Joshua Cooper Ramo, *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 Why the New World Disorder Constantly Surprises Us* (New York: Back Bay Books, 2009), pp. 75–81.

④ “The Views and Opinions of South-Eastern Regions Residents of Ukraine: April 2014,” Kyiv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ology. Support for joining Russia was higher in Luhansk (30.3 percent) and Donetsk (27.5 percent) than in other parts of southeast Ukraine, but still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opposition to the idea (50.9 percent and 52.2 percent, respectively) (<http://kiis.com.ua/?lang=eng&cat=reports&id=302&page=1>).

（四）领导权的转移以及大国的衰落

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一战后预测西方文明的终结开始，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叙事，就是西方竭力维持其主导地位，而不肯放手让位。^①在 20 世纪，这场辩论随着西方的信心水平而起起伏伏。十多年前，福山有关“历史终结”以及自由民主取得巨大胜利的理论，不仅反映在西方赢得冷战的说法中，也体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药方（即“华盛顿共识”）的四处发放、美国主导的盟军在海湾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并反映在北约和欧盟的东扩中。即使“9·11”的巨大冲击，似乎也并未打击到这种胜利主义的情绪。在 2002 年初，很少有人会预料到西方即将面临的危机。

那么问题就在于，克里姆林宫所说的西方和美国全球领导力正在进入长期衰落之中，这个说法是否正确。答案取决于采用何种标准。如果将今天的状况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衰落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美国权威受到的挑战超过了冷战后的任何时期。美国明显在试图管理冲突（伊拉克、阿富汗），这里的敌人以非传统的形式出现——暴动，恐怖主义集团、以及跨国犯罪网络。在叙利亚冲突中，美国也没有显示出可以影响结果的显著能力。金融危机暴露出这个西方经济领袖的弱点。对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推销，也遭受到不少高调的反驳。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抵制被民主化的压力，而在那些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后果也常常令西方国家的政府难以下咽——例如在伊拉克日益增长的伊朗势力；在加沙公开反对以色列的哈马斯受到了大众空前的支持；而在埃及，在六十多年来首次举行的自由大选中，穆斯林兄弟会竟然赢得了选举。

但如果我们回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对于美国权威和西方价值观的挑战比今天更多、更严峻。不仅因为那时尚存一整套对抗体系，即苏联及其卫星国和代理人国家，而且还有无数不结盟且不友好的国家：好斗的中国、肆无忌惮的印度、以及由于 1973 年和 1979 年油价飙升而兴盛的阿拉伯世界。那时美国经济在全球 GDP 中占有更大份额，但正如石油危机所反映的，华

^①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bridged vers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923]).

盛顿支配他国的能力严重受限。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一个狂热的反共分子，出于对美国影响力衰落的担心，竟然从1971年起主导并维持了对“红色”中国的战略接近。^①

许多俄罗斯观察家对于美国权力显而易见的弱点和盲点都特别熟悉，但是却低估了美国仍然拥有的多方面的主导优势。无论以任何严格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目前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军事实力强过其他国家的总和。尽管遭遇了金融危机，美国仍然主导着全球经济；^②它也仍然是最强的科技大国，^③美国的文化与规范性权力也无人可比。特别是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希望在美国生活、学习和工作，而不是在中国、印度或是俄罗斯。^④

将国际政治视为零和博弈是一种惰性思维，即，认为某些大国、帝国或文明的衰落，就一定会有他者的崛起。这种观点忽略了守成大国的适应能力和再次繁荣的潜质。回顾罗马帝国的例子就足以说明，在公元四世纪末，似乎是其最终的衰落，但这个帝国将自己重塑成为东罗马帝国及之后的拜占庭帝国，因而又延续了另一个千年的发展。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更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倾向于认为西方衰落、非西方崛起，这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实际上是将高度复杂的国际关系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相对而言，当今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几乎**所有**主要的大国都在衰落。不仅是美国和主要的欧洲国家丧失了十年前那样的影响力，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欧亚地区，也同样不可挽回地失去了曾经的霸权地位。

没有遭受相对衰落的一个大国，也发现提升全球地位和影响力的道路并非坦途。尽管北京试图将中国的崛起温和地表述为——“和平崛起”、“和谐

① Margaret Macmillan, *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② 与1985年巅峰时的32%相比，美国的GDP总量今天仍占全世界的25%。

③ 2010年，在美国知识产权和商标办公室颁发的专利证明（也颁发给外国企业）中，美国本土的专利占49%；虽然中国的份额自2004年以来增加了3倍，但是在2010年所占的份额仍不足3%。参见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 (NCSE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2”, <http://www.nsf.gov/statistics/seind12/c0/c0s9.htm>

④ 虽然美国的边界控制日趋严格，但是向美国移民的趋势仍然非常明显，这也导致美国的人口迅速增加。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美国人口在2050年前将达到4亿。“U.S. Census Bureau Projections Show a Slower Growing, Older, More Diverse Nation a Half Century from Now”, <http://www.census.gov/newsroom/releases/archives/population/cb12-243.html>

世界”、“双赢方案”——然而许多国家仍然用消极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拓展足迹。阻力不仅来自于美国和日本，而是无处不在——东盟在中国南海领土问题上的立场日趋强硬，缅甸军政府决定与西方接触，以及非洲和拉美一些重要人物不安的表述。^①因此，中国人对于代替美国成为“未来”霸主，并无多大兴致，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知道世界领导大国的地位，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一种消耗，同时也是他国嫉妒、怀疑和焦虑的目标。^②当中国被要求在全球治理中更积极地发挥作用时，北京的标准回答是，维持中国内部的稳定和繁荣，就是对国际社会最大的贡献。^③虽然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显示出了更大的抱负，但这也主要是集中于中国在亚洲的“核心利益”。习近平对华盛顿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构想，不应被误读成中国希望像美国一样，在世界范围内积极行动和到处许诺。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其实是中国希望调整中美**双边**关系的努力，希望美国对于中国更加友好，更少干预。

因此，问题不在于美国一个国家领导权的衰落（这是很多俄罗斯人所希望的），而在于**整个**国际社会中大国领导权的式微。在当代，权力日益相对化，令一国越发难于对他国施加影响。牛顿第三运动定律在此非常适用：任何作用力都存在着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美国的全球优势激发其他国家寻找削弱其权力的途径，中国的崛起在亚太地区激起相似的抗衡。俄罗斯也发现，当它试图在欧亚空间里重建昔日影响时，总会面临前苏联国家坚决且常常成功的巩固主权的努力。在新的世界失序中，各国更倾向也更有能力抵制一个无论在何处产生、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的领导国——单边领

① 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前行长拉米多·萨努西（Lamido Sanusi）曾抱怨说“中国从我们这里拿走初级产品，再卖给我们制成品。这曾是殖民主义的实质。” Sun Yun, “China’s Increasing Interest in Africa: Benign but Hardly Altruistic”, Brookings, April 5, 2013,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3/04/05-china-africa-sun>. 另可参见 Brian Winter and Caroline Stauffer, “Chinese Investors Sour on Brazil, and Projects Melt Away”, Reuters, November 1, 201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11/01/us-brazil-china-invest-mentinsight-idUSBRE9A004920131101>

② 中国问题专家戴坚定（Clinton Dines）曾形象地描述中国希望不承担责任的状态：“中国人愿意坐在轿车的前排，但是不想驾驶。”

③ 贾庆国在爱沙尼亚塔林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评论，“Comments by Jia Qingguo at the panel on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Global Citizen or Mercantile Bully’”, Lennart Meri Conference, Tallinn, Estonia, May 14, 2011.

导、协商领导、集体领导，或是“垂帘听政（leadership from behind）”。^①事实上，这种抵抗是如此强烈，可以说是“领导者”的终结，更准确地说，是“追随者”的终结，即，无人愿意追随别人的领导。^②

莫斯科希望世界政治回归到国家利益和国家优先权的至高无上，但这也使俄罗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国际关系民主化”一直都有，但并非是克里姆林宫期望的那样——唯一超级大国和其他大国之间的差距缩小。相反，目前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其中，小国和地区性强国不再是大国外交的被动目标，而是成为日益要求主权独立的行为体。即使是最弱小的国家，现今所拥有的行动选项，在几年前甚至都无法想象。他们自身不仅更为娴熟地在外部大国间进行平衡，也更有技巧运用地区组织来发挥集体影响力。2008年8月，中亚国家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顶住了俄罗斯要求他们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压力。更近的一个例子是，极度失序的乌克兰，居然能从一个分裂的欧洲、一贯顽固的IMF和游移不定的白宫获得巨大的经济援助。

主要大国很大程度上被迫承认，他们影响小国行为的能力在衰弱。比如，奥巴马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协商姿态，并非出于任何的自由主义；这是在承认没有其他替代手段后所采取的务实回应与调整。即使在实力对比巨大的情况下，也必须在外交交易中注意“平等”和“互惠”。相应地，克里姆林宫有时也会在后苏联的欧亚空间里调整其策略。俄罗斯试图将欧亚经济联盟包装成一个平等、集体和双赢的项目，这表明莫斯科认识到在投射俄罗斯影响力的过程中，采取更为间接的手段大有价值，也更为合理。当然，如何将这种合理性与历史惯性以及自然秩序协调一致，则是另一回事——正如乌克兰危机所显示的那样。

（五）规范与价值的非普遍化（de-universalization）

① “垂帘听政（背后领导）”的说法，受到了相当的嘲讽。但这个说法也有依据，如“授权别人为你来竞拍；或者像在利比亚的情况，为了避免在世人眼中成为美国单独的行动，而使用一些挡箭牌来遮掩。”参见Ryan Lizza, “Leading from Behind”, *New Yorker*, April 26, 2011, <http://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leading-from-behind>

② 我要感谢埃里克·琼斯（Erik Jones）的这个见解。

新的世界失序的另一重要特征，是普世主义的消逝。西方倡导的标准和价值观，诸如《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等文件中规定的那些理念，正在遭受严重挑战。虽然西方领导人不断地控诉（一些）专制政权侵犯人权、不民主的行为以及蔑视法治，但他们的批评权无疑在降低，热情也在消退。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严重损害了西方的规范性声誉（*normative reputation*），被指责为假冒伪善和双重标准。西方声誉的破损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为那些试图挑战西方制定规则权力的国家开启了机遇之门。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一些国家行为体信心的日益增长，以及多边机制的逐步走弱，共同导致了普世主义处方不可逆转的衰落。

克里姆林宫提出建立一个规范、文明的多极世界，难于让人信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套完整的理念体系，可以挑战二战后在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共识。围绕尚未定论的中国模式，已有不少宣传，但并没有任何“北京共识”。^①中国人自己将此视为西方的天方夜谭。事实上，中国人恰恰是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最大支持者：强调利益、社会流动性、个体的理想以及对财富的尊重。同样地，是否存在一个基于俄罗斯传统保守主义的新“普京共识”，也是值得商榷的。虽然在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之后，普京总统个人的受欢迎程度飙升，但舆论调查显示，俄罗斯民众对诸如法治、司法独立、公平选举以及取消媒体审查等西方理念，仍然十分在意和支持。^②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陷入危机之后，有关莫斯科—北京的“威权国际”（*authoritarian international*）或轴心，被重新热议。^③然而这些只是过时的说辞，俄罗斯希望藉此威胁和迫使西方决策者更加“理解”（即，包容）俄罗斯的利益。

南希·伯德索（Nancy Birdsall）和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① Bobo Lo, Lilia Shevtsova, *A 21st Century Myth: 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 Carnegie Moscow Center, 2012, <http://carnegie.ru/publications/?fa=49116>

② “Russians Back Protests, Political Freedoms”,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May 23, 2012, <http://www.pewglobal.org/2012/05/23/russians-back-protests-politicalfreedoms-and-putin-too/>

③ Dmitri Simes, “How Obama Is Driving Russia and China Together”, *National Interest*, June 24,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obama-driving-russiachina-together-10735>

曾撰文讨论“后美国共识”^①，但今天存在的唯一真正的共识，就是每个国家走自己的路——即辛纳屈主义（“自己的路”）。^② 世界各国政府使用漂亮的“民族价值观”和“文明”等说辞，其实是在为自身的政策和利益辩护，但与克里姆林宫建立一个文明的“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并不等同。现今，规范框架被破坏，西方主导的规则与价值观受到侵蚀，加大了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真空。

对于美国和欧洲而言，这应该是最大的担忧，他们的外交关系中长期追求以价值观为导向的目标。然而，这也与俄罗斯相关。普京的欧亚联盟计划，同时建立在前苏联国家的文明边界和经济合作的基础之上。但在规范和价值观层面上出现的去普世主义的总趋势，使得这些纽带变得松散。正如西方再也无法主导世界上其他国家，莫斯科也发现，其在欧亚空间的道德领导力日益式微。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伙伴——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也与克里姆林宫一道，说着欧亚一体化的话语。然而很明显，吸引他们加入欧亚联盟的动力是经济，而不是文明因素。他们强烈地维护着各自的国家主权。哈萨克斯坦还致力于保护自身的文化特性。^③

（六）包容性与碎片化

国际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包容，参与国际事务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与日俱增，并有着前所未有的机遇。虽然部分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为全球化、更有权力，但并没有完全被孤立的国家，或是某一国的行为不会影响到邻国。孤立已成为一个相对概念；即便如朝鲜这样的国家也有自己的伙伴。相反，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能够完全独立自主。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事务。最小的国家也能在曾经只属于大国的领域中分得一杯羹。全球贸易和资金流动、气候变化、人类

① Nancy Birdsall, Francis Fukuyama,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Vol.90, No.2, pp.45-53.

② 辛纳屈主义（Sinatra doctrine）指的是，戈尔巴乔夫决定允许华约组织成员国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苏联外交部发言人格拉西莫夫（Gennady Gerasimov）在1989年10月最先使用这个说法。

③ Sultan Akimbekov, “Needless Rush”,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March 21, 2014,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Needless-Rush-16499>

发展、区域冲突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跨国犯罪，以及能源安全等，多多少少地困扰着每一个国家。

国际议程的扩大和参与者的增多，有利有弊。就积极方面而言，诸如气候变化、全球流行性疾病和水安全等，许多长期被忽视的重要议题，受到了迟来的关注。然而议题和利益攸关方的增多，都意味着谈判协商比以往更加复杂，也更难找到解决方案。因为必须要面对更多国家的利益和关切，需要更多的权衡——多哈贸易谈判和最近的气候变化峰会，足以体现其中的艰难。不同国家对于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没那么重要的，也不可避免地有着不同看法。正如莫斯科和华盛顿对于伊朗核威胁的态度，存在着严重分歧。许多国家在诸多议题上都有认知上的差异。

一个包容但充斥着争辩的世界，与克里姆林宫寻求的多极秩序，是两个极端。小国变得重要，而大国发现很难实现他们的日程。^①俄罗斯的决策者并不盲目乐观地认为地缘政治已经终结，他们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他们低估了政治竞争的绝对普遍性。不仅是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试图遏制和抗衡对手；小国也同样如此。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小国寻求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中，他们利用大国间的竞争关系，来巩固自身的独立地位。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提供了最佳的案例，还有亚努科维奇治下的乌克兰。^②

还有另一个关键因素。再说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已经不恰当了。新近高涨的保护主义情绪——同时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表明，许多国家用零和博弈的思维来看问题，因为其间有着明显的赢家和输家。克里姆林宫抱怨全球化给俄罗斯的制造业、农业和信息领域带来负面影响；而前苏联国家则担忧俄罗斯主导的地区化，会削弱他们自身更为脆弱的经济和政治，这已经成为后苏联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事实上，这些国家无法与俄罗斯在同等层面上竞争，这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不仅在经济，也在政治、安全和文化领域。

① Sultan Akimbekov, “Needless Rush”.

② 亚努科维奇在莫斯科和布鲁塞尔之间左顾右盼，激怒了谢尔盖·卡拉加诺夫，他批评乌克兰的精英没有定向。Sergei Karaganov, “A Lop-Sided Power”,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December 26, 2013,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A-Lop-Sided-Power-16279>

结语：两个世界——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功能性失调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精英的世界观及俄罗斯国际地位观，都极大地受到了诸如“多极世界格局”、“国际关系民主化”、“没有分界线的欧洲”以及“联合国至上”等泛化概念的影响。最近，这个词典又增添了新的概念，特别是“西方的衰落”和“全球权力转向东方”。强化这些新的概念，反映了俄罗斯希望构建一个能体现自身地位与合法性的概念框架。俄罗斯也只能这么做。所有类型的政权，无论民主的或威权的，都深陷于一定的认知框架、民族叙事和痴心妄想之中；其外交政策，一半被先入为主的意愿所塑造，一半由事实塑造。

如果能够在理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国际体系）与现实（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回应）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平衡，这实际上就是一门艺术了。但即便处于相对稳定且可预测的时代，这都不容易实现，更遑论如今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不断变化中的世界，向各国政府提出了异常艰巨的挑战，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国家。无论他们的“战略愿景”如何，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都受着超出其控制和理解的事态的冲击。他们最多只能做出事后反应——事后才能认识到事件的本质与规模、对国家利益的影响和机遇。

这也是俄罗斯要补的功课。然而，目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认同世界再次失序这个“麻烦的现实”。俄罗斯仍然在想象中的多极（多中心）格局中，勾画其当代政治的图景。莫斯科没有认清自身的限制，高估了俄罗斯成为地区性和全球性大国的能力。莫斯科对于未来的信念，不是调整自身，以适应快速变化的事态，而是盘坐不动——重新确认历史悠久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原则，诸如大国外交和军事实力的至高无上等。

认知和行动上的失误，导致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功能性失调。战术上的“胜利”和很大程度上的自欺欺人，分散了莫斯科的精力，替代了严肃的战略思考。尽管俄罗斯在追求国家利益时强调务实，但其国际交往方式，却被一个虚拟的秩序所扭曲；该秩序承诺的多，成就的少。

（陈曦译 肖辉忠校）

【Abstract】 Moscow's worldview, first of all, holds the world is mutually exclusive and often hostile, where the strong becomes stronger and the lagged is beaten. Secondly, perpetual belief in hard power. Thirdly,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s dominated by great powers. Russia's expected world is a multi-polar one, where Russia is a center. Russia believes that the multi-polar world is promising, especially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nd the rise of non-Western world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However, the actual world is full of various challenges, different from Russia's perceptual world.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 full of chaos and disorders. In such a world, compared with the U.S. and European powers, Russia is more vulnerable. Nevertheless, Russia is still outlining the picture of contemporary politics under its conceived multi-polar (polycentric) world structure.

【Key words】 Russian World View, Multipolar World, Geo-politics, Concert of Great Powers

【Аннотация】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Москвы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отраж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в Москве полагают, что всё в этом мире является взаимоисключающим и часто враждебным, здесь сильный становится сильнее, а над слабым издеваются. Во-вторых, вечная вера в жёсткую силу. В-третьи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истема находится во власти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Россия ожидает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а, в котором она сама будет центром силы. Россия считает, что многополярный мир перспективен, особенно в условиях упадка Запада после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и роста незападного мира. Однако реальный мир полон различных проблем и находится не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воображаемым Россией миром.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полна путаниц, это мировой беспорядок. В таком мире,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Соединё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Россия является ещё более уязвимой. Но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находясь в своём воображаемом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м

(полицентрическом) мире, продолжает составлять свою современн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картину.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Москвы, многополярный мир,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координация держав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意识形态对俄罗斯国家对外目标的影响*

初智勇**

【内容提要】根据意识形态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保守型和革命型。前者对现状满意,认同现存国际权势分配,遵守现存国际法治;后者对现状不满,憧憬对现存体系权力结构进行颠覆与修正,以应然式的道德原理批判现有国际法治,并以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能动性为标志。革命型意识形态与既有国际秩序存在内生对立与冲突,作为一国对外政策目标的指导思想,具备内在固有的修正主义动机。俄罗斯传统意识形态属于保守型,以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地位和帝国传统、反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为目标。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泛斯拉夫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先后取得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其意识形态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型特质。在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俄罗斯对外政策目标呈现出较多的修正主义色彩,对传统国际体系持否定与敌视态度,并与当时的国际体系发生一系列对抗与冲突。而地缘环境产生的不安全感也使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进攻性得以强化。但是,由于俄罗斯与主要大国的实力对比,特别是与首要强国实力对比,并无明显优势或处于明显劣势。因此,出于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俄罗斯需要维护当时的国际体系均势,以免受潜在霸权国的侵略威胁。在不得已的条件下,根据当时国际体系的均势结构特征,适时调整具有革命型意识形态色彩的对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同盟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中的作用及我国应对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2BGJ010)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日美、韩美同盟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关系”(项目批准号:12JJD810025)的阶段性成果。

** 初智勇,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

外政策,使对外政策的修正主义目标出现一定程度的妥协。在国家安全拥有余裕的前提下,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进攻色彩较强,反之,则进攻色彩弱化。

【关键词】 革命型意识形态 俄罗斯 国家对外目标 修正主义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2-0100(34)

本文所讨论的意识形态概念仅限于国际关系范畴,其外延受到严格限制,主要指对国际关系具有较大影响的政治思想体系,其实质是认识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观念体系,具有认知国家利益、指导对外政策、形成内部共识、维系同盟关系、争取国际支持等功能。

现实主义学派倾向于将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淡化处理。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均认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受到权力、利益等因素的严格制约。^①怀特认为,意识形态可以被利用为转化敌国的手段。^②建构主义学派和英国学派则认为,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主要来源,并且是认知国家利益的重要视角。^③尽管现实主义与其他学派在分析意识形态对主权国家对外行为的作用方面也曾有所调和与妥协,但程度有限,仍有相当保留。如沃尔特承认意识形态对国家对外行为存在一定影响,但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即国家的安全形势比较和缓;而当国家安全面临紧迫威胁时,意识形

① 参见[美]汉斯·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英]马丁·怀特著:《权力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美]斯蒂芬·沃尔特著:《联盟的起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 怀特著:《权力政治》,第46-56页。

③ 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巴里·布赞著:《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美]斯蒂芬·范·埃弗拉著:《战争的原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玛莎·费丽莫著:《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态的作用将退居次席。^①

中国当代国际关系学界认为，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之间存在重要联系：意识形态既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形成国家能力的重要源泉；意识形态可以成为国家对外行为的终极目标，对它的划界成为国家认知和判断威胁来源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包括如下内容。首先，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指导思想体系，是国家政权合法化的依据和政治稳定的保障，因而构成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也是对外政策需要维护的国家利益目标。事实上，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具体的国家利益之间往往存在多样化的、结构复杂的相互联系，并同时发挥作用，难以截然分开。其次，意识形态方面的感召力，对国家利益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价值，即“软实力”。对于大国来说，意识形态对其实现对外目标具有特殊意义。总之，无论是公开强调还是表面回避，意识形态对国家的对外关系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冲突的特殊之处在于：与常规地缘政治矛盾不同，易于导致价值观冲突和道德僵局，以至于无法用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②

冷战国际史领域的学者则认为，源于历史经验的思维惯性、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冲突逻辑等因素，有助于维持并延续苏、美对抗的两极格局。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领导人认为，从理论上分析，垄断资本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苏联存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冲突的可能性；从历史经验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特别是德国的侵略以及复兴后再次进攻的潜在威胁，构成威胁苏联安全的主要根源。虽然，世界革命的成功是最终打破国际资本主义对苏联形成的安全威胁的根本出路，但就目前（指当时）国际力量分布来看，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在力量对比中占据优势，淡化国际共产

① 沃尔特对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形成中作用的忽视，受到持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的广泛质疑。沃尔特接受了某些建构主义观点，对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进行了修正，但对之前的观点仍有所保留，认为“国际环境缓和时，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色彩加重，当安全受到威胁时，对意识形态的考虑就会退而求其次”。——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578-579页。

② 参见阎学通、金灿荣、贾庆国、邢悦：“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世界知识》，2002年第21期；王逸舟：“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概念与表现的粗略检讨”，《欧洲》，1994年第5期；潘维、肖木：“论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7年第5期。

主义意识形态的修正色彩、减缓其激进的革命冲动，才能与资本主义民主派缓和矛盾，抑制德、日等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复兴与复仇威胁，最终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维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这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是有利的。

①

笔者倾向于认为，国家利益既包括国家基本的生存利益、安全利益，也包括体现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安全。前者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首要目标，后者是重要目标。这二者都体现在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中，但是，二者在其中的层次不同，前者带有首要性、根本性的特征，属于最高层次；后者则一般不具备这些特征，属于次高层次，尽管意识形态因素也常常涉及国家的生存与安全利益。国家的意识形态赋予使国家发生分野的“身份”与“角色”特质，使国家功能出现区别与差异，这对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国家功能“黑箱化”的过度简约的处理，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挑战与质疑。但是，同时也不可忽视，意识形态仍然受制于国家追求安全目标的生存需要与国际权力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塑造，后者属于国家需要更加优先顾及的动因。

19世纪中后期以后，随着国内社会的变迁和国际体系的演进，泛斯拉夫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先后在俄罗斯社会取得主导地位，这两种革命型意识形态具有对外修正主义的内在动机。而权力结构、地缘关系形成的安全结构，对俄罗斯对外目标具有严格的限制作用，使其必须在国家安全形势与需要的框架内行事。俄罗斯意识形态的进攻性与权力结构、地缘关系形成的安全结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而安全余裕的存在与否，则成为决定这种互动关系的临界点与转折点。在影响和形成俄罗斯对外目标方面，安全余裕匮乏，安全结构排斥意识形态能动性；安全余裕充足，意识形态能动性凸显。这一结论对现实主义学派、特别是华尔兹的体系结构理论忽视意识形态这一单元层次因素对行为体对外行为的影响做出了部分修正，同时验证了沃尔特接受建构主义学派和英国学派观点做出的理论妥协：意识形

① 参见[美]梅尔文·P·莱弗勒著：《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沈志华著：《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徐天新、沈志华著：《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的外交取向（1945-197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

态的对外作用随国家面临的威胁程度而变化，并在这一前提下支持了建构主义学派、英国学派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提出或承认的意识形态在国家对外行为方面存在重要影响的观点。此外，这一结论也与部分国际冷战史学者总结二战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苏联对外目标的形成与变化之间的关系时得出的观点相符。

一、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意识形态类型

意识形态是现代国家制度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对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动机与原则产生指导作用。^①对国际体系的关系结构具有一定影响。根据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模式，可以将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区分为保守型和革命型，它们的区别如下：首先，意识形态指涉国际秩序的应然性问题，即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是合理的。而价值观为衡量和判断国际秩序合理性提供了出发点、标准和视角。保守型意识形态奉行的价值观与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基本一致或至少不处于对立状态；而革命型意识形态奉行的价值观与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根本抵触或处于对立状态，二者无法调和或相互排斥。这里，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是指处于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唯一大国或多个大国奉行或认可的价值观念。其次，保守型意识形态构想的国际秩序与当前国际秩序基本一致或至少能够互不排斥，而革命型意识形态理想中的国际秩序与当前国际秩序存在根本矛盾与对立。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国际秩序目标的实现，必须以对现有国际秩序造成破坏或颠覆为基础或前提。如果当前国际秩序没有被彻底修正或根本改造，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国际秩序目标就无法实现。再次，保守型意识形态不否定他国存在的合法性，因此，实现对外目标并不冀望于胁迫与转化他国，输出价值观与政治理想，改变他国人民的效忠分野。而革命型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即否定他国具有与自己同等的生存权利，认为他国政府无法代表和保护本国人民。倾向于通过灌输、鼓动等手段，操纵和利用他国人民的效忠分野，使其对构想中的

^① 潘维、肖木指出，意识形态就对外政策而言，起着指导性的作用。——潘维、肖木：“论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

国际社会的效忠胜过对本国、本民族的效忠，^①利用他国的这种超越民族意识的效忠，获取、巩固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权势。无论保守型意识形态还是革命型意识形态，其对外目标都是试图增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但是，二者采取的手段不尽相同。前者奉行权力政治的思维逻辑，主要通过军事、外交等手段获取领土或势力范围，改善国家与他国之间的权力结构；后者虽然仍然不放弃上述手段，但增加了对他国的意识形态宣传、鼓动，常常通过在他国煽动革命，转化他国的价值观、体制，使之倾向于本国特色，对他国的法治传统造成破坏。

19世纪中后期以前的俄国正统主义，属于保守型意识形态，强调“君权神授”、“君主专制”，否定共和、自由、民族主义价值观，与欧洲主要大国的意识形态传统相近，而其影响下的外交原则以权力政治为准绳。摩根索指出，1815年的神圣同盟是某种纯粹意识形态类型同盟的体现，而1873年的《三皇同盟条约》是在同盟实质性义务上增加意识形态责任，这是一种更为典型而普遍的意识形态同盟。^②无论其意识形态具有何种表面形式，上述同盟都具有明显的现状偏好。它们对当时的国际条约体系感到满意，并支持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神圣同盟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维护维也纳会议制定的条约体系，以及它所倡导的正统原则和势力均衡原则。三皇同盟（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普法战争”（1870-1871）后的欧洲现状，并继承了神圣同盟的正统主义和势力均衡原则。它们认同国际体系的既有权势分配和法律规范，具有强烈的维护现状色彩，因此，基本应归类于保守型意识形态。

① 怀特指出，多年来，苏维埃国家就是一个反叛者，未得到其他大国的承认，理由很充分，这就是其他国家无法相信苏联接受了它们所属的国际社会的规则。它维持着第三国际这么一个国际革命组织以便破坏这些规则。……个体对国际社会的忠诚胜过对国家的效忠。……一个革命国家，……希望改变国际社会基础……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政府不能代表本国人民，因而总是试图操纵或利用他国内部可能出现的效忠分野。……革命国家在道义上和心理上始终与其邻国处于战争状态，即便在法律上和平占优势时依然如此，因为革命国家认为它的使命就是通过胁迫、转化对手来改造国际社会，它无法承认它的邻国具有与它同样的继续生存的权利。关于意识形态与国际革命的关系，详见怀特著：《权力政治》，第46-56页。

② [美]汉斯·摩根索著、肯尼斯·汤普森改写、李晖、孙芳译：《国家间政治——为了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219-220页。

与上述保守型意识形态不同的是，19世纪兴起的泛斯拉夫主义和20世纪崛起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具有强烈的修正现状偏好。这两种意识形态均从道义上否定现状的合法性，试图以应然性的道德原则颠覆现存的国际法治规范，而其理论架构也导致其具有帝国式扩张的心理动机。摩根索指出，俄国帝国主义，特别是它对于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野心，先后或同时利用了东正教、泛斯拉夫主义、世界革命以及防御资本主义包围等意识形态工具。^①因此，可以将上述两种意识形态归类为革命型。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最早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起初是一种民族文化思潮，但很快发展成为一种民族政治运动，强调斯拉夫民族的特殊性是泛斯拉夫主义的基本内容，成为沙皇俄国政府在中东欧和巴尔干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思想武器。泛斯拉夫主义首先宣扬俄罗斯人与斯拉夫各民族在血缘、文化上的亲近关系，各斯拉夫民族与俄国具有共同命运；其次，俄国是斯拉夫各民族的领导者和保护者，只有依靠沙皇，斯拉夫各民族才有出路；俄罗斯人是斯拉夫各民族的领导者；再次，斯拉夫各民族只有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大斯拉夫帝国，才能摆脱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获得“解放”。

19世纪欧洲的国际秩序，是通过大国之间的协调，孤立修正主义国家，压制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地位，维护基于权力政治及势力均衡原则订立的条约体系的神圣性，防止对以领土划界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现状的破坏。

首先，泛斯拉夫主义强调民族属性、倡导民族权利，而欧洲协调则尊重帝国的正统地位。民族权利与君主正统权力是根本对立的，因为君主正统权力恰是建立在牺牲众多弱小民族权利的基础之上的。这在当时的奥地利、奥斯曼帝国尤为典型。即使是大英帝国，也存在压制爱尔兰民族权利要求的现象，而俄国本身也存在对帝国内少数民族的压迫，如波兰、波罗的海沿岸、中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各民族。

其次，泛斯拉夫主义试图打破权力政治原则，以民族主义原则重新对中东欧和巴尔干进行领土划分，而欧洲协调要极力维护的欧洲现状恰是在权力

^① [美]汉斯·摩根索著：《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29页。

政治一系列原则（包括君主正统原则、势力均衡原则、领土补偿原则等，这些原则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否认或忽视欧洲领土的民族属性）基础上签订的条约体系。

再次，泛斯拉夫主义否认哈布斯堡奥地利、奥斯曼土耳其对中东欧、巴尔干统治的合法性。试图通过煽动上述地区斯拉夫各民族进行反抗，颠覆、破坏这两个邻国的国内秩序，使上述地区从这两个传统帝国分离出去，以达到将上述地区纳入构想中的“大斯拉夫帝国”的目标。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对外政策，超越了传统权力政治的限度，对国际体系其他国家的社会基础产生了破坏和颠覆作用。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否定的逻辑基础上，在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首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与体制。它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都是虚伪的，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这些权利。而资本主义制度则是披着伪善外衣的“阶级压迫”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当时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全部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无论是英、美等国的自由主义，还是后来德、意等国的法西斯主义）都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温斯顿·丘吉尔在著名的“铁幕”演说中声称，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文明构成了严重威胁。^①美国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也指出，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观提出了挑战。^②

其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认为正是这一反动国际体系的存在，才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包围，并对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构成严重威胁。乔治·凯南指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认定由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外部世界是敌视、反对共产主义的。^③

再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否定资产阶级政府的合法性。根据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结构进行判断，资本主义无论采取何种表面形式，其实质都是

① Francis Williams, *A Prime Minister Remembers-The war and post-war memoirs of the Rt.Hon.Earl Attlee*, London: Heinemann, 1961, pp.161-162.

② McGovern, George Stanley, *A Time of War, A Time of Pea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p.179-180.

③ 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p.855.

建立在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奴役与剥削基础之上的，因此资产阶级政府都是违背正义与道德的政权，其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合法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应该团结起来，反对并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

最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鼓励输出革命，通过革命等手段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转化，使之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意义的革命，必将在整个世界勃兴，它不应仅局限于一国，它应在整个文明世界，至少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同时发生”。^①美国学者迈克尔·H·亨特（Michael.H.Hunt）强调，共产主义天然具有对外侵略的本质，它的手段是在海外进行反对当地政权的颠覆活动，以此来扩大自身的对外权力。这是美国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的深层次原因。^②

东正教强调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服务于君主专制制度。它以基督教正统自居，强调拯救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救世情结（“第三罗马^③”的天命）。村社（мир）文化^④崇尚集体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意识，突出对权威的信任与服从，认为个人命运应服从集体使命。这使泛斯拉夫主义的弥赛亚^⑤（Messiah）精神对君主专制下的帝国目标的支持获得了统一而稳固的社会文化基础。弥赛亚式的普世宗教情怀与村社集体主义的权威政治结构，使泛斯拉夫主义具有大一统的民族与宗教抱负，这与16世纪以后西欧因新教伦理的兴起而反对罗马教廷的思想专制与一元化形成鲜明对照。前者试图利用东正教与斯拉夫民族主义构筑帝国式的政治与思想结构，后者试图使民族从中世纪宗教大一统的束缚下获得解放，赋予个体以思想自由。前者是一个有利于导向统一帝

①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② [美]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62页。

③ 沙皇俄国以东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正统继承者自居，自称“第三罗马”。

④ 来源于俄罗斯传统社会的一种宗法文化，重视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关系，强调集体结构的价值高于个人自由的价值，重视服从现状而反对理性批判，缺乏自我意识，盲目依赖权威，是俄罗斯权威主义与专制主义的重要社会文化基础。

⑤ 在本文中指以拯救世界为己任的思想体系或政治团体。

国的思想与行动进程，后者是一个促使基督教思想帝国分崩离析、同时以世俗的民族为主体确立主权政治单元的分离过程。

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与东正教弥赛亚精神相似，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具有普世情怀的政治思想体系。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消灭民族国家、消灭阶级差别，最终解放全人类。此外，与俄国的村社文化传统相似，共产主义也强调集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在列宁的革命实践中则更加突出了对权威的服从（列宁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在此基础上，共产主义显然能够与俄罗斯对内强调国家权威的集体主义及对外崇尚帝国抱负的传统政治文化相适应。共产主义由马克思提出的理论假设演变为俄国的社会革命，始终作为一种与主流国际秩序相背离的异质型政治文化与革命理论而存在，它与当时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主权至上的国际秩序相悖，后者强调地域特征、民族自治，前者强调普世价值、统一帝国。

泛斯拉夫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本质上具有普世情怀与帝国意志，这是其在成为俄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后，在指导对外政策时，具有修正主义和进攻性动机的内在思想根源。

二、地缘政治与革命型意识形态

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对外抱负——泛斯拉夫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的对外诉求——在目标导向和地缘覆盖空间上表现出契合与同构关系。俄罗斯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解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理想与 19 世纪泛斯拉夫主义解放被异族统治的斯拉夫民族的对外抱负，都恰巧与俄罗斯基于权力政治考量的国家安全需要相吻合。而这两种看似存在本质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对外修正主义动机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与继承性。这体现了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理想与国家安全需要之间的内在联系。意识形态的革命特质隐含着俄罗斯国家安全方面的历史经验和地缘认知。

从地理环境角度观察，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幅员辽阔，国土主要由大面积的平原构成，与周边陆地大国之间缺乏险阻。而在历史上，俄罗斯的邻国中强国林立，同时也颇具对外征服的禀赋，俄罗斯曾遭到这些国

家的反复入侵。这种惨痛的历史经历，结合国家现实地缘环境的易受攻击性，构成俄罗斯民族传统安全观的重要经验素材。俄罗斯维护国家安全的传统战略是社会组织的军事化及拓展国家幅员与势力范围，把领土纵深作为保护国家安全的屏障。正如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Nicholas V. Riasanovsky）与马克·斯坦伯格（Mark D. Steinberg）所描述的那样，俄罗斯的“南部草原边境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是敞开的，这个事实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社会的军事化，俄罗斯西部边界通常难以保护且变动不安的性质，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①杰弗里·曼科夫（Jeffrey Mankoff）指出，历史上俄罗斯的邻国皆富于侵略性，如鞑靼、土耳其、波兰和近代的德国，俄罗斯曾遭到反复入侵，对外扩张成为俄罗斯捍卫自身安全的关键。俄罗斯主要采取在自己与对手之间建立缓冲区的方式，将安全纵深拓展到国境以外。^②俄罗斯屡遭入侵的历史记忆给外部世界涂满对立色彩，俄罗斯国家被认为肩负着将自身意识形态扩展到全世界的历史使命。^③莫斯科公国起源于东方亚细亚地缘政治板块。在那里，征服与奴役是国家、民族间关系的普遍状态。俄罗斯人始终质疑敌对势力之间能够实现持久和平。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对苏联决策者的世界观发生重要影响，而在苏联对外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逻辑警告苏联人，外部世界必然对苏联持敌视态度，推翻它们的反动政权是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使命。^④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与其想要捍卫和扩张苏联边界的企图的结合。^⑤苏联领导人为了彰显其与旧制度决裂的革命特色，使用一套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语言，但是，在地缘政治目标方面却与被其推翻

① Nicholas V. Riasanovsky and Mark D. Steinberg, *A History of Russia* (Seven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5, p.9.

② [美]杰弗里·曼科夫著：《大国政治的回归：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序言）第2页。

③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33.

④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p.855.

⑤ [美]沃尔特·G·莫斯著：《俄国史（1855-1996）》，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251页。

的沙皇如出一辙。^①二战结束后，苏联对领土和势力范围的要求与沙皇俄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和继承性。冷战期间，苏联的对外意图与俄国历史上的传统目标——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国——一脉相承。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策略，是扩大和巩固苏联在欧亚大陆的势力范围，并排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该地区的影响力。^②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大国政治逻辑^③在俄罗斯身上表现得更为典型，也是导致其始终具有对外扩张倾向的内在动因。他认为，战后苏联对势力范围的要求有其历史逻辑上的合理之处。^④西尔维奥·庞斯（Silvio Pons）指出，二战结束之初，苏联的主要对外关切集中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安全战略导致其对外扩张主义将持续存在。^⑤

泛斯拉夫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都具有解放在邻国统治下的与俄罗斯人存在某种共同命运纽带的民族或阶级的动机和诉求，前者强调民族纽带，后者强调阶级划分，但其目标都是企图胁迫邻国向自身的意识形态转化，从而实现了对邻国的政治控制。这一目标与俄罗斯在周边拓展缓冲带的传统安全观不谋而合。根据怀特等学者的分析，具有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国家，其胁迫其他国家向自身的体制类型发生转化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解决自身的不安全感，以争取更多具有共识的国家成为自身的同情者或同盟者，来提高本国在

① Zbigniew Brzezinski, *Game Plan: a Geo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Conduct of the U.S.-Soviet Contest*, Boston: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86, p.41.

② Brzezinski, *Game Plan*, p.99.

③ 根据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大国具有向其他国家发动进攻的军事能力，而国家之间的对外意图既难以把握又时刻充满变数。只有在地区获得绝对霸权的国家才能获得绝对安全。彼此之间缺乏天然险阻的大国，为了生存必然发生激烈的安全竞争，从而导致螺旋上升的安全困境，以至于争霸战争几乎不可避免。因此，这类大国具有天然的对外扩张倾向。——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78页。

④ 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1945年有哪个国家有很好的理由统治欧洲的话，那一定是苏联。它在30年中两次被德国入侵，每次德国都让它付出了血的代价。没有哪个负责的苏联领导人会错过二战结束所带来的成为欧洲霸主的机会。——参见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1页。

⑤ Silvio Pon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ge of Wars: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o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in Pons and Andrea Romano (ed.), *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 1914-1945*, Milan, Italy: Fondazione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2000, p.305.

无政府逻辑前提下的国际体系中的生存系数。^①

三、权力结构与革命型意识形态

由于俄罗斯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②，为了维护国家生存与安全，俄罗斯首先要维持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平衡或均势格局，避免自身拓展缓冲区的行为引起大国冲突。因此，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又受到所在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或均势格局的严格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对外修正主义诉求就受到国家安全变量的有力制约并随其变化而进退。^③

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理论认为，行为体若想在国际体系中持续存在，首先要求生存，其次才是发展，而生存与发展的前提目标都指向安全。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缺少一个最高权威垄断暴力、实施仲裁，体系行为体需通过“自助”方式增进自身安全。因此，可以认为，在国际体系中，行为体（基本为主权国家）的基本目标和功能是雷同的，都是出于安全的需要而追求相对权力。行为体之间的差异不是表现在功能“性质”上，而是表现在功能（权力）“程度”上，即行为体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差异——国家实力，而国家实力差异呈现出的结构，即形成了国际体系相对权力结构，这种结构是决定

① 怀特指出，如果革命国家赢得其他国家政府作为盟友的希望不大，那么它可以试图挑起该政府与民众的不和。——参见怀特著：《权力政治》，第50、51、53页。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进一步分析认为，非大众化政权在面对由国外激发的颠覆或革命时更容易受到攻击。颠覆是进攻的一种形式，而且它以与进攻性军事能力同样的方式影响国际关系。基础不稳固的政权对邻国的敌意更加敏感，就更倾向于将自身类型的政权加诸于邻国。——参见埃弗拉：《战争的原因》，第179-180页。

② 这里的“弱势地位”是指相对于国际体系的潜在或实际支配大国——即国际体系的首要强国而言。

③ 冷战时期美国政论家对苏联实力与其对外目标之间关系的分析，显然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较好的说明。美国卡特政府执政时期，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指出，对苏联来说，只有军事能力符合其超级大国地位，经济、科技、文化等其他方面都差强人意。苏联成为只具有一个方面威力的畸形巨人，其实现意识形态抱负与地缘雄心的力量严重不足。因此，苏联出于理智的权力对比计算，便足以使其将上述理想的预期下调，维持在自身力量所及和对手能够容忍的范围与程度以内。——参见 Brzezinski, *Game Plan*, pp.99, 122.

国际关系性质、特征、发展方向的基本动因。而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主要是由主权国家之间的实力关系决定的。相对权力结构对无政府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行为的主导或塑造作用，在大国关系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对于大国之间的权力角逐或政治游戏而言，相对权力地位是获取绝对权利的前提和保障。大国权力博弈明显具有零和性质，它们因此彼此戒备，相互遏制是常态，搭便车的机会几乎不存在。这一点与小国的情况存在根本差异。^①

主权国家及其联盟之间的相对权力结构使国际体系形成华尔兹所称的“极化”。“极化”对国家关系进行修正并使其复杂化，对国际体系的结构与特征产生不同于单纯的国家关系所产生的作用，以至于“极化”（较之国家关系）可以被看成国际关系发展的更加直接的动力。

与保守型意识形态不同，革命型意识形态的产生，使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凸显，使原本被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忽略不计的单元层次因素（行为体身份），对行为体行为特征产生的影响无法再被忽视。

意识形态赋予国家身份与角色特质，使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功能发生分野。国家的意识形态特质，限制了国家改变对外政策及变换盟友的灵活性。这一现象似乎是对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确立的国家至上原则^②的颠覆与对之前宗教道德原则^③的回归。国家至上原则使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具有同质化的特征。国家出于权力政治的现实需要，不断调整或改变对外政策，穿梭于不同联盟阵营之间，既不会受到谴责，亦不会令人感到奇怪。这与之前国际行为体对外政策的形成以宗教道德等“正义”原则为依

① 参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第392-394页。

② 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期间，法国首相黎塞留就天主教法国与新教诸侯联盟问题提出这样的观点：由于国家对提供普遍安全与福利肩负重大责任，对国家的要求不同于个人，国家利益具有独立于宗教信仰的特殊性。三十年战争结束后，这一观点被欧洲国家普遍接受，基督教会与世俗国家分离，世俗国家摆脱了基督教会的宗教观念和制度约束，成为独立的国际关系主体。——参见 Church, William F, *Richelieu and Reason of Stat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388.

③ 至少从16世纪初以来，宗教道德原则成为影响欧洲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教派之间在教义方面的争论及由此引发的冲突，甚至一度主导了16世纪的欧洲国际格局及其发展进程，成为“宗教冲突时代”。欧洲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直接诱因也是宗教原则冲突。直到三十年战争结束，宗教道德原则才被作为三十年战争结果之一的宗教宽容（国际而非国内）及主权和君主自治原则所取代。——参见基佐：《欧洲文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90页。

归形成强烈反差。而意识形态为其主导的对外政策重新确立了“正义”原则，使之与权力政治现实形成了结构性紧张关系。国家任意改变对外政策或变换盟友，会受到所属意识形态阵营的唾弃和惩罚。而在奉行国家至上原则时期，这一行为是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包容的。

“身份”特质使行为体对“利益”等价值的认知与偏好发生改变，从而对其对外行为产生持续的修正作用。“极”——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权力（基于主权国家及其同盟的实力关系）——仍然是行为体对外行为的主导因素，但是，意识形态等“身份”因素显然对其具有一定的“导航”作用，从而对行为体对外行为共同发挥影响。“极”是物质性的实力因素，“身份”则是观念性的价值观和认知准则，包括“何为正义”等基本原则、对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以及对正当生活方式的选择理念等。它的正当性及其在国际体系中形成的吸引力、影响力，构成了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软实力基础。

革命型意识形态认为，国际体系现存秩序使自身的应得权利受到压制，只有推翻并彻底改造国际现存秩序，才能使自身应得的权利得以实现。革命型意识形态往往通过鼓动他国人民转变效忠对象，形成以革命型意识形态为导向的超越国家民族的国际效忠，以胁迫、转化对手，改变他国的社会基础，进而改造或颠覆国际体系的既有秩序，以达到拓展对外权力的目标。由于革命型意识形态具有彻底改造国际法治传统的潜在动机，因而在形成对外政策目标时，具有修正主义倾向。^①史密斯（H.A.Smith）教授指出：“历史发展会提供充分佐证，俄国十月革命不仅限于使其本土及其影响所及之地的社会秩序发生改变，其最终目标是彻底颠覆国际秩序的法治基础。”^②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华尔兹的权力结构模式做出了修正：实力不再

① 一再重现的国际革命潮流，亦即以武力、以战争或革命来改变国际社会的有组织的行动所塑造的国际社会，似乎更像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而不是主权国家的松散联合。国际革命使整个国际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层，从而可能导致每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层。国际革命使许多国家处于横向分裂状态，这些内部分裂很可能引发战争。压倒一切的国际效忠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正是叛国，叛国和对叛国的担忧成为国际革命期间的重要特征。国际革命引发革命战争，这些战争带有狂热的思想信仰色彩，而且目标是无止境的。它们往往不是具有确定目标的战争，而是为寻求正义的征战或战争。战争的目的不是通过谈判解决争端，而是力图达成“迦太基式的合约”或“无条件投降”。——参见怀特著：《权力政治》，第50、51、53页。

② H.A. Smith, “The Anarchy of Power”, in *The Cambridge Journal*, 1948, Vol.I, No.4, p.215.

是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唯一因素，行为体单元层次上的“身份”特质及其观念因素，对威胁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怀特指出，革命国家从自身奉行的道义原则出发即与持不同意识形态的邻国处于冲突、对立之中。改变邻国的“不义”体制是其天然的使命，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修正国际政治秩序，才能实现其内在价值观的逻辑诉求。^①即使仅具适度实力，奉行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国家甚至比实力遥遥领先的现状国家对其邻国及国际体系的威胁更大。^②尽管不一定立刻导致战争的爆发，持续的敌意却始终对和平构成威胁。^③奉行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国家潜意识里总是相信，只有通过将对手转变为与自身具有相同价值观及政治抱负的盟友，才能最终确保自身价值观与体制的维系与生存。^④因此，革命型意识形态促使国家输出意识形态革命，发动国际意识形态运动。斯大林对苏联输出意识形态的内在冲动是这样描述的：“国家在权势所及之处，皆致力于将自身的体制加诸其上。”^⑤因此，革命型意识形态有时会受到现存国际体系其他意识形态类型国家的联合抵制。而保守型意识形态以传统的权力政治手段伸张权势，不干预他国人民的效忠意识和社会基础，因此，一般不会由于意识形态因素而受到国际体系其他成员的集体排斥。

尽管奉行革命型意识形态国家的对外行为偏好具有内在的修正主义倾向，但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行为体对安全的考量必然被置于优先位置，国家在安全需求上的自助是以权力结构为导向的。当意识形态诉求与国家维护安全的行为选择出现冲突时，国家常常会选择最有利于国家安全的行为模式，而不是最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行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对国家行为模式的要求，就被置于次要的考虑范畴了。怀特强调，

① 怀特著：《权力政治》，第 46-56 页。

② 沃尔特认为，在形成威胁时，进攻意图比实力更为关键。如果一国的进攻意图源于其体制的内在属性而无法改变，即使其仅拥有适度能力，也将形成国际体系的主要威胁来源。由于进攻意图对形成威胁的作用，实力与威胁之间不再严格遵循对等因果关系。——参见沃尔特著：《联盟的起源》，第 23-25 页。

③ T.Hobbes, *Leviathan*, J.M.Dent, London, 1943, p.64.

④ 埃弗拉著：《战争的原因》，第 179-180 页；怀特著：《权力政治》，第 50、51、53 页。

⑤ 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6.

“国际革命从来没有长期为革命而反对国家利益，……任何国家都未能出于信仰理念的考虑而限制了自己结盟。”^①摩根索在下面这段话中对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与国家对外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总结：“完全背离物质利益的纯粹意识形态同盟是无法维持的；它无法指导政策与行动，还会以政治团结的表象误导人们”。^②

从历史经验当中能够发现，俄罗斯与国际体系其他大国在权力对比上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相对权力结构决定了维护均势而不是冒险向其他实力更为强大的国家发动进攻，是俄罗斯维护国家安全的明智选择。米尔斯海默曾经对这种情况进行过分析，他指出，相比而言，面对强大对手的大国，一般较少考虑采取进攻行动，而是更关心保护现存均势免受更强大对手的威胁。^③这一涉及国家基本生存前景的基础条件，决定了俄罗斯意识形态的进攻性缺乏赖以实现的物质手段。因此，俄罗斯只能一再压抑自己的世界革命理想，将其下调至符合权力政治目标的有限水平，而其试图颠覆整个国际秩序的理想只能束之高阁，隐忍待时。地缘结构特征导致的不安全感使俄罗斯进攻型意识形态的对外扩张诉求得以强化。但是，这种对外扩张是受到国际安全结构的严格限制的。它只能与国家构筑有利地缘空间的安全诉求保持一致，而不同于诉诸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理想的全面实践；它只能是一种以渐进方式实现的有限目标，并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而意识形态色彩更多地体现在实现这一进程的手段层面。^④如王逸舟所言，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着双重的功能：它们或者是政治行动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通过追求政治权力以图达到的那些目标；或者，它们是装点门面的虚伪之词，用以隐藏所有政治都固有的权力因素。两种功能可以是各自单独行使的，也可能是同时发挥的。^⑤

① 怀特著：《权力政治》，第54页。

② 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第220页。

③ 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0页。

④ 俄罗斯进攻型意识形态可以作为弥补国家对外能力不足的手段，在与敌对国家的斗争中，利用对敌国内部的分化，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参见埃弗拉著：《战争的原因》，第179-180页；怀特著：《权力政治》，第50、51、53页。

⑤ 王逸舟：“意识形态与国际关系——概念与表现的粗略检讨”。

四、革命型意识形态与俄罗斯对外目标形成

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偏好，对国家对外目标选择的影响力，受到国家在体系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制约下的安全目标的严格限制。俄罗斯需要调整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要求和扩张动机，使之适应更具“权力政治”色彩的现实国际政治环境的要求。从而在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改变现状的要求和权力结构限制下的安全诉求之间达成妥协。在国际关系趋于紧张、俄罗斯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时，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胜于一切，对权力结构与地缘利害的精确算计，压倒了革命型意识形态的浪漫理想。尽管从长远来说，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乃至安全利益同样紧密攸关，但是，在国家安全面临紧迫威胁时，使国家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一）泛斯拉夫主义与俄罗斯对外目标形成

1、泛斯拉夫主义与地缘政治

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的对外目标主要是夺取两海峡并控制巴尔干和君士坦丁堡。两海峡与巴尔干地区是俄罗斯势力进入地中海的桥梁与通道，也是俄罗斯由内陆型地缘结构向陆海复合型地缘结构转变的关键步骤之一。俄罗斯缺乏地理险阻的内陆型地缘结构，是其陷入与周边邻国之间无休无止的安全困境的重要原因。而将领土和势力范围拓展到海洋，是缓解这一安全竞争的有效手段。与面临一个陆地邻国相比，面临海洋在地缘安全上显然是一个有利因素。

对巴尔干和土耳其海峡的控制，可以使黑海变为俄国的内海，保障克里米亚地区的安全；^①出于与英国势力在中亚争夺势力范围的考虑，也可以利用这一地缘上的优势，威胁英国向中亚投送力量的补给线，对俄国与英国在中亚的势力范围竞争是一个间接支援。

出于上述地缘上的考虑，克里米亚战争前夕，在与英国共同瓜分近东势力范围的计划中，沙皇尼古拉一世提出，让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塞尔维

^① 克里米亚战争中，克里米亚地区遭到英、法联军的进攻，显然是因为俄国没有取得对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两海峡的控制权，如果俄国拥有对这一关键地带的军事控制，英、法是不能将战火延烧到克里米亚地区的。

亚、保加利亚在俄国的保护下行事。在 1878 年 3 月逼迫奥斯曼政府签订的《圣·斯特芬诺条约》^①（Treaty of San Stefano）中俄国将拟议中的保护国大保加利亚的领土延伸至爱琴海沿岸。

巴尔干地区受奥斯曼帝国统治与压迫的当地居民中多数属于斯拉夫民族并信仰东正教，他们对奥斯曼统治者心怀不满并希望摆脱其统治，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将在民族与宗教信仰方面有近缘关系的俄国视为有力外援。这为俄国利用泛斯拉夫主义对巴尔干问题施加有力影响提供了机遇，并且比单独使用武力征服的方式更具正当性，代价更小。在克里米亚战争和 1875 年东方危机中，俄国利用圣地保护权之争及 1875 年巴尔干斯拉夫族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作为推行在巴尔干地区的进攻性政策的借口与工具。

在此，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动机与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扩张出现重构与契合。

2、泛斯拉夫主义与权力结构

从较长时段的历史考察，自拿破仑战争以来，在法国拥有支配大陆的潜在实力的情况下，神圣同盟的实质，是北方三朝廷联合起来对法国实施监督与制衡，同时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引起的欧洲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运动予以压制。在普法战争之后，法国被普鲁士击败，德国实现了统一，并一跃成为欧洲大陆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为防备法国复仇，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以三皇同盟、德奥同盟（Austro-German Alliance）、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等为基本架构，建立了复杂的同盟体系，目的是孤立法国，维持对德国有利的欧洲现状。俾斯麦的政策是保守主义的，尽管其目的是维持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后已经发生修正的欧洲现状，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四十年）里维持了欧洲大陆的和平。无论是法国强大时制衡法国潜在霸权的神圣同盟，还是德国崛起后孤立法国的俾斯麦同盟体系，都是以维持

^① 《圣·斯特芬诺条约》是 1878 年 3 月俄国逼迫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城下之盟，奥斯曼帝国默许了许多损害国家主权的条款。主要条款有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脱离奥斯曼帝国获得独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自治，建立大保加利亚公国，领土从多瑙河至爱琴海、从塞尔维亚至里海，黑海东岸的巴统、比萨拉比亚多瑙河沿岸地区让予俄国。《柏林条约》大大缩小了大保加利亚的领土，使其局限于巴尔干山脉以北地区，巴尔干山脉以南的东鲁米利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自治省，马其顿仍归属奥斯曼帝国。

欧洲既有均势格局和大国平衡为目的的保守同盟。只是前者置法国于同盟框架之外对其进行监督，后者在防止法国挑起复仇战争破坏和平的前提下，在同盟框架内对德国实现约束，并且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反对欧洲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革命。^①这符合俄国的安全利益。俄国作为非首要强国的列强之一，需要制衡国际体系中的潜在霸权，维持多极格局下的大国均势；同时作为一个君主专制帝国，反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也符合其正统主义传统。尽管在这种局面下，需要对俄国的局部对外扩张加以制约，至少在巴尔干地区需要考虑与奥地利的协调。因此，俄国对巴尔干各斯拉夫族的民族主义的支持比较有限，因为这既有可能破坏俄国维持大国协调的对外政策基础，也与俄国反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对外传统相抵触。

3、泛斯拉夫主义的妥协性

在欧洲均势与大国协调的约束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俄国对泛斯拉夫主义意识形态在巴尔干的扩张诉求，保持了克制。维也纳会议以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以保守思想讨好沙皇，借以牵制俄国利用其在巴尔干及欧洲边陲发展的机会。这一局面维持了近30年。^②克里米亚战争前夕，尼古拉一世试图以支持英国控制埃及、克里特岛换取英国对俄国在巴尔干扩张的默许，这是以共同瓜分和领土补偿原则维持俄、英之间的平衡与协调的一个方案。就对外进攻的有限性来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提出的关于“圣地”问题的要求及对多瑙河两公国的占领，并不构成对欧洲均势的重大挑战。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克里米亚战争就某些重要方面来说是有限的，它主要是一个地区性战争。^③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列强孤立后，俄国并未想将战争扩大与升级，也没有奢望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并打算在东方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以结束战争。早在战争开

① 基辛格指出，保守利益需团结在一起的观念超越国界，因此有缓和权力政治冲突的作用。而民族主义与此相反，它只关注国家利益，有可能激化对立，增大国家冲突的危险。——参见基辛格著：《大外交》，第82页。

② [美]亨利·基辛格著：《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第79页。

③ [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224页。

始不久的 1854 年 11 月，沙皇就遣使以“维也纳四原则^①”为基础进行和谈，其后，沙皇表示愿意在此基础上达成和平协议。巴黎和会的结果是俄国接受了比列强之前提出的维也纳四原则更为苛刻的媾和条款，放弃对多瑙河两公国、塞尔维亚和奥斯曼帝国内基督教会的保护权以及在黑海的军事优势。1875 年东方危机发生时，由于仍然顾忌列强（如英国、奥匈帝国）的立场，俄国不但在此次俄土战争之前与列强（特别是奥匈帝国）反复协调立场，而且在战后的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上，面对英、奥合谋的算计与要挟，修改了具有强烈泛斯拉夫主义色彩的《圣·斯特芬诺条约》，代之以各方都能接受的立场调和的《柏林条约》，让出了 1877-1878 年对土战争中取得的大部分战果。

实际上，在欧洲势力均衡与大国协调机制形成的体系结构压力下，俄国多次从泛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对外立场向后退缩。尽管泛斯拉夫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修正国际现状的内在扩张冲动，但其对俄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显然不及国际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动所引起的变化之巨。

4、小结

在巴尔干政策中俄国利用了泛斯拉夫意识形态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影响力，但是，俄国并未让泛斯拉夫意识形态完全左右自己的巴尔干政策，至少要将其置于国家安全和地缘利益的框架之内，而不是与之相背离。尽管带有局部扩张的修正主义性质，俄国实际执行的巴尔干政策无疑是有限的。实际上，泛斯拉夫意识形态只处于俄国政府推行巴尔干政策时可资利用的资源和手段的地位。只有当泛斯拉夫主义的意识形态理想与国家安全需要及地缘政治利益在具体政策层面相符或吻合时，泛斯拉夫主义的国际革命旗帜才会高高扬起，只是在背后牵动和操纵这面旗帜的却是对权力政治的计算

^① 1854 年 12 月 28 日奥、英、法确定的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四项基本原则：（1）塞尔维亚与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多瑙河两公国，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由列强进行集体保护；（2）多瑙河为国际自由通航的河流；（3）俄国须放弃在黑海的支配地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受到欧洲均势的保证；（4）俄国放弃对奥斯曼帝国内基督教会的独占保护权。——参见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65-66.

与权衡；而当国家安全需要和地缘政治利益与之背道而驰时，这面旗帜就会应声落地。

（二）国际共产主义与俄罗斯对外目标形成

1、国际共产主义与地缘政治

战后，苏联在东西两个方向面对大国，西方主要是德国，东方主要是日本。而自 1871 年德国统一以来，俄国在欧洲最大的地缘威胁始终来自德国。而自 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就成为俄国在远东的主要竞争对手和威胁来源。出于地缘环境的不安全感，苏联在战后表现出对势力范围的强烈兴趣并致力于对周边缓冲区的不懈追求。将东欧和东北亚部分地区纳入势力范围，作为与相邻大国之间的安全缓冲区，是苏联与西方外交博弈的重点，这与沙皇俄国时期的地缘政策如出一辙，显示出苏联在安全观上对俄国地缘政治传统的继承性。^①而对德国的地缘政治安排以及中立化等问题，也是苏联与西方讨价还价的焦点。战后初期，苏联对土耳其提出领土和修改海峡公约的要求，通过扶植傀儡政权分裂伊朗并加强对其政治渗透，则是延续了沙俄时期的近东、中亚政策，其目的是取得国境南方的势力范围，控制土耳其两海峡或进一步南下波斯湾，取得南方出海口。

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周边缓冲区——东欧和远东势力范围——基本属于雅尔塔体系划定的苏联势力范围，苏联基本采取以军事进驻为后盾的紧密政治控制，而在其他对苏联安全价值较小的因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存在苏联影响的地区——基本位于雅尔塔体系划定的苏联势力范围之外，苏联主要采取政治渗透和对外援助的方式施加影响，对其关注的程度

^①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签订时，苏联对东欧势力范围的要求是基本恢复沙皇俄国在一战前的版图，而对波兰的再次瓜分，与历史上三次瓜分波兰的目的相同，也是为建立与西方大国之间的缓冲区。将东欧作为势力范围，是苏联在与西方达成百分比协定和雅尔塔协定时的基本要求。作为苏联出兵远东对日作战的交换条件，斯大林要求恢复沙俄在远东的势力范围。

与投入的资源也比前者要少。^①苏联用于第三世界的军事投入仅占其国防预算的 10%，而同期美国的同类支出比例则达 25%。^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意识形态进攻性随地缘安全价值的高低而起伏。在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苏联也把撤回对古巴的导弹援助，用来交换美国将驻土耳其的同类导弹撤出，来增进苏联自身的安全。正如莱弗勒 (Melvyn P. Leffler) 指出和强调的，斯大林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而是保护疆域和重建苏联。在苏联安全是压倒一切的优先考虑^③，革命理想也要向安全问题让步^④，世界革命已经沦为斯大林为提高苏联的安全与地位与西方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严格来说，战后初期苏联在东欧、东北亚等周边地区实施的地缘战略主要是基于源自欧洲传统的权力政治的需要，而非国际共产主义的革命诉求。

2、国际共产主义与权力结构

战后初期，维护雅尔塔体系确定的国际均势及苏联与西方大国的合作关系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指导方针。根据苏联领导人的判断，首先，复兴后的德、日将成为战后对苏联安全的最严重威胁。苏联预计德、日具有极强的复兴能力且复兴后会对苏联采取报复性进攻。其次，英、美虽为战时同盟，但在意识形态与地缘关系方面与苏联存在冲突与竞争，美国拥有巨大的实力优势，还垄断着核武库。苏联虽然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但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力空虚；苏联面对以上威胁，在资源与手段

① 苏联从二战结束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不足美国的二分之一，而其占国防投入比例仅及美国的 40%。——参见 Barry R. Posen, Stephen William Van Evera, “Overarming and Underwhelming”, *Foreign Policy*, 1980, No.40, p.105; Evera Posen, “Defense Policy and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Departure from Contain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83, Vol.8, No.1, pp.36-39; Walter C. Clemens Jr., *National Security and U.S.-Soviet Relations*, Muscatine, Iowa: Stanley Foundation, 1982, pp.117-118.

② Evera Posen, “Overarming and Underwhelming”, p.105; Evera Posen, “Defense Policy and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Departure from Containment”, pp.36-39.

③ Jonathan Haslam.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Under Stalin”, in Teruyuki Hara, Kimitaka Matsuzato, *Empire and Society: New Approaches to Russian History*, Sapporo, Japan: Slavic Research Center, Hokkaido University, 1997, pp.167-179.

④ Pon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ge of Wars: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I o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pp.277-307.

上捉襟见肘，应对乏力。在这种不利的权力结构与恶劣的地缘环境前提下，苏联应一方面增进自身实力，一方面削弱最危险的对手（德、日），并在雅尔塔体系的框架内尽可能长期维持与英、美之间的和平乃至合作关系。苏联应通过加速重建、调整边界、控制缓冲区、索取赔款、争取同盟及对德、日进行国际监督等方式取得对德、日的实力与地缘优势，而这些举措都需要英、美的首肯与合作才能奏效。苏联的战后重建需要美国的贷款，而对周边地区的地缘要求及对德、日实施有效控制也需要与英、美取得协调。

苏联应对安全威胁、化解潜在危机的关键在于如何巧妙处理与战时同盟伙伴（英、美）之间的关系。由于苏联在权力结构中的弱势地位^①，苏联需要采取保守主义政策，尽量缓和大国对手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更应力避与英、美发生正面冲突，维持与英、美之间的现有均势格局。1944年初，苏联驻英代表迈斯基（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айский）分析指出，在欧洲鼓动世界革命将使苏联与西方大国的关系陷入紧张状态，而维护战后的大国和平共处局面才能保证苏联的安全，苏联应力避与西方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长期维持战时同盟关系。^②莫洛托夫事后坦言，1944年9月顿巴敦橡胶园会议期间，斯大林确实怀有与西方大国长期合作的愿望。^③1945年初斯大林就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谈到，在实力对比不利时，应该处于防守态势。^④

苏联在战后的对外政策以维持雅尔塔格局既定现状为目标，即使在美、苏冷战格局形成后，苏联也始终坚持美国拥有战略优势的认知，从而积极寻求美、苏在限制战略武器等军备控制方面的对话与合作，试图实行与西方和平共处或和平竞争的对外政策，以缓和美、苏两大阵营竞争与对抗的紧张气氛。

① 美国学者乔治·凯南认为，苏联与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意识形态对手在力量对比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而苏联领导人对此也心知肚明。——参见[美]乔治·凯南著：《美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00-101页。

② АПРФ. ф.3. оп.63. д.237. л.52-93.

③ V.Zubok, C.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London, 1996, p.27.

④ “From the Record of I.V.Stalin’s Conversation with A. Hebrang”, January 9, 1945, *Cold War History*, 1 (April 2001), pp.161-162.

3、国际共产主义的妥协性

战后的苏联致力于与美、英达成妥协，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战后国际和平与既得利益，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对苏联的安全与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苏联在周边地区的局部扩张与势力范围索取，基本未超出雅尔塔体系所划定的范围，而其在局部扩充缓冲带的直接目的是改善苏联对其他大国的防御态势。为了维持与美、英等战时盟友的合作关系，苏联在为自身谋取势力范围的同时，也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做出诸多承诺：主要是严守雅尔塔协定规定的双方势力范围的界限，并对此界限以外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持消极政策。

早在战争尚未结束之际，斯大林就解散了共产国际。实际上是为以后与西方大国继续合作清除障碍。莫斯科领导共产国际的做法使西方大国对苏联心存疑虑，1942年末，美国政府曾提出解散共产国际的要求。^①

战后初期，苏联继续对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修正色彩加以抑制，将苏联的对外影响限制在雅尔塔体系规定的界限内。对希腊、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活动予以压制，使其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因错失时机、放弃武装、失去支持等各种原因而最终失败；对南共在东南欧地区对资本主义阵营所持的激进主义立场予以严厉批评，并最终将南共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接受美、英的警告与要求，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做出退让，使苏联在近东、中亚的影响止步于其国境；对远东的共产主义运动采取不承认或漠视的态度。正像沈志华所指出的那样，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特别是在亚洲。^②苏联从伊朗、中国东北、朝鲜撤军，其目的在于促使美国也从其他地区撤军，以形成对苏有利的均势结构及大国协调局面。^③

土耳其、伊朗属于没有被列入雅尔塔体系界定范围的未划定区域。就苏联对土、伊问题的最初动机与立场来观察，具有在其南部边境以外地区拓展势力范围、输出意识形态的扩张色彩。但是，苏联的对外扩张仍然以维持雅

① Судоплатов П.А. Разведка и Кремль, Записки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го свидетеля. Москва: Гя, 1996. С.255.

② 沈志华：“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历程”，《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③ АВПРФ. ф.06. оп.7. п.34. д.544. л.8-9.

尔塔体系基本格局、与美、英等西方大国合作为前提，既是有限的又是可调和的，斯大林显然不想与美、英发生正面冲突，因而在美、英的强硬立场面前采取了退却的政策。

战后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另一方向是对第三世界的争夺。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苏联对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只给予有限的援助，并力避直接介入军事冲突。此举受到中国领导人的严厉指责，苏联应对资本主义进攻的政策是退缩的、不利的，苏联没有给予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以应有的支援。^①“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赫鲁晓夫也在美国的压力下退却了。

即便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尽管苏联已经缩小了与美国的军备差距，苏联领导层仍然认为苏联相对于美国处于战略劣势。与此相应，无论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方面都表现出比美国更加积极的兴趣，并一再表明苏联无意进攻美国，而是希望与美国进行和平竞争。

国际共产主义的对外理想与目标的实现方式要服从苏联的安全利益，其防御的需求高于革命的诉求，而其采取的手段是影响与转化，而非战争与征服。苏联的进攻性更多表现在对势力范围的控制和第三世界国家影响力的竞争方面，而通过直接武力对抗^②与西方阵营争夺世界霸权的表现则不明显。通过对第三国的影响力竞争、而不是直接的军事对抗进行权力角逐，是关于权力的增殖与削减而不是其存在与消失的博弈，属于不直接关涉国家生存前途问题的权力与利益范畴。而美国对苏联最为担心的方面是其将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化为共产主义政权执政并失去盟友的信任与忠诚，从而使美国陷入国际政治上的孤立，而非苏联对美国的直接军事进攻与打击。

^①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Mao Era, 1948-1976”,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ashington D.C.: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2004.

^② 此处系指大国之间的征服战争。

4、小结

苏联在地缘环境方面缺乏天然安全屏障^①，导致苏联难以以类似美国那样的超然态度，热衷于建立一套国际规则来确保自身的安全利益，因此，苏联寄望国际体系形成对自身有利的均势格局并在国境周边的广阔空间形成以自身体制为模版的同盟阵营。但是，在占据综合实力优势的西方大国的权力结构压力之下，其所能够要求的势力范围又只能局限于既有国际均势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这也是苏联既有输出和推动世界革命的内在动机、而在实践中又被迫对其范围与规模加以严格限制的深层原因。

在此前提下，世界革命蜕变为局部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化为“有限”共产主义运动，苏联把世界革命作为与西方大国划分和争夺势力范围的筹码，将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影响力转化为维护苏联国家安全与既得利益的工具。苏联领导的国际共运主要局限于雅尔塔体系规定的己方势力范围之内。苏联革命型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与局部拓展势力范围、构筑缓冲带的安全诉求在地缘空间发生同构与重合。在此基础上，苏联从原来的体制外修正主义大国，变成维护美、苏两极格局现状的保守型大国，苏联完成了重新回归并主导国际体系的历史夙愿。苏联在革命型意识形态与欧洲传统的均势政治之间找到了对苏联安全最为有利的契合点。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中国把苏联的保守政策称之为对国际共运的修正主义，这一点确实符合当时国际局势的实际情况。国际共运已成为苏联平衡美国霸权或伺机取得局部对美优势的维持大国平衡的均势手段。

总体来说，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位次始终处于次强或列强之一的地位，而未能取得首强地位，其相对权力地位并未发生过根本性改变。按照华尔兹的理论，行为体对外行为受到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强有力塑造，相似的体系环境导致行为体出现相似的行为。在这种体系权力结构限制下，首先，俄罗斯必须维护国际均势以免其向于己不利的方向发生异化，比如向霸权结

^① 这里主要是将苏联的地缘安全环境与英、美等海权国家相比得出的结论。虽然就安全角度而言，苏联的地缘位置较之法、德等大国紧密相邻的西欧国家有一定的距离与边缘优势，但是，整体而论，苏联的地缘安全环境仍属陆权性质，其安全程度只能是有限的而非绝对的。

构或恶性竞争转化，威胁自身的生存与地位。其次，在整体均势不被破坏的前提下，谋求局部的渐进式扩张，以扩大与其他大国之间的防御纵深，增加国家的安全系数。俄罗斯意识形态方面的对外主张与要求基本适应了国际政治现实权力关系的演进与转化。俄罗斯经常对革命型意识形态的修正诉求加以自我克制，基本未对国际均势构成严重威胁，其进攻性色彩主要表现在维护整体均势前提下的局部扩张与拓展缓冲带方面。意识形态诉求实质上起到了权力政治的文化与思想工具作用，没有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首要或基本目标。正是由于在国家安全方面存在脆弱性，迫于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需要维系国际体系安全结构的平衡，为了在意识形态的革命诉求与由其导致的安全困境之间取得平衡，需要对革命型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进攻性色彩加以调整。

五、安全余裕与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进攻性

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可以把改变大国力量平衡和均势作为目标，也可以在不改变大国力量平衡和均势的前提下进行局部地缘调整。在国际局势缓和、俄罗斯国家安全没有面临紧迫威胁的前提下，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对外修正主义诉求，在其对外政策中有时会得到强化。此时，国家安全获得暂时的保证，安全需要虽然仍处于首要议程，但可暂时被视为一个常量。因此，作为次要议程的意识形态动机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能动性和影响力，在指引和影响对外目标方面的作用凸显出来。^①

国家安全的余裕与安全困境的程度成反向关系，当俄罗斯对外目标的进攻性导致其他大国的威胁感急遽上升时，安全困境在国际互动模式中的作用将凸显出来，其他大国将采取制衡行动。其他大国采取制衡行动的前提与临

^① 1939-1940年苏联在波兰、波罗的海地区的领土扩张，是在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暂时避开德国的安全威胁之后，其意识形态进攻性得到强化的一个例证；而1940年夏苏联利用德国陷入西线战争，趁机强迫罗马尼亚割让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是另一个更为典型的例证。彼时希特勒正忙于西线战事，而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依赖罗马尼亚的石油，希特勒担心苏、罗之间的武装冲突威胁罗马尼亚对纳粹德国的石油供应，只得压服罗马尼亚向苏联做出让步，而苏联实际占领的土地超出了各方有关协议规定的范围。苏联在东欧的这一系列进攻既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更出于地缘政治动因。

界点，是可自由支配力量与安全困境产生的威胁程度的综合作用结构。安全困境产生的威胁程度决定制衡意愿，它取决于俄罗斯的对外行动引起其他大国对威胁的认知与判断（包括错误认知与判断）。可支配力量决定制衡能力，它取决于大国在其他对立与冲突中的卷入程度与刚性、地理对力量投送阻碍的可克服性、以及国内因素对行动的支持与否等综合因素。当安全困境产生的不安全感足以引起其他大国的干涉意愿，且其同时具有能够用于干涉行动的可支配力量时，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存货”即告罄，其余额归零。而在此时，意识形态的进攻性在对外政策与行动方面的积极作用将让位于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首要议程，国家安全需要将作为一个主要变量在决定国家对外目标的议程中恢复主导作用。因此，进攻型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只有在以上前提与框架内，才会对俄罗斯国家对外目标产生主导性的积极作用，而这种能动性必然受到国际体系层次的国家间互动的强烈影响和有力制约。显然，在这种国际行为逻辑结构下，安全困境与权力结构仍然具有终极的限制作用。

二战结束后，苏联将已经彻底战败的德、日未来复兴后的潜在进攻威胁置于优先于与英、美之间目前实际存在的意识形态冲突威胁的地位，主要是由于苏联与德、日之间存在因地地理位置临近而产生的地缘结构上的冲突，而苏联与英、美之间虽然并不排除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地缘矛盾，但由于英、美力量的海权性质以及地缘上远离苏联，与德、日等陆权大国对苏联的威胁程度显然有所不同。前者更多表现为威望与影响的竞争，主要涉及国家在国际体系的渐进式权势消长；后者则常常表现为征服、控制与反制的斗争，并以直接武装冲突为主要和终极形式，可能导致国家主权或作为国际体系行为体地位的消失与终结。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与平衡客观上维护了二战后世界历史的长期和平。华尔兹等学者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解释这种现象的发生，认为其原因是两极格局比多极格局更加稳定，但是，其仅关注权力的结构而忽视了权力的性质对行为体行为与国际进程的塑造与规制。事实上，美、苏对抗的非直接性与自我约束性从两国权力的地缘性质与类属关系也可以做出具有相同结论的解释，美国的权力性质是海权型，由于海洋对国家安全的保障及同时存在的对本国力量对外投送的阻碍，对大陆霸权只有制衡而无直接竞逐的意愿，这一点与 18、19 世纪的英国极为相似，当时英国对欧洲

大陆的政策是和平时采取孤立政策，大陆出现霸权争端时加入较弱一方制衡具有霸权可能的强权。美国的对外政策虽然在具体政策和操作层面与英国存在差异，但就其权力性质与国家大战略的根本目标来说并无二致。与陆权国家彼此之间对国家生存前景构成的刚性安全威胁不同，海权国由于拥有本土安全的超然地位，在与陆权国追逐国际权力的竞争中，彼此之间的安全竞争具有更多的缓冲与回旋空间。而苏联由于其经济、政治中心区域均位于欧洲大陆的东部边陲，在历史上这一远离西欧权力中心的特点成为其在抵御强敌入侵时的一大优势^①，但是，同时存在的情况是俄罗斯对西欧地区的力量投送也存在同样的障碍与制约。因此，位于欧洲东端的俄罗斯（实际上俄罗斯的绝大部分领土都位于近东以远的亚洲，但是其经济、政治的中心区域位于欧洲东部边缘）即便在二战结束时苏联红军处于对西欧极为有利的战略进攻态势（彼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正处于一个历史上的活跃阶段），也没有控制整个欧洲或建立全欧洲霸权的计划与意图，其控制东欧势力范围与积极干预德国的未来政治安排，更多都是出于为维护国家安全与防止德国未来的报复性进攻而构筑防御缓冲区的考虑。从这一视角观察，除了权力结构因素的制约，俄罗斯的对外权力也因其地缘特征的边缘性而导致其进攻性质的弱化。美、苏两国与历史上欧洲大陆争霸国家在地缘类属性质方面的差别也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抗始终以争夺对彼此盟友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为主要目标，以军备竞赛、对外援助、代理人战争或对第三国实施军事干涉为主要手段，始终规避在彼此之间直接发生热战的重要原因之一。综合以上分析，二战后的美、苏两大阵营竞争与欧洲历史上的大陆霸权竞争有所不同，其性质具有防御性和非直接性，其烈度明显低于历史上的欧洲霸权之争。

正是在这种前提下，苏联的领土安全获得了某种保证。^②冷战时期苏联

① 大北方战争之后，能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欧洲国家都位于远离俄经济、政治中心区域的欧洲西部。从力量投送的地缘阻碍因素分析，路途遥远导致西欧诸强对俄罗斯的进攻能力遭到严重削弱与遏制。拿破仑、希特勒侵俄战争的失败都与由距俄罗斯的相对遥远距离及其巨大的国内纵深导致的战机贻误与补给困难有关。

② 苏联在 1949 年 8 月 29 日试爆原子弹成功，1953 年 8 月 12 日又成功试爆世界上第一颗实用型的氢弹，打破了美国的战略优势，在美、苏之间确立了核恐怖相互威慑与平衡，无疑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安全保障。

的意识形态扩张也可以视为是在国家的领土安全拥有保障的前提下，追求国家在国际体系的权力与影响力的具体实践与体现。在此期间，苏联意识形态的对外进攻色彩也时有表现，以至于西方政治家与观察家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乃至整个基督教文明均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是，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领导人始终认为美国拥有战略优势，并以维护雅尔塔体系确定的美、苏均势格局为战后外交主线。

结 语

从历史经验来看，俄罗斯对外政策具有实用主义的历史传统。俄罗斯与其大陆邻国的地缘版图之间缺乏天然险阻，从国与国之间的攻守平衡来看，这一地缘环境因素显然对进攻有利。而其历史上的邻国也充满了侵略性，俄罗斯历史上多次遭到邻国的野蛮侵略。历史上的惨痛经历与地缘环境的险恶，使俄罗斯对国家安全问题充满了疑惧与忧虑。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俄罗斯鲜有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充斥着实用主义的权力与地缘算计和争夺。俄罗斯解决安全问题的手段，是牺牲邻国、构筑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缓冲带，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权力政治策略。理想主义的对外政策偏好使俄罗斯缺乏政治文化土壤，其历史上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个个执政短暂，并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而精于权力关系计算来处理对外关系的人物却使俄罗斯变得安全与强大。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与体制源于东罗马帝国的东正教文化与金帐汗国的东方专制制度，俄罗斯在还处于莫斯科公国时期，即成为金帐汗国的代理人，替蒙古人统治罗斯诸公国，代其向诸公国征收税赋。其时金帐汗国已接受伊斯兰教，莫斯科公国与其在宗教文化上处于抵触状态，但并不妨碍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为金帐汗国服务，其实用主义的权力政治传统由此可见一斑。当俄罗斯加入欧洲国家体系之时，欧洲国家已经摒弃中世纪宗教政治伦理，确立了世俗国家政治伦理，倡导国家至上原则，开始了权力政治当道的新时代。欧洲权力政治的现实状态与俄罗斯基于地缘环境和历史记忆的不安全感，使安全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中始终一贯的优先选项，安全诉求与威胁意识总是能够压倒意识形态理想。正如彼得·高恩（Peter Gowan）所言，意

意识形态的变化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真实世界的变化。^①在对外政策上，俄罗斯意识形态目标常以权力政治目标为依归，当意识形态目标能够与权力政治目标保持协调并对其予以支持时，意识形态目标才能登上国家政治的议事日程。而当意识形态目标已成为权力政治目标的软肋和障碍，二者已经无法和谐相处时，意识形态目标要么被下调预期，要么被废弃不顾，可以说，实用主义的政治哲学始终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目标形成中居于主导地位。

【 Abstract 】 According to its influences on a country's foreign policies, ideolog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conservative and revolutionary. There exist endogenous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s between revolutionary ideology and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a country's foreign policy, the revolutionary one has its inherent revisionist motives. The former is satisfied with the status quo, recognizing existing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power, complying with existing international law; while the latter is dissatisfied with the state quo, hoping to subvert and revise the existing power structure, criticizing current international law according to legal principles and is signed with the external expansion of imperialism. Traditionally, Russia's ideology belongs to the former type, aiming at maintaining legitimacy and imperial tradition of absolute monarchy, turning against liber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Pan-Slavism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became dominant with distinct revolutionary features. Influenced by revolutionary ideology, the goal of Russia's foreign policy was characterized by more revisionism, holding negative and hostile attitudes toward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system. Moreover, it underwent a series of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s with then international system as well. However, compared with major powers, Russia did not have obvious advantages or disadvantages. As a result, out of the urgent need for national security, Russia needed to maintain the

① [英]彼得·高恩著：《权力的解析——21 世纪的重大战略》，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年，第 4 页。

balance of power at that time in order to protect itself from being threatened and invaded by potential hegemonies, especially those primary powers with invading intentions and obvious superiority in strength. In the last resort, in accordance with then prevailing international balance structure, Russia adjusted timely its foreign policies characterized by revolutionary ideology, making a certain degree of compromise in its revisionism goal. When its national security is not so threatened, Russian revolutionary ideology is more offensive, otherwise its offensiveness is weakened.

【 Key Words 】 Revolutionary Ideology, Russia, National Foreign Goals, Revisionism

【 Аннотация 】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страны мо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два типа: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й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находится в состоянии эндогенной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и конфликта с существующи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орядком и является руководящей идеологией целе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той или иной страны, ей присущи ревизионистские мотивы. Первый тип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ностью статус-кво, признанием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власти, соблюдает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нор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второй — выражает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статусом-кво, подрывает и корректирует существующую архитектуру системы власти, считает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критику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а такж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инициативу внешней экспансии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как символ власти.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России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к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ому типу, цель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поддержании ортодоксальной позиции и имперской традиции абсолютной монархии, борьбе с либерализмом, национализмом. В конце 19-го века и в начале 20-го века панславизм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по очереди достигли доминирующе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в данных идеологиях проявился четки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цел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получили окраску ревизионизма,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негативное и враждеб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е, и претерпели ряд конфликтов и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с существующ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ой. Однако из-з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особенно ведущ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Россия не обладает очевидными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ми или даже находится в явно невыго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стра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требует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баланса си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ы, защиты от угрозы агресси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го гегемона (обладающей явным силовым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м и агрессивными намерениями ведущей державы), в определё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существующего баланса сил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е, требуется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 корректировать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 окрашенную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стремиться к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омпромисса в ревизионистской цел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В условиях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имеет явные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в противном случае,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ослабляетс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ревизионизм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人文学术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张力 ——冷战时代英美斯拉夫学界对苏联的文学把握*

林精华**

【内容提要】二战后，在为遏制东方共产主义而超常发展“苏联学”之大势中，英美斯拉夫学界却和这一超级重点学科（苏联学）保持着明显距离：远不只是热衷于研究和出版被苏共排斥的俄侨文学、境外文学、持不同政见者文学，还同样直面苏联主流的作家作品和理论，并自主地编纂不同类型的俄罗斯文学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遵循斯拉夫学传统，既十分重视俄语的基础文献搜集和整理，又遵守欧洲既成的人文学术范式，从而不直接针对苏联官方话语、不依据“苏联学”范式，在话语层面能超越冷战意识形态。如此研究的魅力，是苏联对俄罗斯文学的僵化阐释所不能及的，因而反过来引领苏联末期以来的人文学术研究，为后苏联俄罗斯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斯拉夫学范式 苏联主流文学 人文学术与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D851.2; K09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2-0134(45)

面对后苏联俄国的人文学术研究景观，我们会疑惑：为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国外俄国学”或“国外俄国研究”（Зарубежное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剑桥俄罗斯文学(九卷本)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89)的阶段性成果。

** 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系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家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自 1990 年代末以来在俄国蔚为壮观，尤其是它大量触及并积极评价冷战时代英美和欧洲大陆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研究^①。实际上，冷战时代由英国发端、美国主打、欧洲大陆积极推动的“苏联学”(Sovietology)，作为遏制苏联的超级重点学科，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被纳入冷战框架(诸如大力研发核武器、发展计算机科学等)相呼应，也与社会科学践行遏制苏联的使命相应和，甚至使得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也难以幸免。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后，美国中情局为满足诺贝尔文学奖评审条件，花高昂代价当即推出英译本，并积极斡旋，使之获得了当年(1958)的诺贝尔文学奖。相比较而言，索尔仁尼岑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被美国接纳，1973“被”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比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严重得多的事件——加剧了冷战。但在俄联邦“出版和大众媒介交流部”支持出版的大型文集《索尔仁尼岑：思想家、史学家和艺术家，1974-2008 年西方批评》(2010)中，有不少篇章乃冷战岁月关于索尔仁尼岑批评之作，如马里恩(Colinn Marion)的《谁害怕索尔仁尼岑?》(1980)、26 岁就获得博士学位、老布什时代任国务院苏联政策顾问的佩特罗(Nicolai Petro, 1958-)的《道德与追求公正：索尔仁尼岑看国际关系》(1983)、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特里高德(Donald Treadgold, 1922-1994)的《索尔仁尼岑的精神先驱》(1984)等。^②这些作品曾经加剧苏联和西方的紧张。1990 年代末以来，俄国入欧屡屡受挫，俄国人由此产生怀旧情怀，认识到苏联解体乃西方遏制的结果，越来越怀疑欧美对俄国的论述，克里米亚入俄引发西方制裁之后，这种怀疑更甚，但却没有妨碍俄国知识界持续接纳西方“俄罗斯学”的成果。

冷战时期英美斯拉夫学界未必和“苏联学”无关。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西方不少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热切推崇苏联学影响下的苏联文学变革。如格拉斯哥大学苏联经济学教授诺韦(Alexander Nove, 1915-1994)，在作品《“公开性”行动：俄国的文化复兴》(1989)中，称 1989 年为“俄国文化复兴”(cultural renaissance)之年；伯明翰大学苏联史教授戴维斯(Robert William Davies，

① Безбородов А.Б. (ред.). Зарубежное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 М.: Проспект, 2013. www.prospekt.org.

② Эдвард Эриксон (сост.). Солженицын: мыслитель, историк, художник. Западная критика 1974-2008. М.: русский путь, 2010.

1925-) 在其《戈尔巴乔夫革命中的苏联历史》(1989)中,赞赏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上的孩子们》等历史文学,认为它们真切地呈现出了苏共的历史真相。这些不是个案,而是潮流。还有诸如伦敦大学学院教授格拉夫(Julian Graffy)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 1942-)主编的《今日苏联的文化和媒介》(1989)、密歇根大学教授布朗(Demin Brown)的《文学与苏联改革》(1989)、匹兹堡大学教授戈希罗(Helena Goscilo)和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林德赛(B.Lindsey)主编的《公开性: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俄罗斯文学文选》(1990)、时任英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的拉克尔(Walter Laqueur, 1921-)的《通往自由的漫长之路:俄国与公开性》(1989)、伦敦大学教授麦考利(Martin McCauley)主编的《戈尔巴乔夫和改革》(1990)、兰卡斯特大学教授皮特曼(R.Pitman)的《改革与苏联文化政治学:大型文学杂志情况》(1990)、多伦多大学教授马尔什(Rosland Marsh)的《公开性和俄罗斯文学》(1992)等,无不高度肯定“新思维”及其成效——活跃了苏联文化和媒体、推动苏联文学发展。诸如此类热情洋溢的论述,与苏联很快就在这种火热的文学场景中走向曲终人散的结局,构成了令人唏嘘的强烈反差。

而造成如此后果,确实与西方遏制苏联的冷战方略殃及俄罗斯文学译介和研究有关。1946年3月5日,在大选中失利的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关于苏联主导的东方共产主义开始威胁西方自由文明的危言耸听的演讲,当即得到美国的积极呼应,形成了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通过建构“市场经济”、“政治民主”、“人权至上”、“艺术自由”等“普世”价值观,并借助马歇尔计划、“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等践行这类价值观,以挑战苏联共产主义。在冷战中,东西方彼此封锁,如1949-1970年代末之前,中国很少有人知道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之真相(现在仍视之为前沿)。同样,得知苏联解体的消息,美国也措手不及:美国国家安全秘书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声言:“我很惊诧(surprised)。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就意识到苏联会加速变化,但在当时我不可能想到要说苏联解体的话”;其前任、时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贝克(James Baker)也说,“我被震撼了。我们主要是被苏联解体的速度震撼了。不仅我们智库震撼了,戈尔巴乔夫亦然。实际上,我们大家都震撼了”;贝克的前任舒尔兹(George

Shultz)说,“苏联解体是一起令人惊诧的事件,我们觉得冷战就此已趋于结束”;时任中情局官员、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情报委员会苏联学项目主管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ell)更是感叹:“我被震撼了,我们当时谁也没想到苏联真的会解体”;华盛顿研究所著名政治学教授史密斯(Dimitri Simes)重复这样的感慨:“当我意识到苏联解体时,我当时就震惊了”;向苏联学投入大量资金的詹姆斯唐基金会,其主管格布尔(Paul Gobel)作为苏联学专家同样说:“我被震撼了。我们没想到苏联是轻而易举地终止存在了”;还有,时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施梅曼(Serge Schmemmann)目睹苏联解体过程后感叹:“当时无论是我还是大使馆职员,都没想到苏联会解体。我们仍假定会和苏联共处到公元2000年以后呢!”;尤其是,冷战时代哈佛大学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 1923-)教授也说:“我被惊呆了。我们已很好地理解了会发生什么变化,考虑到了这些变化的重要性,但没想到它们会导致苏联解体”^①……诸如此类的论述,反过来强化了对冷战的认知:不能再如冷战那样彼此封锁,必须相互开放。

然而,这样一来就出现了第一个问题:苏联解体20多年来,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继续成为西方斯拉夫学界热衷研究的经典,也成为俄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文学选读课和语言课选作语料最多的作家作品之一。索尔仁尼岑则不仅是誉满世界的著名作家,而且成为后苏联时代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表。俄联邦为其举行的葬礼近乎国葬,备极哀荣。1979年末被苏联官方查禁却很快被美国密歇根安波阿尔迪斯(Ardis)出版社推出的《大都会文集》,今天仍是著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集。其作者之一阿克肖诺夫(Сергей Аксенов, 1932-2009)成为后苏联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另一作者伊斯康德尔(Фазиль Искандер, 1929-)于2013年获俄联邦国家奖。这些并非撞大运的个案。冷战时代为英美所力推的作家作品,在后苏联多被俄国列为经典,且英美论述俄罗斯文学的概念在俄国亦通行。这意味着,当时斯拉夫学知晓苏俄文学及批评的实际情形,否则,如何能对俄国文学有前瞻性把握?哈佛大学教授斯杰夫斯基(Dmitrij Cizevskij)《比较的斯拉夫文学史》(1968)在冷战

^① David Arbel & Ran Edelist, *Western Intelligence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1980-1990: ten years that did not Shake the World*. London: Frank Cass, 2003, pp.viii-ix.

高峰期声言，“斯拉夫学(Slavistics)或斯拉夫语言文学(Slavicphilology)，现已成为美欧及世界其他区域各大学发展最为显著的学科和领域。”^①

进而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冷战时代以英美为主体的西方斯拉夫学界，对俄罗斯文学之把握及其研究成果，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失去生命力。这是否因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遵从了由来已久的斯拉夫学传统，而能超越冷战意识形态的“苏联学”呢？从16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基于地缘政治之缘由，英国日益关注通过殖民手段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疆域连片的俄罗斯帝国，包括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和研究，英国也远比欧洲其他国家更为投入。从1859、1889年开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分别专门设立俄罗斯研究教席。即便从十月革命到二战之前，因苏维埃政权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导致英俄关系紧张，也没有妨碍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类的经典作家在英国流行。^②英译俄罗斯文学的兴盛，对英国社会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③。二战到来后，英俄需要合作抗战，更扩大了英国对俄罗斯研究的规模，俄罗斯文学译介规模得以迅速扩展，这种情形甚至因冷战而持续、扩大。剑桥、牛津和伦敦的斯拉夫东欧学院，扩大了俄语训练和俄罗斯文学译介的项目。尤其是1961年在《海特报告》(Hayter Report)^④的推动下，伯明翰大学、斯旺西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均开设了斯拉夫东欧学专业。赫鲁晓夫推动解冻思潮后，爱丁堡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巴斯大学、诺丁汉大学、谢菲尔德大学等，先后创立了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既影响欧洲大陆的斯拉夫学界，又积极译介欧洲大陆的成

① Dmitriy Cizevskij, *Comparative History of Slavic Literatures* (transl. by Richard Noel Porter and Martin P. Ric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71, p.5.

② See W.J. Leatherbarrow (ed.), *Dostoevskii and Britain*, Oxford: BERG, 1995.

③ 如劳伦斯所说，“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代欧洲占据着某种特殊位置，类似于莎士比亚、高乃伊和塞万提斯之于文艺复兴、中世纪欧洲，或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在古希腊占据的位置。”参见 M. Herbert (ed), *Reflections on the Death of a Porchpin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1988, p.381.

④ 海特(William Goodenough Hayter, 1906-1995)曾任英国驻苏联大使(1953-1957)，1959年被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任命为“东方、斯拉夫、东欧和非洲研究专门委员会”主席。1960-1961年该委员会访问英美二十多所大学，发表《海特报告》：主张加大对亚洲、东欧和非洲的研究，包括研究这些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加强这些地区的语言教学和训练，改变过于重视古典学研究的状况，以应对正在变化的世界秩序。

果。如旅居德国的俄侨学者楚热夫斯基 (Dmytro Chyzhevsky) 的德文版著作《19 世纪俄罗斯文学》(1974)，及时被译成英语。

在冷战时代，作为唯一能与苏联抗衡的美国，和英国一道，积极推动欧洲国家共同实施遏制苏联战略。美国中情局暗中所创办或支持的诸多基金会，以不同方式资助美国许多著名大学研究苏联问题。1946 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哥伦比亚大学在战时的区域研究经验基础上，成立了哈里曼研究所 (Harriman Institute)，对苏联体制展开多方位研究。主要是在欧洲受业而成为斯拉夫学家的克纳 (Robert Kerner, 1887-1956)，1948 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创建伯克利斯拉夫研究中心。同年，在卡内基基金会支持下，哈佛大学成立了俄国研究中心，并和美国其他大学苏俄研究所合作研究苏联问题课题，有计划地实施培训青年苏联学家的工程。1953 年 10 月，美国福特基金会大量增设苏联学研究新项目。相继地，达特茅斯大学、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在基金会支持下纷纷建立苏俄研究中心。到 1950 年，美国有 29 所著名大学建立了这类研究机构，研究和教学人员达 500 人；1965 年这类研究机构已达 153 个，专职研究和教学人员 4000 人。1945-1955 年间，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有超过 400 名不同层级的苏俄研究专家得到资助^①。为了吸引西方左翼学者、苏联东欧持不同政见者，1952 年福特基金会设立“外国区域研究奖学金”，1958 年启动国防教育行动项目，1968 年建立国际研究和海外交流机制。相应地，1941 年成立美国斯拉夫东欧语言教师协会，六年后更名为美国斯拉夫研究合作委员会。1948 年，为吸引更多人参与该智库性学会，委员会再次更名为美国高等斯拉夫研究学会（苏联解体近十年后，更名为斯拉夫东欧和欧亚研究学会）。1955 年，该学会创办信息交流性月刊《苏联研究》（主编乃俄国史专家沃尔特·拉克，曾以笔名马克·亚历山大发表大量苏联学文章），1957 年创办《斯拉夫东欧杂志》，等等。此外，还有 1974 年成立的美国俄语教师理事会、凯南高等俄国研究所、1977 年成立的全美苏联东欧研究学会（现易名为“全美欧亚和东欧研究理事会”）等。庞大的苏联学也推动着美国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和研究。

^① David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39.

然而，英美著名大学的俄罗斯文学译介和研究者（斯拉夫学家），比那些欠缺俄语功底的苏联学家（智库专家）有更多机会亲身了解苏联。^①194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美国学者委员会5万美元津贴。两年后，哥伦比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主任西蒙斯(Ernest Simmons, 1903-1972)教授，以“在学术研究中发展美国、欧洲和斯拉夫世界的文化关系”之名，访学苏联。1931届哈佛大学毕业生基尔戈(Bayard Kilgour, 1904-1984)，借助该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所藏文献和冷战时期两次访苏所得，出版《基尔戈俄罗斯文学集：1750-1920》(1959)。20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贝尔克纳普(Robert Belknap, 1929-2014)，曾访学列宁格勒大学。上文提到的著名俄国史教授霍斯金，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读书期间，曾在莫斯科大学访学(1962-1963)。1963年，时任布朗大学副教授的范格尔(Donald Fanger, 1929-)访学于列宁格勒大学。34岁即成为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的普罗菲(Carl R. Proffer, 1938-1984)，为创办阿尔迪斯(Ardis)出版公司，1969年和妻子去苏联访问半年。伦敦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帕梅拉(Pamela Davidson)，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求学(1976-1979)时，获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文学档案馆访问一年有余。他在牛津大学工作期间(1979-1981)，再度访学苏联，查阅伏亚契斯拉夫·伊凡诺夫档案文献，得以出版力作《伊凡诺夫

① 关于苏联学，佛蒙特大学教授丹尼尔斯(Robert V. Daniels, 1926-2010)在《苏联社会和美国苏联研究：一种成功的研究？》(Soviet Society and American Soviet Studies: a Study in Success?) (1998)开篇有清楚的论述：“就其自身而言，苏联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种学术崇拜(academic cult)。它仅仅是从类似于学术——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各种政治学——的观点，对苏联进行特殊研究。本质上，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以其自身方式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当下苏联，足以能把苏联的存在纳入其学科框架内查考的。比起他们各自学科的理论主潮，分散在各领域的苏联学家或许少有精妙的方法论，他们作出的判断经常是根据彼此意见，而不是超越同行。在学术意义上，和不同学科相比，它是一种广义的宗教”；“苏联研究不应该仰赖于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政治歇斯底里症，而是要致力于用关于这套制度的过去和现在问题的帝国知识去预防它”。

的诗学想象：俄国象征主义者对但丁的认知》(1989)。①而《共产主义问题》、《美国斯拉夫和东欧评论》、《苏联东欧犹太人事务》等苏联学杂志，也刊行了不少论述文学艺术问题的文章。可见，冷战只是阻止了东方对西方的了解，使东方不清楚西方对共产主义国家实际情况掌握到什么程度。然而，英美斯拉夫学界是有机会了解苏联的，且能超越冷战话语去分析所观察到的苏联真相。

如此一来就产生了第三个问题：客观上成为苏联解体重要力量之一的英美斯拉夫学界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冷战时代究竟是怎样把握俄罗斯文学的，具体做了哪些研究工作，从而能对后苏联俄国产生巨大影响，并预先确定了后冷战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经典？

同样正视苏联官方所肯定的文学和文学批评

罗切斯特大学著名教授帕特(Kathleen F. Parthe)，在冷战结束伊始出版了其力作《俄罗斯农村题材小说：灿烂的过去》(1992)。在序言中，作者称，“近年来西方学界和新闻界关注的重点，是苏联官方体制之外的地下文学、境外文学(创作在苏联、出版在国外)、俄侨文学。公开性时期，东西方都回过头来关注十月革命后统一的俄罗斯语言文学背景下的苏联文学进程。由此，被耽误的文学(早先就已经创作完毕，却未能及时在苏俄出版的作品)重新被发现。”②但该作者却研究苏联学术界热衷的农村题材小说，用欧洲的文学批评范式，论述解冻思潮后兴起并持续繁荣到20世纪80年代的这一主流文学。在其作品中，呈现出城市化和工业化如何对俄罗斯传统的破坏、促成居民的思乡(xenophobic)情绪、对家园(home)的眷顾、暗潮汹涌的排犹

① 作为重要的象征主义运动理论家和文学家，伊凡诺夫原本就痴迷于古希腊文学和思想，由此无法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后流亡国外，选择旅居意大利(始于1924年)。帕梅拉在此专门研究伊凡诺夫文学活动和但丁的关系：追溯他对但丁的兴趣之源(索洛维约夫对但丁有诸多研究和阐释，其思想影响了白银时代；勃洛克和别雷等白银时代诗人普遍热衷于但丁)，他对《新生》、《飨宴》、《神曲》等翻译；分析他的创作对神秘之爱(Eros & Amor)的表述；重点研究其诗篇《透明》、《浪漫之地》(I)、《浪漫之地》(II)中的但丁形象

② Kathleen F. Parthe, *Russian Village Prose: the Radiant Pa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ix.

(anti-semitism)潜流，以及不同地区的乡村儿童和妇女遭遇到的新危机。这种不同于苏联本土的农村题材文学的研究，反而预先指出了工业化在苏联的进程同样难以避免的现代性后果。

造成这种矛盾，是因为冷战时期英美对俄罗斯文学的认知，仍然处于斯拉夫学的框架之下，因此，并非只是批判苏联官方文学及其诠释。欧洲正视帝俄的强大，不是在1812年俄国抵抗住拿破仑军队进攻莫斯科、并反攻到巴黎之后，而是在1861年改革后20多年间帝俄国力增大、文艺业绩非凡之时。法国驻俄使馆二秘和东方学家沃盖(Eugene-Melchior de Vogue, 1848-1910)，娶俄国女子亚历山德拉·安年科娃为妻，退职后居住在乌克兰。他著述多年而成的法文版《俄罗斯长篇小说》(Le Roman Russe, 1886)，介绍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文学家。自此，在欧洲形成了译介俄罗斯文学艺术的热潮，即便是在一战末期，苏俄建立了反资本主义的政权，英国也未终止译介俄罗斯文学艺术的热情。到二战之前，俄罗斯大部分经典作家的著作全被译成了英文。同样重要的是，在英国现代学术制度形成的过程中，融合着斯拉夫学的诞生与成长：1619年，英国著名诗人和学者詹姆斯(Richard James, 1592-1638)出版了《罗斯人歌曲集》；1696年，牛津大学出版了第一部《俄语语法》(作者鲁道夫不是出生于英国的英国学者)；考克斯(W. Cox)的《波兰、俄国、瑞典和丹麦之旅》(1784)，借助德文和法文资料介绍俄罗斯文学；后来成为第四任香港总督的旅行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鲍林(John Bowring, 1792-1872)所著的《俄罗斯诗人的文本》(1821)和论文《俄国的政治和文学》(《西敏寺评论》1825年)，专事介绍俄国文学；1841年，《西敏寺评论》发表《俄罗斯文学档案》；1843年，《外国评论季刊》刊载巴拉丁斯基、普希金和雷列耶夫等19世纪初著名诗人之作。自此，英国不断推出关于俄罗斯文学的力作，如著名新闻记者爱德华(Sutherland Edward, 1828-1906)的《在故乡和在国外的俄罗斯人》(1861)、格雷厄姆(F. Grahame)的《俄国的科学、艺术和文学之进步》(1865)、巴赞(E. Bazan)的《俄国及其居民和文学》(1890)、威尔逊(C. T. Wilson)的《英语韵文中的俄语抒情诗》(1897)、作家和学者波伦(John Pollen, 1820-1902)的《俄语韵律》(1891)等。1890年，伦敦出版了《自由俄国》期刊。1892年，创建

了“英俄文学协会”(The Anglo-Russian Literary Society)。^①1880年代以后,欧洲更加关注对俄罗斯文学的认知。如,1887年埃德蒙斯(J. Edmonds)英译了沃盖的《俄罗斯长篇小说》;勃兰兑斯的《俄国印象记》(1889)、波兰史学家瓦利泽夫斯基(K. Waliszewski, 1849-1935)的《俄罗斯文学史》(1900)等也被及时英译。英国的斯拉夫学者们还积极搜集俄语文献,如格洛特(Яков Грот, 1821-1907)主编的七卷本《杰尔查文文集》(1868-1878)、“科学院俄罗斯作家文库”(Академическ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所包括的阿布拉莫维奇(Дмитрий Абрамович, 1873-1955)教授主编的五卷本《莱蒙托夫全集》(1909-1913)、著名文学史家温格罗夫(Семён Венгеров, 1855-1920)的《俄罗斯文学史概论》(1907)等等,在牛津大学的泰勒斯拉夫-希腊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等,当时就有收录。

即便是十月革命后,欧美各著名学府图书馆仍然先后收录了苏联出版的《文学大百科全书》、《文学小百科全书》、六卷本《普希金全集》(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1938)、以及1937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部推出的著名文学理论家托马舍夫斯基主编的《普希金文集》(按长诗、童话、剧作、抒情诗、小说和散文、历史、评论、笔记、回忆录、书信等文类编纂作品,再按问世时间顺序编列,非常方便读者阅读)、艾亨鲍姆主编的五卷本《莱蒙托夫全集》(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1935),等等。

二战期间,美国著名学者和作家威尔逊(Edmund Wilson, 1895-1972)不断修订再版《观察俄国的窗口:外国读者用书》,向英语读者介绍关于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基础知识。威尔逊认为,“法语是逻辑性和公共性语言,而俄语则是一种非逻辑性和私人语言;当旧制度下的俄国人借用西语改变俄语”,就意味着,“俄语成为混杂语言(世俗语言和基督教用语、西方译语和本土口音等相交织),虽然它显得笨拙、僵硬,但比西语更能表达对事

^① Donald Davie, “Mr. Tolstoy, I presume? The Russian Novel through Victorian Spectacles”, in *Slavic Excursions: Essays on Russian and Polish Literature*, Manchester, 1990, pp.271-280; Rachel May, *The Translator in the Text: on Reading Russ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Evanston IL, 1994; Казнина О.А. Русские в Англии: рус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усско-англий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ека. М.: 1997.

物的感觉、印象和情感，但要领会这些，对学习者的而言是很困难的。”^①。这样的论述，在战时激发了英美读者对苏俄的兴致。

即便是在冷战时期，这种已学院化的传统，也推动着英美斯拉夫学界大力搜集苏联出版的文学及文学批评文献，包括：托马舍夫斯基等主编的六卷本《普希金全集》（国家文艺出版社，1947）、纪念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的十卷本《普希金全集》及其再版本（科学院出版社，1949、1964-1966年）、十四卷本的《果戈理全集》（国家文学出版社，1937-1952）、三十卷本的《屠格涅夫全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托尔斯泰诞辰百年纪念版全集》、十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国家文艺出版社，1956年）、三十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科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部，1972年）、三十卷本的《高尔基全集》（1949-1956年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二十卷本的《契诃夫全集》（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1951）和三十卷本《契诃夫全集》（科学出版社，1974-1983）、《莱蒙托夫百科全书》（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科学院版十卷本《俄罗斯文学史》（1941-1956）、勃拉格伊主编的三卷本《俄罗斯文学史》（列宁格勒，1958-1964）等大型书系，以及利哈乔夫（Дмитрий Лихачёв，1906—1999）院士的《古罗斯文化史》（1946）和《俄罗斯文学缘起》（1953）等重要文献。这些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的图书馆均有收录。这些资源为所在学校的师生和访问学者免费开放，使得英美和欧洲大陆并不缺乏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基础文献。由此，英美得以重新编纂俄罗斯经典作家文集，如20卷本的《契诃夫文集》（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1954-1957年）出版10年后，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8卷本《牛津契诃夫文集》（1967-1978）。该文集由著名翻译家和学者辛格雷（Ronald Hingley，1920-2010）翻译和主编，至今仍广受英语读者青睐。

尤其是，英美学者按斯拉夫学传统编纂文献工具书。（1）英译的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文献。如布莱德（Paul Bred）和斯尼杰尔满（Forence M. Sniderman）

^① Edmund Wilson, *A Window on Russia for the Use of Foreign Reader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2, pp.7-8. 该书1943年初版，1944、1952、1957、1965、1967、1969、1970、1971、1972年九次修订再版，但不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凸显俄国文化和欧洲的对抗性。

的《俄罗斯文学、戏剧和艺术：英语出版的书目文献，1900-1945》(1947)、时任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馆员莱恩(Maurice Line, 1928-2010)的《1900年之前的俄罗斯文学之英译书目》(1963)、莱万斯基(Richard C. Lewanski)的《英译世界文学：文献书目》，其第二卷为《斯拉夫文学卷》(1967)及阿尔迪斯出版社创建者普罗菲和出版家梅耶(Ronald Meyer, 1944-)的《英语中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与翻译文献》(1990)等。(2)重新编纂俄罗斯文学研究基础工具书。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金斯(William E. Harkins, 1921-2014)的《俄罗斯文学词典》(1957)^①、韦伯(Harry B. Weber)主编的《现代俄罗斯和苏维埃文学百科全书》(1977)、《剑桥俄罗斯研究指南》系列中的《俄罗斯艺术和建筑》与《俄语和俄罗斯文学指南》(1980)、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布朗(Archie Brown)和经济学副教授凯瑟(Michael Kaser)及俄国史教授史密斯(Gerald S. Smith)主编的《剑桥俄国和苏联百科全书》(1982年初版、1984年再版，涉及苏联官方提及的重要作家作品、补充被苏联禁止的文学^②)、布朗大学教授特拉斯(Victor Terras, 1921-)主编的《俄罗斯文学手册》(1985)，等等。

英美斯拉夫学界还搜集和翻译了对具体作家的批评文献。如著名文学批评家韦勒克(Rene Wleek)曾主编和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论文集》(Prentice-Hall 出版公司 1962 年英文版)，其中辑录德米特里·奇捷夫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主题》(1929)、卢卡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43)等重要篇章。康奈尔大学教授吉本(George Gibian, 1924—1999)翻译的《罪与罚》(诺顿公司 1964 年初版、1975 年再版)中，附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关于该作的书信、重要批评家的论述(包括斯特拉霍夫的《虚无主义者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新思想》、楚尔科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方法》、穆楚尔斯基的《〈罪与罚〉的五个部分》等经典文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谢杜罗

① 收录阿克梅主义、斯拉夫理论家阿克萨科夫，象征主义诗人巴尔蒙特、巴别尔等苏联不热衷的流派，也收录勃洛克、苏维埃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波格丹诺夫(1873-1928)、从象征主义转化为和苏维埃政权合作的勃留索夫(1873-1924)、巴巴耶夫斯基等苏联积极推崇的作家。作者曾任哈曼研究所所长(1974-1976、1980-1981)。

② Archie Brown, Michael Kaser & Gerald S. Smith (e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and the (former) Sovi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00-243.

(Vladimir Seduro)的《俄罗斯文学批评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46-1956》(1969)，则辑录了百余年来俄国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的经典文献。《今日苏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1975)汇集了苏联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观点，为认识俄罗斯文学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这些意味着，冷战时期因特殊机缘，重视来自俄国的基本文献、强调俄语基础的斯拉夫学传统得以光大，使准确把握苏联的文学及批评成为可能。

需要特别提到流亡和旅居欧美的俄侨知识分子进入当地斯拉夫学界、并参与英美俄罗斯文学译介和研究的问题。本来，英国的俄侨就有积极译介俄语文学作品和欧洲大陆俄罗斯文学研究成果的传统。如，沃盖的《俄罗斯长篇小说》及时被英译出版(1916)，正是得益于俄侨的工作。^①这种传统，在20世纪的四波俄国移民潮中得到了传承。侨民主体乃人文学术知识分子和作家，斯拉夫学界大门向其敞开，以图召唤更多的苏东知识分子投奔西方。而他们以其母语和对俄国有切实感知之优势，很容易就占据斯拉夫学界中的位置。内战时入白卫军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Дмитрий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1890-1937)，1921年流亡到伦敦。他在这里结识了创立利物浦大学俄语系、并访问过俄国多次的巴林(Maurice Baring, 1874-1945)。米尔斯基得以入职伦敦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并出版了再版率极高的《俄罗斯文学史》(1924)。格列勃·司徒卢威(Gleb Struve, 1898-1985)，曾任伦敦大学学院高级讲师、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教授，于1984年出版了他的力作《流亡中的俄罗斯文学》。著名小说家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2)先后任教于卫斯理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出色翻译了《叶夫盖尼·奥涅金》和《当代英雄》，出版了《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座》等。十月革命后就从基辅流亡到欧洲并在法国完成大学学业、二战后辗转来到美国的著名俄侨学者津科夫斯基(Serge Zenkovsky, 1907-1990)，任佛罗里达斯泰森大学教授和俄罗斯研究项目主管，出版过《俄罗斯文学文献指南》(1970)。上文提到的特拉斯，原是爱沙尼亚人，毕业于塔尔图大学古典语文系，该国并入苏联时移居美国。牛津大学史学教授奥波兰斯基(Dimitri

^① Carol Peaker, *Reading Revolution: Russian Emigrants and the Recep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England 1890-1905*, (unpublished D. Phil.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6).

Obolensky, 1918-2001), 本是德米特里·奥波兰斯基公爵(1882-1964)之子, 1919年在英国友人帮助下随家人旅居英国。后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任职于牛津大学, 致力于俄语和俄国史研究。1922年流亡到欧洲、1943年开始任职于美国萨拉劳伦斯学院的马克·斯罗尼姆(Marc Slonim, 1894-1976), 出版有《俄罗斯史诗: 从起源到托尔斯泰》(1950)、《从契诃夫到十月革命的俄罗斯文学, 1900-1917》(1962)、《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77) 等作品。20世纪70年代开始侨居美国的鲍里斯·加斯帕罗夫(Boris Gasparov, 1940-)和帕佩诺(Irina Paperno, 1952-), 在伯克利积极推动白银时代文学的研究。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大批这种知晓俄罗斯文学原委的俄侨学者进入斯拉夫学界, 卸下了苏联的意识形态枷锁, 又置身于欧美学术语境, 很容易在学界崭露头角, 促成英美斯拉夫学界培养出大批掌握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专才, 译介了大量的苏联重要文献。如莫斯科大学教授古杰(Николай Гудзий, 1887-1965)的《古俄罗斯文学史》(1938), 在冷战冰点期被英译出版(1949)。爱丁堡大学教授沃德(Dennis Ward)在《今日俄语: 系统与异常》(1965)中, 讨论了1950-1960年代俄语的语法和词汇变化情况, 帮助提升英美学界对俄语变化的敏感度。牛津大学教授奥蒂(Robert Auty, 1914-1978)与奥波兰斯基合作的《俄语和俄罗斯文学导论》(1977), 辨析俄语如何由斯拉夫民间口语、教会斯拉夫语和标准语混合而成, 提出了“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 1820-1917”的概念。他们还讨论了后来才被俄国重视的索洛维约夫、巴尔蒙特、索洛古勃、安德烈耶夫、勃留索夫等象征主义作家, 并分析了苏联时代文学的意识形态化与俄语变动之关系。^①

正因为如此, 对于苏联为使各加盟共和国认同俄罗斯文化而加大对古罗斯文学研究、建构古罗斯文学乃是斯拉夫文学世界中最重要文学的历史景观, 英美斯拉夫学界对此不但不回避、挑战、批判, 而是积极追踪这种学术动态, 译介了包括利哈乔夫考释的《伊戈尔王子远征记》、《伟大的遗产: 古罗斯的经典文学》(1981)等在内的极具史料价值的学术成果。并把它们纳入到欧洲斯拉夫学的框架下重新查考, 由此产生了一大批斯拉夫学成果。如美

^① Robert Auty & Dmimitri Obolensky (ed.), *An Introduction to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et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63-173.

国第一位斯拉夫文学教授维纳(Leo Wiener, 1862-1939)在哈佛大学教职上编纂的《从古至今的俄罗斯文学作品选》(1902-1903),在冷战时代继续被欧美各大学广泛采用作教材(1949年再版)。上文提及的米尔斯基公爵在伦敦大学工作期间所著述的英文著作《俄罗斯文学史:自远古至陀思妥耶夫斯基(1881)》(1927),成为冷战时代被英美重版最多的俄罗斯文学史之作(与其1925年出版的英文版《现代俄罗斯文学》合集)。因为它不同于苏联所建构的18世纪之前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史》涉及了基辅罗斯时代的编年史、13-14世纪的历史文学、莫斯科罗斯文学、诺夫哥罗德公国文学、普斯科夫公国文学、特维尔公国文学、斯摩棱斯克公国文学、16-17世纪统一的俄罗斯文学、翻译西方叙述体文学等经典之作,让英语读者看到了现代俄罗斯文学之前的古罗斯文学原貌。与此同时,运用欧洲普遍的文学范式,重建古俄罗斯文学史,出现了琼斯(Susan Wilbur Jones)的《早期俄罗斯文学史》(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49年)、牛津大学芬内尔(John Fennell, 1918-1992)和斯托克斯(Antony Stokes)的《早期俄罗斯文学》(伯克利1974年)、斯泽夫斯基的《俄罗斯文学史:从11世纪到巴洛克时代末期》、爱德华·布朗的《17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和《18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安波尔1980年)、德拉格(C.L. Drage)和维克瑞(W.N. Vickery)的《十八世纪俄罗斯文学文选》(牛津1969)等力作。这些作品以欧洲中世纪文学史观审视古罗斯文学史,对融历史、基督教和文学叙述为一体的古罗斯文献,进行了不同于苏俄的诠释。这种用启蒙主义视野观照西化最初百年俄罗斯文学的研究成果,远比苏俄本土彰显(俄)罗斯中心论之作更有世界影响力。其中,《十八世纪俄罗斯文学文选》用英语注释18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辑录谢缅·波洛茨基、谢里维斯特·梅德韦杰夫、费奥凡·博罗科波维奇等31位作者的68篇作品,相较于柯克列夫(А. Кокорев)主编的统编教材《18世纪俄罗斯文学选读》(1965),更显示出英美选编者对俄罗斯文学理解的独到性——选材比苏联同类著作更全面,在诠释方面凸显苏联文学的历史根源。相应地,英美许多著名学府斯拉夫语文系,普遍开设早期(俄)罗斯文学课程。

进而,对苏联热衷于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阐释十月革命前就已确定的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系列经典作家,英美学界则不回避、不批判,而是

及时从基础文献上把握这一态势，再按斯拉夫学框架还原这些经典的原初形态和文学史价值，从而发掘他们所具有的不同于苏联所理解的意义和特点。

自19世纪末以降，普希金一直为斯拉夫学界所注重。在普希金去世百年之际(1937)，《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报》六月号，发表了亚尔莫林斯基的长文“英语中的亚历山大·普希金：普希金作品及关于普希金的著作，1799-1837-1937”，其中辑录了百余种文献。英美学界并没有因苏联把普希金苏俄化就不再重视普希金，而是把对普希金的理解与苏联将其意识形态化的阐释分离开来。英美学界系统地翻译俄国评论普希金的经典文献，诸如普罗菲翻译勃洛克《论诗人的使命》(1976)，休谟斯基(A. Humesky)翻译别雷《论普希金》(1975)，伯班克(John Burbank)翻译雅克布森《普希金及其被塑造的神话》(1975)，理查兹(D.J. Richards)和科克雷尔(C.R. Cockrell)主编《俄国评论普希金文集》(1976)等。尤其是后来成为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的霍伊辛顿(Sona Hoisington)，他在耶鲁大学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对〈叶夫盖尼·奥涅金〉的早期批评》(1971)。在此基础上，他翻译和编纂了《俄国关于〈叶夫盖尼·奥涅金〉评论集》(1988)。诸如此类的俄语普希金评论经典篇目被英译刊行，使冷战时代的英美人能发现普希金远不只是苏联所说的政治诗人(苏联官方多次掀起全苏性的普希金热潮)。与此同时，重新翻译普希金所有重要作品，诸如杜金彤(Natalie Duddington, 1886-)翻译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1958)，巴伯尔(Phillip L. Barbour)翻译剧作《鲍里斯·戈东诺夫》(1953)，托马斯(D. Thomas)翻译叙事长诗《青铜骑士》(1982)，桑普森(Earl Sampson)翻译《普加乔夫暴动史》(1983)，艾特金(G. Aitken)和伯登(D. Budgen)翻译《别尔金小说集》(1983)等等。尤其是《叶夫盖尼·奥涅金》，甚至出现了五个英文译本，即凯登(M. Kayden)译(1964)、多伊奇(Babette Deutsch)译(1965)、纳博科夫译(1975)、约翰斯通(Charles Johnston)译(1978)和阿恩特(Walter Arndt)译(1981)等。其中，纳博科夫译本最为学界称道，因为译者作为俄侨文学家，有极好的俄语功夫和俄罗斯诗歌修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拉伦斯·布朗(Clarence Brown, 1929-)在其文章“纳博科夫的普希金和纳博科夫的纳博科夫”(《威斯康星大学比较文学研究》1967年)中指出，“他(纳博科夫)对普希金的理解融入了不同于苏联的独特性。”爱德华·

布朗的《纳博科夫和普希金：对新译本〈叶夫盖尼·奥涅金〉的评注》(1975)，则盛赞其不仅具有和普希金原作相当的审美价值(译本极为传神地传达了原作)，而且增添了原作所没有的学术价值(注释篇幅超出了原作)。冷战时代出版的多种《普希金文集》，都收录了纳博科夫的这个译本。如，纽约“Bollingen”基金资助的四卷本《普希金文集》(1964)、伦敦 Routledge & Keel Paul 出版社的四卷本《普希金文集》(1964年初版、1975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再版)，皆然。有这样扎实的文献和翻译基础，英美学者就能切实还原普希金的俄罗斯民族认同及其诗学表达问题，并论述普希金创作及其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等具体问题。这些作品有：诺丁汉大学教授拉夫林(Janko Lavrin, 1887-1986)的《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学》(1947)、波蒙特(C. Beaumont)的《普希金及其对俄罗斯芭蕾舞的影响》(1947)、巴勒特(Glynn Barratt)的《十八世纪非经典对巴拉丁斯基和普希金的影响》(1969)和《普希金的美国》(1969)、里德(Roberta Reeder)在威斯康辛大学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普希金抒情诗的古典历史》(1970)、安尼肯(A. Anikine)的《普希金对经济思想史的贡献》(1979)、基尔大学教授安德鲁(Joe Andrew, 1948-)的《在俄罗斯现实主义兴起期间普希金的创作和社会》(1980)、福森菲尔德(Nancy Fchsenfeld)的《普希金在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国的散文体创作》(1980)、现任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勒(Stephanie Sandler)在耶鲁大学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普希金诗歌中的历史问题》(1981)、加尼特(Sherman Wesley Garnett)在密西根大学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为诗学问题的普希金政治观》(1982)、莱维特(Marcus Levitt)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1880年普希金纪念与俄国的文学政治学》(1984年，1989年出版)等。

相应地，英美斯拉夫学界还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普希金研究专家：除纳博科夫外，北卡罗来纳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德布勒泽尼(Paul Debreczeny, 1932-2008)也值得称道。他重译了《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等作品，主编《普希金作品集》(1982)和《普希金叙事类作品全集》(1990)等。其《另类普希金：普希金叙述类作品》(1983)认为，“把普希金视为叙事体作品这种艺术的开创者，不仅仅指他肇始了叙事类作品的细节描写，而且他还运用了诗歌创作才会有的各种巨大潜能，即激情在小说创作中的作用。走到这一

步是一个逐渐且艰难的过程，经历了多次的失败。”^①以如此视野研究《别尔金小说集》、《罗斯拉夫列夫》和《杜勃洛夫斯基》、《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等，揭示出普希金在叙事作品的美学范式上，有异于欧洲小说的特点，即把欧洲的审美范式变成了适用于俄国的审美形式。更重要的是，下文要论及的《文学与民族认同：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论集》（1970），是冷战时代触及普希金民族认同问题的力作。《文学的社会功能：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化》（1997），是德布勒泽尼在后冷战时代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普希金著作的代表。渥太华大学教授卡莱顿（J. Douglas Clayton）同样也是业绩非凡的普希金学家：在伊利诺伊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普希金作品中的反讽和巴洛克之批评研究》（1971）后，相继发表了《〈叶夫盖尼·奥涅金〉的题词》（1971）、《普希金诗歌中的乌克兰观：翻译问题》（1978）、《普希金、浮士德和魔鬼》（1980）、《苏联关于〈叶夫盖尼·奥涅金〉评论的新趋势》（1980）、《〈叶夫盖尼·奥涅金〉：时空的象征主义》（1981）、《普希金和纳博科夫的诗歌翻译之理论与实践》（1983）、《女性主义者对〈叶夫盖尼·奥涅金〉的阅读》（1987）、《探寻〈叶夫盖尼·奥涅金〉情节》（1988）等许多重要论文。其著作《冰与火：普希金〈叶夫盖尼·奥涅金〉》（1985），梳理了俄罗斯思想史上关于该著作的重要观点，包括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皮萨列夫之类的现实主义批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批评和象征主义批评、十月革命后的社会话语批评，斯大林时代及其后的意识形态批评（也包括维诺格拉多夫的语言学批评）等。在此基础上，卡莱顿具体分析该作的诗学结构、塔基扬娜和奥涅金形象塑造问题等，揭示这部诗体小说在结构和节律方面如何打破了俄语诗歌固化的韵律，呈现出抒情诗本质。^②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展示普希金作为英美译介和讨论得最多的俄罗斯文学家的文学业绩，不是在情感上赞赏他作为俄罗斯民族诗人，而是冷静地研究普希金。不同于苏联的普希金学，这些作品重新诠释了普希金的意义，揭示出苏联所掩饰的普希金的复杂性，为后冷战时代牛津大学教授卡恩（Andrew Ken）出版《剑桥普希金指南》（2008）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Paul Debreczeny, *The Other Pushkin, A Study of Alexander Pushkin's Prose Fi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4.

② J.Douglas Clayton, *Ice and Flame: A. Pushkin's Eugene Onegi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5.

有意味的是，重视苏联所热衷的普希金，并对其有超越性的理解，这在英美绝不是个案：对于苏联大力张扬的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经典作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英美斯拉夫学界各有高度关注，并且同样是直面苏联人的解读，在阐释方法和力度方面超越苏联。^①说“超越”，有其根据：哈佛大学教授托德(William Mills Todd III)教授主编的《俄罗斯帝国时代的文学与社会，1800-1914》(1978)，是此前三年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全美俄罗斯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各位作者不囿于已成为传统批评模式的新批评、也不限于正在强劲起来的结构主义思潮，而是对俄国文学进行社会学考察，发现作家和读者、文学批评和文学社会影响力、经典作家作品的叙述策略和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极为密切。^②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岁月，德布勒泽尼等主编的《文学与民族认同：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1964)，却辑录了斯拉夫派思想家基列耶夫斯基(Иван Киреевский, 1806-1958)的《论普希金诗歌的某些特质》(1831)、莫斯科大学教授谢维廖夫(Степан Севырѣв, 1806-1864)的《果戈理的叙事长诗〈乞奇科夫历险记》

① 英美对托尔斯泰译介和研究不遗余力，见 G.M. Terry, “Tostoi Studies in Great Britain: A Bibliographical Survey”, in V.V. Jones (ed.), *New Essays on Tosto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J. & A.I. Wreath, *Leo Tostoi: Bibliography of Criticism in English from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 through 1979*, CASS 14 (1980). Leo Wiener 翻译和主编 24 卷本《托尔斯泰伯爵文集》(伦敦 Dent & Sons, Ltd, 1905)，1968 年纽约 AMS 出版社再版。

关于英美对屠格涅夫的译介和研究，参见 R.& David Yachnin, *Turgenev in English. A Checklist*, NY: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1962; Allan J. & Barbara T. Urbanic (ed.), *Ivan Turgenev: A Bibliography of Criticism in English, 1960-1983*, CASS 17, 1983.

英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介和研究更是汗牛充栋，参见 Maurice & Christopher Beebe, “Dostoevsky in English: a Selected Checklist of Criticism and Translations”, *Modern Fiction Studies*, 4 (1958); Floyd E. Eddelman, *Dostoevsky and The Brothers Karamazov in English, 1879-1959*, Ph.D. diss, Arkansas, 1961.

对经典作家研究，论题、方法和立论丰富多彩，同苏俄大相径庭。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兰克-拉斐里埃(Daniel Rancour-Laferriere)主编的《俄罗斯文学与心理分析》(1989)，汇集弗洛伊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母》、罗森塔尔(Richard Rosenthal)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满怀主观机制的经验与〈双重人格〉中的身份盗窃》、达尔顿(Elizabet Dalton)的《梅西金与罗戈津》(分析《白痴》中的两位主人公心理)、麦克林(Hugh Mclean)的《果戈理的爱情终结：对〈米尔格拉德〉的阐释》(分析果戈理文学创作很少涉及情爱问题与其一生远离爱情婚姻之关系问题)等，显示出不同于苏联学者阐发性论述的文学事实研究特征。

② William Todd III (ed.),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Imperial Russia, 1800-191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或死魂灵》(1842)、根基派文学批评家格里格列夫(Аполлон Григорьев, 1822-1864)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1861)、保守主义思想家斯特拉霍夫(Николай Страхов, 1828-1896)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索洛维约夫(1854-1900)的《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1882)等经典篇目^①, 显示出主编认识到俄罗斯文学的国家认同问题, 实属难得。当然, 也有用西方文论诠释俄罗斯文学经典的, 如舒华兹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结构》(1982)依据结构主义, 论述该作品情节结构之高超、语言之美妙、人性描写之细腻、意象设置之复杂等, 重建该作品作为世界小说经典之魅力, 颠覆了苏联视之为托尔斯泰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论。^②

意味深长的是, 对苏联官方积极推崇的苏维埃文学史及与其相关的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中的“革命”, 英美斯拉夫学界也完全不回避, 而是: 1) 翻译相关的重要文献, 如《列宁论文学》和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被英译(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1971 年)。2) 谨慎思考苏联文学的意识形态, 爱德华·布朗的《俄罗斯文学中的无产阶级趣事, 1928-1932 年》(1953), 认真梳理“拉普”及其文学政治功利主义的复杂影响。1951 年开始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俄侨学者扎瓦利辛(Vyacheslav Zavalishin, 1915-1995)的《早期苏维埃作家》(1958), 描述了白银时代的重要作家在十月革命后是怎样面对从帝俄向苏维埃过渡的问题。这部作品生动地论述了勃洛克、沃罗申、勃留索夫、别雷、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高尔基等人创作的变化, 扎米亚京、什克洛夫斯基、巴别尔、皮里利亚克等的艰难探索, 未来主义、农民诗派、无产阶级文化等迅速异军突起。该作品认识到新经济政策使俄罗斯文学复杂化, 如在 1925-1929 年产生了新现实主义作家格拉特科夫、新浪漫主义作家奥列沙和列昂诺夫、讽刺文学家布尔加科夫和左琴科等。3) 重视布尔什维克推崇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 翻译了波兰著名文学家沃罗斯泽尔斯基(Wiktor Woroszylski, 1927-1996)《马雅可夫斯基的一生》(1970)。该作认为, 这位无产阶级诗人是因自身的激情, 而使创作历程在苏维埃环境下

① Paul Debreczeny & Jesse Zeldin (ed.),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Critical Essay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4.

② Sydney Schultze, *The Structure of Anna Karenina*, Ann Arbor: Ardis, 1982.

变得动荡不定，充满着诸多戏剧性，使读者徜徉于其诗篇和生活阅历之间。^①而且，随着苏联社会的延伸，苏联文学发生相应的变化，牛津大学学者辛格雷(Ronald Hingley)的《俄罗斯作家和苏维埃社会，1917-1978》(1979)，论述了苏维埃政权所建构的社会对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影响问题。如，引发世界局势紧张、促成苏联内部分裂、出现移民潮等情势，导致这一时期苏联的诗歌、小说、戏剧和回忆录、文学批评等迥然异于欧洲。两年后，耶鲁大学教授克拉克(Katerina Clark)推出力作《苏联小说：历史即仪式》(1981)，分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如何改变了俄罗斯文学的进程，认为“无论这种文学之发展和成为主流是多么的人为，就文学体系本质而言，它的确不是自然生成的，但某些方面与此前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些本质现象和发展动力相关联，其许多因素和19世纪文学是一致的。”^②克拉克正是以这样的视野研究苏联时代作家队伍的分化、斯大林的宏大叙事影响力、人物形象塑造方式的变化、解冻思潮之后文学状况之变等。辛格雷持续关注苏联的主流文学问题，他的《使夜莺发烧：革命中的俄罗斯诗歌》(1982)，查考了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发展与“革命”之关系，包括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人在十月革命、内战、斯大林文化革命之不同语境下的创作。辛格雷认为，“革命”成为他们文学活动的重要动力，“革命”也使这些文学家的命运、文学之路发生转折。^③

更为重要的是，英美斯拉夫学界还特别在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实践问题，先后推出多部论述相当深刻的作品。在解冻思潮之后，苏联兴起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潮，马修森(Rufus W. Mathewson)《俄罗斯文学中的正面人物或积极英雄》(1958)却冷静讨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之历史渊源问题，包括别林斯基所声称的“我的英雄就是毁灭者”、杜勃罗留波

① 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研究，伦敦大学学院教授 Robin Aizlewood 《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韵律形式和意义》(1989)据诗人名作《怎样写诗》(1926)所提理论，论《穿裤子的云》(1914-1915)、《笛子》(1915)、《人》(1916-1917)、《我爱》(1922)、《关于这个》(1923)等诗篇格律，在诗学层面论述诗人的创作特点。

② Katerina Clark, *The Soviet Novel History as Ritua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251.

③ Ronald Hingley, *Nightingale Fever: Russian Poets in Revolution*, London: George Weidenfeld & Nicolson Lim., 1982, pp.6-7.

夫的“英雄是要超越多余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英雄是社会中流砥柱”等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把自然形成的激进主义思潮制度化，并压抑了历史上对正面人物形象的复杂认知，如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珂德》的演讲，就表明所谓“英雄”不是一概而论的。但解冻思潮在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争论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物形象塑造的单一化格局。如，《日瓦戈医生》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所彰显的英雄形象。在苏联试图以开放体系缓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危机之际，苏塞克斯大学詹姆斯(C. Vaughan James)教授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起源与理论》(1973)，探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来源：即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纪念赫尔岑》(1912)、《论无产阶级文化》(1920)等论述，变成了苏联文学发展的指导思想，促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自此文学理论改变了文学活动和人民大众、政党之关系。随着开放体系讨论的深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尔莫拉耶夫(Herman Ermolaev)的《1917-1934年间苏联的文学诸种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谱系》(伯克利，1977)，多方阐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新时代历史依据。此后，他的《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及其艺术》(1982)进一步用经典作家的创作案例，补充说明这一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复杂性。更为重要的是，霍斯金的《超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来的苏联小说》(1980)，重新追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来源，结合解冻思潮之后的苏联文学，论述《日瓦戈医生》和《伊凡·杰尼索维奇一天》等作品在实践上颠覆了这种理论体系，以及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舒克申、特里丰诺夫等的创作和这一理论之间的各种矛盾。当然，罗宾(Regine Robin, 1939-)这位出生于巴黎的犹太-波兰裔学者、1982年以来担任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种不可能的美学》一书(1987年法文版、1992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最具轰动效应。该书论述第一次作协代表大会如何建构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经验是其基础，苏联一元化声音是其形成关键。这种观点远比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的《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8)冷静。这些著述既指出该理论的缺陷，

又说明其俄罗斯文化史根据。后冷战时代公认的俄侨学者(现任谢菲尔德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主任)杜勃联科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2009),是在这些论述基础上,分析这一话语系统及其效能的代表性作品。

英美斯拉夫学界也重视被苏联官方推崇的所谓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家和批评家、民粹主义作家、无政府主义文学家等,搜集苏俄编纂的这类文献,如:1920年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推出的15卷本《赫尔岑文集》、1954年科学院出版社推出的30卷本《赫尔岑全集》、国家文学艺术出版推出的9卷本《赫尔岑文集》等。“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赫尔岑《论社会主义文选》(包括1843-1844年间日记、在法国和意大利给友人的书信、《来自彼岸》(1849)、《俄国》、《俄罗斯人民和社会主义》、《神圣的所有权》、《旧世界与俄国》、《俄罗斯的农奴制》、《俄国的革命》、《俄罗斯的德国人和德国的俄罗斯人》、《俄国和波兰》、《青年人与俄国》等)。这些作品在英美各著名大学图书馆被悉数搜集。同时,还翻译了相关文献,如马特洛(Ralph E. Matlaw)翻译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批评文选》(1976)。进而,严肃阐释这种激进主义思想史遗产,如伯克利教授马利亚(Martin Malia, 1924-2004)的《亚历山大·赫尔岑及俄罗斯社会主义之诞生,1812-1855》(1961),论述了赫尔岑思想及其对于苏联的意义。伦敦大学副教授大卫·朗(David Marshall Lang)的《第一位俄国激进主义者:拉吉舍夫》(1959),建构了激进批评俄国贵族庄园制度的文学思想家拉吉舍夫(Александр Радищев, 1749-1802)的形象,分析了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的激进主义思想及其后来在俄国不断发酵的历史。剑桥大学学者凯莉(Aileen Kelly)《巴枯宁:乌托邦的政治学和心理学》(1982年初版、1987年再版),在建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形象的过程中,深入论述了乌托邦思想在俄国的表现。英美学术界直面这类俄苏文学思想家,为其在后冷战时代的进步奠定了基础。如凯莉此后出版了《面向彼岸:在必要性与可能性之间的俄罗斯思想家》(1998)、《来自对岸的视角:赫尔岑、契诃夫和巴赫金散论》(1999)等重新反思俄罗斯激进主义思想家的力作。

可见,冷战时代英美斯拉夫学界远不只是热心于被苏联官方忽视或排斥的文学,同样关注苏联热心推崇的经典作家、现实主义文学、革命文学、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等，甚至包括浪漫主义文学问题。如在雷顿(Lauren Gray Leighton)主编和翻译《俄罗斯浪漫主义文选》(1987)之前，贝尔法斯特王后大学学者里德(Robert Reid)就主编了《俄罗斯浪漫主义问题》(1986)。该作品在还原俄国文学界如何建构浪漫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浪漫主义如何促成普希金把不可靠性(fallibility)和完美性(perfection)融为一体，并认为，十二月党人诗歌、果戈理小说、莱蒙托夫和奥托耶夫斯基诗歌等，具有其他写实主义作家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且，这些研究还有俄罗斯思想史研究的基础，如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奥福德(Derek Offord)的《早期俄国自由主义者肖像：格拉诺夫斯基、波特金、安宁科夫、德鲁日宁和卡维林之思想的研究》(1985)、《1880年代俄罗斯革命运动》(1986)、他和谢菲尔德大学斯教授莱塞巴罗(W. Leatherbarrow)合作主编的《俄罗斯思想史纪实：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1987)等，分别揭示出苏联文学批评的文化史根据。正因为重视原初文献，外加有斯拉夫学框架，同一个研究对象，英美的诠释不同于苏联的论述，重要著作远比苏联的深刻。如牛津大学教授库克(Raymond Cooke)的《弗拉基米尔·赫列勃尼科夫：批评研究》(1987)，从诗歌技术的角度研究未来主义，相较于苏联大量的大多从多变的意识形态层面讨论未来主义之作，更有学术价值。西蒙斯教授的《俄国小说与苏联意识形态：费定、列昂诺夫、肖洛霍夫导论》(1972)，特别注意到了苏联著名理论家弗里德列杰尔(Г.М. Фридледер)的《俄罗斯现实主义诗学：19世纪俄罗斯文学概论》(1971)的价值，他发现现实主义作为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在苏联文学发展中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冲突，从而揭示出苏联诸多经典小说家和官方意识形态相矛盾的原因。

这种积极面对苏联官方认可的文学及理论的态度，与欧洲大陆相呼应。例如：波焦利(Penato Poggioli)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1951)，依托波兰史学家布鲁克纳(Aleksander Bruckner)的德文版《俄国文学史》(1922)和米尔斯基《俄罗斯文学史》(1925)等经典著作，论述了19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如何受西方写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虽少了普希金的抒情性，但增添了许多有思想性的细节描写，如《死魂灵》就有《堂吉诃德》的观念性写实因素，充满着想象力；主张“我们全部是来自果戈理《外套》”的陀思妥耶

夫斯基，也深受这种写实主义影响，其小说充满着心理分析，真切显示出具体情境中的人物情感状态，由此不同于福楼拜和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描写。托尔斯泰、冈察洛夫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都注重有情感渗透的细节描写。这甚至促使晚年托尔斯泰激烈反对非道德化和拒绝细节描写的象征主义，致力于描写“犹豫而真实的细节”。^①在此基础上，波焦利的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或现实和神话》（1952），对比了《作家日记》所论述的文学主张与其创作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讨论其作为“残酷的天才”所表现出的“更高级现实主义”，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现代性在俄国展开过程中所生成的复杂性。^②同样，普罗克特（Thelwall Proctor）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流派》（1969），论述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等批评家，如何运用各自的现实主义概念来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多年后，在此基础上，安德鲁教授在其《俄国现实主义兴起时的作家和社会》（1980）中论述道，“屠格涅夫只是第一位得到欧洲承认的外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以及稍后的契诃夫，在19世纪末的欧洲大陆和英伦就变得更有名，至今仍然是主流作家。很显然，俄罗斯文学并非起源于这些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但若没有普希金、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等19世纪名家之创作，以及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俄国是不可能获得这些现实主义文学成就的。”^③

热衷于出版和研究被苏联禁止的俄罗斯文学

实际上，冷战时期英美对苏联文学译介最具效力的，当属大规模出版和研究被苏联官方所查禁的文学、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所批判的文学，包括不同时期的俄侨文学、人在苏联而作品在国外出版的境外俄罗斯文学、地下文学、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被限制的现实主义和巴赫金等。这些

① Renato Poggioli, “The Tradition of Russian Realism”,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o.3, 1951.

② Renato Poggioli, “Dostoevski, or Reality, and Myth”, in *The Kenyon Review*, No.1, 1952.

③ Joe Andrew, *Writers and Society during the Rise of Russian Realis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0, pp.ix-x.

作品当时就在西方产生了超常的影响力，并在后冷战时代，变成常识，成为俄国人文学术的主要论题，文学史家则据此重建俄罗斯文学史。

二战期间随家人流亡到东欧、1950年开始侨居美国并任职于美国之音（主持“书籍与人”栏目）的法斯捷尔（Людмила А. Фостер，1931-），其编纂的大型两卷本《俄罗斯侨民文学文献目录：1918-1968》（1970），按作家姓名字母顺序收录了超过1100位左右作家的5000种作品。其中包括曾在俄国出版却被苏俄当局查禁、在境外继续再版的作品（以白银时代文学为主，也包括苏联禁止阅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经典作家的若干作品），流亡到国外的作家用俄语出版的文学作品，在世的苏联作家不能在苏联出版、只能在国外问世的作品等。^①如此庞大的境外俄罗斯文学，首先是在20世纪俄国出现过的四次移民潮的基础上产生的：即，十月革命后大批知识分子和犹太人逃离或被驱逐出苏俄、解冻思潮之后兴起第二批移民潮（也以人文知识分子和犹太人为主）、20世纪70年代冷战缓和之际第三波移民潮（作家也很多）、20世纪80年代后期规模更大和人员构成更复杂的移民潮等。向俄侨开放的英美和欧洲大陆斯拉夫学界，则持续积极“发掘”境外俄罗斯文学：早在1928年，在斯拉夫学界的力促下，南斯拉夫有关机构组织了国际学术会议：“一种还是两种俄罗斯文学”（One or Two Russian Literatures），出资邀请十月革命后流亡到欧洲的俄罗斯文学家赴会，讨论他们的文学创作及其对俄国文学的影响问题。近30年后的冷战冰点期，格列勃·司徒卢威发表《流亡中的俄罗斯文学：对境外俄语文学的历史观察》（1956）。受其启发，俄侨文学史得以重建，认为俄侨文学经历了形成期（1920-1924）、自觉期（1925-1939）和当代俄侨文学（二战和战后），涉及几代著名的俄侨诗人、小说家、批评家等。

再25年，即在冷战的又一个危机时刻，1978年2月13-15日，在日内瓦大学再度举行了“一种还是两种俄罗斯文学”国际研讨会，邀请欧洲斯拉夫学者讨论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出席者包括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的俄侨学者、巴黎十大教授叶菲姆·艾特金德（1929-）、1973年开始侨居法国

^① Ludmila A. Foster (comp.), *Bibliography of Russian émigré Literature*, Boston: G. K. Hall & Co., 1970.

并在索邦大学任教的西尼亚夫斯基(1925)等。三年后，巴黎大学尼瓦(Georges Nivat)教授编纂了会议论文集《一种还是两种俄罗斯文学》(Одна или два рус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1)。

1981年3月14-16日，因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冷战局势加剧，南加州大学出资邀请解冻思潮以来开始侨居欧美的俄罗斯文学家、英美学者，包括爱德华·布朗、杰明·布朗、卡尔·普罗菲及其妻子——著名的布尔加科夫专家普罗菲(Ellendea Proffer, 1944-)、稍后就出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教授的顿洛普(John B. Dunlop)、哈佛大学苏俄问题研究教授邓纳姆(Vera Dunham)等知名学者，以及媒体和听众约500人，讨论俄罗斯文学的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这次会议提出了影响力至今不减的“俄侨文学：第三浪潮”(the Third Wave)的概念。伯克利校区马提奇教授(Olga Matich)从历史视角讨论20世纪70年代俄侨文学，回溯第一代俄侨文学艺术家康定斯基和沙加尔、斯特拉文斯基和纳博科夫等为西方文学艺术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还认真理清了20世纪70年代俄侨文学家及其创作情况、命运，包括1972年流亡到美国的布罗茨基、1973年流亡到法国的西尼亚夫斯基(1925-)，1974年流亡到美国的索尔仁尼岑、亚历山大·加利林(1935-)、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纳乌姆·科尔亚文(1925)、维克多·涅克拉索夫、阿列克·谢茨维托科夫(1947-)、爱德华·利蒙诺夫(1943-)，1975年流亡到美国的弗拉基米尔·马拉姆金、萨沙·索科洛夫(1943-)、康斯坦丁·库兹明斯基、尤里·马穆列夫，1978年流亡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季诺维约夫、谢尔盖·多弗拉托夫(Сергей Довлатов, 1941-1990)，等等。身为索邦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的俄侨文学家西尼亚夫斯基发表报告《两种文学抑或一种文学》，分析苏联的文学分裂情况。俄侨文学家阿克肖诺夫、尤兹·阿列什科夫斯基、德米特里·博贝舍夫、尼古拉·纳博科夫、沃伊诺维奇(1932-)，与上述流亡作家一道就此展开圆桌会议讨论，普遍赞同“两种俄罗斯文学”的说法，并分别谈自己作为侨民作家的创作情况。会上，索尔仁

尼岑成为重点讨论的作家。^①这次会议，为七年后(1988)境外和境内的俄罗斯文学家坐在一起讨论俄国文学以及境内外俄罗斯文学走向合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时期流亡到国外的俄罗斯文学家，从第一代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布宁、什梅廖夫、列米佐夫等，连同阶段性在欧洲旅居的高尔基、茨维塔耶娃、别雷等(下文论及的白银时代文学合法化与之有关)，到第二、第三代俄侨作家，尤其是纳博科夫、布罗茨基，都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威斯康星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贝西(David Bethea)的《〈索伦托的照片〉：霍达谢维奇的记忆言说》(《斯拉夫评论》1980年第1期)，论述了诗人霍达谢维奇(В.Ходасевич, 1886-1939)在意大利的侨居生活和创作，唤起了英美对这位侨民生活的兴致。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帕秋慕斯(Temira Pachmuss)主编和翻译的英文版《俄国文化复兴：1939年之前侨民文学选集》(1981)，辑录了布宁、吉皮乌斯、列米佐夫、茨维塔耶娃、苔菲、什梅廖夫等40位俄侨作家的百余种作品，震动了西方知识界。斯拉夫学界对俄侨文学之热衷，导致“20世纪俄罗斯文学”概念替代“苏联文学”在1980年代成为现实。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苏联文学”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而四次移民潮酿成的蔚为壮观的俄侨俄罗斯文学，连同大量作者身在苏联、作品却在境外出版的文学，共同组成的境外俄罗斯文学，才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导性力量：从文学结构上瓦解了“苏联文学”的概念。

在热心“发现”、积极推介人在境内、作品在西方向世的境外俄罗斯文学的历程中，帕斯捷尔纳克极为引人瞩目。1957年，那本怀疑十月革命合法性之作《日瓦戈医生》在米兰 Feltrinell 出版。第二年，由曾任英国驻苏大使的牛津大学教授海沃德(Max Hayward, 1924-1979)和著名翻译家哈拉里(Manya Harai, 1905-1969)合作，将其译成英文(伦敦柯林斯和哈维尔出版社、纽约新美国图书馆出版社同时推出)，作家由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自此，冷战无论怎么升级，也没能影响英美对《日瓦戈医生》的热情。该英译本经常被再版。1965年，由著名导演里恩(David Lean, 1908-1991)执导，

^① 会议之后三年，伯克利教授 Olga Matich & Michael Heim 主编了论文集《第三浪潮：俄罗斯侨民文学》(Ann Arbor: Ardis, 1984)，收录斯拉夫学者论文(英文)15篇、苏侨作家报告(俄文)11篇。

米高梅电影公司更把它搬上了银幕。尤其是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力作，如奥波兰斯基的《〈日瓦戈医生〉中的诗篇》(1961)、达维克(Donald Davic)的《〈日瓦戈医生〉中的诗歌及评注》(1965)、韦恩(John Wain)的《〈日瓦戈医生〉的意义》(1968)、图穆尔(Joyce Stetson Toomre)的《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叙述结构》(1978)等。紧接着，是由对这部境外俄罗斯文学作品的热衷转化而来的对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的出版和研究的痴迷。冷战期间，英美先后出版了十余种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信选》、《诗集》、《回忆录》等。1961年，格列勃·司徒卢威和菲利波夫(B.A. Filippov)编辑了三卷本的《帕斯捷尔纳克文集》(阿尔迪斯)。学术研究著作更是层出不穷，且多是研究其创作中的具体问题。如普兰克(Dale Lewin Plank)的《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之结构，1912-1932》(1963)、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波莫思卡(Krystyna Pomorska, 1928-1986)的《帕斯捷尔纳克诗学主题及其多样性》(1971)、伯克利教授休斯(Olga Hughes)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学世界》(1974)、戴克(J. W. Dyck, 1918-1998)的《帕斯捷尔纳克和勃洛克的现实主义》(1967)、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雷什曼(Lazar Fleishman)的《帕斯捷尔纳克:1920年代》(1980)、马拉斯(Guy de Mallac)的《帕斯捷尔纳克其人生和艺术》(1981)等。而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教授的佩恩(Robert Payne)在《帕斯捷尔纳克的三个世界》(1961)中，论述帕斯捷尔纳克作为诗人、小说家和政治人物的三种情形，认为其作为政治人物是因为要避开政治局势而在晚年意外发生的。更有甚者，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翻译活动也受到关注，有关作品有戈德曼(Howard Allen Goldman)的《在帕斯捷尔纳克和俄国其他现代诗人笔下的莎士比亚之哈姆雷特》(1975)、安娜·摩西(Anna Kay Moses)的《帕斯捷尔纳克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1967)等。必须承认，这些冷战时代之作的学术价值至今仍不可低估。布里斯托尔大学吉福德(Henry Gifford, 1913-2003)教授的《帕斯捷尔纳克：批评研究》(1977)，论述了诸多论题，如帕斯捷尔纳克关于未来主义的看法、《生活，我的姐妹》与1917年之关系、在苏维埃政权下其诗歌创作主题及变异、他和新俄国小说变化的关系、《安全证书》和里尔克及马雅可夫斯基之关系、帕斯捷尔纳克格鲁吉亚之行后的思想变化、《日瓦戈医生》尤其是其中的25首抒情诗之文学意义等等，都是后苏联

俄国热衷讨论的话题。正因为如此，该作于1991、2003年再版，且2003年版中《作者要讲的话》明确说，“当代读者要参考以下著述：巴尔纳斯(Christopher Barnes)的《帕斯捷尔纳克：文学传记》(1989)、康沃尔(Neil Cornwall)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多视点看〈日瓦戈医生〉》(1986)、弗莱什曼的《帕斯捷尔纳克：诗人与政治》(1990)和《帕斯捷尔纳克与其时代》(1989)、利文斯通(Angela Livingstone)的《帕斯捷尔纳克论艺术和现实》(1985)、奥康纳(Katherine O’connor)的《帕斯捷尔纳克〈生活，我的姐妹〉》(1988)、叶夫盖尼·帕斯捷尔纳克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悲剧岁月：1930-60年代》(1990)。”^①实际上，冷战时代还出现了多种研究帕斯捷尔纳克之作，如普鲁瓦亚尔(Jacqueline de Proyart)的《帕斯捷尔纳克》(1964)、米奇尔斯(Cesare de Michelis)的《帕斯捷尔纳克》(1968)、欣利(Ronald Hingley)的《帕斯捷尔纳克传记》(1983)等，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从不同方面描述了这位伟大作家的丰富人生和文学创作之路。

其实，在整个冷战期间，就英美对苏联时代境外文学的关注度而言，索尔仁尼岑则更为瞩目。在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索尔仁尼岑就因《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名声大噪。由于冷战局势变化，苏共改变对其态度，令其处境逆转，许多作品被迫在境外出(再)版。英美和欧洲大陆斯拉夫学界则不断出版索尔仁尼岑的俄文和英文著作，并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

1963年，出现了多个《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英译本，如海沃德和欣利合作、纽约F.A. Praeger出版社推出的译本，帕克(Ralph Parker)翻译、伦敦Victor Gollancz出版公司推出的译本，布莱克斯托克(Paul Blackstock)、南卡罗来纳州大学出版社问世的译本，等等。

1964年，《为了善的事业》英译本问世，译者是大卫·弗洛伊德(David Floyd)和海沃德。这年在美国出版了亚历山大洛娃的《苏维埃文学史，1917-64：从高尔基到索尔仁尼岑》英译本。

1966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建人之一卢卡奇(Gyorgy Lukacs, 1885-1971)所著的、不同于苏联诠释的德文版《索尔仁尼岑与新现实主义》(1963)，被英译出版(该作品论述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所包含的丰富细节，

^① Henry Gifford, *Pasternak: A Critical Study*, London: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2003, p.ix.

认为其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不相匹配)。1970年,卢卡奇的《索尔仁尼岑传》(1969)英文版问世(伦敦 Merlin 出版公司)。

1968年,伦敦 The Bodley Head 出版社,推出《癌病楼》俄文打印稿的影印本,伦敦企鹅图书公司、纽约“哈珀和罗”公司(Harper & Row)出版惠特尼(Thomas P. Whitney, 1917-2007)的英译本。同年,惠特尼的英译本《第一圈》也获得了出版,1971年企鹅图书公司再版该译著。

1969年,美国“青年基督教协会”(YMCA)出版社推出俄文版《第一圈》;剧作《可爱少女和纯洁天真》被英译出版(由 Nicholas Bethell and David Burg 翻译)。

1970年,Посев出版社推出阿尔杰莫娃(A.H. Артемова)编辑的6卷本俄文版《索尔仁尼岑文集》(第1卷包括《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科里切托夫卡车站发生的事》等4篇短篇小说,第6卷是他写给苏共中央、苏联作协、《文学报》等鲜为人知的信函)。同年,纽约 Farrar, Straus & Giroux 出版了索尔仁尼岑的《小说集》。

1971年,伦敦 Flegon 出版社推出《1914年八月》俄文本(该社先后出版其作品6种之多)。

1972年,英国“鲍利海”公司(The Bodley Head)出版《1914年八月》(《红轮》系列)英文版,1984年美国再版(YMCA),1989年纽约(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又版。

1973年, YMCA 出版俄文版小说《古拉格群岛》,伦敦柯林斯和哈维尔出版社、纽约哈珀和罗出版社分别推出英文版(惠特尼翻译)。同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推出索尔仁尼岑剧作《内心之光》的英译本(译名《风中之烛光》,译者为波士顿大学教授阿姆斯(Keith Armes)。1989年,法文版问世。

1975年,顿诺普等人主编的《索尔仁尼岑批评文集和文献资料》出版。

1977年,伦敦 Hart-Davis, Macgibbon 出版社出版了伊万诺娃(Elena Ivanova)翻译的列舍托斯卡雅的《桑亚:我的丈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岑》。

1980-1981年间, YMCA 出版社出版了20卷本俄文版《索尔仁尼岑文集》:“恢复到新闻审查之前的完整文本,是作者信任和修改过的。有些是第一次问世”,第5卷为《古拉格群岛》。

……在大量译介索尔仁尼岑作品的同时，关于索尔仁尼岑的研究成果倍增，且不是“苏联学”框架下的阐释。波兰裔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强烈反苏反共的苏联学家拉培兹(Leopold Labedz, 1920-1993)，主编和翻译了《索尔仁尼岑文献档案》(1970)。其中辑录了作家本人关于其创作的诸多意见、赫鲁晓夫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对其的评价、苏联官方机构对其作品和获奖的反应等重要文献。^①1971年，罗斯伯格(Abraham Rothberg, 1922-2011)的《索尔仁尼岑的诸多重要小说》问世。该作品分析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叙述过程、《艰难任务》的主人公、《癌病楼》的肿瘤等。同年，波莫思卡发表了《俄国小说五十年：从帕斯捷尔纳克到索尔仁尼岑》(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将索尔仁尼岑纳入文学史加以考察。1972年，沃克(James Walker)的《索尔仁尼岑的“癌病楼”研究导论》(阿尔迪斯)、加列尔(Meyer Galler)的《苏联集中营的言说：幸存者的词汇》(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等，不是直接赞赏作家对苏联的批判，而是从诗学和语言学角度论述作家如何呈现苏联问题。1973年，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讲师穆迪(Christopher Moody)出版了《索尔仁尼岑》一书，根据苏联史料论述《为了善的事业》(1963)，认为它本是关于伦理的中篇小说，却被苏联视为反对苏共的政治之作。^②同年，鲁西德(Luellen Lucid)的《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家：梅勒、萨特、索尔仁尼岑的文学社会学研究》(1973)，从文学社会学价值的角度，论述索尔仁尼岑作为世界伟大作家的特性。尤其是，卢特曼(Roman Rutman)的《索尔仁尼岑与犹太人问题》(1974)根据《古拉格群岛》的相关情节，揭示出他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反犹思想及其诗学之影响。这种敏锐性，在索尔仁尼岑的《二百年同行，1795-1995》(2001-2002)中得到了验证。索尔仁尼岑在这部作品中，讨论了俄国历史和犹太人的复杂关系，回答了俄国历史何以动荡不安的“谁之罪”问题。加州大学圣克鲁兹校区比较文学教授鲍姆加腾(Murray Baumgarten)、历史学教授凯内兹(Peter Kenez, 1937-)和汤普逊(Bruce

① 曾出版《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1962)，完全不看好苏联共产主义建设；《苏联研究之状况》(1965)和《苏联学之用途与滥用》(1989)，主张苏联学发挥作用要注意策略。但和海沃德合作的《苏维埃俄国的文学与革命，1917-1962年》(牛津1963)却不直接用文学演绎苏联问题。

② Christopher J. Moody, *Solzhenitsyn*, Edinburgh: Oliver & Boyd, 1973, p.75.

Thompson)主编的《五花八门的反犹主义：历史、意识形态和话语》(2009)再次收录该作。而卡尔波维奇(Vera V. Carpovich)主编的《索尔仁尼岑俄英难词详解词典》(1976)，找出作家创作和思想中的诸多复杂关键词，并用英文解释，这对理解作家思想的复杂性和准确翻译其作品，至今仍有重大学术价值。这些译介和研究，得到欧洲大陆的积极呼应，法国学者克莱门特(Olivier Clement)的《索尔仁尼岑精神》(1974)就受英美影响，积极推崇其基督教和民主思想。

1978年，索尔仁尼岑在哈佛大学发表抨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和美国的演讲，西方苏联学界茫然不知所措，但斯拉夫学界则对他一如往常。斯拉夫学界发现，“批评”是他的常态。在被驱逐前三个月，他写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1973)，反对当局不特别重视中国的发展和苏中冲突对苏联之威胁，批评“苏联危机是学习西方的后果”，认为包括列宁倡导的世界革命和斯大林推行的苏联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等都是步西方后尘。这次哈佛大学演讲，他抨击当代西方的不足，对西方的人文主义则心向往之。由此，斯拉夫学界照常出版其作品、研究这位俄罗斯文学家：

1978年，纽约大学教授柯德雅克(Andrej Kodjak, 1926-)出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岑》(多次再版的莫泽的《剑桥俄罗斯文学》也重视该作)。同年，俄侨学者、作家安德烈耶夫之孙女奥尔加·卡莱尔(Olga Carlisle)出版《索尔仁尼岑与神秘的循环》。

1979年，YMCA出版社出版俄侨学者列昂托维奇(Виктор Леонтович)的《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历史》(初版于法兰克福1957年，德文版)，但添加了索尔仁尼岑所写的序言(2012年再版亦然)。

1980年，纽约哈珀和罗公司出版索尔仁尼岑的《生死攸关：关于俄国危及美国的错误迷思》(1984年再版)。次年，顿洛普(John Dunlop)、豪弗(Richard Haugh)、尼克尔森(Michael Nicholson)编撰《流亡中的索尔仁尼岑：评论及文献材料》(1985)，重新梳理英、美、法、西德、南斯拉夫等为何接受索尔仁尼岑，重新解读其《古拉格群岛》、《牛犊与橡树》、《第一圈》、《普鲁士之夜》等诗学结构，以及反思他在苏联时期的创作、作为苏联作家和俄侨作家在伦理思想上的一致性。1981年，哈珀和罗公司出版《橡树与小牛

续：苏联的文学生活片段》。斯坦福大学教师克拉索诺夫(Vladislav Krasnov, 1938-)出版《索尔仁尼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声部小说研究》(1980)，对比这两位作家的复调性表现，包括对阴暗地下世界之描写、对圣徒形象之塑造、对罪与罚之判断、对想象和象征之选择，对语言和文类之感受等。

1984年，以《文化即复调》(1978)而著称的柯蒂斯(James M. Curtis)，出版了影响力至今不减的《索尔仁尼岑对传统之想象》。而诺丁汉大学著名翻译家和俄罗斯文学研究家斯卡梅尔(Michael Scammell, 1937)，则出版了著名的《索尔仁尼岑传记》。

……就这样，索尔仁尼岑之地位被确定下来，并不断被夯实：享誉国际斯拉夫学界的特瑞斯的《俄罗斯文学手册》(1985)、莫泽尔的《剑桥俄罗斯文学》(1989)等，皆将其置于文学史的崇高地位；1982-1991年法国Fayard公司也出版了四卷本法文版《索尔仁尼岑文集》。这种把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岑塑造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做法，也延伸到了对布罗茨基的认知上。^①

其实，英美斯拉夫学界不仅仅是推崇性地译介和研究苏联官方查禁的境外俄罗斯文学、持不同政见者文学，同样热衷于译介和研究苏联官方所斥责的各种颓废堕落的文学。这些并非是直接回应和遏制苏联的意识形态行为，但效果却胜于冷战时代的苏联学。历史真相不断被揭示出来，为了对抗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情局所支持的“国际和平自由大会”和其他基金会耗巨资推崇现代主义文艺，是因为已对现代主义文艺进行了技术处理，使之看上去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审美。这样的文学观念“引发我们过分相信关于形式手段的本质和美学意义，不再把形式与复杂的意识形态关联起来，忽视作品和读者之关联、读者之于特定社会结构的关联”。由此，现代主义被视为是比其表现重要得多的文本，它成了一种社会现实、由观念转化而来的审美结构，广泛存在于文艺的生产、市场、出版的实践中，演化为20世纪

^① 从1967年的《悼邓恩及其他诗篇》(伦敦朗曼公司)开始，到1991年，阿尔迪斯、哈珀和罗等著名出版公司，推出其作品英文版八种、俄文版十种。他先后被耶鲁大学(1978)、牛津大学(1986)、埃塞克斯大学(1989)和达特茅斯学院(1989)等授予名誉博士。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克拉伦斯·布朗誉为“当今最优秀的俄语诗人”(《纽约书评》1980年9月17日)。在后苏联时代依然得到重视，如拉杰拉(Tatiana Paterra)就编纂了六卷本的《布罗茨基诗歌索引》(A Companion to the Poetry of Joseph Brodsky, 2002-2003)。

广泛共享的语言。^①这样的文化战略的意义在于：

直接遏制苏联的手段，无法阻挡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发达社会主义”之繁荣，而针对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学，也明显力不从心。但苏联视现代主义为“颓废主义”，并加以查禁的意识形态，则是一个漏洞，这给斯拉夫学界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性。苏联官方持续认为十月革命肇始了人类迈入共产主义的新纪元，和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相冲突的19-20世纪之交的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等文学，或被查禁，或被改造。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斯拉夫学界在重建俄罗斯文学史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大量整理出版研究这类文学遗产。许多出版公司，甚至苏联学杂志，也对此津津乐道，出现了：司徒卢威和菲利波夫主编的四卷本《古米廖夫文集》（1962-1968）、两卷本《阿赫玛托娃文集》（1965）、三卷本《曼德尔施塔姆文集》（1967）、哈佛大学教授马尔姆斯塔德（Malmstad）等合编的三卷本《库兹明诗集》（1977）、休斯教授与马尔姆斯塔德合编的三卷本《霍达谢维奇诗集》（1983、1990）、贝德福德（Charles Bedford）的《探索者梅列日科夫斯基》（1975）、罗森塔尔（Bernice Rosenthal）的《梅列日科夫斯基与白银时代：革命观念的发展》（1975）、克拉伦斯布朗的《曼德尔施塔姆》（1973）、韦斯特（James West）的《俄罗斯象征主义：伏亚契斯拉夫·伊凡诺夫和俄罗斯象征主义美学研究》（1972）、罗伯茨（Spencer E. Roberts）的《罗赞诺夫的四幅面孔》（1978）、以及莎霍夫斯卡娅的《影子》（1975）等。还有以丰富图像和生动文字纪念列米佐夫、布宁、玛利亚·茨维塔耶娃、扎米亚京、霍达谢维奇、阿达莫维奇、扎伊采夫、苔菲等作家的作品。^②这些文献和研究，展示了白银时代现代主义文学具有苏维埃文学所不可替代的普遍价值。更重要的是，象征主义文学家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1880-1934）得到了特别的关注。1967年，纽约约翰逊公司再版其《绿草地》。被誉为能和《逝水年华》、《尤利西斯》相媲美的《彼得堡》（1916）出现了两个译本——库诺斯（John Coumos）翻译（Grove出版社1959年）、马圭尔（Robert Maguire，1921-2005）和马尔姆斯塔德翻译（印第安

① Lawrence Rainey, *Institutions of Modernism: Literary Elites and Public Culture*, New Haven, CT, 1998, p.5.

② Зинаида Шаховская, *Отражения*. Paris: YMCA press, 1975.

纳大学出版社，1978年）。以研究俄罗斯象征主义著称的彼得森(Ronald Peterson)翻译了《别雷短篇小说全集》(阿尔迪斯，1979)；晦涩程度更甚的《交响曲》则由剑桥大学教授埃尔斯沃斯(John Elsworth)翻译并出版(1987)(2001、2009年，他分别翻译出版了《银鸽》和《彼得堡》，并因此获得“俄国奖”)。肯塔基大学著名教授亚内切克(Jerald Janeczek)翻译了别雷另一部难读的小说《柯基克莱塔耶夫》(1971)，出版了《论安德烈·别雷》(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78)。此外还有马尔姆斯塔德主编的《安德烈·别雷：象征主义精神》(1987)等。这些作品从现代主义具有高超的美学技巧和审美质量的角度，提升了别雷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尤其是，普罗菲夫夫妇主编的英文版《白银时代俄国文选》(1971)，辑录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当代俄罗斯文学衰落之若干原因和某些新趋势》、罗赞诺夫的《论象征主义和颓废主义》、巴尔蒙特的《象征主义诗歌的基本语汇》、伊凡诺夫的《思考象征主义》、曼德尔施塔姆的《阿克梅主义之晨》和《古米廖夫与阿克梅主义》等经典文献，以及勃洛克、别雷、勃留索夫、巴尔蒙特、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等杰出诗人的代表作，还有索罗古勃和别雷等人的重要小说片段，比较全面地呈现出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景观。《白银时代俄国文选》的出版，当即震惊了斯拉夫学界和英美文学界(1972-75年阿尔迪斯出版社连续四次再版)，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俄国人重新认识白银时代的蓝本之一。此后，布里斯托尔(Evelyn Bristol)的《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中的唯心主义和颓废》(《斯拉夫评论》1980年第2期)、彼得森的《俄罗斯象征主义史》(1991)等，进一步把现代主义文学的价值理论化和历史化。英美的学术努力得到欧洲斯拉夫学界的积极呼应：1972年西德慕尼黑出版了《梅列日科夫斯基选集》，法国学者艾特金德(Efim Etkind)、尼瓦、谢尔曼(Ilya Serman)、斯特拉达(Vittorio Strada)编纂了六卷本皇皇巨著“俄罗斯文学史”，其中近八百页的《俄罗斯文学史：20世纪的白银时代》(1987)，系统讨论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历程，包括19世纪末文学、象征主义作家、20世纪初宗教哲学的文学家、文学批评等。这部书成为后苏联俄国讨论白银时代文学的基础读物，很快就被译成俄文。这些翻译和研究共同显示出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已经融入欧洲，苏维埃政权中断了这一文学进程。

与之相关的是，被苏联官方禁止的其他非现实主义文学家，同样得到严肃正视。在这方面最显眼的，是作为“现实主义艺术联合体”代表的哈尔姆斯(Данни́л Хармс, 1905–1942) (其父亲作为“人民自由”组织著名作家，作品深得托尔斯泰喜爱)。这位诗人致力于戏谑性消解布尔什维克人为建构的苏维埃新人意识形态，1930年代末之后在文坛上销声匿迹。1970年，牛津大学斯拉夫研究专论(Oxford Slavic Papers)第3辑，刊发了哈尔姆斯起草的《现实主义艺术联合体宣言》。同一年，吉安比编辑翻译了《俄国失落了的荒诞文学：一种文学话语。哈尔姆斯和亚历山大·伏维坚斯基作品选》，辑录了《微型故事性作品》(30篇)、《老妇人》、《伊丽莎白巴姆》、《为儿童而写的若干故事》，以及伏维坚斯基的《基督在伊凡诺夫家》，附录《现实主义艺术联合体宣言》等。该书导言称，“1927–1935年间的俄国政治气候，不能容忍哈尔姆斯、另一位先锋派诗人伏维坚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Введенский, 1904–1941)及其同道所要做的所有事情。被要求推行‘社会订货’文学和其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20世纪30年代，黑色幽默作家哈尔姆斯和伏维坚斯基被出版社残酷拒绝。很快地，他们就转而出版儿童故事……这两位俄罗斯作家都有某些和西方超现实主义同样的特征。现实与非现实相混合，目的就是要制造冲突、混沌和幽默的强烈印象。哈尔姆斯曾宣称生活只有幽默和圣洁才是最有价值的，这一点也不奇怪。”^①此后，欧美兴起译介和研究哈尔姆斯的热潮。1974年，慕尼黑大学教授昆斯特曼(Heinrich Kunstmann)、哈佛大学教授谢特奇卡列夫(Vsevolod Setchkarev)主编的《斯拉夫专题》(Colloquium Slavicum)丛书第5辑、乃吉安比编辑并撰写导言的俄文版《哈尔姆斯选集》(影印当时苏联打字文本)出版。编者睿智的目光令人惊叹：收录了1926年全俄诗人联盟列宁格勒分部出版的《诗集·铁路上的偶然事件》、1927年列宁格勒诗人联盟出版的《文集·彼得亚什金的诗》，以及《普希金生活中的笑话》、《戏剧》、《交响曲第2乐章》、《图书笔记选》、《联系》、《寓言》等名篇，还有《现实主义艺术联合体宣言》等。编者说哈尔姆斯属于“天生的思想家”，对强加给他的痛苦特别敏感，使他的诗歌创

^① George Gibian (ed. & tran.), *Russia's Lost Literature of the Absurd: a Literary Discovery*,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3, 38.

作“拥有各种逻辑的和非逻辑的模式。他无拘无束地使用各种彼此之间无甚关联的情节，运用以震动、混乱和笑的方式所产生的碰撞，有其他作者加入其中的因素。他那些为儿童写作的诗歌和故事却转化成人的文学，而他那些为成人创作的故事性作品和剧作，则类似于儿童文学和精神病写作。”^①

1978-1988年，德国布莱梅K出版社出版了希伯来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梅伊拉赫(Михаил Мейлах)和艾里(Владимир Эрль)编辑的5卷本俄文版《哈尔姆斯文集》(同样是苏联时代打字版本)。

1991年，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康沃尔(Neil Cornwell)主编的《哈尔姆斯和荒诞诗学》，辑录了法国“现实主义艺术同盟”项目研究主持人、日内瓦大学教授雅克(Jean-Philippe Jaccard)的《俄国和欧洲荒诞文学语境下的哈尔姆斯》、科比学院阿内莫伊(Anthony Anemone)的《哈尔姆斯的反世界：论荒诞的意义》、伦敦大学教授艾兹列伍德(Robin Aizlewood)的《对哈尔姆斯〈偶然〉的一种解释》、科勃林斯基(Aleksandr Kobrinsky)的《哈尔姆斯小说的某些诗学特征》、印第安纳大学佩尔琳娜(Nina Perlina)的《哈尔姆斯的诗学体系：文本、语境和文本之间关系》、尼古拉斯卡娅(Татьяна Никольская)的《现实主义艺术同盟和生活的戏剧化》、以及苏塞克斯大学教授米尔纳格兰德(Robin Milner-Gulland)的《超越转折点》等。^②

……这些学术贡献，持续引领着斯拉夫学界关于哈尔姆斯的认知。如1994年莫斯科出版的《哈尔姆斯作品选》，基本上没有超出英美学者的选本，只是增加了《为儿童而写的作品》。相应地，其他具有超现实主义特征的文学现象，如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得到英美斯拉夫学界的关注，也是自然而然的。

还必须看到，英美斯拉夫学在话语表述层面超越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的学术魅力：形式主义文论在冷战时期突然壮大起来，并持续产生影响力，就是这方面最好的案例。1910-1920年代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大学几名大学生人为创立的形式主义流派，本是因不满大学的文学教育遵从学院派主张——强调作品欣赏需要相应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知识，尝试从语言艺术的技术手段角

① Даниил Хармс, Избранное. Wurzburg: Jal-verlag, 1974, p.42.

② Neil Cornwell, *Daniil Kharms and the Poetics of the Absurd*, London: Macmillan, 1991.

度建构阅读文学一般模式，试图隔离文学表达层面的历史知识和文学审美功能的社会性诉求。在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前，这可以理解为青年人的大胆尝试，没有更多寓意。出生于彼得格勒的波兰犹太裔青年埃里希 (Victor Erlich, 1914-2008)，在德国进攻波兰之前，举家避开纳粹和克格勃的监视逃到纽约，参加美军去欧洲前线参战；复员后师从当年的形式主义运动领袖罗曼·雅克布逊 (Roman Jakobson)，1953 年获博士学位，并继续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 (1948-1961)，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推出《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1955) 一书。该书按编年史方法论述了俄国形式主义流派之兴起、成长历程、十月革命后遭到批判、在欧洲延续、1926-1930 年间出现危机直至解散。尤其是，系统介绍了形式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批评方法，包括文学与存在的关系、文学的意义、文体和结构、文学发展动力等理论问题。埃里希认为，相较于“苏联的文学批评之平庸和没有生机、教条化，回溯到挑战权威、愉快、敏锐的形式主义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虽然形式主义有各种不足和矛盾，但作为一个杰出流派的遗产，始终占据着现代文学批评思想史的制高点。”^①对此，捷克裔耶鲁大学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教授韦勒克 (1903-1995) 为该书作序，盛赞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研究贡献和该书的意义，预期它会对文学认知做出巨大贡献。有意味的是，韦勒克首先深受其影响，六年后 (1961) 出版的《文学批评概念》，确立了 20 世纪文学批评的六种主潮，即：马克思主义批评、心理学批评、语言学和文体学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神话学批评、由存在主义激起的新哲学批评等。从此以后，这一著作在西方文学批评界持续发酵：1964 年，西德慕尼黑推出德文版；1965 年著名的穆顿 (Mouton) 出版公司、1981 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先后推出英文版；1987 年，法兰克福再出德文版；1996 年，莫斯科推出俄文版。埃里希本人也于 1961 年成为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更重要的是，该著作促成形式主义在冷战时期成为显学：一直抵抗苏联对其故国影响的保加利亚裔法国学者托多罗夫 (Tzvetan Todorov, 1939-)，在埃里希的基础上选编和翻译了《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文本》(1965 年。雅克布逊为文选作序——《诗学的探

^① Victor Erlich,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Doctrine*,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86.

索》), 提供了俄罗斯形式主义诸多最重要的文本, 使西方人文学界直接触摸到形式主义的原貌, 进一步看清了形式主义在表述层面超越意识形态的新奇, 刺激结构主义方兴未艾起来。托多罗夫本人也深受形式主义影响: 其《散文诗学》(1971)、《诗学导论》(1973)、《幻想的: 文学种类的结构方法》(1975)、《文学及其各种理论: 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个人看法》(1989)等, 对此有深刻反映。此后, 文学批评界兴起选编和翻译俄国形式主义文本的风潮, 诸如内布拉斯加大学英文系教授莱蒙(Lee T. Lemon)与里斯(Marion J. Reis)选编的《俄国形式批评: 四篇论文》(1965)、后任哈佛大学教授的斯特里德尔(Jurij Striedter, 1926-)主编的《俄国形式主义文本(第1卷): 文学概念和散文理论文本》(1969)、斯坦普尔(W. Stempel)《俄国形式主义文本(第2卷): 散文理论和诗学语言文本》(1972)等。多角度研究形式主义更是生机盎然: 埃里希的耶鲁同事、后来成为声望显赫的杜克大学教授的詹明信(1934-), 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二十世纪文学对话诸理论》(1971)、《语言的牢笼: 结构主义和俄罗斯形式主义》(1972), 把形式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这种情况反过来影响斯拉夫学界扩展形式主义, 如里斯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汤普逊(Ewa M. Tgompson)的《俄罗斯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 比较研究》(1971), 把俄罗斯形式主义和英美文论关联起来, 认为受象征主义文学改变日常生活的语法规则和修辞习惯影响的形式主义, 和重视具体词语在句子中的重要性的新批评, 有着共同的边界——语言是文学审美的本质, 前者凸显语言结构的意义, 后者辨析叙述过程中的语义含混性。由皮克(Christopher Pike)主编、安德鲁翻译的《未来主义、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评》(1975), 把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关联起来。正因为有这些基础, 曾任荷兰驻中国使馆参赞和临时代办的乌特勒支大学教授佛克马(1931-2011), 深谙东方阵营问题, 在与其妻子易布斯合作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1977)中, 把形式主义列为20世纪最先开始的重要流派。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1983)序言声称, “如果谁想确定20世纪文学理论变化的开端, 大概可以选择1917年。因为这一年, 俄国年轻的形式主义者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埃里希)发表了那篇开拓性论文《作为手段的艺术》。从那时起, 特别是近20年来, 文学理论数量激增, ‘文学’、

‘阅读’、和‘批评’的含义已经发生深刻变化。”^①他还在导言中借用雅各布逊的观点，即“文学作为一种写作方式，是对于通常言语系统的强制性改变”，进而创造性地解释了“何谓文学”。二十年后，杰克逊(Robert Jackson)和卢蒂(Stephen Rudy)的《俄国形式主义回顾：纪念维克多·埃里希文集》(1985)，高调纪念这位学人的贡献，在冷战的西方，恰逢其时。此后，苏联很快接受斯拉夫学成果和文学批评方法，包括与形式主义同样得到推崇的巴赫金，也迅速越过苏联影响世界，并反馈于苏俄。

可见，由于在技术层面上不直接实施文化冷战策略，使得英美斯拉夫学界对苏联时代的文学的把握，反而有学术创新的自由。所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除了俄侨文学、境外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文学、苏联官方所不容的另类文学、形式主义和巴赫金等外，甚至触及大众文学。如，1976年顿纳姆(Vera Dunham)出版的《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小说中的中产阶级价值》，深入辨析了在斯大林时代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如何意外出现了政府官员、国企负责人、高级知识分子、高级艺术家、高级工程师等组成的庞大中产阶级，他们的需求和价值观活跃了地下交易、刺激了经济活动的频繁。阿扎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尼古拉耶娃的《收获》(1950)、科切托夫的《茹尔宾的一家》(1952)等，从不同方面呈现了这些景观，而这些正是被苏共斥责为“资本主义残余”的现象。如此研究揭示出被苏联官方所屏蔽的文学事实，即杰明·布朗在《斯大林之后的苏俄文学》(1978)中所说的：“近年来，‘苏联文学’已经变得很不合时宜。苏维埃专制政体坚持已创立的统一的各民族文学，包容了苏联各民族的文学”。实际上并非如此，甚至索尔仁尼岑也称不上是苏维埃作家，其他许多作家即便是在苏联境内，也被迫求助于国外才得以发表作品，大量地下出版物发表了许多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不一致的作品。这些情形危及苏联作协体制，苏联的文学因意识形态而变成一个孤岛——与俄罗斯文化传统遗产和20世纪西方文化分别隔绝。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茨维塔耶娃等名字，和布宁、巴尔蒙特一样都被屏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绝对地相信自我意识形态修正能力，认为现代主义

^① 特雷·伊格尔顿著：《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序言第1页。

不足以充分理解历史过程及其复杂性、欠缺历史视角；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致力于追求客观真理，认为现代主义无助于人对我们周遭世界的感知。”^①同样，爱德华·布朗在《十月革命以来的文学》（1973）中声称，“在苏联，苏维埃文学即十月革命以来的文学，包括用各加盟共和国语言书写的作品。但为苏联意识形态所不容的作家则被排除在外，虽然他们的作品在苏联创作、问世……非苏联的批评家反对把被苏联人称之为红色作家、反对把创作思想更接近西方的作家归之于红色苏联的范畴……‘苏维埃’表明俄国文学传统出现了断裂。”^②这些被昭示出来的文学事实反而获得了另外的意义：帕斯特纳克和索尔仁尼岑先后获诺贝尔文学奖；1979年底，未经苏联官方审查的《大都会文集》在阿尔迪斯出版社推出，是西方通过文学介入冷战的重要事件。这加剧了更多的文学家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抵触、从而加入持不同政见者行列，更多的居民移居国外（第三波移民潮由此扩大）。英美斯拉夫学界不断召唤俄苏东欧侨民进入其中，从而不断“发现”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文学的巨大价值，“寻找”苏联文学的破绽，“证实”不存在统一的苏联文学；对不能归于苏联的俄罗斯文学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按欧洲普遍的“文学”范式诠释其价值；在客观上有效介入苏联境内的文学发展，成为推动冷战终结的积极力量。如1988年境内外俄罗斯文学家，因英美斯拉夫学界的努力，而坐在一起讨论俄罗斯文学，促成分裂的俄罗斯文学走向统一，也肇始了苏联文学走向终结，为后苏联重建完整的俄罗斯文学奠定了基础。

总之，战后英美斯拉夫学者借助冷战大势所推动的苏联学勃兴之机遇，持续积极搜集整理苏联出版的俄罗斯文学基础文献，译介俄罗斯文学经典，加大学科队伍建设力度，注重学术资源整合，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他们没有破坏斯拉夫学传统，视俄罗斯文学及其相关问题为冷静的学术研究对象，而非代之以要批判的话题，并尽力熟知文学在苏联的发展态势、苏联对各时代俄罗斯文学的研究情况，直面苏联官方所热衷的古罗斯文学、经典现

①Deming Brown, *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since Stalin*, Cambridge et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 15.

② Edward James Brown, *Russian Literature since the Revolution*,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5-6.

实主义文学、苏维埃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等。同时，他们还特别重视被苏联官方所排斥的俄侨文学和境外俄罗斯文学、持不同政见者文学，发掘出这些文学所具有的被苏联官方屏蔽的独特价值。这些，连同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近三十种“俄罗斯文学史”：包括列文(Arthur Levin)主编的《俄国犹太人文学史》(1979)、曾任芝加哥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副教授(1990年转任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的布鲁克斯(Jeffrey Brooks)的《在俄国人学会阅读之际：读写能力和大众文学，1861-1917》(1985)中关于俄罗斯大众文学发展史问题，斯杰夫斯基《乌克兰文学史》(1975)等(这些是需要专文论述的重要话题)，共同成就了冷战时代英美对俄罗斯文学在苏联时代的发展态势、认知变化的严谨把握，大幅超越了“苏联学”之局限：

1) 拥有辐射力极大的学术创造力。苏联解体后，俄国和西方都热衷于苏联时代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如何批判苏联，如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波特(Robert Porter)于1994年就及时出版力作《俄国另类小说》，就因得益于冷战时期斯拉夫学的研究基础，及时有效阐释阿克肖诺夫和索罗金、纳尔彼科娃和彼得卢舍夫斯卡娅及托尔斯泰雅、维涅吉克特·叶洛菲耶夫(《莫斯科—彼图什基》)、叶夫盖尼·波波夫(《一位爱国者的灵魂，抑或致费尔菲契金的各种信》(1989)和《生命之美》(1990))、维克多·叶洛菲耶夫(《俄罗斯美女》)、爱德华·利蒙诺夫等另类俄罗斯文学，得出结论“1920年代苏俄现代主义传统和当代西方文学经验，对苏联时代进行了后现代式的叙述，形成了新浪潮(new wave)文学。这些作家可被视为另类运动的先锋队。”^①

2) 从文学史结构、文学观念、文学论题选择等方面，深刻影响了后苏联俄国本土学者对俄罗斯文学的认知。^②尤其是促成人们重建苏联时代的文学，这就是杰明·布朗在《苏联文学的最后岁月：1975-1991年间小说》(1993)中所声称的，“毫无疑问，1985-1990间最伟大的运动，是出版了大量所谓‘被耽误的文学’(delayed literature)，这些此前苏联读者被禁止阅读的文学”，让人们突然看到了安德烈·彼托夫、弗拉基米尔·马卡宁，以及当时

^① Robert Porter, *Russia's Alternative Prose*, Oxford/Prvidence: Berg, 1994, p.190.

^② 后冷战时代俄国热衷研究西方，如费多洛夫(Alexander Fedorov)的《西方银幕上的俄国形象》(2011)。

仍在流亡中的维克多·涅克拉索夫、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索尔仁尼岑等。^①这些作家在后苏联俄罗斯文学史建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 Abstract 】 After WWII, against the extraordinary development of “Sovietology” in order to contain the Eastern communism, the Anglo-American Slavic scholars kept a distance from Sovietology, the super key discipline. They were not just interested in doing researches in and publishing overseas Russia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and dissidents’ literature, but also facing directly the works and theories of mainstream Soviet writers. Moreover, they compiled various types of Soviet literature history independently. The reason lies in that they could both follow the tradition of Sovietology,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llection and collating of fundamental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omply with the given paradigms in European humanities. As a result, they could go beyond the Cold War mindset in discourse without directly targeting Soviet official discourse or basing itself on the paradigm of Sovietology. The charm of such research is what rigid interpretation of Soviet in Russian literature cannot catch up. Thus, in turn, it has led the humanistic scholarship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post-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studies.

【 Key Words 】 Paradigm in Slavic Studies, Mainstream of Soviet Literature, Humanistic Scholarship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в эпоху небывалого интереса к развитию «советологии» с целью обузда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остока, английские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учёные-слависты сохраняли чёткую дистанцию с данной ключевой дисциплиной (советологией): они не только стремились к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 и изданию запрещённых КПСС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русских эмигранто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диссиден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о также работали и с

^① Deming Brown, *The Last Years of Soviet Russian Literature: prose fiction 1975-199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2-3.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м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ми и теориями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ри этом автономно компилировали различные типы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Благодаря этому, а также благодаря следованию традициям славистики, приданию большого значения сбору и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и базовой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а такж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ю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й парадигме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дан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е были напрямую направлены против советского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и, не базируясь на парадигме «советологии», они на уровне дискурса выходили за рамк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Данная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е могла быть достигнута жёсткой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е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ч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привело к ещё большему интересу к гуманитарным наукам в конц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ССР, заложив тем самым основу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России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арадигма славистики,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ая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политика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乌克兰研究

乌克兰地方自治：问题、改革与前景

杨友孙*

【内容提要】乌克兰地方自治制度在21世纪初已成型，却一直未很好地落实。2013年年底乌克兰危机之后，地方自治改革成为乌克兰政局中的关键问题。乌克兰地方自治问题包括东部省份的自治地位和其他地区的自治制度问题。目前，东部省份地位问题虽有所进展，但仍未打破僵局。对此，乌克兰有关各方应尽早就东部省份获得何种自治地位达成一致。其他地区正在朝着“波兰模式”前进，但尚需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此外，还需要考虑到俄罗斯族占多数的“灰色”区域的自治地位问题。只有尽早解决这三类问题，更好的地方自治制度才可能顺利建立，乌克兰才有可能早日渡过危机。

【关键词】地方自治 波兰模式 高度自治 联邦制

【中图分类号】D751.1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2-0179(28)

作为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在1991年独立之后，实行了多党制、自由选举、市场经济等变革，并曾交替采用过两部新宪法——1996年宪法和2004年宪法。^①两部宪法均在政体上作了一定的变革，但在国家结构方面则完全保持不变。尽管宪法及法律明确规定乌克兰实行地方自治制度，但法律上赋予地方的各种自治权力实际上基本被集中到中央去了，而且这个趋势在2010年亚努科维奇任总统之后更为明显。因此，乌克兰自独立以来，其国家

* 杨友孙，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① 乌克兰1996年宪法和2004年宪法的英文版原文，分别参见 http://en.wikisource.org/wiki/Constitution_of_Ukraine,_1996; http://en.wikisource.org/wiki/Constitution_of_Ukraine,_2004。

结构表面上是实行地方自治的单一制，实际上却是具有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更非基层自治机构——是影响人们生活 and 满足人们需要的最主要实体。

自2013年底乌克兰骚乱开始，乌克兰危机已经经历了政府危机、克里米亚危机和东部省份危机三个阶段。如果说第一个阶段的危机暴露的深层问题是中央政府内部总统过度集权的问题——即政体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二、第三阶段的危机所暴露的更多是中央与（民族聚居）地方的关系问题——即国家结构方面的问题。

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与乌克兰融入欧盟的诉求不相符合，也不适应乌克兰的国情，因此它越来越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国内政治力量、民间组织、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压力，尤其是受到乌克兰东部省份的挑战，并导致了严重的冲突。

2014年4月开始，乌克兰中央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全面的“分权”（decentralization）改革。^①但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到底如何分配，东部省份应获得何种程度的自治地位，仍然需要经历艰苦的讨价还价过程。

一、乌克兰地方自治制度的发展脉络

国际上对“地方自治”并没有标准的定义，但不同定义的意思却没有太大的差异。中国大百科全书将“地方自治”界定为：在一定的领土单位之内，全体居民组成法人团体（地方自治团体），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监督之下，按照自己的意志组织地方自治机关，利用本地区的财力，处理本区域内公共事务的一种地方政治制度。^②西方学者诺顿·阿兰（Norton Alan）归纳了“地方自治”的两个基本原则：（1）综合能力原则（doctrine of

^① 乌克兰中央政府常常使用“分权”（decentralization）而谨慎地使用“地方自治”（local self-government, autonomy）。笔者认为，两者的细微差别在于，“分权”表明地方的权力只是部分地从中央“分给”地方，但大部分仍然集中在中央，而“地方自治”则表明地方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地方自治机构。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56页。

general competence), 即地方政府对本区域事务和居民具有全面的管辖权;

(2) 辅助性原则 (doctrine of subsidiarity), 即基层地方政府对地方事务具有特别地位和特殊责任, 上级政府只承担“辅助性”责任, 即支持基层政府完成其职责。^① 由此可见, 地方自治的要义, 在于地方机构有处理地方事务的优先权力, 同时也有处理地方事务的相应资源及能力。

欧洲有浓厚的地方自治传统, 它广泛存在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自由城市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欧洲地方自治的“星星之火”呈现燎原之势, 朝“普遍化”和“制度化”方向演进。20世纪60、70年代, 比利时、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都全面实行了地方自治制度。^②1985年, 欧洲委员会出台《欧洲地方自治宪章》(The European Charter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③表达了将地方自治制度推向整个欧洲的愿望。冷战结束后, 中东欧国家开始民主化改革, 而实行地方自治就是民主转轨的重要组成部分, 甚至被认为是中东欧民主进程中的关键因素。^④目前, 所有47个欧洲委员会成员国都签署了《欧洲地方自治宪章》。因此, 从理论上讲, 欧洲已经全面实行了地方自治制度。

乌克兰地方自治的立法从独立之前就已存在。1978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规定, 乌克兰各级地方设立代表地方利益的地方委员会 (local councils), 以行使自治权, 但地方委员会需要对地方公共行政机构负责。然而, 在苏联模式下, 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实际上剥夺了包括自治共和国在内的任何层级的地方机构实行地方自治的可能性。

1990年底,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议会通过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地方自治与地方苏维埃人民代表法》, 强调了地方委员会 (local

① Norton Alan, “Western European Local Gover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R.Batley and G. Stoker (eds.), *Local Government in Europe: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London, 1991, pp.21-40.

② 虽然比利时和德国都是联邦制国家, 但联邦制国家的每个联邦主体仍然是自治地方; 换句话说, 联邦制也可以视为“地方高度自治”的一种模式。

③ “European Charter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Strasbourg, 15.X.1985, <http://conventions.coe.int/Treaty/EN/Treaties/Html/122.htm>.

④ Stoker Gerry, “Introduction: Trends in European Local Government”, in Batley, R. and Stoker, G. (eds.), *Local Government in Europe: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pp1-20.

councils)的功能和地方经济独立性。同时该法将乌克兰地方行政区划划分为三个级：州(obl原因)、县、区(raion)及基层地方(包括小的城市、城区、镇、村等),每个层级都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机构——州委员会(obl原因 council)、县(区)委员会(raion council)和基层地方委员会(local council),不再规定自治委员会从属于地方公共行政机构,这使地方自治获得了重生的希望。

1991年7月,乌克兰宣布独立。1992年初,乌克兰议会通过《乌克兰总统代表法》和《地方委员会和地方自治法》,规定州、县(区)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隶属于内阁管辖,由总统任命的代表领导。这种“总统垂直管理”模式使州、县(区)两级的地方受到中央较大的约束,只有基层地方仍由自治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管理。

根据上述制度框架,乌克兰适度地调整了苏联时期的行政区划。州级和县级变动不大,重点是调整实行地方自治的村、镇、市的结构。调整之后,乌克兰地方政府分为三级:(1)24个州(obl原因)、一个自治共和国(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两个特殊地位市:基辅和塞瓦斯托波尔市(Sevastopol);(2)490个县、区(raions);(3)约12000个居民区(hromada)^①,包括村、镇、较小的市组成的自治地方。^②后来,第三级的自治地方有所增加。

1994年总统选举后,一部分政治势力对总统任命地方代表从而剥夺了地方的自治权力极为不满,他们呼吁恢复地方的独立性。1995年6月,“宪法协议”出台,反映了两种政治力量的妥协:州、县(区)行政机构长官不再是“总统代表”,而由该行政区的人民普选产生,然后再经总统任命;而基层自治执行机构长官,则由过去的基层自治委员会选举产生转变为由基层选民选举产生。同时强调,州和县(区)行政机构既要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又要执行州、县(区)自治委员会的决定。

① “hromada”为乌克兰语,在中文中并没有对应的词语,它具有多种含义,它既包括聚居在一定区域的无正式行政建制的群体,例如“居民区”、“社区”、“居住点”,也包括“村”、“镇”等具有行政建制的区域。本文统一译为“居民区”。

② Dominik Tolksdorf,“The Constitutional Process in Ukraine, Issues in Play”,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brief,May 22,2014.也有统计认为乌克兰目前约有15000个“居民区”,参见Sean R. Roberts,Oleksandr Fisun,“Local Governance and Decentralization Assessment:Implications of Proposed Reforms in Ukraine”,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September 03,2014.

然而，由于支持库奇马总统的势力在议会占优势地位，1996年6月28日通过的乌克兰宪法再次向“总统垂直管理”模式稍稍倾斜。宪法涉及地方自治的条款主要是：第一章“总则”的第二条；第六章关于内阁及其他行政机构的权力；第九章关于乌克兰领土结构的规定；第十章关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地位的专门规定；第十一章关于地方自治的规定。

“总则”第二条规定：乌克兰是个单一制国家。

第六章第118条规定，州、县（区）以及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基辅市和塞瓦斯托波尔市的行政权力由地方国家行政机构享有，其长官由乌克兰内阁提名，总统任命（及罢免）。地方国家行政机构既要向上级行政机构负责，又要对同级地方委员会负责。地方委员会可以对总统任命的地方行政长官进行不信任投票，但需由总统裁决是否解除该行政长官职务，但如果地方委员会以2/3以上多数对该地方行政长官投不信任票，则该行政长官必须辞职，而总统也需批准其辞职。

第九章是关于乌克兰领土结构和行政区划的条款，这方面基本延续了独立以来的框架。其中第132条阐明，乌克兰行政区划的根本原则是国家统一和领土不可分离，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第133条规定，乌克兰行政区域层级主要包括三级：自治共和国、州、单列城市为第一层级；县、大城市的区为第二层级；定居点和村、镇为第三层级。

第十章是关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地位问题。第135条规定，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议会可以制定该自治共和国的宪法，但必须获得乌克兰议会的通过。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议会的法案及部长会议通过的决议，不能与乌克兰宪法、法律、总统和内阁的决策相违背。第136条规定，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行政长官——部长会议主席由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议会选举产生，但需要获得乌克兰总统的同意；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没有单独的司法，司法体系和其他地区一样。第139条规定，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内，设置乌克兰总统代表办公室。

第十一章是关于地方自治的具体条款。最为核心的是第140条，该条规定，各级地方都可以实行地方自治，选举产生自己的自治机构，管理本区域的财产和事务。村民或城镇市民组成的基层自愿联合体，可以享有地方自治

的权利，依法独立地处理本地区事务；村、居民点和城镇的自治机构是村民委员会、居民点委员会和城镇居民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而县（区）和州级的自治机构是县（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第141条规定了地方委员会代表的选举办法和任期。第142条规定了地方的财政独立性：行政区内所有的不动产、地方财政收入、土地和自然资源、中央拨款以及其他一些资金，都由该行政区自治机构管理，但国家有权参与管理地方自治机构的开支和预算。

1997年5月21日，乌克兰出台了《地方自治法》，将地方自治原则具体化，其中以下几项内容值得关注：首先，该法宣布将按照“欧洲地方自治宪章”的要求推进地方自治机构的法律自主权、组织自主权和财政自主权。其次，提出建立名为“格罗马达”（Gromada）的基层行政区，包括村、镇、较小的市。再次，建立和完善基层地方委员会，以真正代表群众利益和就相关事务进行决策；在民众倡议或自治委员会的决定下，也可以建立一些其他的自治机构，协助解决地方事务；再次，规定了基层自治机构的组成：自治委员会的代表及其主席，即行政长官（村长、镇长、市长），由该地方基层群众直接选举产生，而执行机构其他成员的组成则由行政长官和自治委员会商量决定；州、县（区）的自治委员会代表由选民普选产生，但其主席与自治委员会执行机构的成员均由自治委员会选举产生。最后，提出了地方自治框架下的几种直接民主形式，例如举行地方性全民公决、地方群众大会、地方倡议、听证会等。

1998年乌克兰通过“地方委员会及村、镇、城市长官选举法”（Law on Elections of Local Councils and Village, Township and City Mayors），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地方委员会和地方自治执行机构长官的选举办法。2001年出台了“公民自治组织法”（On the bodies of self-organization of citizens），对地方公民建立的一些自治机构的权利、职能进行了具体规定。1998年出台的地方政府法（Law on Local government）和1999年出台的“地方国家机构法”（Law On local state administrations），对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职责和构成以及选举作了详细规定，也可以说是间接对地方自治机构权力进行了限定。

2001年，乌克兰出台“预算法”（Budget Code），对乌克兰自治地方的收入、预算和支出进行了具体规定，并给予了地方更大的财政自主权。该“预

算法”第7条规定，乌克兰预算体系包括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其中地方预算又包括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预算、州、县（区）的预算和地方自治机构的预算。国家预算、地方政府预算和自治地方预算相互独立；地方自治机构在符合乌克兰法律的情况下有权决定自己的经费如何使用。但第7条和第76条同时又规定，地方自治机构的预算需要获得地方国家机构的批准。第65条规定，在基辅市和塞瓦斯托波尔市，所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的1%必须用于这两市的预算之中；克里米亚共和国及各州的个人所得税的75%必须用于各地的预算之中；村、居民点、镇、社区等个人所得税的25%必须用于各自的预算之中。第69条规定，在基辅市和塞瓦斯托波尔市，所征收的土地使用税的100%必须用于这两市的预算之中；克里米亚共和国及各州的土地使用税的75%必须用于各地的预算之中；村、居民点、镇、社区等的土地使用税的60%必须用于各自的预算之中。第97条、第102条、第103条、第105条、第106条等规定，自治机构还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获得国家的直接或间接特别拨款。^①

至此，乌克兰地方自治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此后虽然宪法、预算法及其他一些相关法律都曾经修改过，但基本的制度框架没有改变，直到乌克兰危机之后，乌克兰地方自治改革才真正启动。

二、乌克兰地方自治制度的存在的问题

在欧洲，地方自治制度大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可以称为“完全地方自治”，它是一种程度较高的地方自治，而且开始于第一级（即最高级）地方政府，继而延伸到下一级地方政府，既有地区自治（regional self-government），又有地方自治（local self-government）；^②地方政府与中央

^① “The Budget Code Of Ukraine”, 2001, http://www1.worldbank.org/publicsector/pe/BudgetLaws/Ukraine%20Budget%20Code%20_2001_.pdf

^② 在欧洲政治学语境中，存在多种“地方”概念，即“地区”（region）和“地方”（local）；也有时作三种区分，即 region（区域）、district（地区）、local（地方）。乌克兰有三级地方政府，因此适合三分法。在中文语境中，常常不作区分，而笼统地用“地方”来指代。本文采取中文的笼统“地方”概念，但说到最低层地方时，本文采用“基层地方”以示区别。

政府之间、地方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体现出较强的平行关系而非垂直关系。这种国家即使是“单一制”，也具有浓厚的“联邦制”色彩，英国、匈牙利是该类地方自治的典型国家。另一种可以称为“半地方自治”，即最高级地方政府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实行地方自治，而是作为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延伸机构及地方自治的协调和监督机构，真正的地方自治主要体现在第二级和第三级地方。这种制度下的地方自治程度一般也相对低一些，强调地方自治与中央权力相协调，法国、波兰是该类型的典型国家。

相对来说，乌克兰的情况更接近于第二种，但与第二种又有所不同，主要差别有两点：第一，乌克兰的地方自治，理论上开始于第一级地方（州），因为每个州都有地方自治机构——州（自治）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但实际上，州、县（两级）的自治色彩并不浓厚，它的地方自治主要体现在第三级地方——村、镇、居民点、较小的市等，可以说是一种“基层地方自治”或“单层地方自治”。第二，乌克兰在州、县（区）两层地方都同时设立了地方行政机构和地方自治机构，两类机构在地方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双轨平行结构”。

乌克兰地方自治制度自实施以来，也并非没有任何积极效果，比较受人称道的是地方自治机构与地方民众互动与合作初显成效；地方政府和地方自治机构在制定政策时会通过举办听证会等形式使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等；^①此外还出现了大量支持地方自治的民间组织，例如乌克兰地方自治学会（1999）、乌克兰地方自治俱乐部（2000）、乌克兰地方与地区领导人协会（1999）、乌克兰地方与地区权力代表大会（2000）等。

然而，乌克兰地方自治制度受到的批评远远多于肯定，它存在的众多问题一直广为乌克兰国内外所诟病。

第一，“纸上谈兵”是最大的问题。宪法和法律上关于地方自治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在实际中基本未能实现。宪法虽然按照欧洲地方自治宪章的要求给予了地方自治机构法律、组织和财政方面的自主权，但这些原则却没有在

^① Olena Babinova,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Ukraine: Strategic priorities And problems of realiz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search*, 2011, Vol.3(4), pp. 98-105.

实际上得到执行。^①这首先是因为宪法法律本身并不清晰,例如1997年的“乌克兰地方自治法”宣布给予地方法律自主权、组织自主权和财政自主权,但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幅度、形式或机制,也没有要求各地方制定适当的条款落实该法律。该法律还要求各级地方委员会具有选举产生本级地方执行机构的权力,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并没有选举产生自治执行机构,只有地方国家行政机构。各州、各县(区)行政长官也都一直由中央政府任命,使得地方国家行政机构也以听命于中央政府为主,难以反映地方的利益。而处于基层的村、镇、居民点、居民区、社区等则没有多大权力,极大地限制了群众参与决策过程的途径。

第二,地方自治机构的职责不清。在州、县(地区)两个层级,乌克兰同时存在地方行政机构与地方自治机构,但两者缺乏明确的分工。例如,1997年出台的“乌克兰地方自治法”和1999年出台的“地方国家机构法”,分别规定了地方自治机构和地方国家机构的职能,但两者职能出现了明显的重叠、交叉和混乱。“乌克兰地方自治法”第27条规定,地方自治机构在地方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方面的职责为:(1)制定并执行村、镇、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计划;(2)执行该地方平衡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并有效利用该地方的自然、人力和经济资源;(3)保持经济与人力资源的平衡发展,以推进该地方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而“地方国家机构法”第17条规定的地方国家行政机构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职责为:(1)制定与执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计划;(2)有效利用地方的自然、人力与经济资源;(3)保持地方人力、物力、经济及其他资源的平衡,以推动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二者职责明显重叠。

第三,各级地方自治机构的经济来源十分有限。乌克兰2001年出台的预算法虽然规定国家预算、地方政府预算和自治地方预算相互独立,但又规定,地方自治机构的预算需要获得地方国家机构的批准,而且中央也可以参与其预算制定及执行的整个过程。由于乌克兰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财政制度,各级地方由于缺乏资源和税收来源,国家对地方发

^① Olena Babinova,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Ukraine: Strategic priorities and problems of realization”.

展重视不够，缺乏合理的地方资产划分方法，导致地方财政收入一直非常吃紧。^①

乌克兰三层地方中，州享有最大的资源和权力，县（区）次之，而与群众生产生活最接近的基层地方资源最少、权力最小。州的税收收入要先上缴国家，然后再由国家再分配到各州，而整个过程并不是透明的，最后导致地方财政严重依赖于中央财政，只有州政府具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而州以下的地方国家机构则基本没有自己的财政收入，完全依靠上级拨款。^②据统计，乌克兰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收入的70%以上，而地方的公共开支只占全国公共开支的20.1%。^③在地方开支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地方自治机构的经费就更寥寥无几了。

第四，基层“碎裂化”状况严重。乌克兰第三级地方——“居民区”存在十分严重的“碎裂化”状况，大多数村庄都是以“自然村”为一个自治单位。据2014年的统计，自1991年独立以来，在乌克兰总人口有所减少的情况下，乌克兰农村村庄增加了348个，而村委员会增加了1067个；超过6000个“居民区”人口少于3000，而人口少于1000的“居民区”有4809个，人口少于500的“居民区”达到1129个。^④这些过于碎裂化的“居民区”使地方资源遭到人为割裂；大多数人口较少的“居民区”只有地方委员会而无执行机构，也无必要的人力物力资源。正是看到了基层自治机构“弱化”问题的严重性，欧洲委员会在2001年给乌克兰地方自治的建议中，曾建议乌克兰重点加强地方自治机构的建设，包括：加强州级地方自治机构建设，完善地区自治（regional self-government）；划分地方自治机构与地方行政机构的权力、责任界限；为地方自治机构提供执行其职责需要的必要资源；加强对地方自治

① Pyhtinskij M, “Reformation of a system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Reform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Ukraine”, Kyiv, NAPA Press, 2009.

②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Ukraine. Human Development and Ukraine’s European Choice”, UNDP Ukraine, 2008.

③ Tumanyan 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Armenia: practice and challenges”, Conference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Easter Partnership –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russels, 2013, <http://cor.europa.eu/en/activities/Documents/fiscal-decentralisation-armenia-practice-challenges-tumanyan.pdf>.

④ Sean R. Roberts, Oleksandr Fisun, “Local Governance and Decentralization Assessment: Implications of Proposed Reforms in Ukraine”.

的法律保护等。^①但是，乌克兰后来并没有遵照欧洲委员会的建议去采取适当的政策。

第五，乌克兰地方自治未考虑民族聚居区的特殊情况。根据中国外交部2015年4月的数据，乌克兰总人口为4555万，其国内一共有110多个民族，其中72%为乌克兰族，22%为俄罗斯族，其余民族为犹太族、匈牙利族、波兰族、鞑靼族、罗马尼亚族、希腊族、德意志族、保加利亚族等。^②俄罗斯族在（原）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东部省份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以及南部城市奥德萨，都达到总人口的半数以上。^③在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方面，乌克兰在1992年6月25日出台的“少数民族法”（Law on National Minorities），^④重点是强调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享有各方面相同的权利，只有第6条和第16条以肯定行动的方式保护俄罗斯族。第6条指出，乌克兰赋予少数民族以“民族文化自治”的权利，包括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保持少数民族宗教，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大众媒介，建立少数民族教育机构等权利。第16条强调，国家预算中设立专门的款项发展少数民族事业。

尽管乌克兰地域广阔，不同部分之间的人口数量、民族构成、经济发展等方面差异很大，尤其是西向性很强的中西部和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东部、南部之间，在民族构成、对外政策偏好、社会心理等方面差异明显，但乌克兰并没有在俄罗斯族聚居区采取民族地方自治制度。自2013年乌克兰危机以来，尤其是2014年3月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以后，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俄罗斯族人口占多数的省份，尤其是东部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的独立意识明显加强，并与乌克兰中央政府发生了长期的武装冲突。

当然，乌克兰地方自治存在的问题除了上述几个之外，广为人们诟病的

① “Recommendation 102 (2001), On Local and Regional Democracy in Ukraine”, Council of Europe, Congress of Local and Regional Authorities, Strasbourg, 2001.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乌克兰国家概况”，2015年4月，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7496/1206x0_607498/t9479.shtml

③ 根据2004年的统计数据，在现今乌克兰的24个州中，乌克兰族在（原）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人口中占的比重只有25%左右。其次是顿涅茨克州（50%），卢甘斯克州（52%），敖德萨州（54%）。参见“乌克兰的民族”，2004年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经商参处网站，<http://search.mofcom.gov.cn/swb/searchList.jsp#>

④ “Law on National Minorities, Law no. 2494-12 of June 25th”, 1992, <http://www.usefoundatation.org/view/629>

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例如中央政府可以决定财政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导致了权力滥用与腐败；国家机构和地方机构中的政党分裂使地方治理质量下降；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支持力度过小，对于地方自治机构的支持力度更小等。^①

正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原因，乌克兰地方自治受到联合国、欧洲委员会及欧盟长期的批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8 年对乌克兰地方自治的调查报告指出，尽管乌克兰在执行“欧洲地方自治宪章”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由于财政不到位、自治机构的地位不高等因素，使乌克兰在绝大多数方面并没有贯彻“欧盟地方自治宪章”的要求。^②欧盟委员会在 2011 年对乌克兰的评估报告中，批评乌克兰在加强地方自治方面进展十分有限，没有执行“欧洲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和“欧洲地区与少数语言宪章”。^③此后，在 2012 年 9 月 12 日欧盟与东部伙伴关系国的地方政府年度会议上，以及欧盟委员会 2013 年关于东部伙伴关系国的进展报告中，欧盟均批评乌克兰地方自治并没有取得实际进展。

三、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地方自治制度改革

乌克兰地方自治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了种种问题，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均对此不满，并表达了自己的改革愿望，以下是影响较大的改革建议和设想。

（一）“一揽子改革计划”

在尤先科任总统期间（2006–2010），曾经出现过一些分权改革计划，但都没能付诸实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2006 年由当时的副总理罗曼·贝兹墨特尼(Roman Bezsmertnyi)提出的地方自治“一揽子改革计划”。“一揽子改革计

①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Ukraine, “Concept of the Reform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and Territorial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in Ukraine”, 11 April 2014, <http://mfa.gov.ua/en/news-feeds/foreign-offices-news>

②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Ukraine. Human Development and Ukraine’s European Choice”, UNDP Ukraine, 2008.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in 2010”, Country Report on Ukraine, 2011.

划”尽管未能实施，但它对日后乌克兰的地方自治改革有很大的影响和借鉴作用，甚至当时“一揽子改革计划”的一些起草者，至今仍然活跃在乌克兰地方自治改革的前台。

“一揽子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三级地方行政体制，即“居民区”（hromada）、县（raions）和州（oblast）；大幅度缩减中央政府的权力，同时更要极大地削弱州一级政府的权力，使之成为协调性机构和中央政府在地方的代表机构；主张“县”、“居民区”才是真正实行自治的地方，它们均有自身的财政权和人事权；要求大大加强地方机构在地方事务中的主导权。该计划呼吁学习欧盟的地方治理经验，强调在地方自治中“辅助性原则”的重要性。^①

在技术性安排方面，“计划”认为，“居民区”应由多个居住点或村庄组成，其人口应不低于5000人；而“县”应该是由多个“居民区”组成的、促进“居民区”利益的设置。“县”的人口不应少于7万人；那些人口达到7万以上的市，可以建立和“县”平级的“县镇”（District-towns），由州政府直辖。那些超过75万人口的“地区性城市”（regional cities），与州平级，由中央政府直辖。那些人口超过45万的市，还可以在其内部划分出“区”，每个“区”至少15万人，每个超过45万人的市必须划分3个或者3个以上的区。

“一揽子改革计划”不再在地方分别设立地方政府和地方自治机构，而是将最高层级的地方政府（州）转变为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行政机构，其功能弱化，主要职责是协调和监督；而第二级地方政府（县），特别是第三级地方政府（居民区）则应大大强化，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地方自治。“一揽子改革计划”被认为具有浓厚的“波兰风格”。^②

尤先科任总统期间，他与总理权斗不止，“一揽子改革计划”未能付诸实施。2010年2月，亚努科维奇就任乌克兰总统后，在缩减中央政府权力和明确中央、地方权限方面继续沿着“计划”的方向前进。2010年修改了“预

① 辅助性原则是欧盟的基本原则之一，即凡是能由成员国办的事，就由成员国办，欧盟只能发挥辅助性作用。而在地方自治方面的辅助性原则，则是指凡是能由地方办的事情就由地方处理，中央只发挥辅助性作用。

② Sean R. Roberts, Oleksandr Fisun, “Local Governance and Decentralization Assessment: Implications of Proposed Reforms in Ukraine”.

算法”，2011年修改了《税收法》，两个法律均有部分内容笼统地涉及权力下放。新的“预算法”规定，将部分国家转移支付直接分配给地方自治机构，地方的公共行政机构有权出台和执行地方预算的自主权。新的“税收法”明确了地方税费管辖的基本范围：包括财产税、创业税、部分商业税费、停车费、旅游税等。^①2013年5月24日，亚努科维奇总统签署了推进下放权力的总统令，要求将部分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到地区政府，例如地区公务员的任命和免职应由地方政府负责。但实际上，中央权力并没有下放到地方，反而得到了加强。

（二）亚采纽克政府的地方自治“设想”

2013年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乌克兰各地都涌现了要求实现真正地方自治的呼声。例如“全乌克兰地方自治论坛”在2014年3月27日至28日的大会结束后，向乌克兰总统、议会、总理，所有乌克兰人和国际社会发表了一个决议，呼吁乌克兰中央政府践行“欧洲地方自治宪章”和落实乌克兰宪法第140条，真正给予乌克兰地方以自治的权利。

2014年4月1日，亚采纽克政府出台了“乌克兰地方政府及地方机构权力设想”，^②成为乌克兰危机以来国家结构和地方自治改革的开场锣鼓。

“设想”提出了比较激进的地方自治方案，将乌克兰地方自治改革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是2014年，主要是制定地方自治的法律框架；加强基层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建设；取消州、县、居民区的地方行政机构，建立地区、地方自治机构，将以前属于地方行政机构的职权转移至地方自治机构；加强县、居民区的自治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的建设；明确地方建设的方法和加强对新政策的宣传。第二步是2015—2017年，主要任务是：实行财政放权，确保地方自治议事会和执行机构在建立后具有足够的经费保证；地方自治机构应制定自己的地方发展计划并推行之；根据新的自治框架进行新

^① “Subgroup of the WG1 on Local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form”, Proposal for CORLEAP, 2012, [http://www.eap-csf.eu/assets/files/ProposalSubGroupLGPARGP Sept_09 \(1\).pdf](http://www.eap-csf.eu/assets/files/ProposalSubGroupLGPARGP Sept_09 (1).pdf).

^② “The Concept on Local Self-Government and Territorial Organisation of Power in Ukraine”, <http://cau.in.ua/ua/results/draft-decisions/id/proekt-rishennja-pro-vnesennja-zmini-do-skladu-komisiji-konstitu-667/>

的地方选举。亚采纽克政府的“设想”获得了欧盟、欧洲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但不久之后由于东部战事紧张，“设想”被搁置，但它为以后的改革方向提供了蓝图。

在技术性层面，“设想”主张，应重点修改宪法第133条、第142条和第119条。第133条过去只是粗略地规定，乌克兰地方行政区划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州、县、城市、城区、居民点、村庄。“设想”认为应该增加以下内容：将“居民区”作为乌克兰行政区划的基层单位，以改变该级行政体系弱化、地理色彩浓厚的现状，按照波兰模式加强和突出该级的行政色彩，以使该级地方机构能够承担地方自治的各项职能。第142条的内容是关于地方机构的财产和资金来源，“设想”认为该条应进一步强调：将一部分国税转移至地方政府，向地方政府移交更多的资产以加强其实现地方治理的能力。119条是关于地方国家行政机构的职责。“设想”认为，在这条中应该特别强调：基层地方不设立地方国家行政机构而只设立地方自治机构，将大部分过去属于州和县的权力转移至基层地方自治机构；而州、县两级的行政长官仍然由“总统代表”担任，其职责主要是协调、监管基层自治地方按照宪法和法律实行地方自治。

“设想”还提议，大大缩减“居民区”和“县、区”的数量，将目前约1万多个居民区压缩为1200个左右，将500个左右的“县”压减为100个左右。

对于“设想”最大的争议，是对宪法第119条的修改。因为人们担心，“总统代表”在地方行政机构中太多，会大大加强总统的权力和威望，从而损害乌克兰总理总统制中总统和总理权力的平衡；同时地方政府对此也难免存在顾虑。^①

“设想”的不足之处还在于，它和过去的一些权力下放计划一样，明确了方向而未提供方法，例如强调了财税权力下放却未明确如何下放，或下放到何种程度。此外，“设想”还遇到一些其他方面的政治问题，包括政治派别林立，很难达成一致的认识；巨大的改革会由于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遭到强烈的反对。

^① Sean R. Roberts, Oleksandr Fisun, “Local Governance and Decentralization Assessment: Implications of Proposed Reforms in Ukraine”.

东部省份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反应特别激烈，它们并不满足于对宪法进行细枝末节的修改，他们不能接受普通的地方自治。2014年4月12日，在顿涅茨克北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Slavyansk），成千上万的市民上街游行，他们包围市政府机关和警察局，要求乌克兰实行联邦制，给予他们所在地区更多的自治权力。

（三）波罗申科总统关于地方自治的宪法修正草案

2014年5月11日，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独立，结果显示，支持独立的选票分别高达89%和96%。^①次日，两州分别宣布成立独立的“主权国家”，卢甘斯克方面呼吁联合国承认其独立地位，而顿涅茨克当局则提出了加入俄罗斯联邦的申请。卢甘斯克州议会主席团还发表声明，要求乌克兰中央政权立即修改宪法，以保障地区联邦化进程。这使乌克兰局势进一步恶化，也使得解决这两州的地位问题变得更加急迫。

2014年5月25日，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当选为乌克兰总统，他表示地方分权是他执政后的首要事务。6月26日，波罗申科向议会正式提出了宪法修改草案。草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地方自治改革，包括：（1）建立一种新的行政区域：居民区（hromada），包括村庄、居民点和城区，以无记名的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居民区执行长官（过去由基层地方委员会选举产生），任期5年，行政长官为地方行政机构负责人；（2）州、县（区）级委员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委员会主席由委员会选举产生，主席同时兼任自治执行机构的长官，自治执行机构的组成由委员会根据主席的建议协商产生。（3）总统有权向各州、县（区）派遣“总统代表”，以监督各地区宪法、法律执行情况和人权、自由的保护情况；“总统代表”也有权对州、县级的地方国家行政机构和地方自治机构进行协调；（4）地区政府有权给予少数民族语言以特殊地位，但乌克兰语应为乌克兰的唯一官方语言；（5）中央政府应给予地方自治机构一定的行政权、税收权，并将部分

^① Steven Woehrel, “Ukraine: Current Issues and U.S. Policy”,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U.S.), July 8, 2014.

国有资产转移给地方自治机构。^①

该建议的核心，是希望通过实行地方自治平息地方自治的呼声和东部省份的独立要求，但同时也要维持总统的强大权力。但该宪法修正草案因过于保守而受到广泛的批评，不少人认为，维持甚至扩大总统权力更是开历史的倒车，而东部省份也不满足于有限的自治。^②

该宪法修正草案的软肋是没有涉及东部省份的特殊地位问题。为了安抚东部省份，乌克兰议会在2014年9月16日通过了“关于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个别地区地方自治特别程序”的法律，决定在顿巴斯部分地区临时实行特别程序，自生效之日起为期3年。法律承认了这两个州的一些特殊的权力：乌克兰内阁和其他中央行政机构可与享有特殊自治权的地方行政机构就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其他事务签署协议；地方行政机构有权参与地方高级司法官员的任命；创造条件让局势尽快正常化、恢复法制、公民宪法权利和自由，同意当地人在政府机构中使用俄语，创造条件让民众返回，恢复居民生活并推动地区各项事业发展。但该法律也强调，给予这些地区的只是临时的自治权，同时这些地方仍属于乌克兰领土。^③

2015年7月16日，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顿涅茨克州与卢甘斯克州部分地区的自治特殊性确定》的宪法修正案，主要内容是将上述“关于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个别地区地方自治特别程序”的法律从过渡性法律转变为正式的宪法条文，纳入乌克兰宪法第15章。2015年8月31日，该修正案在议会获得通过，两州的特殊地位已铁板钉钉。

（四）明斯克协议中的地方自治安排

“顿巴斯”是指乌克兰东部及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煤矿地区，它包括乌克兰的卢甘斯克州和顿涅斯克州和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州（Rostovskaya

① “Rada puts Poroshenko-proposed bill amending constitution on plenary session’s agenda”, Ukraine News Agency : Interfax, <http://en.interfax.com.ua/news/general/211972.html>

② “Poroshenko’s constitution: False start of the constitutional process”, Ilko Kucheriv Democratic Initiatives Foundation (Ukraine), <http://pasos.org/wp-content/uploads/2014/07/focus-30.06-06.07.pdf>

③ 乌克兰议会通过法案 东部获三年“特殊自治权”，中国日报网，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4-09/17/content_18613468.htm

Obast)的一部分。从19世纪该地区煤炭业开始发展起来以后,顿巴斯地区就具有了一个强烈的地区身份了。乌克兰独立后,顿巴斯地区虽然被分割成俄罗斯部分和乌克兰部分,但两部分之间的联系不是轻易能割断的。

乌克兰独立后,顿巴斯地区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地位重要而成为乌克兰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据称,在庫奇马任总统时期,顿巴斯地区和中央政府有一个协议:中央政府允许这个地区一定的自治地位,以换取这个地区支持庫奇马总统。^①来自顿涅斯克的亚努科维奇在2002年当选为总理后,任命了大量来自顿涅茨克的官员到中央政府担任要职。在2010年总统竞选中,亚努科维奇也正是依靠顿巴斯地区选民的支持而当选总统。此后,顿涅茨克州及整个顿巴斯地区的重要性被再次提升。导致一些学者认为,顿巴斯不仅是乌克兰内部的一个独立部分,而且是与乌克兰平起平坐的一部分。^②但在独立后乌克兰的制度中,该地区并不享有特殊地位,甚至连法律中规定的普通的自治也无法实现,这使顿巴斯民众越来越不满。在失去了政治依靠亚努科维奇之后,他们的不满立即被引爆了。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顿巴斯地区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的地位问题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最终演绎成了旷日持久的内战。两州与乌克兰中央政府在2014年9月5日和2015年2月12日分别达成了两个明斯克停战协议。两个停战协议除了如何在实施协议方面有所差别外,协议内容本身基本一致。关于乌克兰地方自治方面的内容,明斯克协议涉及的只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自治地位而未涉及其他地区的自治制度。明斯克协议规定:在乌克兰启动宪法改革,制定一个新的宪法;新制度应考虑到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的特殊性,让其自行决定俄语在其自治范围内的地位;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州政府的行政、司法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应由两州内部选举产生而非由中央政府任命;中央行政机构应与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缔结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协议;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地区将举行自由的地方选举。

① Hans Van Zon, “Is the Donetsk model sustainable?”, *Geographia Polonica*, 2005, Vol. 78, No. 2, p. 79.

② Osipian Ararat L., Alexandr L. Osipian, “Why Donbas Votes for Yanukovych: Confronting the Ukrainian Orange Revolution”,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006, Vol. 14, No. 4, pp. 495-517.

国家将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支持等。明斯克协议的核心是乌克兰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特殊地位。

（五）东部省份的自治要求

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对乌克兰中央政府就宪法改革的“微调”措施非常失望，两州都希望能够获得高于其他地区的特殊地位，包括保留一定的武装部队，享有一定的外交权力，例如可以独立和外国签署一些合作协议，可以决定自己的语言政策等。

2015年5月，“卢甘斯克共和国”和“顿涅茨克共和国”向乌克兰宪法改革委员会提交了宪法改革建议，建议反映了两“国”对于自身地位的主要要求：确保乌克兰军事上不结盟（即暗示不能加入北约），允许冲突地区——顿巴斯成立地方警务力量，保证俄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在乌克兰东部建立特别的经济体制等。6月，两“国”再次抛出宪法修正建议，要求给予东部地区更大的权力，例如中央政府无权干预地方官员的去留，中央不能武装干预地方事务等。这些显然是乌克兰中央政府难以接受的，例如在结盟方面，乌克兰总统早已多次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乌克兰将加速加入北约的进程；在国家结构方面，波罗申科总统也多次表示，反对俄罗斯和东部省份将乌克兰“联邦化”的企图。

（六）“波兰模式”的地方自治建议

2015年初，现任议长、地方自治改革的实际推行人赫斯曼（Volodymyr Hroysman）提出，乌克兰应该采取“波兰模式”的地方自治结构，改革措施必须在9月前实施，地方选举须在10月份举行。^①“波兰模式”也是波罗申科总统所大力支持的，早在2014年6月5日访问波兰时，他就华沙发表讲话声称，乌克兰宪法改革将学习“波兰模式”。2015年4月5日，在乌克兰宪法改革委员会的会议上，波罗申科再次表示，“乌克兰政府将按照自

^① Adriana Skorupska, Piotr Kościński, “Ukraine: Local Government Reform Accelerates, but Slowly”, *PISM (the 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Bulletin*, 2015, No.17, p.749.

己的计划下放权力，我们有可能会效仿波兰。”^①

此后，“波兰模式”地方自治成为乌克兰地方自治改革的方向。目前，乌克兰中央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和学习地方自治的“波兰模式”，波兰也派遣了一些工作组到乌克兰指导其地方自治改革。

那么，地方自治的“波兰模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

波兰在1997年新宪法生效后，即于1998年启动了新宪法框架下的地方自治改革。主要内容是调整地方行政区划、改革地方机构、下放权力、向地方转移部分税收等。

波兰宪法第3条规定，波兰是单一制国家，同时第15条规定，波兰的行政区划是以确保公共权力下放为基础的。宪法第163—172条规定了地方政府的设置及其权力。此外，涉及自治地方权力的法律还有“地方自治法”、地方选举法等。

根据宪法精神，波兰设置了三级地方政府：省（województwo）、县（powiat）和社区（gmina）。根据2013年的统计，波兰有16个省、380多个县、2479个社区（包括镇、村即较小的市）。^②省级地方政府既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行政机构，又是地方行政机构，省级不另设地方自治机构。而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即县、市、镇、村等地方政府机构，本身就是地方自治机构。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关系以平行关系为主，垂直关系主要存在于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间。

波兰宪法第163条规定，地方（自治）政府掌管所有未赋予其他机构的职权之内的所有公共事务；第164条规定，最基本的自治机构是社区，它掌管该区域的所有公共事务。因此，“社区”就成为波兰人民实行地方自治的主要机构。根据波兰宪法第166条，地方政府除了推行地方的公共政策之外，还需要贯彻中央的一些政策，但中央并不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而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式推行其政策。如果地方自治机构之间，地方自治机构和省政府、中央政府之间存在冲突或纷争，可以通过司法解决。

① 王晓薇：“联邦制公投：乌克兰的无奈选择”，中国新闻网，<http://www.ifengnews.com/news/china/2015-04-08/7058.html>

② Adam Sauer, “The System of the Local Self-Governments in Poland”,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Poland), Research Paper, December 2013.

在资金来源方面，地方政府除了自己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外，还能从中央政府获得一部分补贴（第167条）。地方政府还有自己的财产和经济资源，自治政府对本地方的预算和开支享有自主权，只有外交、安全事务地方无权管理。自治地方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主要官员，都由自治地方的选民选举产生，波兰的第一级地方政府——省政府权力很小，而第三级地方具有较大的权力，这和乌克兰正好相反。

然而在乌克兰，对于“波兰模式”的地方政府改革也存在一些反对意见。最大的反对者是东部省份，因为“波兰模式”忽视了它们的特殊地位。部分受到俄罗斯支持的分裂主义者也反对加强州以下地方的权力和削弱州的权力。^①

另外，波兰前总统克瓦涅夫斯基则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他的忧虑。2015年9月18日他在波兰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讲话中提到，他对乌克兰民主转轨中采取“波兰模式”有所担心，因为乌克兰并不具备波兰的“同质性”。^②克瓦涅夫斯基总统所指的“同质性”方面的差异，是指乌克兰存在着较高比重的非乌克兰族人口，而波兰的波兰族人口则高达总人口的98%。^③克瓦涅夫斯基总统暗含的意思是，乌克兰必须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做出特殊的制度安排，而不能像波兰那样，每个地区的地位整齐划一。

四、国际社会对乌克兰地方自治改革的不同声音

乌克兰地方自治制度不仅是乌克兰民主转轨中的重要一环，而且直接涉及乌克兰东部省份的地位、乌克兰俄罗斯族的地位和乌克兰今后的对外战略，因此国际上不同方面对乌克兰的地方自治，尤其是东部省份地位的争论十分激烈。

① Adriana Skorupska, Piotr Kościński, “Ukraine: Local Government Reform Accelerates, but Slowly”.

② “Prospects for Ukraine”, Radio Poland, September 18, 2015, <http://www.thenews.pl/Portal/ExternalSearchen.aspx?q=prospects%20of%20ukraine>

③ 高德平编著：《波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一）欧盟和欧洲委员会的立场

欧盟及其成员国和欧洲委员会，偏重于乌克兰通过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变革实现长治久安，因此比较关注乌克兰的地方自治制度和地方自治改革。为此，欧盟倾向于推动乌克兰向其东部省份做出让步，以便在实现和解的基础上推动制度变革。

地方自治制度是乌克兰实现民主的重要一环，也是乌克兰践行“欧洲地方自治宪章”以及欧盟与乌克兰的联系国协定的重要环节。^①

2014年2月11日，时任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指出，乌克兰需要的是一个“2004+”宪法，新宪法必须革除2004年宪法的不良因素，例如取消一些政府机构过多的权力。^②2014年4月10日，欧洲委员会下属机构威尼斯委员会也表示，希望乌克兰按照欧洲的价值观念改革宪法，实现权力制衡与司法独立。^③

2014年3月及6月、欧盟与乌克兰分别签署了联系国协定的政治部分和经济部分，并于2014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成为欧盟联系国后，欧盟取消了乌克兰商品进入欧盟的关税。欧盟也正在通过睦邻政策框架和与乌克兰的联系国协定框架向乌克兰进行拨款，以支持乌克兰的地方经济、社会建设。2014年3月5日，欧盟向乌克兰援助111.75亿欧元，以帮助乌克兰经济渡过难关；同时欧盟还计划在2014-2020年期间给予乌克兰15.65亿欧元的援助，以支持乌克兰的改革；在援助乌克兰的同时，欧盟也要求和协助乌克兰进行民主化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地方自治改革。^④

然而，随着乌克兰局势从短期危机向长期危机的方向发展，欧盟、欧洲

① Council of Europe, “Local and regional democracy in Ukraine”, Strasbourg, 2013, <https://wcd.coe.int/ViewDoc.jsp?id=2113065&Site=COE&BackColorInternet=C3C3C3&BackColorIntranet=CACC9A&BackColorLogged=EFEA9C>

② “Remarks by EU High Representative Catherine Ashton at the AFET Committee”, http://eeas.europa.eu/statements/docs/2014/140211_02_en.pdf

③ “Resolution by the Council of Europe’s Parliamentary Assembly 1988: Recent developments in Ukraine: threats to the functioning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http://mfa.gov.ua/en/news-feeds/foreign-offices-news/21452-rezolyucija-parlamentsykoji-asambleji-radi-jevropi-1988-2014-ostannij-rozvitok-podij-v-ukrajini-vikliki-funkcionuvannju-demokrati-chnih-institutiv>

④ Steven Woehrel, “Ukraine: Current Issues and U.S. Policy”.

委员会逐渐对乌克兰失去耐心。例如 2015 年 6 月底，欧盟就呼吁乌克兰尽快给予顿巴斯地区特殊地位，同时要求乌方在冲突中率先让步。^①2015 年 7 月 10 日，波罗申科总统在讲话中指出，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建议乌克兰总统继续宪法改革”，“尤其强调乌克兰宪法修改后要反映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某些地区的特别自治”。^②这表明欧盟认为在目前的乌克兰局势下，实现和平是第一要务。今后，欧盟很可能加大对乌克兰中央政府的压力。

（二）美国立场

美国比欧盟更积极支持对乌克兰中央政府的经济、政治支持和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主张武装乌克兰，支持乌克兰中央政府对东部省份军事力量的打击，并力争拉乌克兰进入北约，从而实现对俄罗斯的战略优势。而对于分权和地方自治改革，美国关注相对较少。2014 年 3 月 4 日，乌克兰危机之初，美国国务卿克里刚刚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时就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政府提供 10 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该国渡过经济困境。在此之前，美国已宣布暂停与俄罗斯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以及与俄罗斯的贸易和投资谈判。^③

2014 年 12 月，美国通过《2014 年乌克兰自由支持法案》。法案决定，美国将给予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三国“北约之外盟友”的地位；在 2015 财年划拨 3.5 亿美元向乌提供反坦克炮和穿甲弹等武器装备，并赋予美国总统向乌提供军事设备的权力；划拨 5000 万美元专项基金，通过欧洲“回流”天然气的方式向乌提供紧急能源支持，并帮助乌克兰维修能源基础设施等。^④俄罗斯认为，该法案是美国针对俄罗斯的公然对抗政策

2015 年 7 月 15 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 15 日敦促乌克兰

① “欧盟建议基辅尽快给予顿巴斯特殊地位 乌反唇相讥”，人民网，2015年6月25日，<http://www.tdcm.cn/news/gj/484602.shtml>

② 新华网：“美国施压 乌克兰拟给东部更大自治权”，2015年7月17日，<http://money.163.com/15/0717/13/AUNTT1AF00254TI5.html>

③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 叫板俄罗斯”，国际在线专稿，2014年3月5日，<http://gb.cri.cn/42071/2014/03/05/6071s4448897.htm>

④ “俄称美通过‘支持乌克兰自由’法案为公然对抗”，新华网，2014年12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2/13/c_1113627260.htm

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以落实明斯克协议。显然，美国也希望乌克兰中央政府尽快对东部省份做出让步，以缓和乌克兰危机，消除俄罗斯浑水摸鱼的可能性及俄罗斯干涉乌克兰冲突的正当性。

（三）俄罗斯立场

俄罗斯关注的重点是东部省份的地位问题，俄罗斯希望乌克兰的修宪问题及乌克兰东部省份地位问题必须参考乌克兰俄罗斯族人的意见，而不应仅仅由欧盟及受到欧盟影响的乌克兰中央政府来决定。

2014年初，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只搞“权力下放”或只实行地方自治，而是要求乌克兰“联邦化”，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2014年3月29日，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要求乌克兰实行“联邦化”的宪法变革，新宪法应规定乌克兰成为一个中立国；在国家结构方面实行联邦制，各联邦主体在经济、金融、文化、语言、教育以及对外经济文化联系方面具有广泛的自治权；同时，俄语应成为乌克兰的第二官方语言。乌克兰成为“联邦制中立国”当然有利于俄罗斯，因为乌克兰将被完全削弱，而俄罗斯则可以自由地与乌克兰每个“联邦主体”发展紧密关系，并借此影响乌克兰局势，甚至为未来可能的“兼并”埋下伏笔。

据俄罗斯塔斯社2014年10月9日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调，在乌克兰宪法改革中，应充分加强基辅与“卢甘斯克共和国”和“顿涅茨克共和国”代表的协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全面的政治对话，即要让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政治力量参与政治对话。^①俄罗斯此举是希望借助乌克兰境内所有地区的俄罗斯族影响乌克兰局势。

在2015年2月15日生效的新明斯克协议中，俄罗斯同意乌政府在2015年年底全面恢复管控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作为交换条件，协议要求乌克兰在同年年底完成宪法变革，赋予东部地区更多自治权，包括组建独立警察部队以及与俄罗斯开展自由贸易。^②

^①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volving all political force needed to settle Ukrainian crisis”, FM. Russian News Agency: TASS, <http://itar-tass.com/en/world/753620>

^② “盘点四国峰会都谈出了哪些成果”，新华网，2015年2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2/14/c_127493962.htm#pinglun

尽管俄罗斯近来避免使用“联邦制”这种刺激性字眼，但有分析认为，即使俄罗斯未能迫使乌克兰采取联邦制，俄罗斯也会极力推动这两个州的独立性，以保留其并入俄罗斯的可能性。俄罗斯的这种做法并不是首次，它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共和国及阿布哈兹共和国、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东岸共和国，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①

（四）联合国立场

由于乌克兰国内冲突的重要利益方俄罗斯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其立场与美国、英国、法国等常任理事国立场迥异，使联合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未能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安理会 2014 年 3 月 15 日就美国起草的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决议草案举行投票表决时，就由于俄罗斯的否决而未获通过。2014 年 11 月 12 日，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临时助理秘书长托伊贝尔·弗兰森日说，乌克兰东部近期冲突持续增多，面临陷入大规模冲突的危险。他呼吁，鉴于乌克兰议会选举结果已公布，各方应全面履行明斯克协议，新执政联盟应与反对党联盟建设性合作，尽快实施此前承诺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改革，这对于乌克兰团结稳定很关键，同时希望乌克兰立即展开全面的民族对话，以解决当前重要问题。^②

除了呼吁和谈、推动执行新明斯克协议外，联合国还会同德国、波兰、瑞士等国派出工作组到乌克兰，协助乌克兰加强地方基础设施和市民社会组织建设，为推行真正的地方自治和全面改革奠定基础。

结 语

乌克兰地方自治制度是涉及乌克兰所有地区的一项制度，但目前，顿巴斯地区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将获得何种程度的“特殊地位”并没有真正解决。从目前局势发展来看，乌克兰中央政府要想让这两个“共和国”接

① Steven Woehrel, “Ukraine: Current Issues and U.S. Policy”.

② “联合国官员呼吁乌克兰各方全面履行明斯克协议”，新华网，2014 年 11 月 13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13/c_1113224510.htm

受与其他州一样的自治地位是不可能的，甚至要这两个州接受过去类似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自治地位也是不可能的。^①

目前，乌克兰中央政府已经接受这两个省份应享有“特殊地位”，很可能接受在这两个省份实行“联邦制”。但不论是否实行局部联邦制，这两个省份都将实现高度自治。问题在于，高度自治是否意味着允许有独立的武装和一定的外交权力，这两点将是今后中央政府与顿巴斯地区博弈的关键。对于乌克兰中央政府来说，最担心的事情是，给予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特殊的自治地位是否会导致“癌症扩散”，引起其他省份，尤其是俄罗斯族人口占多数的省份的效仿？这种担心也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奥德萨州就已出现了要求独立的声音。

在乌克兰其他地区的自治制度方面，由于乌克兰已启动“西向”外交，乌克兰国内东西方力量平衡态势已被打破，今后，欧盟及其成员国、欧洲委员会对乌克兰国内制度的影响将大于俄罗斯的影响。今后，乌克兰实行与欧盟国家程度类似的自治，逐渐践行“欧洲自治宪章”的要求，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而选择“波兰模式”的可能性最大。

但即使实行“波兰模式”，也需要扫除一些比较大的阻力，包括中央、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中央政府是否有魄力废除派驻地方的“总统代表”；大幅度的行政机构重组和财政重组，需要耗费乌克兰大量人力和财力，而且还涉及很多法律的变化，尤其是“预算法”和“税收法”需要进行大幅度的修改；议会内外的各个党派，尤其是反对派，有可能采取一些手段阻止改革的顺利进行；修改宪法第119条、第133条、第142条是否能获得议会2/3（300/450）多数的支持等。^②这些问题解决以后，还需要根据乌克兰国情对“波兰模式”进行必要的改进，但这些技术性问题的则可以参考“一揽子改革计划”和“乌克兰地方政府及地方机构权力设想”。

① 过去，克里米亚尽管是乌克兰国内的“自治共和国”，有高于其他地区的独立性，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行政长官仍需要获得中央批准后才能任职，中央政府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干预和左右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政策和法令；同时俄语也并不是该“共和国”的第二官方语言，尽管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曾经多次请求乌克兰中央政府允许其实行特别的语言政策。

② Sean R. Roberts, Oleksandr Fisun, “Local Governance and Decentralization Assessment: Implications of Proposed Reforms in Ukraine”.

2015年4月6日，乌克兰宪法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波罗申科总统发表了演讲。他说：“如果大家认为有必要，我准备就国家体制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实行联邦制的想法就像是生化武器一样具有传染性，乌克兰也正在受到传染。”^①这表明，乌克兰中央政府已经改变了态度，正在尝试接受此前一直反对的“联邦化”。但波罗申科反对使用“联邦化”一词，仍然坚持“权力下放”的说法。同时，波罗申科也强调，未来乌克兰的地方权力下放也不会涉及国防、安全和对外政策领域。乌克兰政府仍将担负保障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责任。^②而基辅方面不愿意下放的这些权力，却是莫斯科方面在明斯克协定中所极力要求的权力，也是“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正在努力争取的权力。

在短期无法确定东部省份地位的情况下，乌克兰也可能暂时冻结东部省份地位问题，而首先解决其他地区的地方自治问题——那些俄罗斯族人口占较高比例的州也应归为此类地区，但需要在俄罗斯族语言文化方面给予那些州一定的自主权。不过，有人指出，需要警惕的是，东部省份地位问题的解决拖得越久，“癌症扩散”的可能性越大。乌克兰中央政府需要早日认识到这一点，尽早做出必要的让步，以退为进，包括接受局部“联邦制”的方案，或接受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采取英国、匈牙利模式的地方自治，而在其他地区采取法国、波兰模式的地方自治，甚至可以接受东部省份成为享有一定外交权力及有限制的武装部队的自治共和国。只有这样，乌克兰才能避免陷于瘫痪而成为大国砧板上的“鱼肉”。

【 Abstract 】 The system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Ukraine was establish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1 century, however, it turned out to be a poorly implemented system in reality. The system became an event under spotlight and a key issue in Ukrainian politics since Ukrainian crisis at the end of 2013. The level of autonomy of eastern provinces and the system of local

① 王晓薇：“联邦制公投：乌克兰的无奈选择”，中国新闻网，2015年4月8日，<http://www.ifengnews.com/news/china/2015-04-08/7058.html>

② 同上。

self-government of other provinces are two aspects of the system of Ukrainian local self-government. Today, the status of eastern provinces should make clear, the Polish Model implemented in other provinces should be reinforced, and the level of autonomy of provinces with Russian majority should also set. Only doing so, a better system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could be set up, and Ukraine might come through from the crisis as soon as possible.

【 Key Words 】 Self-government Polish Model,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Federalism

【 Аннотация 】 Украин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была образована в начале 21 века, однако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а адекватно реализована на практике. После кризиса в Украине в конце 2013 г. реформа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стала ключевым вопросом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Украине. Вопросы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Украины включают в себя вопросы автономного статуса восточных районов страны и системы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других регионов.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прогресс в вопросах статуса восточных провинций, выход из тупика не найден до сих пор.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всем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ным сторона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в кратчайшие сроки достигнуть соглаш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получения украинскими восточными районами автономного статуса. Другие районы движутся вперёд по «польской модели», но им всё ещё необходимо решить некоторые конкрет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Кроме того, необходимо также учитывать автономный статус «серой» зоны, на которую приходится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этнически рус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Только путём скорейшего решение этих трёх проблем, более соверш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может быть успешно установлена, и Украине удастся в кратчайшие сроки преодолеть кризис.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Местно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льская модель, высокая степень автономии, федерализм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6 年第 2 期

(总第 198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定价：30.00 元